

斯大林研究

第 4 辑

1995

中央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斯大林研究

第 4 辑

1995

中央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斯大林研究(第4辑)

- 主办单位** 中共中央编译局
主 编 岑鼎山
编辑者 《斯大林研究》编辑部 电话 6033377—301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发行单位 《斯大林研究》编辑部发行组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33)
银行户名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部 帐号 890684—82

斯大林研究

目 录

新文献

-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续)…………… (1)
斯大林家书及有关材料 …………… (15)
斯大林青少年时期诗六首 …………… (34)

传记与回忆

- 反李森科学派斗争的史料(续)…………… (40)

理论探讨

- 空想家的利己主义 …………… 亚·齐普科(64)

人物与事件

1937年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材料

- 2月23日晚间会议…………… (82)
2月25日午前会议…………… (110)
2月25日晚间会议…………… (155)

关于所谓的“克—罗”案件 (迫害苏联知识分子的一段历史)	(192)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总部”案件	(214)
托洛茨基笔下的斯大林	
约瑟夫·斯大林——评传习作	(237)
克里姆林宫的超级博贾	(256)

斯大林与中国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1949年1月)	(275)
同毛泽东同志谈话笔记	
——摘自尤金日记	(287)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续）

24

致莫洛托夫^①、伏罗希

洛夫、奥尔忠尼启则

1. 李可夫的讲话你们看过了吗？我认为这是一个假装“忠诚”和“同情”苏维埃的党外苏维埃官僚的讲话。通篇只字不提“党”！只字不提右倾！只字不提党的成就（这些成就现在被李可夫据为己有）是在同右倾分子，也包括同李可夫的斗争中取得的！我们所有发言的负责人一般都认为自己有责任谈一谈右倾分子，有责任号召同右倾分子作斗争。而李可夫竟像没有这个责任似的！试问，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理由？你们怎么能容忍（也可以说包庇）这种政治上的伪善态度呢？你们是否明白，你们容忍这种伪善态度，就会造成李可夫已脱离右倾分子的假象，从而使党产生错觉？而众所周知，李可夫过去和现在都不想脱离右倾分子。今后是否应该让李可夫作出抉择：要么公开地老老实实在地同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划清界限，要么失去代表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行

① 在斯大林的信的左上角有莫洛托夫的亲笔附言：“我完全同意这里谈到的一切看法。李可夫的讲话我没有看，只是翻了翻标题，我会看的。但即使是现在我也认为斯大林是正确的。只是不同意说我们‘包庇’李可夫。但必须像斯大林建议的那样改进工作。

维·莫洛托夫

10月3日”

事的权利。我认为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中央不能拒绝的最起码的做法，要是中央不想冒否定自己的危险的话。

2. 听说李可夫仍然每星期一和星期四在你们那里主持会议。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你们为什么容许这种闹剧？谁需要这样做，为了什么？不能结束这种闹剧吗？难道还不到结束的时候吗？

3. 我打算在索契再住一个星期。你们的意见如何？如果你们要让我回来，我可以立即返回。

敬礼！

斯大林

1929年9月30日

25

1930年8月2日

维亚切斯拉夫：

想必你已经收到了格罗曼、康德拉季耶夫和马卡罗夫的新供词。亚戈达已把这些供词带给我看了。我认为，应该把所有这些供词加上格罗曼的第一次供词分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以及我们那些最积极的经济部门负责人^①。这是头等重要的文件。

握手！

斯大林

^① 1930年8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那些因“劳动农民党”案件被捕的人的供词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

(1930年8月6日以后)

维亚切斯拉夫：

8月6日的来信收到了。

1. 我反对派米尔佐扬^①去红色工会国际，因为我一贯反对，并将继续反对从州里，特别是像乌拉尔这样的州里抽调人，因为这个州发展迅速，正是用人之际。

2. 同硬币匮乏的斗争结果几乎没有什么意义。28万卢布，简直不值一提。看来，揪出几个出纳员就心安理得了。问题不仅仅在于几个出纳员。问题在于皮达可夫、布留哈诺夫及他们周围的那些人。无论是皮达可夫，还是布留哈诺夫都赞成进口白银。无论是皮达可夫，还是布留哈诺夫都曾大肆鼓吹进口白银的必要性，并在副手（或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我们在星期一的会议上否决了该项决议，骂他们是财政破坏分子的“尾巴”。现在就连瞎子都清楚，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措施是由尤罗夫斯基（而不是布留哈诺夫）主持制定的，而国家银行的“政策”则是由那些被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政府”策动的国家银行机构中的破坏分子（而不是皮达可夫）主持制定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1）要彻底清洗政财人民委员部机关和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不管那些行为可疑的布留哈诺夫—皮达可夫型的共产

^① Л. И. 米尔佐扬 (1897—1939) —— 1929—1933年任联共（布）彼尔姆区委书记，乌拉尔州委第二书记。

党员怎样哀号，(2)一定要把这些机构中的破坏分子枪毙掉20—30个，包括几十个不同类型的出纳员，(3)要继续在苏联全境进行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的回笼硬币（银币）的运动。

3. 我认为对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萨德林一案应当十分认真地侦查，不要着急。此案非常重要。该案的全部文件应当分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我相信，这些先生与右倾分子（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之间的直接联系（通过索柯里尼柯夫和泰奥多罗维奇）定会暴露出来。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和另外两个坏蛋一定要枪毙。

4. 一定要把破坏肉食品供应的整个破坏分子集团都枪毙掉，并将此消息在报上公布^①。

5. 你们真的决定现在就发行镍辅币吗？如果真是这样，这是错误的。此事需缓一缓再说。

6. 真的从英国进口了很多皮鞋（花掉几百万卢布）吗？如果真是这样，这是错误的。

7. 北美合众国决定进口我们的木材，这很好。我们的坚定立场取得了成果。对波格丹诺夫^②的处理暂时等等再说。

8. 同意大利的条约是个有利条件。德国也会步其后尘的。顺便问一下，德国贷款一事怎么样了？

9. 请竭尽全力加紧粮食出口。这是当前的关键。如果我们把粮食运出去，贷款也就有了。

① 1930年9月25日一些报纸报导，全苏肉品工业联合公司、全苏鱼品工业联合公司、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等部门的48名专家以“破坏工人供应的坏分子”这一罪名被枪决。

② 彼·阿·波格丹诺夫（1882—1939）——1905年入党。1930—1934年是苏美贸易股份公司的领导人。

10. 请注意斯大林格勒和彼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① 的事态。那里的情况不妙。

就写到这儿，握手！

斯大林

27

(不早于 1930 年 8 月 23 日)

维亚切斯拉夫：

1. **国家工业** 10 个月总计增长 26% (不是 32%)。这个结果不妙。你谈了对应的工业财务计划和中央的号召。我认为只要能达到 30—32% 的增长率，就可以放手去干。我担心现在说这些已为时过晚，——反正 10 月份 (年底) 以前是不会作大的修改了。或许可以试试看？也好，试试吧。看来，应该试一试。

2. 我们还剩下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出口粮食：从 10 月底起 (或许更早) 美国粮食将开始大量上市，我们很难竞争得过美国粮食。如果我们在这一半月内不能出口 1.3—1.5 亿普特粮食的话，那我们的外汇情况将会非常不妙。再说一遍：必须全力以赴加紧粮食出口^②。

3. 一定要把苏汉诺夫、巴扎罗夫和拉姆津抓起来。应该

① 关于斯大林格勒工厂和普梯洛夫工厂的拖拉机制造问题在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 1930 年 8 月 25 日、9 月 5 日和 25 日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② 粮食出口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 1929 年年底起波及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粮食价格急剧下跌。为了保证弥补因购置外国设备而不断增加的外汇支出，苏联政府不顾国内加剧的饥饿威胁加紧粮食出口。1930 年从征收到的 8.35 亿公担粮食中出口了 4840 万公担，而 1931 年从 6.95 亿公担中出口了 5180 万公担。

试探一下苏汉诺夫的妻子（共产党员！），因为她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家里发生的丑事。应该无一例外地将全部供词（不管是原有的还是补充的）分发给中央委员。加里宁是有罪的——对此不能有怀疑。供词中有关加里宁的一切情况全都属实。所有这一切必须通报中央，使加里宁今后不敢再和那些滑头来往。

4. 我收到了奥新斯基^①关于纳米^②的信。奥新斯基不对。我坚持自己的意见^③。理由将由克利姆告诉你。奥新斯基真是无耻之徒。

5. 附上关于马里乌波尔五金工厂^④的剪报。算下来这已是可恶的国家五金工厂设计院第四次的挑拨行为了。可不可以好好地惩罚一些罪犯呢？

（载于1930年8月23日《真理报》）

暂且就写这些。

握手！

斯大林

① 恩·奥新斯基（真姓名瓦·瓦·奥博连斯基）（1887—1938）——1929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② 指苏联汽车和汽车发动机科学研究所研制的汽车型号。

③ 奥新斯基与斯大林分歧的实质不清楚。1930年9月5日政治局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尽快为组建汽车制造独立研究所提供充分的根据。

④ 8月23日《真理报》刊登一篇简讯，报导了国家五金工厂设计院管理委员会审定了新成立的马里乌波尔工厂的规划，该工厂当时被称为是苏联最大的五金工厂，一期工程生产能力铸铁为81.6万吨、钢为110万吨。斯大林对预定的建设速度不够快和规模不够大非常生气。

1930年9月2日

维亚切斯拉夫：

1. 对托姆斯基“辞职”一事，我表示同意，因为在化学工业方面他什么都没有给我们提供^①。

2. 只有在我们准备将康德拉季耶夫“案件”移交法院的情况下，才应该在报刊上对该“案件”作出解释。我们是否准备这样做呢？我们是否认为需要把“案件”移交给法院呢？看来很难撇开法院。

顺便提一下：那些被告先生是否打算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从政治上唾弃自己，同时承认苏维埃政权是巩固的，承认集体化的方法是正确的呢？但愿如此。

3. 我同意要求那些帮助过格罗曼—康德拉季耶夫分子的共产党员作出答复，但对李可夫（他无疑帮助过他们）和加里宁（显然他是被泰奥多罗维奇这个卑鄙的家伙牵连进这个“案子”的）怎么办？对此应该考虑一下。

4. 终于使国家银行和烂透了的财政人民委员部里的那些“自由射手”起来揭发了。这太好了。加尔克林、卡克滕和其他人在国家银行都干了些什么？难道在所有的问题上大家都赞同皮达可夫吗？我认为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工农检察院对国家银行和财政人民委员部进行检查和打击之后，必须

^① 米·巴·托姆斯基因病要求解除其在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的工作的请求，于1930年9月6日得到政治局批准。

依靠这两个机关来改组国家银行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上层领导……

29

(1930年9月13日)

维亚切斯拉夫：

1. 必须立即将那些破坏肉、鱼、罐头和蔬菜供应的破坏分子的全部供词公之于众。我们为什么不公开这些供词，干嘛要“保密”？应当把它们公之于众并宣布，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已将此案移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该机构在我们这里类似于法庭）处理，一星期后再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名义发布消息：所有这些坏蛋都已被枪决。应当把他们统统枪决……

4. 关于留京我已给你发了密码电报。

5. 我们苏维埃中央领导班子（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副手会议）患了绝症。劳动国防委员会从务实的和战斗的机关变成了无聊的议会。人民委员会被李可夫那些空话连篇，实质上是反党的讲话搞得瘫痪了。原先是李可夫—索柯里尼柯夫—舍印曼^①司令部的副手会议，现在有可能变成与党中央对立的李可夫—皮达可夫—克维林或博哥列波夫（我看不出后两个人之间有多大差别）的司令部。显然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采取根治的办法。至于采取什么办法

^① 亚·李·舍印曼——1903年入党。20年代任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

——待我回莫斯科后再告诉你。而眼下要密切注视皮达可夫这个真正的托洛茨基右倾分子（索柯里尼柯夫第二），他现在是李可夫—皮达可夫联盟中危害最大的人物，代表了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者的康德拉季耶夫失败主义情绪。要是能让谢尔戈和米高扬提前结束休假返回就好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同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以及伏罗希洛夫）一起能够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副手会议中把李可夫和皮达可夫孤立起来。

6. 我的身体现在非常好。

握手！

约·斯大林

维亚切斯拉夫：

对今天的信作如下补充：

1. 我认为，对留京不能只是开除了事。应当在开除后过一段时间将其放逐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必须彻底打垮这个反革命魔鬼的斗志。

2. 我已同甘申谈过了。我认为，从为生产汽油而**增加裂化装置的数量**这一角度来看，一定要在9月份将石油问题提交政治局。没有石油我们将陷入困境。拖到10月份就晚了^①。

3.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取缔那些像老鼠般吱吱尖叫，说什么“普遍欠产”、“接连失败”、“挫折不断”等等胡话的刊物。这是歇斯底里的托洛茨基右倾分子的腔调，这种腔调已被材料证明是不正确的，是与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的。叫喊得最凶的是《经济生活报》、《真理报》、《工业化报》和在某

^①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在苏联发展裂化装置生产的建议于1930年10月5日得到政治局的赞同。

种程度上的《消息报》。这些报纸抱怨速度“下降”，“工人向农村倒流”，而不解释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工人怎么会一下子“突如其来地”向农村倒流，这种“灾难性的”流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许是因为食品供应不好？但是难道去年的供应就比今年强吗？为什么那时没有发生这样的流动，没有向农村倒流呢？工人去农村是为了参加收获，是为了不让集体农庄在分配收获的东西时漏掉他们，是为了当众在集体农庄劳动上一两个月，以此保证自己有权享有集体农庄一份完整的口粮，这些难道不清楚吗？为什么不写这些东西，而只是张皇失措地叫喊？顺便说一句，中央的《呼吁书》也错过了这个机会。

暂且就写这些！

握手！

约·斯大林

1930年9月13日

30

1930年9月22日

维亚切斯拉夫：

1. 我认为，必须在入秋之前彻底解决苏维埃领导班子的
问题。届时全部领导人的问题将一起解决，因为党的领导人
和苏维埃领导人是交叉兼职、分割不开的。关于这一点我的
意见如下：

(1) 必须免去李可夫和施米特的职务并取缔他们的整个
官僚主义的咨议性秘书机构；

(2) 你替代李可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必须这样做。否则苏维埃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之间就会脱节。只有这样安排我们才会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苏维埃和党的领导班子，这无疑会加倍增强我们的力量：

(3) 必须把劳动国防委员会从一个空谈机关变成一个战斗的、有作为的经济领导机关，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人数应大致减少到 10--11 人（主席、两名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财政人民委员、劳动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交通人民委员、陆军人民委员、商业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

(4) 应该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设一个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它的唯一的目的是对中央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它有权对无论是党员还是党外人士的官僚主义、不执行或无视中央决定的行为、组织不力、经营不善等情况立即直接**追究责任**。该委员会应当有权直接享用工农检察院（首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检察院和印刷部门提供的各种服务，没有这样一个有威信的，雷厉风行的委员会，我们就不可能打破我们机关的官僚主义和玩忽职守的铜墙铁壁。没有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改革，中央的指示往往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该委员会的领导人最好由谢尔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来担任。

(5) 现在的副手会议应予撤销，人民委员会主席同他的副手开会（吸收某些工作人员）可由其自行酌定。

所有这一切暂时仅限我们两个人知道，详情等秋天再谈。目前先在亲密朋友的小范围里考虑一下此事，并将不同意见告诉我……

4. 康德拉季耶夫“案件”暂缓移交法院。这样做并不完全保险。等到秋天再解决这个问题。10月中旬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有几点相反的看法。

暂且就写这些。

握手！

斯大林

31

致莫洛托夫同志

1. 老实说，我（以及伏罗希洛夫）不满意你去休假一个半月，而不是像在制定休假计划时说定的那样去两个星期。要是我知道你想去一个半月的话，我就会提出另外的休假计划了。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改变了计划。是躲避谢尔戈吗？难道你不明白，不能把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长期留给古比雪夫（他会酗酒）和卡冈诺维奇？不错，我对休长假表示过同意（在电报中），但是你清楚，我那是不得已而为之。

2. 我认为谢尔戈对维辛斯基的行为是无赖行为。你怎么能对他让步呢？显然谢尔戈是想用自己的抗议破坏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进行的产品配套运动。这是怎么回事？是卡冈诺维奇骗了我们吗？看来是他骗了我们。还不止他一个人。

敬礼！

约·斯大林

[1933年] 9月1日

维亚切斯拉夫：

你好！

1. 我同意，1934年的基本建设工程不应超过210亿卢布，而工业产品增长率不应超过15%。这样较妥。

2. 我也同意，根据1932年的粮食总产量应该征收6.98亿公担粮食。不得少于此数^①。

3. 谢尔戈（和雅柯夫列夫）在“产品配套”一事上的行为只能说是反党行为，因为这一行为的客观目的是保护党内反动分子反对联共（布）中央。的确如此，全国都在叫喊产品不配套；党已着手进行产品配套运动，即公开在报刊上进行讨伐；对那些肆无忌惮地恶毒破坏党和政府决定的党的敌人已经作出了判决，而应当对这些破坏行为负责的谢尔戈（和雅柯夫列夫）不是忏悔自己的罪过，反而打击检察长！这是为了什么？当然不是为了制止这些破坏党的决定的反动分子，而是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他们，向党的舆论证明他们是对的，并以此来诬蔑党正在展开的运动，也就是诬蔑中央的现行路线。

我给卡冈诺维奇写了一封信，出乎我的意料在这件事上他竟然站在党内反动分子一边。

4. 由于我的原因你要提前从休假地返回，这使我有些过意不去。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势必要把中央的工作长期留给卡

① 指苏联1934年国民经济发展控制数字被通过。

冈诺维奇一个人去做（古比雪夫会酗酒），这显然很轻率，何况卡冈诺维奇还要同时抓地方和中央的工作。一个月之后我将回到莫斯科，那时你可以再去休假。

5. 我依旧坚持你没必要去土耳其。让伏罗希洛夫和李维诺夫去吧^①。

握手！

约·斯大林

1933年9月12日

原载《共产党人》杂志1990年第11期

（王丽华译 翟民刚校）

^① 1930年9月20日政治局通过了回访土耳其的决定。

斯大林家书及有关材料

编者按：1994年2月3日，《俄罗斯报》从《史料》杂志编纂的《斯大林在家人中间》这本集子中选登了斯大林同亲属及有关人员的一些往来信件，以及其他与这些信件有关材料。现一并译出，予以刊载。

娜·谢·阿利卢耶娃^①

致叶·戈·朱加施维里^②

(1922年10月21日)

亲爱的妈妈：您好！

非常热烈地吻您并转达索索对您的问候，他现在身体十分健康，自我感觉非常好，工作很忙并且经常想您。

雅沙在上学，很淘气，会抽烟了，不听我的话；瓦西卡也淘气，老惹妈妈生气，也不听我的话，他烟倒是不抽，但是约瑟夫大概很快就会教会他的，因为约瑟夫总是拿烟给他抽。我们生活得很好。莫斯科的冬天很快就要到了。亲爱的妈妈，请写信告诉我您现在怎么样？身体如何？约瑟夫让我

① 娜·谢·阿利卢耶娃（1901—1932）——斯大林的第一个妻子。

② 叶·戈·朱加施维里（1859—1937）——斯大林的母亲。

代吻您。

热烈地吻您，瓦西卡让我代他热烈地亲吻奶奶。

您的娜佳

雅申卡吻您，保姆向您问候！

1922年10月21日

向瓦里亚问好！

斯大林致叶·戈·
朱加施维里

1923年2月26日

我的妈妈：

你的来信都收到了。祝你身体健康、结实。

近日内我们就会见面，祝你活上一千岁。

吻你！

娜佳问你好！

你的 索索

斯大林致叶·戈·
朱加施维里

1929年4月25日

我的妈妈：你好！

你近来怎么样？自我感觉如何？很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了——很显然你是在生我的气，但有什么办法呢，上帝呀，我

实在太忙了。

寄上 150 卢布——我已倾我所有。如果还需要钱，请告诉我，我尽可能寄上。向熟人们问好！

娜佳向你们问好。

祝你长寿！

你的 索索

斯大林致娜·谢·

阿利卢耶娃

(1928 年 4 月 9 日)

代我转告雅沙，说他的所作所为像一个流氓和骗子，我和这种人再也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他愿意去哪儿，愿意干什么，随他的便。

约·斯大林

1928 年 4 月 9 日

斯大林致娜·谢·

阿利卢耶娃

(1930 年 9 月 8 日)

塔季卡：

来信收到，书也收到了。我这儿没有梅斯科夫斯基的英语自学课本（按照罗森塔尔的方法编写的）。好好找一找给我寄来。

我已经去治牙了。拔掉了一颗坏牙，修了一下两边的牙，总的说来抓得很紧，医生打算在9月底给我治完牙。

我哪儿也没去，而且哪儿也不打算去。我感到好些了。我一定会复原的。

寄上几个柠檬，这东西你用得着。

瓦西卡怎么样？萨坦卡怎么样？

非常热烈地吻你！

你的 约瑟夫

1930年9月8日

娜·谢·阿利卢

耶娃致斯大林

（不晚于1931年9月12日）

约瑟夫：你好！

我已经顺利到达，莫斯科非常冷。也许是我刚从南方回来才有这种感觉，但的确挺凉了。

莫斯科更美了，但是有些地方像一个用脂粉遮盖自己缺陷的女人，尤其是雨天更是如此，雨后墙上的颜色一道道往下流。总而言之，要使莫斯科有一个像样的理想的外貌，当然不仅仅需要这些措施和条件，不过现在这已经是一种进步。

一路上使我感到不愉快的，是和我们去索契的数十俄里路上碰到的同样的那些事情，事情的确略微少些，也只是略微而已。我给基洛夫打了电话，他打算9月12日到你那儿去，但正在大力协调交通工具。他本人会把有关格罗特的一切统

统告诉你。莫斯科的街道已经好多了，有些地方甚至非常好。从特维尔大街到红场一带非常漂亮，教堂正在慢慢地拆除，但是圆顶的“神气”已荡然无存。

克里姆林宫里很干净，但是用作车库的院子却一团糟，什么也没收拾好，就连修理后的垃圾也没收拾。我感到这样很不好。总之，我婆婆妈妈地唠叨一定使你感到厌烦了吧。小组十分满意，因为我百分之百地遵守它的纪律，应该说，从第一天起我们就知道了各种新的规定，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迟到，不仅仅出于要百分之百遵守纪律。

对了，《消息报》报道的那件棘手的事已经查明：这是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案，因为这个教师身上带着用于购买数学研究室设备的钱。凶手是谁以及其他详情暂时还不清楚。这件事使全体教师感到非常沉痛，尽管这个教师是新来的。教师们仍满怀热情地投入了工作，尽管应该指出，学生和教师对于伙食的反映平平，“收尾工作”以及在这些事情中、主要是在起码的制服供应问题上出现的一些纯粹组织不力的情况使大家心烦意乱。商店里的物价很高，由此造成大量商品积压。

请别为我写得如此详细而生气，但我多么希望人们的生活中不再出现这些不如人意的事情，那样的话大家都会感到高兴，干起工作来也会非常出色。

寄上你要的电工技术书籍。增补版我已经订了，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拿到，下次再寄给你，德语读本也是如此——我把家里有的先寄上，成人读本下次再寄。

请你一定要好好休息，最好什么事情也不要做。

谢尔戈给我打来电话，不知是抱怨你骂他的那封信还是那份电报，但是看来他极为疲乏，我转达了你的问候。

孩子们都很健康，已经在莫斯科了。
祝你一切都好！
吻你！

娜佳

斯大林致娜·谢·
阿利卢耶娃

(1931年9月14日)

塔季卡：你好！

来信收到。你学会了写详详细细的信，这很好。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出，莫斯科的外貌开始变好了。终于开始变了！

《工人中等技术学校》**电工技术分册**收到了。塔季卡，请把《工人中等技术学校》**黑色冶金分册**给我寄来。一定要寄来（看看我的藏书——你从中一定能找到）。

索契没有什么新闻。莫洛托夫一家走了。据说加里宁准备来索契。这里的天气暂时很好，甚至非常好，只不过有点儿寂寞。

你现在怎么样？叫萨坦卡给我写信，瓦西卡也一样。

请继续“提供信息”。

吻你！

你的 约瑟夫

1931年9月14日

附言：我的身体正在复原，很慢，但正逐渐痊愈。

斯大林致 B. B. 马尔丁申

(1938年6月8日)

致马尔丁申老师同志

您介绍瓦西里·斯大林^①的不良行为的信收到了。谢谢您的来信。

由于工作缠身，所以拖了这么久才回信。请原谅。

瓦西里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能力中等，生性粗野（属粗鲁型！），有时不诚实，喜欢欺骗那些温和的“师长”，经常耍无赖，意志薄弱，确切些说是意志还没有养成。

各种各样的“干爹”、“干妈”们把他给宠坏了，动不动就说，他是“斯大林的儿子”。

我感到高兴的是，你毕竟是一位有自尊心的教师，像对待所有的学生一样对待瓦西里并且要求这个无赖遵守学校的全部规定。像您提到的那类校长正在把瓦西里毁掉，这些草包不应该呆在学校里。如果蛮横放肆的瓦西里还没有彻底毁掉的话，那就是因为我国还有一些不放纵纨绔子弟的教师。

我建议：**更严格地**要求瓦西里，不要怕这个任性的家伙以假“自杀”来恫吓和威胁。您在这方面将会得到我的支持。

很遗憾我不能亲自管教瓦西里。但我保证会时常过问一下他的事情。

敬礼！

约·斯大林

① 斯大林和第二个妻子生的儿子。

拉·帕·贝利亚致斯大林

(1938年12月8日)

致斯大林同志

我曾派工作人员去卡恰航校并带去了给校长——伊万诺夫旅长同志的一封信。这位工作人员在当地了解到，在得知瓦夏将到航校学习的消息之后，该校的领导们为他破了例，没有按照为学员制定的统一条件安排他。

瓦夏到达塞瓦斯托波尔城时，航校的政委——谢苗诺夫团政委同志和一位特别部工作人员到车站去迎接他。在去学校的路上瓦夏对谢苗诺夫同志说：“爸爸今年要来塞瓦斯托波尔休假，大概会顺便来卡恰”。

瓦夏被安排在被称为“学校宾馆”的招待外来人员的单独小楼里，而不是安排在学员的宿舍里。

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为他在军官食堂里单独开伙，有一次瓦夏订了一道东方菜，但当地的厨师都不会做，就专门派人去塞瓦斯托波尔去打听，怎样做这道菜。

瓦夏坐着航校领导们提供的汽车去过塞瓦斯托波尔和穆赫拉特卡3—4次，用高频电话给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第一处打过电话。

今年11月24日，瓦夏和该校参谋长格拉西缅科在校园里骑摩托。瓦夏摔倒了，脸和手臂轻微擦伤。格拉西缅科应瓦夏的请求把这件事向校领导隐瞒了几天。

在编班之前，由老师单独辅导瓦夏学习飞行理论，研究“Y—2”飞机和“M—11”马达的材料以及条令。

我在写给卡恰航校校长伊万诺夫同志和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雅库舍夫同志的信中作了如下指示：

1. 公开的警卫不能允许设立，应予撤销，设立秘密警卫以保证瓦夏的人身安全和健康；

2. 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应是帮助他很好地掌握学校的课程和遵守学习纪律和日常纪律，而不应是为他提供某些破坏航校现行制度和内部规定的特殊条件。

拉·贝利亚

1938年12月8日

斯韦特兰娜·阿 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40年8月22日于索契

我可爱的、亲爱的爸爸：你好！

你现在怎么样？身体如何？我和瓦夏不在你是否感到寂寞？亲爱的爸爸，我非常想念你，一直在等你来，可你却一直也不来。我“明显地感到”，你又欺骗了我，借口没有接到指示不会来了。唉……

1号书记同志欺骗自己的小女主人，这很不好。

听说莫斯科的天气很不好，时冷时热，阴雨连绵，这里的天气很好；29日我去莫斯科，31日回来。

我们9月2日开始上课，因为1号是休息日——星期天。现在的地理课又变得单调而乏味：新增了5个共和国，国土

扩大了，人口增加了，工业企业的数量也增加了，可教科书呢，还是 1938 年的。况且我们今年学的是苏联经济地理，——而教科书中许多许多内容都没有。这本教科书我看到了；尽管课本有两指厚，可尽是些没用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所谓的艺术装帧：各种照片和风景，如索契、马采斯塔和所有疗养地的风景，总之尽是些谁都不需要的画片。

对了，你喜欢空军阅兵式吗？是比去年精彩，还是老样子？不久前我去了旧马采斯塔，那里的路修得特别棒：又直又平又很漂亮。这条公路太棒了！总之，索契变得干净整洁了，甚至有些光彩夺目。

我不记得，我是否写信告诉过你，我坐了客运快艇。报纸报道说这种快艇时速 90 公里，可这艘快艇的时速还不到 65 公里。但这也很好。糟糕的是，稍有一点小风浪，它就不开了，因为浪会把它摧毁，原因就在于它是由横梁连接的双体船。船上可容纳 50 人。

亲爱的爸爸，请你一收到我的信就马上给我回信，要不然你就会忘了或者忙着干别的事，而且我也要回来了。

好吧，最最热烈地吻你，我亲爱的爸爸！

盼早日见面！

你的 **斯韦特兰娜**

8 月 22 日

热切地向我所有的书记问好！

斯韦特兰娜·阿 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41年9月19日于古比雪夫)

我亲爱的爸爸、我可爱的爸爸：你好！

我亲爱的小书记，你现在怎么样？我在这里已经安排好了，开始上学了。所有的孩子都是莫斯科来的，有许多熟人，所以我并没感到寂寞。

亲爱的爸爸，当我出门在外时总是想你，但是现在我不知为什么特别想上你那儿去。如果你允许的话，我会马上坐飞机去你那儿呆上两三天（“道格拉斯”每天都飞莫斯科）。坐火车让人太腻烦。如果你允许的话，我马上就飞去。

不久前马林科夫的女儿和布尔加宁的儿子飞到莫斯科去了，如果他们能坐飞机，我为什么不能坐呢？他们和我一样大，哪儿也不比我强。

这里的天气本来不错，很暖和，可现在却冷起来了，阴雨连绵。我不太喜欢这个城市，像所有的港口城市一样脏乱，到处尘土飞扬，不知为什么有许多瘸子、盲人、肩膀歪斜和手脚畸形的人以及其他的残疾人。街上几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残疾人。还有许多乞丐和流浪儿。

（战时）有许多人从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敖德萨和其他城市来到古比雪夫。当地人明显地恨这些外来人。他们认为外地人是食品价格上涨、经常短缺以致不得几个小

几个小时排队的罪魁祸首。古比雪夫的居民还说：“我们这儿尽来些穿戴入时、花枝招展的女人，所以希特勒又要往这儿扔炸弹了”！

噢，爸爸，我是多么想回莫斯科，哪怕呆上一天也行啊！！爸爸，德国人怎么又在不停地推进？！什么时候才能好好教训他们？！总不能把所有的重要工业区都给他们占领呀！

我等你批准我飞回莫斯科。只去两天！最最热烈地吻你！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所以没有打电话。如果你想给我打电话，那就在（晚上）9点到12点打。其余时间我在学校。上午也可以打——从10点到2点。

斯韦特兰娜

9月19日于古比雪夫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1943年5月26日）

致红军空军司令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同志

我命令：

（1）立即撤销瓦·约·斯大林上校空军团长的职务。除非有我的任命，否则不能让他担任任何指挥职务。

（2）向全团和前上校团长斯大林宣布：斯大林上校因纵饮无度和败坏团队纪律而被解职。

（3）上报执行情况。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1943年5月26日

米纳相少校关于雅·约· 朱加施维里的证明

(1945年3月12日)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遣返侨居西欧的苏联公民代表处
巴黎市第16区阿贝尔将军街4号

证明

炮兵大尉雅科夫·约瑟福维奇·朱加施维里（苏联元帅斯大林同志的儿子）和我一起曾在南巴伐利亚小城戈梅尔堡附近的集中营里呆过。这里拘禁着各国战俘，其中有苏联、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军官。这个集中营里还关押着27名苏联将军和许多工农红军的高级军官。

1942年4月起雅科夫·朱加施维里被关押在这个集中营里，直到1942年6月后被转移到另外一个我不知道的集中营里。许多苏联军官都认识雅沙·朱加施维里本人。他在戈梅尔堡集中营的时间很短，但表现坚强并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是一位英勇不屈的苏联军官，无愧于伟大父亲——斯大林元帅同志的儿子。他吃的与其他苏联军官吃的一样，即：150克煮过的“粮食”，每天一次不加调料的元白菜汤。

德国人利用他的特长，让他在集中营里干一些日常事务；他干过骨雕。他用马骨头雕刻人物、象棋、烟斗等。

法西斯报纸的摄影记者和盖世太保的人每天都来找他，逼雅沙说出对他们有用的情报，但均遭到他坚决的拒绝：“我

爱自己的祖国，我永远也不会说祖国的坏话！”——这就是雅沙的回答，德国人还给雅沙穿上了“迷彩服”。在他的红军制服上用不同的颜色写上了12个大写的“S·U”。

第一苏联游击团

少校参谋长（米纳相）

1946年9月14日

No. 001034/c

于柏林

斯韦特兰娜·阿
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52年2月10日）

亲爱的爸爸：

我非常想见到你，告诉你我目前的情况。我想一个人面对面地对你倾诉一切。我几次想这样做，但是在你身体欠佳而工作繁忙的时候，我又不想去打扰你。

首先我对在社会科学院的学习感到很满意，我在这里的情况不错，大家好像对我也很满意，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快乐，因为在我家庭不和时，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其他一切就都忘掉了。

至于说到尤里·安德列维奇·日丹诺夫，还在新年前夕我就决定和他分道扬镳了。这完全是必然的结局，因为我们几乎已有半年之久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也不知成了什么，他非常清楚地向我证明——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

动——我对他来说既不可贵也不重要，并再次请求我，把女儿留下给他。这个干巴巴的教授、没心没肺的“学问家”已经让我受够了，让他去啃他的书本吧，他根本不需要家庭和妻子，他的许多亲戚完全可以代替他们。

总而言之，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我们的分手是件憾事，我感到遗憾的只是，我在这个铁石心肠的人身上白白耗费了那么多美好的感情。

这件事引发了一些纯物质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因为我无处能得到帮助（靠尤里·安德列维奇的施舍过日子是令人十分不快的），而我毕竟还有两个孩子。小儿子秋天就要上学了，而且我的老保姆还住在我这儿（她现在退休了）。

钱现在我还有，还是你寄来的那些钱，所以问题不只是在钱上。

这里发生的种种事情我也会告诉你，只不过这些事情并不重要。

所以，爸爸，我还是非常希望见到你，请你别生我的气，说我先斩后奏，这些事情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最最热烈地吻你！

让你操心的女儿

斯·约·阿利卢耶娃（斯大林娜）

致格·马·马林科夫

（1953年3月21日）

斯·约·斯大林娜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格·马·马林科夫

我对政府及您本人在我们大家都感到沉痛的日子里对我的孩子及我本人给予的同情和关心表示深深的谢意。

同时我认为自己有义务谢绝某些提供给我们家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是不必要的，我认为我们不能享受这些权利：

- （1）谢绝指定“沃伦”别墅及服务设施归我家使用；
- （2）谢绝每月4000卢布的临时津贴。

我请求不要指定“沃伦”别墅归我家使用，但请准许我夏天有权在卢布列沃—乌斯别恩公路边上的苏联部长会议别墅区租用2—3个房间，房租另付。

再一次表示感谢！

致以敬意！

斯大林娜

1953年3月21日

审讯记录

对被捕人瓦西里·约瑟福维奇·斯大林的审讯。时间：
1953年5月9—11日

瓦·约·斯大林，1921年生于莫斯科，格鲁吉亚人，苏共党员，原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

问：在前几次审讯中你承认，在担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副司令和司令期间曾非法使用公款。

您的供词是真的吗？

答：是的。是真的。我从1947年到1952年在担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副司令和司令期间，的确挥霍了国家财产并非法使用了公款，给苏维埃国家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

我也并不否认，我所下达的一些违法的命令和所作所为都可以定性为犯罪行为。

问：侦查部门有材料证明，你滥用职权，还侵吞国家财产和公款。

你承认吗？

答：我并没有为了中饱私囊而侵吞国家财产，我不能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有罪。

我准备如实交待我的全部罪行。1948年我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一上任我就着手重新装修空军拨给军区司令部办公用的中央机场大楼，花了几百万卢布，准确数目我记不清了。根据我的命令，把大部分的钱用于大楼的过分豪华的装修以及购买在德国订制的价格昂贵的办公家具。

1951年11月我打算在中央机场一带建造一座长度为50米的游泳池，并已开始建造，共耗资4百万卢布。

除了游泳池设施以外，我还搞了其他一些建设项目。

问：具体有哪些项目？

答：1950年我下令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区文化休息公园开始修建所谓的“运动中心”——莫斯科军区空军军官之家。我在得到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同意后，通过前联共（布）莫

斯科市委书记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格·米·波波夫将列宁格勒区文化休息公园征用为建筑场地。因此这个公园关闭，停止对劳动者开放。

别洛斯科夫上将也支持我建设“运动中心”的倡议并建议我使用在德国拆除的飞机库作房屋的骨架。把飞机库的金属框架从德国运到莫斯科。这件事耗费了许多时间和资金。当飞机库骨架最后弄到莫斯科时，我们又为卸车、搬运到工地及安装大忙了一阵子，因为无论是我们空军还是军事部都没有这样大型的起重机能把这个飞机库的一个个金属构件吊起来。

1952年这个工程也“暂时停工”，因为我们缺乏继续修建的资金。我记得，这项建设工程共耗费了500多万卢布。

我在这件事上的错误还在于，我占用了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区劳动者最喜爱的休息场所——文化休息公园，拆掉了影剧院，破坏了植被，而“运动中心”又没建起来，我真是“占着茅厕不拉屎”。

我外出打猎当然很丢脸。我去打猎坐的是“道格拉斯”飞机，陪同有瓦西里耶娃，司机奇斯佳科夫和一些同事；我的体能训练和队列训练助理瓦西里克维奇、歼击航空兵监察员马卡洛夫和前军区军校部主任莫洛佐夫上校。同时飞往佩列亚斯拉夫—扎列斯基机场的还有雅克—12型飞机。这架飞机是我专门用来与莫斯科联系和从那里运来食品、伏特加酒和葡萄酒的，因为我打猎要用几天的时间。我交待的这些任务由我的副官卡佩利金完成。

此外，还按照我的命令，从莫斯科调了几辆汽车到打猎场来，其中包括装有УСР—399型特种无线电设备的“威力斯”牌汽车，我用这个无线电设备与佩列亚斯拉夫—扎列斯

基空军技术学校联系，这所学校与莫斯科军区空军通无线电话。我打猎时需要飞机或者要向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部发布什么命令，就用无线电设备通过佩列亚斯拉夫学校来联系，因为这台设备的功率不够，不能与莫斯科直接联系。

还从图拉调来了一位有名的打猎能手萨福诺夫和他的一群猎狗。这样的打猎当然使国家花了许多钱，因为这些费用完全由国家支付。

此外，我的罪行还在于利用职权大肆挥霍公款，特别是花公款为我占用的别墅增添设备和进行保养。比如说，由苏联军事部出资修建了能供近3万人饮用的水塔，根据我的申请，在我的别墅附近的莫斯科河岸上修建了水泥防护堤和从别墅到莫斯科河的水泥台阶，耗资近50万卢布。

现在我基本上交待了自己非法挥霍、浪费和侵占国家财物的全部罪行。我可能漏掉了个别已记不清的事实，但是我尽量回忆所发生的一切，决不隐瞒。

审讯记录我已看过，记录准确。

瓦·斯大林

参加审讯的人员有：

苏联内务部重大案件侦查处中将处长

（弗洛德济米尔斯基）

苏联内务部重大案件侦查处上校副处长

（科兹洛夫）

内容无误：

签字

原载1994年2月3日《俄罗斯报》

（邢艳琦译 何宏江校）

斯大林青少年时期 诗六首

致明月

你不知劳累一如既往，
巡行在乌云笼罩的大地上，
用你那银色的清辉
把浓浓的黑雾驱散。

你的微笑是那么柔美，
你俯瞰的大地还在沉睡，
卡兹别克^①的冰峰直插天外，
你的催眠曲叫它陶醉。

但是你要永远牢记，
有人虽然遭受压迫和毁灭，
却有着一腔强烈的希冀，
要与姆塔茨明达^②一争高低。

你照亮黑沉沉的苍穹，
迸射出淡淡的光辉，
像以往那样优柔和婉，
映照故土的山山水水。

我向你敞开心扉，
我向你举起双臂，

① 大高加索山脉中部一段山名。

② 大高加索山脉的主峰之一。

我看到明月皎洁，
思潮重又起伏澎湃。

* * *

诗人啊，你热泪盈眶，
为农民的苦难黯然神伤，
此后你又亲眼目睹了
非人的磨难一桩又一桩。

伟大的祖国使你激动
你一次次欢呼雀跃，
你的歌声响彻云霄，
宛如瀑布奔泻直下。

祖国给了你灵感，
你弹起神圣的琴弦，
把理想倾注在她的身上，
如同坠入情网的少年。

从此你同人民融为一体，
爱情使你们永远分不开，
你在每个格鲁吉亚人心中
为自己竖立起一块丰碑。

祖国的歌手英勇顽强，
理应得到相应的奖赏，
因为种子已生根发芽，
现在该来收获庄稼。

人民有理由把你赞美，
你将跨越世世代代，

我的祖国将再抚育出
埃里斯塔维^① 那样的儿女来。

* * *

他从一家走向另一家，
叩响了陌生人的门扉。
弹起柞木的老潘杜利^②，
淳朴的歌声轻轻飘起。

在他动人的歌声里
激荡着伟大的真理，
洋溢着崇高的理想，
像太阳的光芒万丈。

他使早已麻木的心房，
重又热血沸腾，慷慨激昂，
他唤醒了许多人的良知，
不再在黑暗中犹豫彷徨。

可是故乡的人们并没有
把崇高的桂冠给他戴上，
却无情地给他端来了
一碗毒汁四溅的药汤。

他们对他说：“可恶的人，
喝吧，喝吧，喝光这碗药……
你的歌声我们并不喜欢，
你的真理我们并不需要！”

① 格鲁吉亚作家（1811—1864）。

② 格鲁吉亚的民间拨弦乐器。

*

*

*

当皎洁的月光
蓦然洒向大地，
淡淡的清辉投射到
那遥远的天际：

当苍翠的树丛里，
夜莺在啾啾啼啼，
悠扬的萨拉穆里①
袅袅余音回肠荡气：

当安静片刻之后，
山泉重又叮咚而去，
长夜里微风徐徐，
把黑树林骤然惊起：

当逃亡者在敌人追逐下
重返多难的故地，
当沉沉黑夜过去，
重又见到阳光熹微：——

愁云这时终于消散，
敞开了抑郁的心扉，
强烈的希望再一次
在我的心中燃起，

诗人心情激动万分：
诗人心潮澎湃不已，

① 一种芦笛。

因为我知道，这希望，
是多么美好，多么纯洁！

* * *

早晨

玫瑰花蕾绽开了，
在紫罗兰旁依偎，
微风惊醒了铃兰，
花朵向青草低垂。

云雀飞得高过白云，
歌声在蓝天里飘荡，
树丛里夜莺啼声啾啾，
给孩子们把歌儿轻唱：

“我的格鲁吉亚，愿你兴旺！
愿和平降临祖国大地上！
朋友们啊，要努力学习，
为我们的祖国增添荣光！”

* * *

我们的朋友尼尼卡老了，
一头白发，老态龙钟。
宽阔的双肩垂下了，
英雄如今再也不能称雄。

多么不幸！遥想当年
他举起意气风发的镰刀，
像狂飚一般席卷麦田——
身后麦秸垛越堆越高。

他在麦茬地里飞跑，
把汗珠从额上擦掉，
饱含欢乐的火苗
在小伙子的脸上燃烧。

可是现在两腿走不了道——
年龄毕竟不把人饶……
可怜的老人一直躺着，
给孙子们说说笑笑。

可是当自由劳动的歌声
从田野传进他的耳中，
他那颗无比坚强的心
还会像从前一样猛然跳动。

老人稍稍抬起身子，
拄着拐杖站立起来，
他冲着孩子们笑了，
容光一下子那么灿烂。

译后记：约·维·斯大林在青少年时代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后来其中大部分已经散失。这里译出的6首诗作于1895—1896年，是根据《关于斯大林一家的神话和真相》一书转译的。

（成士 译）

反李森科学派斗争的史料（续）

1947年底至1948年初，尽管学者们受到的行政命令压力以及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压力愈来愈大，关于遗传学问题和达尔文主义问题的争论还是变得激烈起来。1947年11—12月，在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和苏联科学院生物学分部相继举行了专门讨论种内竞争问题的会议，1948年2月又在莫斯科大学举行了达尔文主义问题研讨会。在这几次会上，人们再次指出李森科的理论观点和他所提出的那些给农业造成损失的农艺学方法是错误的。

到1948年初，就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科学处处长的尤·安·日丹诺夫成了表达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关于发展生物科学意见的人。尤·安·日丹诺夫由于身居高位，又有担任中央书记的父亲安·亚·日丹诺夫的支持，得以在其工作初期奉行一条相对独立的领导科学的路线。他无疑认真研究了保存在中央书记处档案中的有关生物科学材料，知道中央组织局的许多成员对李森科的批评态度以及学者们给党中央的信。在这些信件中也包括曾在这一时期担当祖国生物科学带头人的伊·伊·施马尔豪森院士的几封信^①。正是他在1948年初的积极活动构成了对李森科及其支持者的特殊

^① 这组信（未指明是写给联共（布）中央的）刊载于一本文集：伊·伊·施马尔豪森《达尔文主义问题：未发表的论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威胁。当时保存下来一封尤·安·日丹诺夫于1948年2月12日致安·亚·日丹诺夫办公室的复函，内容如下：

“伊·伊·施马尔豪森院士在他给联共（布）中央的几封信中一再指出，在就自然界种内生存竞争及其对进化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争论的过程中存在着某些不良现象。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科学处召见过施马尔豪森院士。已同他谈过话。

请将材料存档。”

尤·安·日丹诺夫还初步尝试以积极的办法来促进科学的进一步发展。1948年2月24日他将一份题为《关于四倍体橡胶草》的报告呈送斯大林（副本送安·亚·日丹诺夫和格·马·马林科夫），报告中指出M. C. 纳瓦申教授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并直截了当地提出李森科给农业造成损害的问题。现将这份报告摘引如下。

尤·安·日丹诺夫呈斯大林

（1948年2月24日）

……培植四倍体橡胶草的工作困难重重，原因首先在于李森科院士直接或间接地提出的不正确的观点。他固执地认为四倍体是秋水仙碱“毒化”出的“畸形体”，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有把握收到良好效果的这种新形式进行客观的研究，而是制造出一种敌视和怀疑的不良氛围。由于农业部门的大多数干部受到他的影响，培植四倍体橡胶草的工作刚起步就遇到很大的困难。纳瓦申所从事的有益工作没有得到善意的支持，相反，他却遭到反对、猜疑和百般挑剔；有人不

断地向参加实践的工作人员说什么“纳瓦申是靠一套鬼把戏使根茎增大的，这些根茎还是没有用”；有人到处宣扬：四倍体的特性将会逐年消失，四倍体的橡胶不能用，个大是由于病态“膨胀”造成的，等等；一句话，就是想方设法阻止这项工作。最初几天，纳瓦申曾当着李森科的面展示了四倍体橡胶草的种子，李森科当时就表态说，这些种子长不成有优质根茎的健康植物。很自然，在李森科的巨大影响下，普遍存在着戒备或否定的态度……

四倍体橡胶草的全部遭遇清楚地说明：一项由实际工作者们几乎是冒着风险在基层坚持从事的有益的事业，遭到受李森科种种不正确观点影响的“领导”千方百计的阻挠。

橡胶工业部系统的工作人员不是畏畏缩缩怕惹事，就是想尽办法随大流，因此，肯定四倍体橡胶草的资料“成了保密文件”，无人提及。实验室的化验结果一拖就是几个月，而且结果出来后还附上对这些结果横加指责的“种种说明”。

最后，当1947年第一次收获了大量种子（2吨）时，李森科院士干脆向橡胶作物总局生产处的总农艺师宣布：“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都不搞四倍体”。有了这样的“原则性指示”，那种不认真考虑所收获的种子的价值、不同纳瓦申打招呼就把这些种子分配掉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联科学院内部为四倍体橡胶草工作提供的条件也不好。纳瓦申身边只有一名初级研究员。纳瓦申所在的细胞学研究所的领导无法保证正常的条件，因为科学院生物学部明显地偏向李森科院士领导的遗传学研究所，给予该所极大的关照……

鉴于发展我国天然橡胶的生产十分重要，应当极为重视

纳瓦申教授的工作并向他提供帮助。

联共（布）中央宣传

鼓动局科学处处长

尤·日丹诺夫

对生物科学状况的深入了解，与遗传学家们的多次会面和交谈，使尤·安·日丹诺夫下决心对李森科的专横做法以及他那些没有根据的理论观点进行批评并把农业实践遭受的损失公之于世。1948年4月10日，尤·安·日丹诺夫在综合技术博物馆为州党委演讲人进修班作了题为《现代达尔文主义的几个争论性问题》的长篇报告。

最近几年，B. H. 索伊费尔根据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资料库中找到的李森科给斯大林和伊·亚·别内迪克托夫^①的信的副本，对苏联遗传学的这段历史作了详细的说明。^②

李森科得知尤·安·日丹诺夫作报告的日期后，就去找当时担任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学会理事会副理事长的马·波·米丁，然后在米丁的办会室（就设在综合技术博物馆那幢楼内）里通过扩音器听了整个报告并作了记录。1948年4月17日，李森科致信斯大林（副本送安·亚·日丹诺夫），抱怨尤·安·日丹诺夫干扰米丘林学说的发展。这封信没有

① 伊·亚·别内迪克托夫（1902— ）——1930入党。1946—1953年间任苏联农业部长、国家计委副主席等职。

② B. 索伊费尔《苦果》，载于《星火》杂志1988年第1期和第2期；B. H. 索伊费尔《权力与科学。苏联遗传学的毁灭过程》，1989年（美国）艾尔米塔日出版社版，第386—394页；另见：尼·彼·杜比宁《遗传学 历史篇》，1988年基什尼奥夫版，第193—197页。

得到答复。^① 李森科从别内迪克托夫那里得到尤·安·日丹诺夫报告的速记记录，接着，他在1948年5月11日将该速记记录送还这位苏联农业部部长时提出了辞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的问题。这是他处心积虑想出来的一个招数，因为别内迪克托夫是决定不了辞职问题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由中央政治局任命，他的去留完全掌握在斯大林的手中。

虽然斯大林没有答复李森科的信，他们两人却有过一次会面（关于会面的时间说法不一），据说会面时斯大林曾责成李森科召开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并让他在会上作报告。

安·亚·日丹诺夫个人收藏的材料有助于从根本上搞清1948年春夏期间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发展过程。在他的大量笔记本中，有一本记着关于一些最重要的案件和事件的简要情况以及斯大林发表的意见，那上面有这样一段笔记：“5月20日。同波斯克列贝舍夫商讨斯大林科学奖问题”。接下来是：“尤·对李森科的指责”。在下一页的背面，“克里姆林宫李森科”几个字下面划了两条线。安·亚·日丹诺夫大概参加了斯大林与李森科的这次会面，而且可以推测，同一笔记本中的下面一段话正是在这次会面时记下的：“纯系学说会断送品种改良工作。基因独立学说〔下面一个词辨认不清。——编者〕会使实践工作陷入僵化状态。先进科学的成就，新品

① 据当时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局长的德·特·舍皮洛夫回忆：斯大林得知此事后立即把他召到办公室，质问道：“……宣传鼓动局未经中央同意就举办全国性进修班，还在进修班上把李森科写了个‘狗血喷头’。他可是我们整个农业的台柱子。凭什么这样做？谁批准的？”当时在场的还有全体政治局委员（参看《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89年第2期第53—54页。）

种的培育，是在摩尔根主义者、孟德尔主义者的反对下取得的”。

除了笔记本外，还保存下来一页纸，上面记的也许是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讲的是关于改变尤·安·日丹诺夫的报告所造成的状况的问题。

安·亚·日丹诺夫的笔记

（1948年5-6月）

找个生物学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一次报告

中央委员会作出简短决定

如果可能的话就 在《真理报》

同李森科共 上发一篇文章

事一段时间

搞一点通俗化的东西。

报告是错误的。

两个流派。头一个流派的支柱是神秘主义——神而又神。

另一个流派是唯物主义的。

日丹诺夫错了。

到处传授的都是施马尔豪森式的生物学。

理论是被歪曲了的（？）

而试验

在这些笔记中看不到明确的决定。可以断定，当时经斯大林同意决定起草一份联共（布）中央有关生物学问题的专

门决定。制定决定的工作由安·亚·日丹诺夫承担。

这份文件草案的初稿是由德·特·舍皮洛夫和马·波·米丁起草的。他们在1948年7月7日将草案呈送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时写道：“现将根据您的指示修改过的联共（布）中央《关于生物学界的米丘林学派》通报草案送您审阅。”安·亚·日丹诺夫看过这份草案后，将标题改为《关于苏联生物科学的状况》，对草案作了大量修改，还在通报的结尾部分加上了对尤·安·日丹诺夫的报告的批评。1948年7月10日，安·亚·日丹诺夫和格·马·马林科夫将通报草案呈送斯大林。在附函的副本上写着：草案同时分送维·米·莫洛托夫、拉·巴·贝利亚、阿·伊·米高扬、尼·阿·沃兹涅先斯基、拉·莫·卡冈诺维奇、尼·亚·布尔加宁。经过一番忙碌之后，搞出的不是简短的决定，而是一份冗长的声明。声明中特别谈道：

“近年来在生物学家中间就生物科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争论。联共（布）中央在了解了生物学界争论各派的代表人物的有关材料、学术论著和实践结果之后，认为有必要对生物学上的主要流派作出评价。

联共（布）中央认为，在生物科学上形成了两个完全对立的流派：一个是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流派，即以其创始人——杰出的苏联自然科学家、自然界的伟大的改造者伊·弗·米丘林的名字命名而现在由特·杰·李森科院士领导的米丘林流派；另一个是反动思想流派，即孟德尔—摩尔根流派，它的创始人是资产阶级生物学家——魏斯曼、孟德尔和摩尔根，他们在苏联生物学界的追随者有：伊·伊·施马尔豪森院士、安·罗·热勃拉克教授、尼·彼·杜比宁教授、尼·

康·科利佐夫教授、亚·谢·谢列布罗夫斯基教授、M. C. 纳瓦申教授等人……

试图对科学界斗争着的各派加以调和，在米丘林流派和孟德尔—摩尔根流派之间采取某种中间立场、混淆相互对立的原则或使之合为一体的任何做法都必然失败。在科学上如同在政治上一样，矛盾的解决不是靠调和，而是靠公开的斗争。

因此，尤·日丹诺夫同志在他给联共（布）部分州委的演讲人进修班所作的题为《现代达尔文主义的几个争论性问题》的报告中折中地调和生物学上的两个相互对立流派的做法是错误的。

尤·日丹诺夫同志说，在我国的生物学家中间并不存在两个泾渭分明的流派，而是有几个‘学派’，其中每个‘学派’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报告人想方设法要把李森科院士同米丘林分隔开，一口咬定李森科院士发展的是米丘林学说的一个方面（分支），还说反对李森科院士的其他生物学家似乎也在发展米丘林学说。所以，报告人呼吁创立一种能容纳生物学所有流派和‘学派’的‘综合生物学’。

这个报告有悖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立场。

尤·日丹诺夫同志不是去揭示生物学上两个流派的根本区别并对生物科学上因循守旧的反米丘林流派加以批评，相反却采取不正确的做法，千方百计地要使生物学上的这个反动流派同李森科院士所发展的领先的、进步的米丘林流派握手言和并结为一体，而且批评的重点也已转为打击李森科。

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追随者们曾不止一次地受到告

诫：他们在生物学上的流派与苏联科学格格不入并正陷入绝境。然而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不仅没有从这些告诫中吸取应得的教训，反而继续坚持和发展自己的错误观点。直到最近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思想还在通过书籍、尤其是通过高等学校的学术和教学工作继续传播，而在许多大学和苏联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中，孟德尔—摩尔根流派仍然在统治着遗传学和生物学讲坛。这种状况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关于祖国生物学遭到破坏的问题其实早有定论，只不过党和国家的对策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制定的。学者们还不知道发生的悲剧。他们对科学和正确思想的胜利一时还未失去希望。就是在1948年7月，伊·伊·施马尔豪森、安·罗·热勃拉克、С. И. 阿利哈尼扬、Е. В. 博勃科、И. М. 波利亚科娃还相继致信格·马·马林科夫。1948年7月16日，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彼·尼·康斯坦丁诺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他再次提出了关于撤销李森科职务的问题。

康斯坦丁诺夫致斯大林

(1948年7月16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虽然我国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当前农业科学的状况却不能说是正常的。某些担负重任的学者各唱各的调，这既影响了工作效率，又影响了农业科学的发展，也使得各项成果不能尽快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

农业实验机构网非常分散，而且没有统一的领导，选题并非都符合农业生产的需要。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对农业实

验机构网不闻不问，对所属的几个研究所也缺乏领导。全面整顿这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工作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我曾就这个问题给苏联部长会议马林科夫同志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写过信。

下面我将侧重谈谈育种学和遗传学领域的一些不正常现象。

我投身于农业和林业工作、尤其是育种学研究已近 50 年。我培育出了几种不同的良种植物，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农田里，这些植物的栽种面积差不多有 500 万公顷。

最初我们是摸索着前进。主要是运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来培育新品种。然而科学并没有到此为止。现代遗传学极为有力地把育种学推向前进。所以现在培育新品种的方法要快得多、准确得多。可以说，我们苏联的育种学家（利西岑、舍胡尔金、尤里耶夫、康斯坦丁诺夫、皮萨列夫、乌斯宾斯基等人），所培育出的品种的种植面积几乎占我国播种面积的 90%。

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都依据新兴学科——现代育种学和遗传学的理论原理来从事工作。这些学科前景广阔。我国的育种学今后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育种学和遗传学的理论方面以及实践方面的状况目前相当糟。

我所指的是李森科院士的学术活动和行政管理活动，他的这些活动极大地妨碍着我国农业科学的发展。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不要以为我对新事物不理解。事情恰好相反，使农业科学不断倒退的是李森科，他已成了一个不知轻重、无视现实的人。

他把自己那些缺乏说服力的“学术”观点奉为典范，置

科学上的历史主义于不顾，对任何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极其厌恶。他听不进合理的建议，结果使我国的农业科学乃至我国农业受到损害。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对他阻碍整个农业科学、尤其是育种学向前发展的做法视而不见。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有责任向您说明一系列问题。

* * *

[1.] 我们科学院已不是领导农业科学的中心，而是成了重点宣传全苏列宁农业学院院长李森科思想和观点的机关。

各分院的工作松松垮垮。所属研究所的工作也很糟。李森科本人对整个庞大的农业实验机构网撒手不管。

听不到任何批评。似乎只有他才能正确地解释达尔文的学说，而实际上他常常是在歪曲达尔文的学说。似乎只有他是米丘林学说的拥护者，只有他在为集体农庄的农田操劳，而别人都不是。简而言之，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他的眼里只有那些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哪怕他们与农业科学毫不相干，如伊·伊·普列津特、别列尼基等人。

他把“孟德尔—摩尔根主义”一词变成了贬低别人的代号，以此来称呼所有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而各部（苏联农业部、苏联高等教育部等）的工作人员都听信这一点。所以，只要李森科那样称呼过你，哪怕只称呼过一次，那么你便是一个劣等苏联人，一个劣等学者。

2. 李森科对农业区划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不重视，也可

能是不理解。结果，农业实验机构的选题常常搞得很不像样，而且没有考虑到地区专业化和农业区专业化，没有考虑到生产的需要。广义的农业区划工作没人管。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也就是李森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各研究所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对此不想管也管不了。可是只有进行了严格的农业区域划分才能谈得上在农业中实行这样或那样的措施。我曾以种种方式在农业部和科学院提出这个问题，但毫无结果。

3. 李森科在农艺学方面的许多建议，如春化处理、留茬地播种、马铃薯夏季栽种等，都被一股脑地往我国农业上应用，而没有通过严肃的科学论证和试验来检验一下它们对地理环境是否适宜。有人把某些措施的失败归咎于各级农业机构态度不认真。实际上并非都是如此。最好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些强制性措施在各地都实行不下去，因为它们是无效的，没有什么益处或根本没有益处。

李森科总是竭力用一些很少有人信服的方法来使人相信他的那些措施是有益的。例如：

(a) 春化处理。1937年我在《要对春化处理作出明确的规定》一文（《选种和育种》杂志1937年第4期）中写道，我根据自己在基涅利^①的4年（1933—1936年）中得到的实验数据判明，春化处理对一些品种有一点作用，对另一些品种根本没用，而对许多品种简直是有害，它们同未搞春化处理的品种相比收成大大降低。我当时曾提出11条建议，要求用各种不同的品种从地理学的角度对春化处理方法加以研究

^① 基涅利——古比雪夫州（现称萨马拉州）首府，彼·尼·康斯坦丁诺夫在那里办了一个育种实验站。

和检验。但由于有李森科的种种教条主义规定，我的建议未被采纳。

有些地方需要搞春化处理，有些地方不需要搞，而在许多地区春化处理实在是弊大于利。

如果再考虑到春化处理过程本身即播种、种子生长时的巨大损耗以及恶劣天气带来的损失等等，那么这种方法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就太多了，这也是生产者自己作出的恰当评价。我们许多人都清楚，应当培育无需春化处理的品种，而且已经有了那样一些划定栽培区的品种。在对一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品种按生长期进行杂交的情况下春化处理也许有效。

(b) 留茬地播种。在西伯利亚的春播小麦留茬地上种越冬小麦是李森科所有建议中最不受欢迎的一条。越冬小麦不如越冬黑麦好种。很久以前富农就以低廉的价格从贫农那里收购土地种越冬黑麦，而且是在粗放耕作地区的完全空闲的留茬地上种。各地的贫农因生活所迫也在留茬地种黑麦。我本人也和父亲一起在留茬地种过黑麦，当时连马也没有。农民们都知道一句俗语：留茬地上来种粮，不用脱粒和扬场。人们曾把留茬地播种称作“懒汉法”、“懒汉地”播种。

留茬地播种的黑麦收成极低（每公顷 1—2—3 公担），而且造成杂草滋生，所以对后茬作物来说又是一种不利的前茬作物。

所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没想到在 1945 年李森科又一次有了发现，建议在西伯利亚的留茬地上干脆不种黑麦，而种越冬小麦，当时并没有任何经过论证的实验资料。他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将留茬地播种越冬小麦与休闲地（绝对休闲

地、秋耕休闲地、春耕休闲地、一般休闲地、生草休闲地和半休闲地)同时播种越冬小麦,尤其是与留茬地播种半休闲地作物加以比较。我也曾建议进行这项试验。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主义农业报》“组织过”对这项建议的讨论。谁也不敢带头反对李森科。最后应《社会主义农业报》的请求,我于1945年9月22日发表了《防止农业上的简单化做法》一文。

我引用了克拉斯诺古日斯基农业实验站18年来的试验资料,因为该实验站所在地区搞过留茬地播种。给黑麦锄草后每公顷可收获6—7公担,而未锄草的每公顷收获2—3公担。锄草后的收成也不稳定,多则每公顷17公担,少则颗粒无收。任何多少有点农业知识的人都应该明白,这种方法显然是无益的。在生产中收成更低,常常颗粒无收。

我的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是该报并没有把这些反响都登载出来,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对李森科的“发现”持反对意见。

该报编辑部没有把苏联科学界和广大集体农庄农民的意见客观地反映出来,而是在报纸上把“赞成”和“反对”“发现”的文章一对一地刊登出来。

农业部对于这个问题也未置可否。

(c) 马铃薯夏季栽培。李森科坚持夏季在休闲地种植马铃薯、黍和苜蓿。这条建议很难实行,它遭到人们的反对。不能不考虑轮作作物、前茬作物等等的种类就搞这样的建议。所有大田作物在休闲地上都长得最好,这是早已众所周知的。院士也应该知道这一点。

我还能列举出李森科一些类似的“发现”和“创新”。它

们都有同样的致命弱点。第一，李森科不懂得农业实验工作的方法。对于他来说，进行农业品种鉴定是多此一举。第二，李森科从来都不把他头脑中产生的任何想法交学者们讨论，也从来不重视他们的意见。他真正听得进的是他周围那些人的话。但他们所说的都是“伟大的李森科”、“革新者”、“天才”一类的话。第三，李森科的多数发现是早已尽人皆知的东西，它们或被认定为无益之举，或被其他更加合理而有益的农业方法所取代。

4.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状况。52名院士只剩下17人，这一点就足以使人明白李森科院士在把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引向何处。他用10多年的时间把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给毁了。

1948年初曾打算进行增补院士的选举，但没有成功。李森科不让选举那些真正的学者。他希望当选的都是对他言听计从、帮他做事的人，是与他观点一致、为他歌功颂德的人。

他这种人不配做管理工作，更不配当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这样一个大单位的领导。他利用院长的权力来确立自己在科学上的统治地位、制造他发现的“法则”不可违背的假象。他分明是在借您的信任胡作非为。

15年前他曾反对科学上的某种垄断做法并因此而步步高升。而15年来他都干了些什么呢？他自己又成了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一个极为独断专行的人，他要把不随他心、不中他意的一切统统清除掉。

5. 李森科想取消高等院校中他所认为没用的一切。今年2月3—10日高等教育部开了一次有关制订农业高等院校育种学与良种繁育教学大纲的会议，会议的参加者是事先从李

森科喜欢的那些人中挑选出来的。一些著名的育种学家没有出席会议，比如像舍胡尔金，他培育出的几种小麦播种面积有好几百万公顷，占苏联秋播地的70%。相反，应邀参加会议的人不仅从未做过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而且有生以来没有培育出一种农作物。不过这些人却精通辩术（伊·伊·普列津特、格卢先科、德沃良金等人）。于是便产生了“公众”舆论：“大多数学者站在李森科一边”。持反对意见的只有已故的彼·伊·利西岑，以及B. H. 霍赫洛夫副教授和笔者。

当然，有人可以设想李森科谱写了农业科学上某一新的篇章，甚至可以设想他对生物学和农艺学的所有问题有了新的提法。一切都可以设想。不能设想的只有一点。怎么能用那种强制的手段来使人相信李森科的种种论点都无可辩驳并认为他一个人就可以抹掉生物科学的全部历史。

难道可以对在实验方面最讲求精确的学科之一——生物学的某位学者的论点不加检验就予以相信吗？绝对不可以。

制订高等院校教学大纲同样也不能这么做。岂能向学生们教授那种徒有虚名的、靠未经鉴定的草率实验和不切实际的教条拼凑而成的李森科的“科学”。

已故的利西岑院士（他培育的品种已在苏联的数百万公顷土地上播种）因高等教育部的这次会议临死心情都没能平静，而且我想，是这次会议加速了他的去世。

真不明白为什么要宣布进行一场反对什么“形式主义的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的运动。对遗传学领域的某些人、某种不正常现象可以进行批评。但愿您能看看苏联农业部副部长洛巴诺夫同志在高等教育部就农业的草田

农作制问题召开的会议上的发言。为什么^①会议由苏联高等教育部和农业部共同召开。在当时的一次农业技术专门会议上这位副部长也没有放过那些据说应当加以清除的形式主义的遗传学家。

6. 他本不该不清红皂白地乱骂一通，而应指名道姓地说说，哪些人用自己搞出的粮食养育了我们整个国家，哪些人可以为自己的品种而自豪——他们培育的各种小麦、黑麦、大麦、燕麦、三叶草几乎遍布我国所有农田。重要的是，在划区栽培的品种中你找不出一个根据李森科的想法培育出的品种。我曾问李森科的助手斯托列托夫哪些品种是他们培育的，他回答说，他们的工作是研究理论，而搞育种实践是别人的工作。有必要提醒他们一下：实践是首要的，理论与实践是分不开的，二者是统一的。

没有他们培育的品种。这也许是因为 15 年的时间不够用。不，不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可没有忘记李森科在 1935 年所作出的要在 2 年到 2 年半时间里培育出小麦新品种的蛊惑人心的许诺。他许诺的品种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为他的全部理论设想都是建立在与达尔文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拉马克主义原则之上的。

7. 我已经大致谈了李森科的种种“学术”争论方法。它们同苏联创作自由的原则根本不相符。他的方法之一是先把事情搞乱，然后嫁祸于人。

他不同学者们公开争论。他利用自己的关系，行政领导地位和社会地位非常巧妙地使自己的对手威信扫地。

^① 原文如此。看来应为“而且”。

他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朋友谋求奖励，而毫不感到羞耻。他的主要助手几乎都借助他的帮助获得了斯大林奖（多尔古申、格卢先科、阿瓦基扬等人）。

8. 学术杂志在科学生活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它们全都由李森科统一控制。《农业生物学》，《选种和育种》，《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学报》，《苏联科学院育种学研究所丛刊》，不用说，李森科可以随时发表他的任何文章和著作。

即使有人在某份杂志上发表一篇小心谨慎地批评李森科的文章，那么该作者在下一期李森科把持的杂志上一定会受到强烈谴责。这种批评的后果必然是：那位敢于批评李森科观点的人将会落下某种不好的名声。

李森科的助手伊·伊·普列津特和德沃良金搞起这种事情来手段特别高明。我可以从这两个人的争论文章中摘引出大量这类文字，他们一篇又一篇地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其目的只有一个——诋毁和迫害苏联学者中的骨干。他们唯独对一个人大唱赞歌、竭力吹捧，这个人就是李森科，可他们却忘了朴实无华能使人变得更美。

然而李森科却不这么看。他主编的《农业生物学》（原《春化处理》）杂志一期接一期地刊载文章，歌颂李森科以及他的所有早已被发现了的“发现”和“成就”。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于李森科的错误和错误观点最初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容忍的，可以认为这是个别人的错误和错误观点，是任何一位学者在创造活动中所难免的。在他工作的头几年我甚至在讲演中多次赞扬过这位有前途的年轻人的钻研精神。

现在对此可不能容忍了。不能容忍的原因是：这些错误

和“成就”正日渐成为农业部和高等教育部的正式方针。

苏联科学院、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莫斯科大学和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的许多学者都在严厉地批评他。各地的工作人员关注着这件事，却不敢公开表态。

为什么谁都不愿考虑我们的意见呢？

为什么解决这些争论的事不是推给像马·波·米丁这样的人就是推给各部的工作人员呢？

为什么不听取学者和有农业实践经验的人的意见呢？

为什么我们的官方评论不反映科学界的意见，而是想方设法迎合李森科的心愿呢？

李森科的活动造成的后果是：农业实验工作，苏联遗传科学和育种科学因受他提出的复杂的种子繁育制的约束而止步不前，推广划区栽培的育成品种的工作进展缓慢，因而也就失去了数亿普特的粮食。

简短的结论和建议

1. 李森科院士在农业科学上根本不讲历史主义。所以他的许多发现是人们早已发现了的东西。

2. 他对农业划区栽培、农业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制定农业实验工作的统一制度等问题的主导意义毫无认识。

3. 他工作上的片面倾向即所谓农业生物学倾向阻遏着整个农业科学及其各个环节。他本人没能成为达尔文主义者，倒成了一个拉马克主义者。

4. 他看不到他的科学同农业生产的需要相脱节。作为一个极端的自我中心论者，他津津乐道的是死的教条，自认为永远正确，热中于自我标榜。

5. 他迟迟不给就要成为空架子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增补人员，因为他害怕与他不是同一派的人进入该院。

6. 改革农业实验工作制度已迫在眉睫，关于这一点我已向马林科夫同志和联共（布）中央报告过。要让改组后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来领导整个实验工作。

7. 立即解除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并在没有来自李森科的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增选院士和通讯院士。

8. 制止李森科垄断上述所有杂志的做法。

9. 就育种学和遗传学以及改革农业实验机构体系等问题在联共（布）中央的主持下召开一次会议。

最尊敬您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
斯大林奖获得者，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育种学、种子繁育和实验工作方法
教研室主任。

彼·康斯坦丁诺夫教授

住宅电话：Д11—83—35

1948年7月16日

1948年7月20日波斯克列贝舍夫将康斯坦丁诺夫的信送马林科夫审阅。马林科夫认真地读了这封信，在信上许多地方作了着重标记，然后把它同手头积存的其他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的信件（他们曾经盼望自己殚精竭虑写成的信能得到答复，可到头来却毫无结果。）放在一起。

而斯大林却在7月23日收到了下面这封李森科寄来的信。

李森科致斯大林

(1948年7月23日)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恳请您审阅一下我写的题为《关于苏联生物科学的状况》的报告，因为该报告要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七月会议^①上宣读，而后对其进行讨论。

我力求尽可能从学术角度如实地讲述问题的真相。

表面上看我回避了尤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但我的报告的实际内容大多是对他那流传甚广的错误讲话的答复。

我将为得到您的指教而感到高兴和荣幸。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特·李森科院士

于是他得到了指教。

李森科的报告最初分为10个部分，共49页。斯大林将报告的第二部分——《资产阶级生物学的原理是错误的》全部勾掉，只保留了其中批评物理学家埃·薛定谔的一段话并在一旁的页边上写道：“这段话放在别处”。^②斯大林对这部分中的一个论点（“任何科学都是有阶级性的”）作了着重标记，并在页边上写着：“哈哈……而数学呢？达尔文主义呢？”。

① 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本应在7月举行，会议从7月31日开到8月7日，因而在历史上被称作八月会议。

② 用着重标记标出的文字是斯大林亲笔写的。

对另一些地方也作了删改。斯大林还提出了修改李森科报告的另几个方面。例如，在第三部分（后成为第二部分）第四段旁边有一句话：“而达尔文理论的不足之处呢？”就因为这句话，后面又增写了9段文字。在第四部分（后成为第三部分）的第一段中曾提到托·亨·摩尔根和威·路·约翰逊。斯大林在这一段旁边的页边上写道：“那么魏斯曼呢？”结果，在这一段的第一句话后面又添上了12段批评奥·魏斯曼的文字。手稿上还有斯大林所作的大量文字上的改动，他通过这些文字上的改动进一步从思想上强调了一系列论点。例如，资产阶级世界观被他改为唯心主义世界观，而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变成了反动的遗传学，等等。

斯大林对李森科的报告 ——《关于苏联生物科学的 状况》所作的部分修改

（1948年7月31日以前）

……新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认为，通过相应改变有机体的生存条件来控制这些有机体的遗传是研究工作者的完全合乎科学道理的追求。所以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也把生物学上的米丘林流派称作新拉马克流派即在他们眼里一无是处的、不科学的流派。

实际上事情恰恰相反。

第一，拉马克主义承认外部环境条件对活体形成的积极

作用和后天获得特性的遗传性，它的〔这些〕^①著名论点与新达尔文主义（魏斯曼主义）的形而上学不同，绝非一无是处，相反，是完全正确的和十分科学的

第二，米丘林流派绝对〔不是〕不能称作什么新拉马克主义流派，而是创造性的苏联达尔文主义〔。〕，它屏弃这两者的错误，并且没有再犯达尔文在理论上的错误即没有套用达尔文所采用的马尔萨斯的刻板公式。

不能否认，在那场于20世纪初变得激烈起来的魏斯曼主义者与拉马克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中，拉马克主义者比较接近真理，因为他们捍卫科学的利益，而魏斯曼主义者却热中于神秘论并与科学决裂。

（摘引薛定谔的话——第2—3页）……

被斯大林删掉的李森科报告原稿第二部分中留下的那一段移到了此处：“摩尔根主义遗传学的真正思想内容被〔资产阶级〕物理学家埃·薛定谔巧妙地（对于我们的摩尔根主义者来说是偶然地）揭示了。他在自己那本题为《从物理学的角度如何认识生命？》的书中以赞许的口吻叙述了魏斯曼主义的染色体理论，得出了一系列哲学上的结论。请看其中的一个主要结论：‘……个人的单个灵魂无非是一种无所不在、无处不见的永恒的灵魂’。薛定谔认为自己的这个主要结论是‘……一位打算一下子就证明上帝存在、灵魂不灭的生物学家所能得出的终极结论’。”（参看：《关于生物科学的状况。1948年7月31日—8月7日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速记报

① 方括号内是被斯大林勾掉的字。

告》，1948年莫斯科版，第14—15页。）

就这样，斯大林不仅支持李森科，让他在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上作报告，而且还是李森科报告的审订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该报告的炮制者之一。李森科的所做所为是斯大林统治在科学上的直接体现，是行政惩罚体制对科学发展的粗暴干涉。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7期

（李京州译）

空想家的利己主义

亚·齐普科

欧洲所有民族对新事物、非同寻常的事物的自然追求，他们的奔向未知社会的愿望，始终受到同样自然物的、对失去已有东西的恐惧心的制约，因为新事物只是预示着可能的幸福，它可能使你如愿以偿，也可能使你大失所望。而旧事物尽管有各种缺陷，但毕竟还存在。它是现实的。

大概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由于制约机制的作用，西欧各国尽管早在上世纪末就已具备向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前提和主观前提，却一直也没有认真地尝试建立新制度。但同时，正是俄国，尽管向纯粹的全面的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些客观前提还没有完全成熟，却多次试图奔向未知的社会。

在我们俄国，现实的吸引力，对拥抱浪漫主义的幻想的抵制力，都不如一些向资本主义学会了现实地冷静地处理问题的民族那么大。大概，列宁所说的“亚洲式的野蛮状态”不仅包括绝大多数居民缺乏知识、没有文化、缺乏劳动素养，而且包括缺乏抵制极端主义和过激主义的动因。“亚洲式的野蛮状态”，这还意味着对自发势力、对破坏的陶醉，意味着不顾一切地蛮干。

列宁认为俄国是介于文明世界国家与东方国家即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国家。一方面，我们为接受西方最激进的思想作好了准备，但另一方面，由于自己的中间地位，不具有客观

地评价这些思想的条件。

结果，正如上一世纪40年代E·伊·赫尔岑所预见的那样，出现了“视错觉”。

视错觉正好就表现在：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西方的新的进步思想，但眼界不开阔，不能得到这种思想的完整的形象。当在俄国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基础已经开始逐渐成熟的时候，我国知识界对这种思想的理解上的缺陷就日益暴露。哲学家谢·布尔加柯夫再一次提醒我国知识界，应该更深思熟虑地对待西方社会思想的成果，欧洲文明不仅果实累累、枝繁叶茂，而且还有给树木提供养料、以营养丰富的汁液保证思想的自然平衡的根。所以，布尔加柯夫发挥自己的思想说，即使是否定的（革命的）学说，它在自己的诞生地、在许多与之对立的强大思想流派中间所具有的心理和历史意义，同它出现在文化沙漠中、妄图一统天下的时候相比，同它成为俄国启蒙和文明的基础的时候相比，也是完全不同的。

对此能补充的只有一点：诞生在西方的激进的革命学说，不仅在外部的，而且在内部都是平衡的。它牢牢地保持着布尔加柯夫称之为西方文明的根的东西——实事求是的思维、实用主义的生活态度。这一内部的平衡也是卢梭主义的特点，但它在马克思主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的确，马克思的学说是欧洲思想史上最激进的革命学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任何人都没有提出过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历史进程、可以从人类的前史转向完全另一种真正的历史的思想。年轻的马克思幻想真正的奇迹，他把共产主义同向崭新的生活尺度的突破，同时空的新观念，同彻底克服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对立面，同“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人

与人的矛盾，同真正解决存在与本质、个体与类的争论”联系起来。对于他来说，共产主义是“解开历史之谜的答案”。

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人对过去这样勇敢地挥拳相向过，还没有人对未来提出过这样极端的要求。在这里，未来的纯洁性几乎带有实验室的性质。甚至连耶稣基督也不能许诺在未来的天国之中把矛盾解决得这样彻底。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初步认识将是一种错觉，因为，只要深入研究问题的实质，并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纯洁的未来具体与什么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其中很多是取之于现在和过去的东西，亦即取之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资产阶级文化，或者说，取之于“庸俗”经济和庸俗“市民”生活方式的本质属性。这一社会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呢？那时将有效而合理地安排生产，将用最低的费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建立“与人的本性相称”的生活条件，维护个人自主权，保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市民文明的一切财富。归根结底，是建立正常的人类幸福。的确，是要幸福。而且是要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其中包括受到我们现在许多批评斯大林主义的人憎恨的小资产阶级。恩格斯在1845年2月向爱北斐特市居民的演说中说：“或许你们当中有人觉得，要提高以前被轻视的阶级的地位，就不能不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应当记住，我们谈的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幸福”。^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26页。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笔下，理想是极为市俗化的，未来紧紧地联系着现在。他们总是直接了当地谈论这一点。而共产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理想，不是状态，而是消灭无产阶级所不能忍受的生活状况的运动。

社会主义建设与显著地改善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正常的思维这样告诉我们。现实的人道主义为我们现在所说的阶级方法或阶级观点的运用划定了范围并规定了条件。

而在俄国，如上所述，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对抗左倾激进主义，对抗在梦幻世界里过好生活的愿望；在这个梦幻世界里，人的思想和人的意志不受任何限制，人们相信童话在这里将会变成现实。斯拉夫主义者认为是我国长处的东西，实际上正是我国的不幸。俄国知识分子的反资产阶级、反实事求是的态度，使我们国家吃了很大的苦头。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与其他国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不同，始终没有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没有掌握经济思维的起码常识，没有达到职业化的高度，因而从一开始就没有为建立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合理的经济作好充分准备。

在我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极端主义当然也曾得到施展。正如列宁所说，没有这样一类的幻想家，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但我们的悲剧在于：这些具有完成革命奇迹的思想准备的人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革命要达到的建设目标、经济目标却缺乏充分的理解，缺乏充分的建设性思维修养。他们不习惯考虑他们所完成的改造的经济后果，他们并不总是急普通人之所急。

列宁看到了社会主义理想有脱离劳动者日常苦乐的危險

性。还在1901年^①，他在自己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激烈地反对把社会理想故意弄得非常玄虚。他说：“如果你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与该阶级的‘公平的劳动报酬’这类‘狭隘’琐碎的生活问题，即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不屑理睬的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②

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这种努力把理想与“狭隘”“琐碎的”生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愿望，并不牢固。俄国社会民主党同民粹主义运动一样，其弱点都是极端轻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许多革命者，甚至在1919年发生饥荒的条件下，还是更多地关心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吃饭，而不是关心糊口所需的粮食，不是关心养牛、养羊和养鸡。

我认为，要是我们俄国知识分子没有轻视日常生活、轻视我们现在轻蔑地称之为“日常生活琐事”的传统，斯大林就不可能说服党必须放弃新经济政策，就不可能使党相信空着肚子、没有任何舒适的生活条件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恩格斯来说是无可争议的宝贵（指对个人幸福的保证）的东西，对于他的许多俄国追随者来说，却变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属性，变成了可鄙的小市民习气。俄国革命者的悲剧大概在于：他们在自己身边的生活中找不到看得见、摸得着的价值。

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市民阶层及其财富和井井有条的生活极其憎恶。但是，我国的宗法制按部就班、令

① 此处有误。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写于1894年。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353页。

人窒息的生活结构，也使知识分子极为不满。所以，他们很难把自己关于非同寻常、超脱凡俗的未来的理想，同某种积极的、牢固的、现实的东西挂钩。

地下职业革命者更感到了这种与现实生活，即与琐事缠身、义务沉重的苦乐世界的脱节。坐过牢、流放过和住过单人牢房的人们，已经很难重新过起按部就班的生活，重新奉行这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和准则。他们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们觉得他们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生活秘密。但是，地下革命者所认为是准则和榜样的东西（例如，斯大林关于共产党员应该怎样生活的观念），实际上是背离准则的怪癖。

神化未来，必然导致怀疑现在，怀疑今天人的生活内容。还在上^一个世纪，当巴枯宁和特卡乔夫左右知识分子的思想时，我国的人们就坚信：不仇恨日常生活，不仇恨人的生活中经久不变、反复出现的东西，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我们发现，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起誓仇恨稳定的、习惯了的生活。在这方面，托洛茨基的思维重新又引起人们的注意。读了他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自传后，就会确信，在他的全部充实的、积极的革命生涯中，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革命带来的预期的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还不如说就是改变和震撼现存事物的可能性、使革命成为持续不断的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完成某种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可能性。构成他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础的恰恰就是一个内在的信念：不管人们本身怎样努力，不管他们怎样努力，不管他们怎样努力，空谈、流弊、无能、庸俗、无能、无能，无不竭力去不断摧毁人们习以为常的旧秩序。

托洛茨基早在斯大林之前，就把平衡斥为人类生活的最不恰当的存在方式。他坚持认为，社会应当“不停地蜕变”：“改革的一个阶段直接来自另一个阶段……经济、技术、知识、家庭、生活方式、道德方面的革命，是在复杂的互动中不断进行的，从而不允许社会取得平衡。”问题不只限于摆脱贫困和把贫困变成富裕。在他的革命狂热的中心，有着比较物质的东西。例如，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富裕生活。如果相信托洛茨基的回忆录的话，那么，正是那些“把烧鸡、烧乳猪、瓶装牛奶和成堆烤面包运到车站的身材高大的西伯利亚人”使他更加坚信，必须彻底摧毁旧世界，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事业。

我国的“爱国派”作家，在极其敌视“消费主义”、极其敌视他们所说的“平静的小市民式的幸福”这一点上，同托洛茨基有许多共同之处。托洛茨基同样确信，在历史上，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劳动带来的“物质利益”更坏的了，因此他更喜欢穷苦的、半饥半饱的工人的兵营式的平均主义和团结精神。他还认为，一旦人们不再挨饿，革命道德就会败坏，所以他认为，就道德来说，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饿死人要比新经济政策时期千百万工人和农民丰衣足食的生活强得多。

我们抨击小市民习气，抨击精神境界低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主义，就是间接地为我们不会工作、不会做生意、不会为了获得富足和幸福而合理地组织日常生活作辩护。同所谓的肤浅的、重商主义的资产阶级思维作斗争，相应地帮助了我们去为我们历来不会计算、不会分析、不会预见作辩护。

反对经济改革的人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他们希望俄国人

千万不要计算，不要吃饱，不要富裕起来和获得正常的生活条件，也就是说，不要变得像西方人那样。他们深信，我们已成为传统的贫困生活，以及在生产优质商品方面的无能，在道义上和精神上的价值却要高于舒适的西方市民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试图证明，推行经济核算、租赁和家庭承包，推行同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工作、进取精神和劳动致富，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健康来说比饥荒和永久的物资匮乏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最后，我认为，旁观者清，侨居国外的费·伊·夏里亚宾对我国革命意识的这一弱点看得最准。他写道：“我还不至于这样瞎眼和带有偏见，会看不到在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最深的基础里，存在着某种按照列宁及其某些战友所认为的更公正的原则对生活进行真正改造的追求……而不幸的是，我们俄国的建设者却总也不能屈尊去按照正常的人类计划建设普通的人类大厦，而一定要建设‘通天塔’——巴比伦塔！……他们不能满足于人们上班和下班所迈的普通的、正常的和实实在在的步伐——他们要一日千里地奔向未来……‘我们将抛弃旧世界’——现在就应该彻底扫除旧世界，连根清除，不留尘埃。而主要的是，我们俄国的聪明人惊人地无所不知。他们知道怎样把驼背的鞋匠变成贝尔维德尔宫的阿波罗，知道怎样教兔子点燃火柴，知道这个兔子为了幸福需要什么……”

只是夏里亚宾没有发现（这并不奇怪，党的许多领袖也没有发现）列宁曾试图使巴比伦塔的建设者回到地面上来。列宁提醒人们注意急性病的危害。他说，如果没有吃饱饭的工人和吃饱饭的农民，那就什么也不会有，更谈不上普遍平等

的世界王国了。^①应该公正地提出，连斯大林也一度支持过布哈林，布哈林试图证明没有吃饱饭的工人和吃饱饭的农民，社会主义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而只是一个空想。斯大林这位俄国几百年历史中的最严重的饥荒的制造者和导演者，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批评托洛茨基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任务割裂开来。当时斯大林说：“只要把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同列宁关于‘丰收可以挽救国家’的说法对照一下，就可以认清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十分错误。”

但是，我们非常不幸，巴比伦塔的建设者们始终没有下到这块罪孽深重的土地上。俄国革命激进主义的传统力量更强大。结果，托洛茨基在斯大林的帮助下胜利了。托洛茨基认为，我们并不是什么样的丰收都需要，需要的只是那种“能够促使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快速发展”的丰收。他的思想非常牢固地扎根在我们的意识中，甚至不久前还是我们党抨击“某些同志试图为个人致富从事副业劳动”的评论文章中的老生常谈。

A. 普罗哈诺夫说，我们不应该在制造成套仪器、研究社会舆论和领导生产的本领方面追赶西方，不应该为“我们苏联的医院的医疗效果低于西方”、为苏联的计算机计算速度比较慢和苏联的田地比较贫瘠而不安，因为我们本来是做另一种事情的人，是做某种“非庸俗的”事情的人。当我们今天读到他的这些话的时候，就会在这一套谬论中发现我们民族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老毛病，发现某种过分的、极端的傲慢。不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51页

是简单地追赶其他民族、拥有他们已经有的东西，而是完成某种任何人都不能做的、不敢做的事情。

这种意识很容易被人利用。人们由于眩于虚荣思想，要震惊世界，要教导全人类应该怎样真正地生活，即怎样按计划工作和生活，他们信心十足，正如尼·瓦·果戈里所说，他们深信“全世界都在撒谎，只有他们自己在说真话”，他们甚至不能发现，他们已经濒临深渊。对他们简直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叫他们自我毁灭。

所以，我们一心要震惊世界、领导大家去不断拯救世界的这种热情，确实就为那种关于纯粹的人和纯粹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幻想的扎根提供了再肥沃不过的土壤。

为什么斯大林打击农民私有者、破坏传统的家庭农业劳动和人民生活方式的尝试在党内得到的支持，甚至比1918年夏秋开始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获得的更大，这是可以得到解释的。也许，新经济政策虽然使城市居民吃饱了饭，使市场上出现了俄国常见的繁荣，带来了有条不紊的生活和政治上的平静，却没有满足体尝到历史节日的欢乐的人们的种种虚荣的要求。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活中，特别是在生活方式方面，与旧事物相似的东西太多了。

虽然布哈林在1918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必要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牺牲成千上万的工人”，但他当时嗜血的程度还比不上亚历山大·勃洛克。1918年初，勃洛克用艺术家的热情歌颂革命所引起的破坏、革命的气魄、革命的目标，并建议所有的人“把一切都建成新的”。他不同意较小的“较有节制的变动”，因为这是“比较鄙俗的”，这是“造反”、“暴动”、“政变”，而不是“革命”。他写道，革命“像带雷雨的

旋风，像暴风雪，总是带来新的和出人意料的东西；它不仅欺骗许多人；它能轻而易举地在革命的漩涡中毁了好人；它往往把坏人平安无事地冲上陆地；但这只是它的局部情况，这既不改变它的基本流向，也不改变急流发出的令人恐惧、震耳欲聋的轰鸣。这一轰鸣声在任何情况下永远都是伟大事业的赞歌”。

这样的话，对以下情况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正是我们国家在争取纯粹社会主义的理想方面表现得最为顽强，最后赢得那场争取权力的斗争的不是在20年代主张现实主义和同情贫穷的俄国农民的布哈林，而是号召不怕牺牲的斯大林。要知道，大家都非常向往奔向未知社会，都准备牺牲一切，甚至生命，只要能尽快地取得伟大的奇迹，达到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纯粹的人。

米哈伊尔·巴枯宁关于革命就是创造的信念不仅没有被根除，反而随着俄国社会的激进化，而拥有越来越多的崇拜者。我国同胞用暴力对付生活、进行破坏的轻率态度，简直令人惊讶。

但事实上革命就其本身来讲，是什么也不创造的。只有创造性的劳动、文化、艺术、思维和发达的宗教感情才能创造个性。革命只能促进个人感情的昂扬和流露，促进个人尊严的确立，只能消除个性的创造性自我表现的道路上的障碍。但革命就其本身来讲还是什么也不能创造的。而且要考虑到，我们所谈的革命，其使命是摘取旧社会内部已经成熟了的果实，使它解脱出来，让它见到阳光。至于另一些以根本改变世界、创造过去从未有过的东西（如“非庸俗的”、“非小市民的”经济）为目的的革命，那就要复杂得多了。对于这些

革命，必须表现出极其谨慎的态度，因为对你能够创造出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例如，在俄国宗法制农村建立大型谷物工厂）从来就没有充分的保证，因此应该时刻提高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分寸感，应该对人们的生命负责，应该作好退却、改变路线的精神准备，应该有勇气放弃最诱人的心爱的空想，如果它不再是促进建设的因素而成为破坏力量的话。

这里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推翻可恶的专制制度，解放俄国人民，而且是解放所有劳动者，建立全世界的工农王国。从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个别人的生命，生命的利益，轻于尘埃。结果，今天活着的人，今天的劳动者为了未来、为了空想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利益。这只能说是“个人溶化在党的集体性之中”。对阶级方法的这种解释从一开始就认为无论怎样残酷地对待个人都是正确的。托洛茨基的政治思维最明显地表现了对阶级方法的这一解释的实质。他在为自己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的行为辩解时公然写道，在德国人发动新的进攻时，为了唤醒德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为了通过他们的觉悟使世界革命的大火有可能早日燃起，即使丧失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乌克兰，即使不可避免地牺牲一些士兵，这也不是很大的代价。托洛茨基回忆说：“当时我主张不要匆忙签订和约，即使以丧失领土为代价，也要给德国无产阶级时间，以便他们弄清形势并作出自己的决定。”

问题不在于托洛茨基个人，而在于决定情绪最激进的革命分子行动的那种社会思维模式。这些人确信，由阶级斗争引发的历史运动什么都容许干。正如党的评论家之一B. 斯坦尼舍夫斯基所说，阶级方法“既不承认所谓战争规律，也不承认人性规律，既不怜悯老人，也不怜悯青年，既不怜悯妇

女，也不怜悯儿童”。

当然，由国内战争和阶级斗争产生的这种对待道德和对待生与死的“轻率”态度，不可能在一两年之内消除。长期以来，人的鲜血的腥味不仅使手持武器保卫新生政权的人，而且使革命领袖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平衡。托洛茨基也好，斯大林也好，都非常喜欢使用“血”这个词。前者爱说“血染的革命经验”，后者爱提个别人的血，例如“布哈尔奇克^①的血”。

斯大林从1928年起就竭力向社会意识灌输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神话，看来这不是偶然的。要知道，哪里有阶级斗争，哪里就没有同情，既不怜悯老人，也不怜悯青年，既不怜悯妇女，也不怜悯儿童。

国内战争的后果，不可避免的不安定的生活，也都表现了出来。一方面是真诚的信仰和热情，但另一方面是精神失衡、情绪躁动、生活不安定、煽风点火、疑神疑鬼。当然，党的那些从它过去的优点发展而成的弱点，也给党带来了麻烦。例如，在地下活动条件下形成的党的铁的纪律，少数人的意志绝对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实际上正确的人不算正确，得到多数人支持的人才算正确。老布尔什维克季娜伊达·涅姆措娃说：“斯大林常拥有多数。算术上的多数。他争取多数并得到了多数。而老近卫军的特点是众所周知的：即使多数错了，也应该服从。民主集中制是极严格的纪律。”

我们把自己的历史目标定得越高，越想向未来跃进，越急不可耐地要进入永远幸福、永远进步的社会，法制就越败

^① 布哈林的小称。

坏，为社会主义进步航船拉纤的人们的权利和生活幸福就越少。

我们越急不可耐地要进入“全人类幸福的王国”，我们为达到自己真正本国的目标所做的事情就越少。所有把未来与现在对立起来，把共产主义道德与全人类道德对立起来，把历史发展和世界革命进程的利益与现在活着的劳动者的利益对立起来的尝试，除了导致产生斯大林现象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但要知道，我们常常越过人类道德的准则，为了空想，为了知识分子的幻想而犯下罪行。我们说：“不应该害怕饥荒，不应该害怕罪行，如果饥荒和罪行能推动我们前进，推动我们走向无阶级社会的话。”为了莫名其妙地狂热追求刻板划一和千篇一律，牺牲了许许多多人的幸福，甚至他们的生命。马克思主义所谴责的粗暴的平均主义和嫉妒这种最卑鄙的感情左右了我们的行动。而且不仅在全盘集体化的时期，即使在很久以后，在40年代后半期、60年代初期以及80年代，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例如，在战后，当许多人住在土屋里，食不果腹，饿得遍体浮肿、奄奄一息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给农民松绑，扩大农民的宅旁自留地，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权的呢？要知道，国内战争以后，经济破坏的程度并不轻。但经过3年农村就已经恢复了生机，医治了创伤。而卫国战争后斯大林执政的8年实际上是白白度过了：当时执行的农业政策、国家对农村的更加严格的监督、对农民的迫害，都只能加深我国的农业危机。众所周知，只是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以后，才出现了转折。斯大林曾打算判处农妇费多西娅无期徒刑，只因为她从集体农庄的田地里拿了200

克粮食给孩子吃。但他却根本不考虑为了拯救挨饿的人，为了我国的经济进步而降低“社会主义的”纯洁度即降低生产资料形式上的社会化程度，不考虑从已走过的阶级划一化道路上后退一步。

很遗憾（而且应该十分明确地说出这一点），我们俄国的工人运动没能使马克思主义摆脱基督教化。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客观的原因：涅洽耶夫和巴枯宁的《革命者的基本信念》这一精神遗产，地下斗争的心理状态，还有选择斗争道路的绝大多数人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低下。

基督教化的表现是什么？它不仅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作乌托邦式的解释，而且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信条。

马克思的创造性的探索精神，他作为研究者的怀疑精神——所有这些细微特点没有打动任何人的心。他们所要求的只是“结果”，最后结论，只是用青铜铸就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确的公式。托洛茨基写道：“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了同只是稍微触犯了我们的民粹主义算帐，而且首先是为了在资本主义自身领域内开辟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人们没有注意到，从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预测的马克思，到致信《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反对把他的理论说成是关于人类的普遍命运的学说的马克思，他在关于未来的联合体社会的观点上经历了整整一场革命。

但那些以马克思的继承者自居的人（更不用说历次革命斗争的普通参加者），能够完成这样一场革命，转到科学的、非宿命论的历史观上来吗？就拿许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十月革命领袖来说，众所周知，他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原著，即使读也读不懂。就连那个自认为学识很高、毕业于敖德萨实

科中学、“以自信心十足相炫耀”的托洛茨基都认为，在5世纪，比较进步的封建生产关系就已经代替了奴隶制生产方式，那时日耳曼野蛮人就已经处于比古罗马人更高的发展阶段。

看来，没有必要去证明工人和农民、武装起义以及国内战争的参加者是用救世主说和宿命论观点来接受共产主义的，就如同基督教徒把未来的天堂想象成地上的天国一样。

最后，是否所有的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在革命中寻找真理，是否所有的人在作出生活选择时都是真诚的呢？从我们所知道的十月革命领袖们的生活道路、他们的全部行动来看，我们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某些人可能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达到自己虚荣的目的的合适的手段。我个人同意苏联社会学家3. 法因布尔格的意见：“革命运动就其构成，就其参加的人员来讲，是多种多样的、复杂的、矛盾的，参加革命的，往往不是具有崇高的思想和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就是在旧制度下极端贫困、丧失前途但又渴望摆脱自己命运而出头的人。”

的确，他说得很对。宗教学校学生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一个鞋匠的儿子，如果顺利地 from 宗教学校毕业，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会成为一个贫困教区的普普通通的神甫（要调到富裕教区需要有显赫的靠山，而他上哪里去找这样的靠山呢？）。而这是他在作这种选择时可能得到的最好的社会前程。

职业革命家的前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前程当然伴随着冒险，但却可以参加一种特殊的事业，而且可以立刻引起人们的瞩目，摆脱由于一只手有残疾而产生的缺陷情结，开掘掌握前所未有的统治人的权力的机会。

毫无疑问，托洛茨基是追求虚荣的俄国革命者中虚荣心

最强的人，也是抱着这样的动机即追求出人头地、引人瞩目而参加革命的。而且他自己也不隐瞒这些动机。在他的自白《我的一生》中清楚地流露了他的革命积极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质：不当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是不肯罢休的。

这些人需要神化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涂上宗教色彩、救世主说的色彩，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伟人学说，这是无须证明的。革命的目标越是宏伟、越是遥远，这些革命者就越是感到信心十足，在这个世界上越有事可做，越有机会表现自己，越能满足他们的自尊心。

这样的革命者需要马克思成为先知，需要马克思成为预言家。他们从十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只接受作为关于不可避免的世界命运、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的关于革命历史悲剧的学说（通过这种革命悲剧，进步精神在血海中前进）。

我并不坚持认为俄国的革命激进主义、精神极端主义的传统和救世主情绪必然导致斯大林主义。我深信，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不可避免的事件，即不存在只能以一种样子出现、呈现出一种面貌的事情。哲学概念“必然性”一般说来不适用于具体的事件范围。发生了的事情总是带有偶然性，就是说，受到难以预料的、具体的人的选择和行为的影响。事件，即必然性表露的时间、方式和行为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进程参加者本身，取决于他们的积极性甚至性格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偶然性在历史中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历史就无法理解了。

从这一哲学观点来看，甚至十月革命也是偶发事件，即它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是由于许多情况（包括俄国历史进程

中的偶然情况)的巧合。

历史爆炸的临界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也是由许多组成部分构成的,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人的智慧,他能预见联合起似乎不能联合的力量时刻,他有足够的意志力在俄国历史的这一命运攸关的时刻按动爆炸装置的按钮。我认为,一般说来,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列宁本人在十月革命前夕也说过,一切归根到底取决于发动的日期,因为“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①。

斯大林在1929年取得的胜利,其原因更是在于许多情况的巧合,其中包括列宁的逝世。那些能够影响20年代政治事件进程的人缺乏意志力,不善于考虑所作出的决定的后果,在当时情况下这一切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但偶发事件毕竟有其成因。所以,我认为,我在俄国左倾激进主义的传统中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的尝试也是对的。促使我这样做的不仅是过去的历史,而且有现在的现实。要知道,现在攻击改革的人,试图维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人,正是把左倾的否定的意识形态当作自己的武器……批评斯大林主义,而不批评革命的极端主义,不批评它的利己主义基础,就收不到任何效果。

原载《科学与生活》杂志1989年第1期

(刘彦章 摘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31页。

1937年联共（布） 中央二、三月全会材料（续）

2月23日晚间会议

莫洛托夫：现在由布哈林同志发言。

布哈林：同志们，我想首先就米高扬同志在这里发表的讲话说几句。这样说吧，米高扬同志认为我在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在第一封和〔下一封〕第二封信中，用托洛茨基式的方法对中央委员会进行恐吓。

我首先要说，我非常了解中央委员会，因此可以预先断定，中央委员会根本不会被什么东西所吓倒〔什么也吓不倒〕。（**赫洛普利扬金：**那你为什么说只要不取消对你的指责你就不结束绝食？）同志们，我恳求你们不要打断我的发言，因为我身体虚弱、讲话吃力；无论大家向我提出什么问题我都一定会作出答复的，但请你们现在不要打断我。我在信中讲了自己的心理状态。（**有人喊道：**为什么写只要不取消指责？）

我说这话指的不是中央委员会。我在这里〔提出〕指的不是中央委员会，因为中央委员会还没有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我提出过这样的指责。向我提出指责的是各种舆论工具，但中央委员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指责。我讲了自己的状态，这个状态纯粹应当从人的角度去理解。当然，假

如我不是人，那就用不着理解了。但我认为我是人，而且我认为我有权利在我一生中极其困难、痛苦的关头（有些人喊道：吓，还说呢！），在极其困难的时候谈谈我的心理状态。因此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恐吓、什么最后通牒。（斯大林：那绝食呢？）至于绝食，我到现在也没有停止〔我已4天粒米未进〕；我向你们说过，也写过信，讲了我于绝望之中选择了绝食的原因，我给少数几个人写了信，因为顶着这样的指责我无法活下去。

我不能用手枪一下子了结，因为那样一来会说我自杀，目的是给党抹黑；然而我要是因病死去，你们因此会失去什么呢？（笑声。有些人喊道：讹诈！伏罗希洛夫：卑鄙无耻！你就不怕舌头长疮。卑鄙。你想想你都说了什么。）请你们理解，我活得太难了。（斯大林：我们就轻松吗？伏罗希洛夫：你老是在想：“我不能开枪自杀，而要正常死去”。）

你们说起来轻松得很。你们能失去什么呢？因为如果我是个破坏分子，是狗崽子等等，那我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呢？我没有任何企求，我说的是自己的想法，说的是自己的感受。如果这能招致什么政治损失，哪怕是极小的损失，我都会无条件地去执行你们所说的一切。（笑声。）你们笑什么？这里根本没什么好笑的。

所谓“拒绝”出席全会也是这种情况。我不停地回答各种问题，不停地寄出大量信件，信件之多甚至使米高扬同志感到厌烦；但近一时期我确实感到体力不支，勉强挣扎着才来到这里。当人们说：你必须到这里来，我就来了。这能说是支吾搪塞吗？这能说是坚持错误吗？

第三。所谓打着列宁的旗号和奥尔忠尼启则的旗号“投

机”。列宁逝世时我确实在场，看着他停止了呼吸，我无限热爱列宁，这同“投机”有什么关系？也许你们认为奥尔忠尼启则的死对我来说无所谓，是吗？我简直对他的死不闻不问，仅此而已，是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就不要相信。但我要告诉你们，我深深地热爱谢尔戈。在党的历史上人与人之间不乏各种各样的争论〔在你们中间也可以看到不少争论〕。他的死使我感到非常痛苦，我由衷地热爱他（这一点米高扬同志非常清楚），我不愿打着他的旗号投机。（**卡雷金娜**：反驳没有听到。）

〔这一点我过会儿谈〕米高扬说我企图败坏整个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名声。绝对没有。我根本不想这样做。米高扬同志谈的地方涉及到〔我泛泛提到的问题〕侦查员们提出的某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是怎样说的呢？我说：这样的问题是完全可能和不可避免的，但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这些问题会导致这样或那样的后果。

米高扬同志在谈到政治方针时说我想诋毁中央委员会。我的谈话指的不是中央委员会。但如果人们看到报纸上发表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的社论总是把还有待证实的东西当作已经证实的东西来谈，那么很自然，这种起指导作用的明确的言论就会渗透到各个方面。难道这一点很难理解吗？这可不是无足轻重的短评。（**彼德斯**：反驳没有听到。）我一切都会谈到的，请不要大叫大喊。（**莫洛托夫**：请不要插话。别妨碍人家。）

米高扬同志说我在一系列问题上向中央委员会说了假话，说我在库利科夫问题上把1929年同1932年弄混了。说我弄错了，这是对的，但这种个别错误是难免的。（**加马尔尼**

克：弄错了。）我在同库利科夫对质时说：“细节我不记得，但这可能是在1932年，不可能晚于1932年，但可能早于1932年。”我丝毫没有坚持这个小小的个别的记忆错误。（米高扬：你没法否认。）

为什么没法？如果我想否认，我就会否认，但我没有否认，因为这是事实。同样，当我想揭露拉狄克与尼古拉耶夫时，我也错了；当时我推说许多事实都可能被忘记。我还推说莫洛托夫同志忘记了，在他的主持下我在大剧院作了关于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而他却说不记得了。这根本没什么可奇怪的。案件审理了10年，个别事实可能被忘记。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米高扬同志的另一个说法。这指的是，他曾讽刺说，我〔在这里〕承认在某一年有某种双重性〔承认〕，在他看来是两面派行为，即我在1930年递交了声明。我特别详细地讲述了这一点。当一个人递交了声明，请你们说说，他在24小时之内就能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吗？常有这样的事，常有这样的人，今天这么说，明天向他们一施加压力，他们就递交声明，说出截然相反的话来。以前的事对这种人没有约束，以后的事也约束不了他：他纯粹是没有原则性的人。（加马尔尼克：这在递交声明后延续了2年。）

请允许我讲讲我是怎样解释这件事的。米高扬同志说，布哈林他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依然同党有分歧：他实质上仍然坚持原先的立场。这是不对的。不管是关于工业化，还是关于集体化，或是关于对整个农村的改造，我根本没有坚持原先的立场。至于农村中的刺激因素，在颁布〔出版〕苏维埃商业法之前我对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我认为，总的来说，在苏维埃商业法问世后，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在这之前我对这

个极为重要但并非无所不包的问题是不清楚的。当在新的基础上开始启动商品流转、启动苏维埃商业后，我对整个经济关系的轮廓有了清楚的认识。难道这也是弥天大罪吗？难道可以说这是旧的立场吗？米高扬同志，别的不说，这至少是你的一种极其夸张的说法。

我还讲了许多宗派主义现象发生的原因。我不是为自己辩护，我确实没能马上理解我国的城乡关系在苏维埃商业方面将如何发展。但我认为，这个事实应当用符合实际、符合这个问题在各种经济问题中的比重的尺度来衡量。我也丝毫不为自己的下述作法辩护：我容忍并从而促使某些宗派主义成分得以保留下来。但我想解释一下事情的始末，我在对质时已经解释过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同一些青年有私交。在我遭到我认为是不公正的指责时，他们经常为我辩护。有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决议要求将我定为反革命分子。当时有些青年站出来为我辩护，表示不同意，不同意通过这样的决议。我对他们说，不要因为我而固执己见。但同时我认为自己对他们负有责任。当时就是这种超常规的联系。

这不好吗？不好。但我希望，发展的逻辑早晚也会使其他人和我一样全都去信奉“基督教”。我尽力不用不必要的尖锐言词去吓唬他们。这从我这方面来说是愚蠢而错误的，但在这里只能作这样的解释，而不能作其他任何的解释。甚至不仅如此，这有一些极有权威的同志可以作证，甚至后来我还始终为他们辩护，因为我把私人关系同政治关系愚蠢地混为一谈。我认为，在私人关系上应当使他们全都去信奉，怜悯他们，原谅他们做的一些事。这是错误的，但事情就是这样。后来结果如何呢？结果我在政治上犯了大错误。这是我

的罪过。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坚决否认我是蓄意这么干的。米高扬同志在这里就这样说。

我还想谈一点意见。好像是米高扬说的：你怎么能不对人们负责呢？要知道整个学派都在坐牢。我对此负责。但问题在于责任的程度，在于对这个责任的性质的评价。我在对质时对卡冈诺维奇同志说：我也对托姆斯基的死负责，因为要不是我在1928—1929年领导了右倾分子集团，托姆斯基的命运也许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我对这个事实也负有责任。但问题在于应当确定这个责任的程度和性质。对这些青年过若干年后发生的事情负有的责任，在质和量上有别于对委托别人去做某件事情并且这一委托得到完成所负有的责任。我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并认为自己的责任大于其他什么人认可的责任。但我想说，责任的份量以及对这个责任的评价完全具有特殊性，应当像我这样来加以阐述。

其次，米高扬说我企图诋毁供词。但米高扬同志，究竟该怎么办呢？既然我想推翻什么，我就要诋毁它；推翻就是某种诋毁。推翻某些论据，就是说不是完善这些论据，而是粉碎这些论据 [我不从其他任何方面诋毁文件，我不诋毁它是有一定的论据的]。我觉得，米高扬同志所说的没必要核对日期和事实，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米高扬本人在我同库利科夫对质时就援引了日期作例子来证明我撒谎。他对日期进行了论证。请允许我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某种批评，对这里出示的材料进行批评。否则任何自我辩护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辩护就是粉碎指责。（米高扬：我说过你有权批评，但要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而不是以反党的方式。）我的批评不是以反党的方式进行的。有人说用了某些律师语言。但律师就是

推翻一些东西和为一些东西辩护的人。（强忍住的哄堂大笑，喊声：律师为一切辩护。）有“魔鬼律师”，但也有其他的律师。

米高扬同志还提出过一个论点，这个论点我听说过多次了。该论点称：可能有些敌人在招供时话没有说完，甚至肯定不会说完，可是他们所说的都是实话。我坚决不同意这个论点。我想从侦查材料中援引一些例子，从分发给大家的供词和其他材料中举一些例子请大家作出判断。

我首先想谈一谈索柯里尼柯夫的供词。索柯里尼柯夫在同我对质时作的供词，是整个供词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次对质时索柯里尼柯夫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点是：所谓的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行动完全一致，托姆斯基作为右倾分子的代表参加了托洛茨基最高总部。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对质时曾多次问他：请问，托姆斯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团的代表参加的？对此索柯里尼柯夫回答说：作为集团的代表。卡冈诺维奇问：也许布哈林和李可夫不知道这一点，不知道托姆斯基是作为集团的代表参加的，是吗？对此索柯里尼柯夫说：不，我亲耳听托姆斯基本人说过，托姆斯基是作为三人团即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代表参加的。（卡冈诺维奇：他不是这样回答的！）是怎样回答的？（卡冈诺维奇：我会讲的。）可能是这样：作为右倾分子的代表。（卡冈诺维奇：我的理解是，托姆斯基代表右倾分子，否则这对于我们就没有意义了。有人喊道：那速记记录呢？）

我听到什么就是什么，我坚持认为我的转述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毕竟是些细节，重要的是索柯里尼柯夫所说的托姆斯基作为右倾分子的代表参加托洛茨基总部一事。正是根据

与索柯里尼柯夫对质时的这段供词而作出了初步结论：我和李可夫知道情况而且不可能不知道。（卡冈诺维奇：索柯里尼柯夫说，他听库利科夫说，你们同他们有联系，而后托姆斯基参加了皮达可夫总部。这是不同的时期。）我在场时索柯里尼柯夫没有提到库利科夫。但据索柯里尼柯夫说，托姆斯基作为右倾分子的代表参加是事实。（卡冈诺维奇：托姆斯基什么时候参加的？）这我不知道。（卡冈诺维奇：1935年。）这就是索柯里尼柯夫在对质时的供词。庭审时索柯里尼柯夫说的完全相反。庭审时索柯里尼柯夫说，右倾分子声称他们不想参加任何总部一类的组织，他们只想保持联系，而后他顺着这个话头就扯开了。

请问，所有这些同其他东西如何能揉在一起呢？一个人起先作为主要之点提出的是一种说法，到庭审时他提出的则完全是另一种说法，对此谁都没有发表过任何看法，而且这还被看作是正常的！怎么能这样做呢？或许，当谈到现有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供词即最有分量的供词时，这就是吹毛求疵、就是诋毁，是吗？

第二份供词是库利科夫的供词，供称我向他下达过恐怖主义的指令。在对质时他供称，我向他下达过针对卡冈诺维奇的恐怖主义指令，而且还说他了解卡冈诺维奇，对付这个目标可以说是稳操胜券；而他在自己的供词中却咬定我下达了针对斯大林的恐怖主义指令。请你们说说，同志们〔而且这一切都说得有枝有叶，极尽添油加醋、大事渲染之能事。〕，即使在过去的时代如果有人指控一个人暗害某个人，而一天之后又说这个人暗害的是另一个人，对此应当如何看呢？（叶若夫：这是律师断章取义的例子。你为何需要这么做呢？）这

是我亲耳听到的，不对吗？我的耳朵还不聋，我还没有死。我是亲耳听到的。（**卡冈诺维奇**：6位政治局委员听到的都是，库利科夫的供词主要涉及斯大林同志，对我只是一带而过。）他直接谈到的只是你，在对质时光谈到了你。他甚至举例说他了解你，说你也〔他也曾当过鞋匠〕当过皮匠，说你特别憎恨右倾分子，等等。

（**有人喊道**：主要的东西也是如此。**笑声**。）这完全是不可容忍的和令人愤怒的事情。不能不看到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即在一个纯粹是闻所未闻的、极端吓人的指控〔彻底改变立场〕、中一夜之间出现的两种说法的欺骗性。而米高扬同志说，这些人所认定的一切都是实情，说他们显然不会说谎，而只能说半截话。我无论如何不相信这样的供词，丝毫不相信。

说完索柯里尼柯夫和库利科夫的矛盾百出的供词之后，我谈谈扎伊采夫有关所谓斯列普科夫分子代表会议的供词。扎伊采夫作供的时间是9月24—27日。首先他说这次代表会议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复辟分子、恐怖主义分子等的一次大聚会。侦查员同志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布哈林在这次斯列普科夫分子代表会议中起了什么作用？他回答说：“斯列普科夫告诉我，布哈林领导了这次代表会议。还有，在这之前彼得罗夫斯基也告诉我，布哈林会见了这次代表会议的与会者，他看到他们很高兴”。问：“布哈林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是否讲过话？”“这我确切情况不知道”。这就是说，他知道，我在某处为这次代表会议忙前忙后，我领导了这次会议，我会见了与会者，我看到这次代表会议与会者异常高兴，他是从两个人——斯列普科夫和彼得罗夫斯基那里听说这些事的。而当

时我根本没在莫斯科。当时我正在北吉尔吉斯。（有人喊道：策划好了才走的。）说的不是策划，因为说我会见了与会者，看到与会者很高兴。（有人喊道：如果在莫斯科，就会出席代表会议。）

[对不起，这里为什么不提我是否讲过话。]我在这里谈的是这些供词的欺骗性。这些供词纯粹是睁着眼睛说谎话。这种谎话一眼就能看穿，而且谎话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播：一方面说是扎伊采夫，另一方面扎伊采夫说这是斯列普科夫说的，第三方面说是彼得罗夫斯基，这样至少有三个人卷入，卷入了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谎话。

米高扬同志和叶若夫同志提到蔡特林的供词，特别是关于同社会革命党人结盟的问题。供词称：我在10月份曾委托斯列普科夫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而他被捕不知是在8月，还是在9月。所有这一切越说越远。请问，我有没有权利对这些事实进行分析？难道这也是律师手法或断章取义吗？我认为我有这个权利。如果这里说我还下达过恐怖主义的指令，在街上下达给一个人——库利科夫，在打猎时单独下达给另一个人，在某处闲聊时偶然下达给第三个人，那我就只能否认这些所谓的事实。请你们想一想，如果碰到的是这类“事实”即同谁私下谈的话，那我要怎么来自我辩护呢。我只能说——不，没有这回事，而且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卡冈诺维奇：几十个人都这样说。）

关于这几十个人我也要谈谈。请问，我把各种人加以比较并尽力证实他们的供词[不一致]是矛盾的，以证明供词是不正确的，这难道是错误的、是不能容许的吗？这是自我辩护的唯一的办法、唯一的方式。我能证实什么呢？（米高扬：

谁也没剥夺你这个权利。)不,你说过,库利科夫与对质完全吻合的供词使你十分震惊。我指出,库利科夫关于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供词根本不“吻合”,相去甚远。(卡冈诺维奇:不是这样。)怎么不是这样,绝对是这样。(卡冈诺维奇:不是这样,有文件为证。)如果确有我签了字的我的供词的文件,那就好了。[例如,这里援引过,我亲耳听说的。](卡冈诺维奇:我们听到过,6位政治局委员听到过。)我不知道你们听到了什么,也许我的耳朵的构造截然不同,我记得绝对清楚。(卡冈诺维奇:有速记记录。)我记得很清楚。我知道他提到许多细节。他甚至说过,莫斯科的右倾分子特别憎恨卡冈诺维奇,还说过其他许多话。不可能所有这些都让我听到。对不起,不管你们怎样,我亲耳听到的就是我亲耳听到的。

拉狄克的供词。我不准备谈他的供词。我已对所有这些作过详细的描述,要知道我在描述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拉狄克是如何杜撰出所谓同我的谈话的。我证明,谈话确实是他杜撰的,因为整个谈话的前提是反对我的只有加米涅夫一个人,因为拉狄克不知道我同索柯里尼柯夫对质过。他不知道这次对质,并在这个前提下炮制了[整整一个纲领]——整套借我的口说出的论点,既提到了留京,也提到了许多其他东西。最终连侦查员也必定会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不可信的,因为你们互通情况,相互磋商,布哈林怎么会不告诉你们索柯里尼柯夫在对质时对他的揭发呢?拉狄克对此未置一词。但我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确实只字未提这次对质,那么拉狄克所说的一切,正是他所说的一切是不可信的。这样的东西在这里比比皆是。

我不可能在这里[而且这也根本不是我的义务]——列

举所有这些东西〔文件〕，但我说了最引人注意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都说明一点。这些东西说明，这些供词是——我不知道该怎样说——轻率的或是〔其他什么〕骗人的。扎伊采夫讲话时怎么能够引证两个人的说法呢？这是明显的〔不可信〕谎言。库利科夫怎么能够就一个极其要害的问题提出两种说法呢？索柯里尼柯夫怎么能够一下子提出两种观点呢？（有人喊道：谈到这一点的有罗济特，有斯列普科夫，还有其他人。）这一点是什么？如果这样“泛泛地”讲，那就无异于问一个学生莫斯科在地图上的位置，而他立刻用手掌指向整个地图。这等于是什么也没讲。

关于留京纲领。叶若夫也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从提出指控的角度来看不难理解。留京纲领（如果你们能够证明我同这个纲领有某种〔接触〕联系）是个真正的宝贝，因为那里既谈到了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极严重的方方面面，也谈到了恐怖活动和〔社会主义〕专制制度，等等，等等。我专门从留京纲领的角度研究了大量〔这些材料〕供词。我仍然认为，应当对这件事进行详尽的研究，研究供词中到底说了些什么？

阿斯特罗夫供称，作者是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我应当告诉你们，一般来说，如果是这四个人撰写的纲领，那么你们应当十分明白，这多半就是我写的。（**斯大林**：为什么？你们讨论，由别人写的。）我想澄清一点：他说〔写〕的是主要作者；我则化整为零，我想一个接一个地说。阿斯特罗夫认定我们是主要作者。如果这四个人是主要作者，那就肯定是我写的，而不是乌格拉诺夫动笔写的。（**斯大林**：某人是一个人。）我说的是阿斯特罗夫的提法，这可以

通过文字鉴定来证明纲领不是我写的，证明我不可能写这个纲领。（叶若夫：难道斯列普科夫没有起草过他签署的文件吗？）我没有签署过留京纲领。我说的是留京纲领，说的是文风。可以从文风上证明我无论如何没有起草这个纲领。（莫洛托夫：我们注意的不是文风，而是恐怖活动。）我根本没有参与这件事。（莫洛托夫：你最好谈谈。）

[这是一个经过论证的纲领。]乌格拉诺夫供出了些什么？乌格拉诺夫供称，纲领的直接作者是留京、加尔金和卡尤罗夫。蔡特林供称，留京在布哈林等人首肯后起草了纲领。库利科夫说，是整个反党派别 [分子] 联盟起草的。扎伊采夫说，参与此事的是马列茨基和斯列普科夫。怎么能说这些供词都是正确的呢？到底是谁起草的呢？（什维尔尼克：你是什么时候公开表示反对这一纲领的？）我就此发表了完全公开的声明。我只是在中央委员会里才第一次看到了这个纲领。（什维尔尼克：这个纲领合不合你的心意呢？）我没有读过，它也不合我的心意，我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材料对纲领进行了谴责。（有人喊道：你是从哪里知道纲领的文风的？）我知道我没有起草这个纲领。（笑声。）因此可以说这不是我的文风。（有人喊道：内容是你的。）

有哪些供词谈到这个纲领的来源呢？我听说，叶若夫同志说好像还有一批其他的供词。我想指出，阿法纳西耶夫供称，首先是加尔金把留京纲领带给乌格拉诺夫去协商的。而且他甚至说，他把这个纲领藏在了马甲里。另一方面，乌格拉诺夫在谈到这件事时说，1932年9月他们在博尔舍沃托姆斯基住处举行了聚会。当时我不在——我缺席。（叶若夫：施米特说纲领是你第一个提出来的。）什么时候？（莫洛托夫：4

月份。)

[这段时间我在休假。] 根本没有这样的事。(莫洛托夫：你提出来后就休假去了。) 对不起，我差不多是在7月[6月]份动身的。(莫洛托夫：累了，于是就休假去了。) 如果你想开玩笑，这是你的事，我可没有这个闲情逸致。我只是想说，如果是我或“三人团”中的任何一个人起草的这个纲领，那么乌格拉诺夫对于纲领的内容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因为乌格拉诺夫说，[我通报说]他在博尔舍沃通报了纲领一事并讲了纲领的内容。(斯大林：集体的创作。) 我没有读过这个集体的创作。(叶若夫：可是李可夫说是一块儿读的。施米特说过。) 我没有去博尔舍沃。当时我没有在莫斯科。我说过，乌格拉诺夫说[向我讲过]向去过博尔舍沃的人讲过纲领的内容。唯一的一点是，我知道这件事，我将对此作详细的解释。(加里宁：施米特讲了第一次会议是怎样定下来的。) 这一点我绝对不[记得]知道，我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为留京纲领提出任何提纲。

唯一一次提到起草纲领是在1928年，当时同志们在我的住处聚会，当时提到制定提纲。我撰写了纲领；纲领的遭遇人人皆知，再也没讨论过其他纲领。(斯大林：顺便说一句，纲领是在托姆斯基那里找到的。) 可能再没有别的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①，对一个人随便扣什么帽子都可以，但我[绝对]不知道留京纲领（只是在中央委员会粗粗看了看纲领）。(有人喊道：你在皮达可夫那里看的是什么纲领?) 在皮达可夫那里我看的不是留京纲领，而是1928年的纲领，是斯

① 即叶若夫。

大林同志提到的那个从托姆斯基那里找到和得到的纲领。既然纲领找到了，可以拿来读一读。（**斯大林**：特别糟糕的纲领。）肯定很糟糕。（**笑声**。**柯秀尔**：现在不能再坚持这个纲领了。）

我首先应当作一些总的声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开头所讲的那几点，即说我知道存在着一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说我知道存在着一个恐怖主义的平行总部，说我知道进行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的方针，说我也知道这些方针并坚持这个纲领。在以上的说法中没有一句实话。我不知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不知道平行总部，不知道进行恐怖活动的方针，不知道进行破坏活动的方针，不知道任何类似的东西，我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参与这些下流勾当。我最坚决地反对这些东西。这里可能有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供词，但无论如何我不能承认这些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斯大林**：你没听说过青年右倾分子的恐怖主义情绪吗？**伏罗希洛夫**：当着你从来没有谈论过吗？）当着我从来没有谈论过。我是从一份东西中，从一大叠与这次代表会议（**阿斯特罗夫**供认过）有关材料中得知恐怖主义情绪的，材料中谈到了库兹明的日记〔材料〕，或许还谈到其他什么；从我在政治局看到的审问萨波日尼科夫的记录中，我也了解到了恐怖主义情绪。

（**斯大林**：你没听说过青年右倾分子的恐怖主义情绪吗？）我没有听说过恐怖主义情绪。（**斯大林**：也没有协商过？）也没有协商过。（**笑声**。）同志们，随便你们怎么发笑都可以，但我在1932年是怀着平静的心情动身去度假的。（**卡冈诺维奇**：布哈林在与库利科夫对质时说，1932年他得知乌格拉诺夫心情沉重而绝望，担心他们可能采取激烈行动，于是他就去住

处找乌格拉诺夫。)不，同志们，不能这样说！这里需要作某种澄清：[他是要采取激烈行动。我指出过这一点而且有这方面的材料。我援引了某些日记。我指的是1932年的日记，当时发生了一些麻烦事，我担心乌格拉诺夫的情绪]我指的不是乌格拉诺夫的绝望情绪，而是他的病态般的动摇性。我谈到了麻烦事，谈到担心乌格拉诺夫会失去自制。(叶若夫：你给乌格拉诺夫下达了充当领导的指令。)什么，充当领导？恰恰相反。我说应当同党一起同心同德地工作，不应当从事任何反对派活动，不要失去自制，而且他也表示同意。事情当时就是这样。这简直是天晓得怎么回事！关于这件事有乌格拉诺夫1933年的供词，因为对这个案子已作了审理。然而请问，既然他没有见过我，他怎样编造谎言呢？(有人喊道：乌格拉诺夫会编。)

是的，他会编。所以，人们说我找过他并说服他同意“充当领导”。我坚决否认这一点。我向他说的话恰恰相反，是要他放弃反对派活动。他同意我的意见。在我动身后发生了某些变化。我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否同涅夫斯基或库利科夫达成了协议，但这里重新配置了力量。(有人喊道：库利科夫的骨干呢?)我在同库利科夫对质时非常[简洁]详尽地谈到了这一点。我谈了这样的事情。我还残存着某些宗派主义的成分。我力图用疑问来瓦解库利科夫，我问他：你们有哪些材料？他则对我说我错了。(有人喊道：哎哟哟！笑声。有人喊道：这也叫瓦解。莫洛托夫：同志们，不要妨碍人家发言。加里宁：不要妨碍人家发言，同志们。)我要负责任的是，我采取了错误的立场，我没有尖锐地提出问题以触动大家，而是一味地以疑问来瓦解他们。我认为他们全都会动起来的。

(有人喊道：去建设社会主义。)这里指的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这里说过这件事)斯列普科夫、胡佳科夫等人的某个纲领。我将同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样，不遗余力地反对这个他向我们通报过的纲领[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个纲领]。如果我看到这个纲领，我会最猛烈地同它作斗争，——不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对此抱着怎样冷嘲热讽的态度。

我要指出，供词中什么东西都有，可以想象的和难以想象的，杂七杂八一大堆。供词中有我同赫里欧的谈话内容(话题是资产阶级民主)，而当时我根本没有见过赫里欧；供词中甚至说我同斯克雷普尼克有联系(站在右倾立场上我是不应同斯克雷普尼克有联系的)，说我坚持民主共和国的立场(当时众所周知，我谈过这个问题，例如在立宪会议上，)——以及其他一系列东西；我不能对所有这些问题逐一作出答复，因为这样做需要许多时间，我只能拣主要的讲。

我想简单地谈谈恐怖活动问题。同志们，我认为党籍问题提得太幼稚了；如果一个人站在恐怖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党的领导，那么他是否能成为党的一员的问题就是一个幼稚的问题。我同恐怖活动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对此没说过一句话，没出过一个主意。当我听到这些事情时，我觉得这是在说另一个人，也许是当着我的面说另一个人的事情给我听。我不明白，怎么能够向我提出这样的指责，我对此一点都不明白，对所有这些事我看着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波泽尔恩：不是摸不着头脑——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你看得更清楚，也许不是摸不着头脑，但我毕竟也不是丈二和尚。如今我应当说，有分量的供词似乎是我好像下达过一系列恐怖主义的

指令。(莫洛托夫：而你不知道，也没有下达过。)

是的，我不知道，也没有下达过。但是不能把同“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的事一古脑都硬推到我身上，说我同他们结成了联盟。这样说简直令人发笑。说我通过斯列普科夫[指使]派遣谢苗诺夫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关系，而当时斯列普科夫早已身陷囹圄。这里应当指出，在蔡特林的供词中几乎没有一个日期同另一个日期有联系，鬼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我已经作过极其令人信服的证明；现在这个我曾经在社会革命党人诉讼案中为其辩护的人说什么，他如今说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应当说，现在人们非常敏感，小心翼翼地揣摸他们该说什么。(会场上一片喧闹声，笑声。)这在扎伊采夫问题上已经得到了证明。(有人喊到：什么也没证明。)这明摆着，怎么能说没有证明？(洛佐夫斯基：这都是你的学生和朋友。)唉呀，我的天，学生和朋友……要知道我可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们了，我对他们口诛笔伐，痛斥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叶若夫：你给你在1934、1935年痛斥过的朋友们写了私人信件。)什么时候？(叶若夫：1934、1935年。)给谁写了？(叶若夫：你的朋友。你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却给他们写私人信件。我这就拿信给你看。)

好，拿来吧。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举一个可以说是极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叶菲姆·蔡特林。他曾是我亲密的人，而他对我简直怀有刻骨的仇恨。这一点可以证明吗？可以证明，你最好听我讲一讲他的信件。这许多政治局委员也知道。(斯大林：他怎么会怀有这样深的仇恨？)原因是这样的。他怀有仇恨是因为他的被捕。在这之后他开始说我没有为他辩护，他公然对我说，我应自行去坐牢，

以反证他是无罪的。(笑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们去问他好了。但是，他说，我一点儿没为他辩护，也没在一月全会上帮助他，当时伏罗希洛夫同志对蔡特林问题提出了异议，我没有把他同斯列普科夫分开。这之后他就对我有了刻骨的仇恨，并写了许多信件。这就是给你们讲的一个例子。

(彼得罗夫斯基：关于恐怖活动和其他问题他又将杜撰些什么呢?)关于蔡特林我已用日期[数字]向你们证明，他说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彼得罗夫斯基：而第25、30两次审讯说的是同一回事。我略知一二。)非常简单。好，如果你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那这非常容易解释[因为]，事情往往是这样；向他们出示[他们首先招供]其他人的供词，因为在审讯时常常直截了当地说：“你被揭发从事恐怖活动，揭发你的有这样或那样的供词”。(叶若夫：如果你不知道，那至少不要胡说。李可夫昨天是心服口服了。彼得罗夫斯基：布哈林又在诋毁了。)我向你们援引这些问题，我是从记录中抄来的，我可不是杜撰的。(斯大林：是在承认以后。)不是。这不对。我从供词记录中抄了许多这样的东西。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施加压力，是为了促使他们招认。所以我在那里写道，一般来说，为了揭穿真相，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完全允许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难道不可以吗?(斯大林：并非总是这样。情况很特殊。)

然而我要说，在这种情况下，即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在我成了千夫所指、举世瞩目的对象后(因为在拉狄克指着鼻子说我是这个那个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问题涉及某个审查对象特别是右倾分子时，肯定会问他——“你们的领导人是谁?”，那样一来，他的食指、拉狄克的食指，两次诉讼

案的锋芒，就会指向我。（鲁祖塔克：会议地点说了，日期也说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些地方说了会议，有些地方说了不同的日期等等，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指的是1928—1929年。（会场上一片喧闹声。）是的，是的，我根本不想否认这一点。（斯大林：这也涉及到1932年。维辛斯基：而拉狄克指的是1934—1935年和1936年。丘巴尔：那索斯诺夫斯基呢？）

我举两份供词来说。这是格罗利曼和罗济特的供词。关于这两人我要详细地谈一谈，关于格罗利曼我要指出他的诬蔑是无稽之谈，而且我认为这是可以验证的，因为我在车厢内同他交谈时在场的还有其他人，其中包括一个或是两个肃反工作人员，他们常常陪我出行，一刻也不离我左右。关于罗济特。我同罗济特交谈时在场的有采赫尔和法伊祖拉同志。[罗济特，关于他。]我们附带地谈到了奇尔奇克，为此我写信给谢尔戈和斯大林同志，信中谈到奇尔奇克工程。我们谈的就是这些。[所以我无法推翻。]如果有谁还要说我同他在打猎时作了个别交谈，那我如何能推翻这一点呢？我只能加以否认。我只能说：不，没有这回事。

斯大林：阿斯特罗夫为什么要胡说呢？

布哈林：阿斯特罗夫为什么要胡说？我想……

斯大林：斯列普科夫为什么要胡说呢？要知道这丝毫不会减轻他们的罪责。

布哈林：我不知道。

斯大林：丝毫不会。

布哈林：阿斯特罗夫招供后，你亲口说可以释放他。

斯大林：难道不能称其为骗子吗？

布哈林：我不知道。（笑声。）请你理解现在人们的心理。

你现在宣布我同拉狄克等人是恐怖主义分子，是破坏分子
.....

斯大林：不，不，不。请原谅，但事实能否回忆起来呢？在组织局驻地进行的对质，你在场，我们政治局委员在场，阿斯特罗夫和其他一些被捕者也在场：在场的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斯诺夫斯基、库利科夫等人。而且我或其他什么人还问每个被捕者：“请你们实话实说，你们的供词是自愿作的还是向你们施加压力后作的？”当时拉狄克甚至放声大哭：“怎么会施加压力呢？是自愿的，完全是自愿的”。阿斯特罗夫使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们都为他感到惋惜：阿斯特罗夫是一个不愿扯谎的诚实人。他心情激愤，几次对你说：“你把我们组织起来，你教唆我们敌视党，你现在却想搪塞不作回答。你不感到羞耻吗？”

布哈林：他对谁说的？

斯大林：对你。

布哈林：斯大林同志，那我是怎样回答的？

斯大林：你怎样回答的？你的回答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是对托洛茨基分子的：“胡扯，恶棍”；这种回答也用于其他人。

布哈林：根本不是。

斯大林：我们的尝试说明了什么呢？当我们安排你同阿斯特罗夫和库利科夫对质时，我想，阿斯特罗夫和库利科夫的供词甚至对你也会有影响的。

布哈林：没有这回事，根本没有。拉狄克是一个老奸巨滑的恶棍。

斯大林：我没提拉狄克。

布哈林：你把所有人分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

斯大林：我没涉及托洛茨基分子。

布哈林：这都是些天生的坏蛋。库利科夫首先是个工人。这就是我对他态度不一样的原因。

斯大林：阿斯特罗夫不是工人。

布哈林：阿斯特罗夫不是工人，但当托洛茨基分子在对质过程中发言时，我同他们吵了起来，当他们厚颜无耻地胡扯时，我打断了他们的话。相反，我同库利科夫讲话时态度温和，虽然也几次冲他大喊：“撒谎可耻”。所以我在斥责他们这些天生的大骗子的供词时，语气是有轻重之分的。我对库利科夫和阿斯特罗夫态度最温和。我对阿斯特罗夫说，我对不起他们，把他们引入了歧途。

斯大林：对阿斯特罗夫特别温和，尽管阿斯特罗夫诋毁你。

布哈林：不知道他为什么诋毁我，但他诋毁了，他们所有人都在诋毁我，而且可能还会诋毁我。

施基里亚托夫：他们说的是实话。

布哈林：施基里亚托夫比你清楚，说的是不是实话。

斯大林：我不明白，为什么阿斯特罗夫要诽谤你。为什么斯列普科夫要诽谤你，因为这丝毫不会减轻罪责。蔡特林没有，你没有为他辩护也没有袒护他，但阿斯特罗夫为人更诚实，不能说他是个爱说谎的人。斯列普科夫是跟你最亲近的人，为什么他要诽谤你呢？斯列普科夫的道德面貌我是知道的，远不能说是尽善尽美。至于阿斯特罗夫，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诚恳，我和伏罗希洛夫都为他感到惋惜，这个人给毁了，不然他本来会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

布哈林：我认为，所有这些青年都在诽谤我，原因非常简单。

叶若夫：他们为什么打击你呢？

布哈林：第一，谁如果再次被捕，他们就认为是我造成的。

施基里亚托夫：他们可全都是在自己指控自己。

布哈林：不是因为我告发了他们，而是因为我正在受审查，所以把他们连累了。

伏罗希洛夫：他们是先被捕的。

斯大林：相反，在最近一次对质时我们不仅传唤了布哈林，而且还审查了著名的军事工作人员布加乔夫。要知道对质有一个特点，当被告去参加对质时，他们全都会产生一个想法：既然政治局委员都来了，那我就可以把一切和盘托出，以便为自己辩护。这就是被捕者在对质时的心理状态。如果说原先我可能认为肃反工作者有某些夸大其辞之处，——这是他们的工作性质，认为他们可能有些夸张，我不怀疑他们的工作是忠实的，不过他们可能着迷，但在最近一次对质中，旧的记录同我们到场时的供词完全吻合，这使我确信肃反工作者的工作是认真和诚实的。

彼得罗夫斯基：诚实的？

斯大林：诚实的。在这方面拉狄克和所有人都曾有机会说实话。我们也曾要求——请据实说来。我说的是实话，他的眼睛，他说话的语气，——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了解人，见识过，我可能失误，但这里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襟怀坦白的人。

布哈林：如果你认为他说的是实话，认为我在打猎时下

达了恐怖主义的指令，那我无法使你改变看法，但我认为这是卑鄙无耻的谎言，对此我不屑一顾。

斯大林：你同他聊过，但后来忘了。

布哈林：根本没说过。

斯大林：聊了很多。

布哈林：说我聊了很多，我同意，但说我聊了恐怖活动，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同志们，你们真以为，是我炮制了宫廷政变计划，按这个计划托姆斯基将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整个中央机关将由斯列普科夫分子所把持！布哈林一贯反对列宁，他是机会主义者等等，但整个中央机关由斯列普科夫分子所把持……

卡冈诺维奇：在对质中你并没有否认你曾向你的学派灌输下述思想：你们应当成长为党的领导人，成长为政治局委员。而且阿斯特罗夫在这里说了实话。

布哈林：我没有说过这话，但我提请你们注意一个事实，即在同志们推荐两三个人进入中央委员会时，我说了这样的话，我是反对这样做的。

斯捷茨基：准备培养托姆斯基担任中央书记。这一点我早在1928年就讲过，当时你还不敢否认。

布哈林：那你当时应该担任什么职务呢？

斯捷茨基：我不知道我当时应该担任什么职务，但我1928年在七月全会上讲过，托姆斯基准备当中央书记。

布哈林：关于培养托姆斯基担任中央书记，这没有什么可笑之处，可笑的是说整个机关由斯列普科夫分子所把持。当时指的是1929—30年的宫廷政变……当时指的是1930年或1929年的“宫廷政变”。

莫洛托夫：那你对你原先那个学派的朋友的所有供词即阿斯特罗夫、扎伊采夫、蔡特林及其他人谈到自己、谈到他们参与恐怖活动的供词是如何看的呢？

伏罗希洛夫：他们出于什么目的要自己诬蔑自己呢？

布哈林：我怎么看？关于蔡特林，说他从事恐怖活动，我不相信。

莫洛托夫：难道说他自己造自己的谣吗？那阿斯特罗夫是为什么呢？

斯大林：罗济特是公司的领导，一个人为什么要中伤自己呢？

布哈林：如果我知道他们这样做的想法，知道他们指控自己的原因，那我早就说了。但是我不知道。

莫洛托夫：这是实话还是谎话，你就没有看法吗？

布哈林：理论上可以认为，这些人走到这一步是可能的，原因很简单，谁继续顽抗，谁就有极大的可能落到这样的地步。

斯大林：如果你能适时告诉我们那就好了，那你就是做了一件好事。

伏罗希洛夫：而且也挽救了他们。

布哈林：当斯列普科夫及其他人因这次代表会议而被捕时，由于在这之前我曾同斯列普科夫说过同党进行斗争是胡闹，而且他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表示应当与党〔行动一致〕同行，所以我不相信他们能做出什么卑鄙的事来。我继续为他们辩护，直到1933年向我出示了他们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供词。我本人当时还不相信。

莫洛托夫：那么现在，在看了大量的供词之后，你对他

们指控自己怎么看呢？

布哈林：我不知道。

斯大林：持中立态度？

布哈林：我跟你讲；我可以提出几个能在这里成为原因的假设。第一个。我认为，在他们的眼里我成了一个堕落的人，成了各种报刊声讨的对象，简直找不出比我更坏的人。第二个。这里可能有些报复因素。

加马尔尼克：请谈谈你自己。

米高扬：这些人为什么要指控自己呢？

布哈林：我不知道。一部分人是信口开河——这是可能的。同时他们害怕成为不诚实的人，因此对有些事可能有所夸大。我可不知道，我没法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而对于某些人的事我根本不相信。我没想过罗济特会干这种事。

丘巴尔：为什么你在这里总是谈心理问题而不谈谈自己呢？

莫洛托夫：还有一个问题：在中央组织局进行的我们所有人都参加的对质结束后，李可夫声称他现在认为托姆斯基知道恐怖活动等等，你还记得吗？有这么回事吗？李可夫知道这事吗？

布哈林：请问，任何一个人读完指控我的400页供词而听不到我的反驳，难道不会说布哈林是狗崽子吗？关于这个问题——关于托姆斯基，你们也问过我。我说过，我不能为任何人打保票，但这件事我认为可能性极小。我有段时间犹豫过。但我马上又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同志们，一个人有没有权利在这些问题上犹豫呢？

斯大林：当然有权利。

布哈林：我不是在街上说的，而是同政治局委员说的。我是〔特别〕犹豫过，但这是在我看到谎言成堆和索柯里尼柯夫推翻自己的供词之后……

斯大林：但这也减轻不了罪责。

布哈林：但索柯里尼柯夫一开始说他是成员……

斯大林：后来又说是有联系。

布哈林：这就是说，他第一次是在撒谎，他确实是这个总部的成员。

斯大林：他不否认有联系，难道这能减轻罪责吗？

布哈林：我说的不是这回事。可能两种说法都同样令人厌恶，都同样是反革命的，但无论怎样，如果其中一种说法同另一种说法相矛盾，这种矛盾就会损害对这样说的人的信任。怎么会呢？关于雅科温科就是这样。这确实像斯列普科夫中央的说法，说什么我提出了独立西伯利亚的分离计划。

加马尔尼克：同雅科温科谈过这个问题吗？

布哈林：没有谈过。

加马尔尼克：根本没有吗？

布哈林：你们10年来一直在凭记忆编写党史。我见到过的人数以千计，请问，我怎么可能说出在这10年中我见到过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呢？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你们中谁也不可能说他记得。

贝金：这样的事情是忘不了的。

布哈林：这样的事情本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纯粹是荒谬的。不能把这种荒谬绝伦的事情强加于我。

有人喊道：现在看是荒谬的！而6年前却不那么荒谬。

布哈林：难道我6年前曾主张独立西伯利亚分离、以此

向俄罗斯联邦施加压力吗？

有人喊道：同农民们谈过吗？

卡冈诺维奇：你谈论过卡巴尔达暴动吗？

有人喊道：没少谈论！

布哈林：这斯捷茨基说过，说这是好事。

卡冈诺维奇：你也说过。

布哈林：我没有谈论过卡巴尔达暴动，但我谈论过格鲁吉亚暴动，而且不是从应当领导暴动的角度，而完全是另一个角度……

施基里亚托夫：应当说实话。

布哈林：该结束了吧？

斯大林：悉听尊便。

日丹诺夫：以后还可以谈。

斯大林：你愿讲多少就讲多少。

施基里亚托夫：应当说实话，而你说的不是实话。

布哈林：我在这里说的是实话，但谁也不能强迫我把有关我的那些奇谈怪论都揽到自己身上，不管在任何情况下，谁也不能想让我这样做。不管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我都不会承认自己是破坏分子，承认自己是恐怖主义分子，承认自己是叛徒，承认自己背叛社会主义祖国。

斯大林：你不应当也没有权利诽谤自己。这是最不能容忍的行为。

莫洛托夫：你关于绝食的讲话，纯粹是反苏言论。

有些人喊道：反革命言论！

斯大林：你应当了解我们的情况。托洛茨基及其弟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同列宁一起工作过，而现在这些人同

希特勒达成了协议。在这之后能否说某些事情是奇谈怪论呢？不能。自从这些过去的同志现在的先生们同希特勒协议出卖苏联之后，世间就没有任何事情可大惊小怪了。所有一切都应当加以证实，而不是发出感叹和疑问。

莫洛托夫：不应当从事反苏活动。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休会。下次会议明天晚 6 时开始。

李可夫：我要求发言。

莫洛托夫：你没有登记。

李可夫：对不起，这也是我的一个错误。（会场上气氛活跃。）

莫洛托夫：这不是最主要的。

斯大林：发言必须要登记。

李可夫：我简单说几句。

有些人喊道：明天再说吧。

莫洛托夫：会议到此结束。

原载《历史问题》1992 年第 4—5 期

（赵国顺译）

2 月 25 日午前会议

莫洛托夫（会议主持人）：我宣布全会的本次会议开始。由安德列耶夫同志发言。

安德列耶夫：同志们，我们听取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两位同志的长篇大论，读了布哈林同志的长篇累牍的书面解释。根

据所有这一切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以为，尽管有一些全面揭露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新供词，尽管进行过对质，但依我看，他们仍然持上一次全会上他们曾坚持过的立场，否认他们的参与。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们向中央全会所作的全部解释。

我认为，根据这些解释所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甚至回避承认右倾分子反苏活动这个事实本身，回避承认这个事实，回避对右倾分子的这种反苏活动作出评价。请看一看布哈林同志给全会成员们寄来的这份文件。这里面有一点想对所有这些被揭露出来的右倾分子的活动即反苏活动的事实作出评价的意思吗？不，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尤其是布哈林没有这种想法。然而向全会的全体成员提供的侦查材料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认为，首先，这些材料彻底揭露了右倾分子，揭露出在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存在这个区别——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这些侦查材料十分清楚地证明，右倾分子在这几年中所走的就是托洛茨基分子所走的路。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无论是托洛茨基分子还是右倾分子都完全保留了自己的骨干，拥有一整套秘密组织的体系，上有总部领导，各地区有地方组织，在纲领问题上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没有区别，过去也没有过区别。无论是对待党的社会主义农业政策还是工业政策，他们的不妥协态度都是一致的。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们的复辟纲领，无论是拒绝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在农业中解散、取消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也是如出一辙。

右倾分子们的这个立场与托洛茨基的立场毫无二致，在

著名的 1932 年留京纲领中这个立场表现最为鲜明，而跟布哈林同志跟得最紧的、一条道走到底的学生——斯列普科夫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走美国式发展道路更有利。我要问；这样的话，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没有，没有任何区别。

在实施这个纲领的手段上也没有任何区别。右倾分子很早（从 1929 年开始）就选择了用两面派手法来欺骗党的策略。现在施米特、乌格拉诺夫、拉金和所有其他人的这些供词就非常清楚地揭露出，他们所坚持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所坚持的那种欺骗党、耍两面派手法的策略。从这些供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党认错的声明，无非是为了使自己留在党内而要的花招而已。右倾分子在群众中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便采取了托洛茨基分子所使用过的斗争手段——搞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

侦查材料清楚地表明，问题并非只限于存在恐怖主义情绪、方针和议论，而且还存在实际的步骤，通过侦查发现存在一系列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战斗小组——有斯拉温斯基小组、阿法纳西耶夫小组、诺索夫小组，在萨拉托夫还有一个小组——所以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存在方针和情绪。现在经侦查证实，他们还跟踪政府成员汽车的行进路线。在搞破坏活动方面，问题也并不仅仅限于一般方针。正像现在供词所证实的那样，他们在工业上进行了破坏活动——这是雅柯夫列夫、科泽列夫、施米特供认的，在农业上也进行了破坏活动——这一点扎伊采夫谈了，戈洛文也谈了——他谈了右倾分子在乌拉尔的活动，别洛博罗多夫也谈了这一点——他谈了在亚速海—黑海地区农业上的破坏活动。

对工人供给方面搞破坏活动的事实已经查明，造成的结果是右倾分子在维丘加组织的“磨洋工”。科托夫供认的右倾分子对社会保险搞的破坏活动也得到了证实——他们把补贴不发给那些需要的人，人为地保持失业现象，挥霍浪费基金，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这一点科托夫供认不讳。这就是说，右倾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走的是一条道，一条道。

同志们，难道说问题仅仅在于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路线和实践一致吗？不，侦查材料也指出了右倾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在组织上的联系即右倾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结成同盟，指出右倾分子并不是孤军作战，而是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在一些环节上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直接地勾结起来，他们沆瀣一气，朋比为奸，“伙着”干。许多供词，尤其是别洛博罗多夫的供词，都说明了这一点。乌拉尔的别洛文在他的供词中谈到，右倾分子在搞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时与托洛茨基分子已经结成一伙。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右倾分子反党斗争的逻辑使他们走上了托洛茨基分子所走的路。右倾分子像托洛茨基分子一样，滑向了背叛、变节、搞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这个烂泥坑。同志们，我想由此作出结论：应该像与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一样与右倾分子作斗争。这就是根据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侦查材料所作出的总的结论。

但布哈林和李可夫与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中央全会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上一次全会以来的这个时期已经进一步澄清了真相，积累了一些新材料，这些材料证明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李可夫都不可能不知道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阵营所干的事，更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

追隨者所干的事。

首先問題在於，迄今為止有着大家都知道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的某些供詞。請問：布哈林和李可夫推翻了這些供詞嗎？這些供詞是有的，但是證明托洛茨基分子與右傾分子的聯繫、右傾分子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所干的一切以及托洛茨基分子供認存在一個右傾總部的供詞是否被推翻了？因此，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的這些供詞是否被推翻了？沒有被推翻。儘管進行了對質，儘管給了時間，儘管這個會上發了言，但這些供詞仍然沒有被推翻。這些供詞是重要的事實。不僅如此，在這一期間三個總部成員承認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的這些供詞。

請大家看一看，烏格拉諾夫供認了什麼，請看一看，施米特供認了什麼，他們都是右傾總部的成員。他們完全證實了皮達可夫的供詞、拉狄克的供詞、加米涅夫的供詞。他們證實了這些供詞。現在已經弄清楚了，就連托姆斯基也證實了托洛茨基分子關於與右傾分子有聯繫的供詞，完全證實了。他本人在國家圖書雜誌出版社聯合公司的講話部分證實了這一點，講話的速記記錄還在，我認為，他開槍自殺就徹底證實了這些証詞，否則他根本用不着開槍自殺。

三個右傾分子證實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的供詞。同志們，這個事實是存在的。任何辯解都躲不開的。現在清楚了，無論是李可夫還是布哈林都知道，他們不但知道，而且還與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有聯繫。是有聯繫的。到現在為止，李可夫和布哈林只剩下他們在上次全會上使用過的一個論據：“有人誹謗”。但是，同志們，現在這個

论据已经不够了，因为众所周知，这个论据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也经常利用；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用过这个论据，后来的情况又如何了呢？

另一点大家都知道，被判罪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有许多事情没有说出来。现在清楚了，许多事情被他们带走了，现在不得不再来追查，他们有许多事情没有讲出来。但他们讲出来的东西都是属实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供词没有说一点假话。一切都被证实了（**波斯特舍夫**：说得对。），他们供出的人都属实。这个事实也是存在的。所以我认为，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李可夫都没有推翻托洛茨基分子的供词，就是说，供出的这些事情是存在的。这些供词证明布哈林和李可夫有罪。

但是如果这里用“有人诽谤”作为论据的话，那么现在还有右倾分子，最接近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人，他们的学生们作出的内容更重要、数量更多的供词。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推说“有人在诽谤”了，也不能推说有人在诬陷了。一个人、两个人可能诬陷，但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招供，那就不可能是诬陷。大家都招供，你还能往哪儿逃？其次，老实说，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人诬陷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没有任何意义。（**施基里亚托夫**：当然了。）这是怎么回事儿，所有的人都发疯了不成？现在只有李可夫同志找到了一个疯子——涅斯捷罗夫。对其他他人他没提到这一点。我要问，这些人凭什么糟蹋自己、供出自己呢？

这是第一点，对此布哈林同志也没有作回答，而这个问题有人向他提出了。第二点是，与布哈林和李可夫数十年一块工作、最接近他们的人、他们的学生们、助手们来糟蹋他

们、诬陷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他们诬陷你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这里只能有一个答案，即：作出这些分发给中央委员们的供词的人，迫于事实，再也无法掩盖你们在右倾组织中的作用了。（**施基里亚托夫**：也没有全都说出来。）他们没有全都说出来，但他们说出来的东西使我们有理由认定你们是右倾组织的领导人。（**施基里亚托夫**：说得对。）因此，无论是李可夫还是布哈林都没有推翻大量的事实，他们与被揭露出来的右倾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的会面、所有这些最重要的谈话和联络。没有被推翻，这就意味着这些事实存在。就是说，这些会面，这些领导人是存在的。

第三点，我们在分析米高扬多少已经涉及到的问题时必须注意到的是：布哈林和李可夫本人的供词也已经说明了这些问题。首先大家已经知道，在上一次全会上布哈林同志坚决否认 1929 年以后他与库利科夫见过面。在对质时以及后来在这次全会上他已经承认，1932 年他与库利科夫见过面。他把这解释为他记性不好。这说明，你已经躲不开这次见面的事实。躲不开了。这不能用记性不好来解释。

第二个事实。布哈林同志声明，他从 1929 年起就不再和党作任何斗争，而现在弄清楚了，在 1932 年以前还有一个时期，他仍然对过渡时期有某些不同的看法。（**施基里亚托夫**：他说得模棱两可。）我们要问，您在 1929、1930 年一再声明，说您已经完全同反对派决裂并站到了党的立场上，这些声明又有什么价值呢？这个事实说明您作这些声明是在耍两面派手法。（**有人喊道**：说得对。）

有关布哈林的第三个事实。布哈林声称，他已经和青年

派、和他的学生们决裂，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等等。但现在的声明又说些什么？他说：“我对青年人的宗派主义假装没看见，对一些议论也假装没听见，如有人议论说对骨干总还应当稍微扶一扶。我只是就这些‘骨干’嘲笑了几句，我想如果我在这方面过于强硬，那大家就会疏远我。”问题并不在于记性不好。问题在于，迫于事实，他不得不承认了一些事情。迫不得已承认了。

李可夫也是如此，迫于事实，他也不得不承认一些以前他不承认的事实。以前他一概否认与右倾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见过面，作过政治性谈话。可是现在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曾与拉金见过面并与他作过政治性交谈。这是不是事实呢？

他不得不承认的第二件事，是他们曾聚集在一起读了留京纲领。（李可夫：我从不否认这一点。）可我们记得他曾肯定地说，他连听都没听说过，见都没见到过。（施基里亚托夫：对，他在全会上否认过。）可现在请大家看看：聚集在一起读这个纲领，现在有关这个留京纲领的神话已经完全消失了，这个神话完全破灭了。（有人喊道：还有疯狂集团的神话。）这个神话再不存在了。留京纲领的实际作者都已查明，这就是由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施米特组成的右倾总部。留京纲领的真正作者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否则为什么要将读过、讨论过留京纲领这一事实隐瞒起来呢？本来应该把存在这个纲领文件这件事报告中央。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把这个纲领叫作留京纲领，是他们战略性计谋，正因为这是一个现在乌格拉诺夫和施米特的供词都彻底揭穿了

的战略计谋。

所以，请允许我再说几句，因为这件事非常重要：众所

周知，留京纲领在1932年就非常明确地制定了右倾分子的纲领性方针和策略性方针。纲领性方针规定：要力争取消集体农庄、消灭社会主义工业，而策略性方针规定：要力争收拾掉现领导——提出了搞恐怖活动的问题。

施米特是这样说的。由于这份供词没发给大家，还没来得及发，而它的内容又特别重要，所以我就给大家读一下：“这是在1932年。当时断定该对前一阶段的整个斗争加以总结，弄清我们的同伙关心的、涉及现在和将来的一些问题并对此作出回答。这个所谓的留京纲领中反映的就是这些答案。侦查员问：为什么叫这个名称？答：原因很简单：在起草这个纲领时我们组织的成员留京、加尔金等人起着相当次要的作用，他们实际上顶替了别人。这个纲领的实际作者是总部成员：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和我施米特”。（**波斯特舍夫**：可是他们没胆量说出来。）接下来，“侦查员问：起草这个文件的问题是谁提出来的？施米特答：在1932年初博尔舍沃的托姆斯基别墅里总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纲领性方针和策略性方针，参与作出这个决定的有：布哈林、李可夫、乌格拉诺夫、托姆斯基和我施米特。会上制定了基本原则，然后写进纲领中并出于保密的考虑委托通过乌格拉诺夫来办，这件事委托给了留京，他要拟出一个草稿。我再说一遍，文件的主要方针已经由总部成员在这次会议上提了出来。

1932年8月，由于纲领已写好，李可夫、乌格拉诺夫和我施米特在托姆斯基的别墅里聚会。布哈林好像没在，当时他正在休假。不管他在不在，反正他与包括我在内的总部的其他成员一起制定了纲领内容的主要论点。不仅如此，1932

年秋托姆斯基说，布哈林回到莫斯科以后，托姆斯基他曾向布哈林介绍了这个纲领的内容，布哈林对纲领的内容表示赞同。八月会议讨论纲领文本时，我只赶上了讨论的结尾，因为我迟到了。在一些发言中我只记住了李可夫的发言，他认为经济部分写得不好，而涉及搞恐怖活动的那部分写得不错，很精彩。托姆斯基说，这可以修改，主要的东西不在经济部分，而在恐怖活动部分，这部分写得不错，就不必争论了。我支持托姆斯基的意见，于是纲领文本得到了赞同。纲领文本是乌格拉诺夫带来的，他又把它拿走了。有我在场时宣读了纲领并进行了讨论。侦查员问：为什么这个纲领叫作留京纲领？答：完全出于保密的考虑。而且还约定，一旦事情败露就把这个纲领说成是留京—加尔金地方集团制定的。为了彻底保护右倾总部成员，表明他们没参加制定这个纲领，留京本人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在这个纲领里大家也会发现有些地方稍稍踹了右倾首领们几脚。”（**施基里亚托夫**：对，那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所以在1932年这个纲领的实际作者没有暴露出来。同志们，这就是一位总部成员现在彻底揭露出来的整个手法和整个战略。现在已经真相大白，这是再也躲不开的了。

但是我还想比较一下一个挺重要的情况、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就是右倾分子首领——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斯米尔诺夫、乌格拉诺夫、施米特及所有其他右倾分子的行为。同志们，应该回忆一下党从1928年到1937年所完成大转折时期他们的行为。他们参加了这次大转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要知道一种行为能说明许多问题。（**波斯特舍夫**：说明他们搞了破坏活动。）当时国内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每

个对党赤胆忠心的人都在这个工作中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当时国内正进行集体化，消灭了富农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起草新宪法。可右倾分子在哪里呢？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对所有这些大事的参与，在党所进行的整个大转折时期又表现在哪儿呢？他们的作用在哪里呢？（**波斯特舍夫**：在搞背叛活动和破坏活动。）如果现在把索柯里尼柯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在这个时期的行为比较一下，我们要问：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行为与索柯里尼柯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的这种行为有什么区别呢？（**有人喊道**：都是一路货。）如果比较一下，那么他们都是一路货。很清楚，没有理由认为有人妨碍右倾分子参加国内这场伟大的运动。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为了使这些人能留在非常重要的岗位上，使他们能参加这场运动，党做了一切。

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人都去当平民百姓了，打算离开重大的政治斗争去休息休息，累了，等等。这都是胡说八道！问题到底在哪儿呢？问题在于这些人并没有切断自己的后路，也没有解除武装，他们仍然坚信自己是对的，就是坚信自己的复辟纲领——正是这一点把他们与托洛茨基分子联系得更紧，超过了与党的联系——他们与托洛茨基分子有共同的基础——对党的领导和苏维埃政权的仇恨，他们保留了所有的联系，周围所有的人。这就妨碍了他们与我国的这场运动以及党的重要工作、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融为一体。这就是妨碍他们参加这一最重要工作的原因。

现在根据揭露右倾分子活动的这些供词来看，产生这种政治上的消极情绪的背景已经非常清楚了，整个这件事的背景非常清楚了。这不是消极情绪，而是敌对情绪。（**布琼尼**：

说得非常对。)另一方面,他们忙着搞另外的活动,完全是另外一种活动——这就是对消极情绪的解释。(布琼尼:说得非常对。)我还想分析一种情况。我认为,涅斯捷罗夫们、拉金们、蔡特林们、雅各洛姆们等人中的许多人我们都认识,他们彻头彻尾地忠于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相应路线,要是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反对他们,反对他们的情绪的话,那他们是不可能走上托洛茨基分子的这条路的,是不可能独立走上这条路的,不可能走上的。那么有没有哪怕一个为中央所知的、说明布哈林、李可夫曾阻止过这些人的事实呢?有没有哪怕一个为中央所知的、说明他们反对这些恐怖主义情绪、破坏情绪、反苏维埃情绪的事实呢?——一个这样的事实也没有。

令人怀疑的是,所有这些现在已被逮捕的、已经被揭露的从事恐怖主义小组的破坏活动的右倾骨干没有他们的将军们的指挥会如此信心十足地独自行动——同志们,不管布哈林和李可夫怎么表白,怎么信誓旦旦,这一点我是不相信的。

通过对这些主要事实、供词以及他们的行为的比较,我坚信,布哈林和李可夫是知道托洛茨基分子的破坏活动的。(波斯特舍夫:绝对知道。)不但知道,而且还和他们有联系。无论布哈林和李可夫如何否认,我坚信这一点,即布哈林和李可夫不但知道右倾分子的活动,而且还仍然非常谨慎、非常巧妙地领导着这些右倾分子,直到最近还在领导他们,与他们保持联系,鼓励他们进行反苏活动并怂恿他们犯罪,怂恿这些人犯罪。

布哈林和李可夫声明和暗示说,人们不让他们辩解,不相信他们的誓言等等。我要问,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这些声

明和暗示还有多大的价值呢？(埃赫：大家已经不相信他们了。对他们相信的时间太长了。)不，不，党和中央已经给了你们足够的时间，给了你们十分充裕的时间和条件来让你们放下武器、洗刷自己。

党没有给任何反对派和敌人提供像给你们那么长的时间。为了使你们留在党内，党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从党这方面来说，我还应该说，尤其是从斯大林同志这方面来说，为你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忍耐了多久啊。(有人喊道：说得对。)是的，正是从斯大林同志这方面来说，他一再要求大家并经常提醒大家，不管哪个同志、不管哪个地方组织“直截了当地”提出右倾分子的问题或把问题提到中央来，斯大林同志就警告我们不要太急躁，他总是这样提醒我们。然而你们却滥用党的这种信任。(有人喊道：简直厚颜无耻。)你们滥用党对你们的好意，不是完全解除武装、切断自己的后路、帮助党揭发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布琼尼：还有揭发他们自己。)却要起了两面派手法欺骗党。你们为右倾反革命分子打掩护，与这些苏维埃政权及党的敌人勾结在一起。

我要问同志们，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布哈林的这些誓言、眼泪，加上谎言、以绝食和死相威胁来同中央继续斗争的图谋等，还有什么价值？所有这一切还有什么价值呢？很明显，问心无愧的人不必要这些手腕。(布琼尼：说得对。)你们的所作所为证明，你们已经被当场逮住了，不如老实点来对中央说：“是的，我们被逮住了，我们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错了，审判我们吧！”这样做要比那些没完没了的花言巧语实在得多。你们还胆敢要求党信任你们、相信你们的话，但是党已经从托洛茨基分子的反苏活动中，从托洛茨基分子、季

诺维也夫分子、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背叛活动中吸取了十分严肃的教训，不能轻信你们的话。我们不能轻信你们的话了。

我的发言快完了，但我以为，同志们，党中央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材料，不仅足以将布哈林和李可夫开除出中央、开除出党，而且足以将这个案件移交侦查机关。（有些人喊道：说得对，说得完全正确）。

莫洛托夫：下面请卡巴科夫同志发言。

卡巴科夫：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上中央全会已经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所进行的活动作出了结论。他们都是党员，候补中央委员，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在自己的发言中，布哈林还在他的材料中断言，他们相信政策是正确的，党中央的路线是对的，他们热爱基洛夫同志。布哈林说，他热爱谢尔戈，说他没有在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墓前一洒悲痛之泪是最大的不幸。（有人喊道：伪君子！）他们的这些话似乎说明，这样的信念应能表明他们干的是布尔什维克的事业。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已经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两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问题在全国各地已经成为工人们、集体农庄庄员们以及劳动群众的切身事业。可是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话又能算什么呢？可以让某个非党员在非党工人会议上报告一下李可夫和布哈林向我们所讲的那些活动。非党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如何对待这些关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的报告呢？每个工人、每个集体农庄庄员都会说，这种人决不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公民。（布琼尼：说得对！）他们在这10年的活动中不但从理论上否定了布尔什维主义，而且完全丧失了一切革命

精神。在这10年中他们那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祸心已经暴露无遗。（布琼尼：他们都是法西斯。）他们在这里向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自己的革命功勋吗？对他的发言能作什么样的评价呢？这些发言开列了一张清单，交待了他们策划反革命活动的谈话、与反革命追随者会见的事实和时间。正是他们在这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干的这些大量的反革命活动支配了他们的行动，使他们忘却了这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倾注全力去完成的战斗任务，离开了党目前的任务，他们不是想党所想，而是站在一旁，参加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为自己选择了另外一种活动——反党活动。

甚至在此时此地，当需要向党中央全会说清楚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前中央委员，现在的候补中央委员、党员为什么会陷入反革命阵营，领导反革命运动时，——对这个问题他们是如何回答的呢？布哈林说：“我应该得到平反，或者退出舞台。”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你们早就退出舞台了吗？（有些人喊道：说得对！）谁给你们的权利说“自己人会凭诽谤不实之词来无端漫骂”？你们能叫出几个与你们一起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中央委员来吗？为什么你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呢？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我受不了业已形成的气氛。”请你们说说，是谁在党内建立了两面派？（卡锡斯基：说得对！说得太棒了！）为了和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作斗争，他们创造了这些方法。你们敌视党的活动，极大地瓦解了组织。

我认为，你们应该向中央说明，你们为什么选择了对党耍两面派手法的道路？你们为什么要进行反革命瓦解活动？我且不去说以绝食相要挟的活动。布哈林从来不会去绝食。（布

琼尼：他说，他从夜里12点绝食到早上，就是说他绝食了整整一夜。（会场上一片笑声。）绝食的人未必会在50分钟内喝掉5杯水。

就是在此时此地，在中央全会上，在他们这些政治罪犯和破坏分子被当场逮住之后，他们又说些什么呢？胡言乱语，信口雌黄，大家看看，他们是怎样接受侦查的，连日期都对不上。他们推说是忘了，是他们的朋友们在诽谤他们。他们不断地诽谤内务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委员会。还抱怨说，把他们搞得精疲力尽，他们并没有错。大家都错了，在拥有1700万人民的国家里，只有布哈林和李可夫这两个人像钉子那样坚定不移，只有他们俩是正确的。

他们在这里说了两个小时，可他们俩谁也没有向中央说出哪怕一个他们所从事的布尔什维克活动的事实，他们没有提到一个布尔什维克行动。好吧，就让他们不提事实，不提行动吧。那就请他们讲讲自己的布尔什维克言论吧。及时说出的话，也是行动，是伟大的行动。

他们有什么活动呢？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说的第一个意见是布哈林纲领。在这儿他们说，他们不知道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和他们没有联系。但是布哈林曾与皮达可夫和加米涅夫讨论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意见，即他自己的纲领。他们所说的第二个意见是他与加米涅夫的谈话。整整10年中他们像戴镣铐的犯人那样在他们的活动中和托洛茨基分子紧紧地铐在一起。可现在却出来抱怨说，要是皮达可夫没告发我，那就好了。（会场上一片笑声。）要是加米涅夫不出卖我们，不把他自己的谈话印到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里去，那我们就不会被逮住了。李可夫还在这儿埋怨施米特

不守纪律。如果都这样的话，那一切就全都好了。

难道中央会在这里给你们断是非吗？你们都是一路货色，你们全是对社会主义祖国犯下罪行的罪犯。（有些人喊道：说得对！布琼尼：他们都是法西斯！）

现在谈谈你们的事情。当集体化成为事实以后，全国各地的农民群众都投入到集体农庄的建设中来。你们却向全世界大喊起来：“我们搞错了”。你们不参加工作，却在干什么呢？你们炮制留京纲领，召集斯列普科夫的代表会议，布哈林在这里撒谎说，他不知道这个会议。他是通过斯列普科夫来领导这个会议的。他去休假是有意的，不参加中央全会也是有意的。（波斯特舍夫：说得对。）中央全会10月4日闭幕，他是6日回来的。（大家齐声表示赞同。笑声。）一旦出现尖锐的问题，他就溜，肯定要躲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去休假，或者去帕米尔。（波斯特舍夫：躲得越远越好。卡冈诺维奇：让人更难找到他。布琼尼：躲到了埃克塞库尔。波斯特舍夫：他组织了会议，煽了风点了火就一走了之。）这些年来他们以疯狂的速度进行纠集反革命势力的实际工作。难道这不是背叛革命、不是他们的背叛行径吗？——不是背叛还能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看清了什么呢？资产阶级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依靠敌对阶级的某些残渣余孽是有好处的。布哈林和李可夫自愿地扮演了资产阶级复辟者这个历史性角色，领导了富农运动，现在你们的反革命活动在党中央全会上原形毕露。你们的朋友乌格拉诺夫、库利科夫、蔡特林、雅科温科、科托夫、罗济特等所作的供词对你们的“战绩”作了精彩的阐述。（波斯特舍夫：说得对。）

对你们肮脏卑鄙的活动能说什么呢？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呢？库利科夫是这样说的：“阿法纳西耶夫来到我的住处并通知我说，他和科托夫见过面，后者向他讲了与李可夫见面的情况，还说李可夫建议科托夫集中全力组织策划对斯大林的谋杀”。这是1934年的事。科托夫告诉李可夫，说“在苏联的个别地区歉收，预计要出现饥荒”。这对你们来说是天大的喜讯啊！对此，“李可夫回答说，只要现在的领导人在领导，就会发生更可怕的事情，他并且立刻补充说：难道你们那儿就没有行事果断、能收拾掉斯大林领导的人吗？”你们的意志和力量全都投入到这种事情上去了。你们干了卑鄙的反革命勾当。你们早就应该坐到被告席上去为你们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

可是你们到这里却低声细语、哭哭啼啼。请看，昨天晚上布哈林来递交抗辩书，说起话来也像一只快被掐死的老鼠一样吱吱尖叫。（笑声。）他的声音也变了，眼神也变了，好像刚从洞里钻出来一样。中央委员们，看看吧，这是一个多么不幸的人哪！（**波斯特舍夫**：当年他们就住在山洞里。这帮修道士！）根据他们与地方右倾分子联系的这条线索可以看出什么呢？我不清楚其他州的情况怎么样，但请看：李可夫在斯维尔德洛夫州有自己的代表——涅斯捷罗夫，布哈林有亚历山德罗夫、卡尔马利托夫，托姆斯基有科泽列夫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伙。（**莫洛托夫**：他们终究把卡巴科夫包围了起来。）不但包围了起来，莫洛托夫同志，还教我学会了一些东西呢。（**波斯特舍夫**：议事日程上把这个问题列为专门问题讨论。）

地下活动与州总部的所有成员都有联系。为了保密起见，乌拉尔的右倾分子与总部的联系有着许多分支机构。为了说

明对地方组织工作的指示涉及的方面之多，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托姆斯基曾下指示说，要与托洛茨基派领导人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必须对土生土长的乌拉尔工作人员作系统研究并且正确地使用他们；为了右倾组织的利益，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各个乌拉尔工作人员群体中现有的地方主义倾向和老乌拉尔倾向。托姆斯基强调指出，尽管有人说工作已经开展，但这些还远远不够。还要继续招兵买马。干什么呢？招兵买马。李可夫对涅斯捷罗夫说：要抓紧实施恐怖行动。要在地方上建立恐怖主义小组。于是他一到地方上就与卡尔马利托夫和亚历山德罗夫取得了联系。涅斯捷罗夫向李可夫报告说，为了实施针对斯大林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恐怖活动成立了一个小组。他们把手更往下伸，开始在研究人员中招兵买马，招募到了萨温和舒列鲍夫等人。

你们在这里说你们什么也没有，连想也没想过要搞什么恐怖活动，但是在你们的领导下成立的每个恐怖主义小组都知道你们无时不在的影响，感受到你们的影响，并说他们已做好搞恐怖活动的准备，正从事破坏活动，实现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意愿。

你们为什么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到一起儿呢？你们说，炮制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在一起的神话，对托洛茨基分子有好处，他们需要这样做多半是为了提高威信。是的，你们在这个阵营中有牌价，你们有某种价值。但是你们问一下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吧。任何一个党都会认为你们一文不值。（哄堂大笑。）你们只在一个地方——在反革命阵营里有价值。他们为什么抓住你们不放呢？他们为什么需要你们的威信呢？只是因为，你们除了搞反革命活动什么也没

干。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这些年来你们的全部活动都和托洛茨基分子紧紧勾结在一起。无论你们怎么推脱，反正你们参加了托洛茨基总部。你们不但了解他们的活动，而且还十分积极地参加了他们的活动。（许多人喊道：说得对！）所以，同志们，结论很明显，要把布哈林和李可夫开除出中央、开除出党，要像审判托洛茨基分子那样对他们进行审判。（许多人喊道：说得对！卡巴科夫同志！）

卡冈诺维奇（会议主持人）：现在由莫洛托夫同志发言。

莫洛托夫：同志们，在最近两三个月的中央全会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在这里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了。这一点是我们对那些早已背离了我们的党，更确切地说，是早已背叛了我们党的人表现出极大耐心的证明之一。在清算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错误期间，我们始终记得他们的功劳，记得他们过去也做过一些好事；而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纠正他们的路线，纠正他们的做法，给他们提供回到共同道路上来的机会。不过，如果观察一下他们迄今为止在这里的一言一行，他们在这里的种种表现，他们对待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对我们全党的态度，那么对我们当中每一个客观地看待问题的人来说都很清楚，这是一些没有放下武器的敌人。（有些人喊道：对。）这是一些继续在向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动攻击的人。

当然，处在他们的地位，如果公开站出来宣传像留京纲领这样的资产阶级纲领；如果公开站出来说要推翻苏维埃政权，就像他们所有的学生和最亲密的支持者们（这些人已经投降，他们在我们已经掌握的各种罪证面前不得不交代真相）所号召的那样；如果在这里跳出来声称他们赞成推翻苏

维埃政权，赞成复辟资本主义，赞成对党的领导人搞恐怖活动；那么，谁也不会让他们发表这些讲话和公开维护这些东西的。因此，他们知道，现在在党内不可能这样来进行斗争。于是他们就采取其他的手段来进行斗争，并且认为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于是我们党的敌人起码要做的事情就是指出：反对党的人们，不要投降，要坚持住！（梅日劳克：对！有些人喊道：对！）那些尚未投降的人，要咬牙挺住，要拖延时间，推迟投降。这就是他们——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策略。就是这样一些人的策略，他们说：那些尚未被揭露出来的人，不要暴露自己；那些在搞暗中破坏和进行反党斗争的人，要继续干下去，我们同你们在一起，我们是不会投降的，我们将一切都予以否认。布哈林既写过，也在这次全会上说过：即便有百万份供词，我也不会承认，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将一概否认。

而李可夫呢，他虽然看到这种立场毫无指望，却仍然坚持这种立场，不过有点小小的保留，他在这里承认了一些东西，因为否认显然是愚蠢的。同时，他又让自己跟布哈林保持某些细微的差别，以便不成为布哈林行为的翻版。然而这两个人的行为说明他们已经不只是最近几年来一直就是的没有放下武器的敌人，而且也是在继续进行反对我们党的斗争，企图保住自己的骨干分子，迷惑某些动摇者、影响某些人，并且想通过他们最近几年来的所作所为来最大限度地坚持他们反对中央、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路线。

不过，同志们，既然我们谈论的是布哈林和李可夫，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明白，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李可夫，从他们目前的样子来看，他

们俩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人物。（梅日劳克：对。）他们本人所能做的也就是每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人偷偷摸摸所能干出来的事，就如同一个耍两面手腕的人，如同一个遮住自己的脸去干坏事的人一样。（有人喊道：胆小鬼。）但是应当重视这一点，就是现在我们还有敌人。当有人发出信号：要坚守阵地，继续斗争，不要投降，拒不承认真相，拒不承认罪证，要兜圈子、绕弯子，这就是要让有些人仍然坚持没有放下武器的敌人的立场。不仅仅是李可夫和布哈林，他们还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现在也还存在。我们不能对此置之不顾。他们不仅向他们在我们党内的支持者们呼吁，而且还向党外的一些人士呼吁。他们正在给这些人发出信号。从他们现在的政策可以看出，布哈林和李可夫与他们原先的动摇和错误相比是走得更远了，他们走得越来越远，现在还在沿着自己最严重的错误道路走着，继续保持其最恶劣的反党斗争的传统。

现在来谈谈布哈林。对我们党来说，布哈林究竟是个什么人，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我们知道，他写了不少文章，作过不少报告，发表了不少演说；可是我们也晓得，在党了解他的整个时期里，他时不时地要挑起反党斗争。在战争时期，这个人在关于国家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公开反对过列宁。我记得在1916年秘密工作时期，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委员在彼得堡读过的列宁的一封信——我不记得这封信发表过没有。列宁在这封信中提醒我们说：我跟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他所持的是消灭国家和否定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我维护的是，国家作为工人阶级为了彻底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全面胜利而斗争的一种过渡形式，必须是无产

阶级专政的形式。我毫不怀疑，这封信如果没有发表过，它就被保存起来了。而列宁当时在1916年，即1916年秋季就专门向从事秘密工作的俄国工作人员提醒过这一点。（**斯大林**：这封信发表过。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一点。）是有一篇文章。而除此之外，还有一封信。我本人在1916年11月底，在彼得堡的秘密环境下，在一所秘密住宅里读过这封信，就是这么回事。这封信是有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显然是知道这封信的。

下面再谈谈接踵而来的几件事。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布哈林是我们党的凶恶的敌人，他鼓吹可以放弃工人阶级专政；因此，按照列宁的话说，〔他〕原本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而是一个小贵族，也就是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想的不是党和革命的利益，而是不要跟小资产阶级群众失去联系，不要跟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这一帮“左派”社会革命党同伙失去联系。他同这帮“左派”社会革命党分子沆瀣一气反对党，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列宁。我们知道，这样做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接着是下一个阶段——1920年和1921年，按照列宁的话说，当时布哈林是在往争论上“倒煤油”。（**主席团中有人喊道：缓冲煤油。**）他所干的是在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斗争中火上加油；在列宁说党内出现危机、党内出现困难状况的那个时期，他又倒上了煤油。总之，他在这一时期起的是背叛作用，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又过去了几年。列宁已不在人世。我们大家都团结在斯大林同志的周围。布哈林似乎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可原来他是在拼凑自己的青年派，一帮坐而论道者。（**有些人喊道：对。大厅里一片笑声。**）他把斯列普科夫跟一些陌生人归在一

堆说：“我本人一直到最近才知道这件事。”可是，在布哈林跟阿斯特罗夫对质时，他却又这样说：“我之所以在反对列宁的斗争中输了（**斯大林**：不过我是对的。），不过其实我是对的，输是因为我没有自己的骨干，而列宁则有自己的骨干。”（**有人喊道**：真是个好蛋。）“其实，从原则上说，真理是在我这一边，不过，在跟一个经验更为丰富的人作斗争时，我就显得太天真了。我也应当拥有自己的骨干。”这便是学派的发端。

于是，我们似乎成了一家人，进行着反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斗争，猛烈地抨击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诚然，当时我们也受到他们相当多的暗中攻击。然而结果却仍然一样，布哈林人虽在我们中间，却心怀叵测。你们要知道，他拥有自己的青年骨干，他正在组建自己的骨干队伍。而且还不是这么简单。他不只顾自己，还关心并向托姆斯基作了某种暗示。托姆斯基就开始培养自己的骨干。他向李可夫作出某种暗示，李可夫就开始培植自己的亲信。不只是在他的秘书班子里。每个人都清楚，李可夫不只是在自己的秘书班子里有几个亲信，他还企图在国民经济部门的负责人中间始终拥有自己的亲信。（**有些人喊道**：对。）他在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时候认识了很多人并具有一定的组织经验。他挑选了一些自己的骨干。然而是什么样的骨干呢？是些没有原则的人，在他们身上没有一点列宁主义，他们什么都不具备，他们对职位斤斤计较并且常常议论，任命某人是对的，任命某人是错的，某人受了委屈，某人得到了提拔。

正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吃吃喝喝的晚会上，这一伙人

(有些人喊道：对，对。)一次次地谋划拼凑自己的骨干队伍。在托姆斯基那里也是同样的无原则，也是吃吃喝喝，但是也在拼凑自己的骨干。惟独布哈林一人公然嘲笑意识形态，把阿斯特罗夫、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蔡特林以及库兹明这位相当重要的思想家召集在一起。他当时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将提出新的更为出色的意识形态等等。布哈林企图把所有这些在毫无原则的基础上跟党决裂并且也在寻找自己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的破烂货网罗在一起。暂时他似乎还是在我们共同的圈子里，在我们共同的主要的派别里，在党的总的基本群众之中，那个时期党正在进行反对托洛茨基，尔后是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斗争。

但是问题在于，应当找到某些适应新的情绪和新的骨干的组织形式。结果，布哈林勾画出了党的新形式，这一点阿斯特罗夫供述得比较详细，当然不只是阿斯特罗夫。布哈林说道，应当存在的不是现在的这个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在目前条件下党应当是一个基本的组织框架（斯大林：不是坚如磐石的。），应当存在的不是一个坚如磐石的统一的列宁的党。他说的是工党类型的党，也就是英国的工党。在工党中各种思潮可以自由角逐，在那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布尔什维主义。（斯大林：各党派的联邦。）对，斯大林同志说得对极了，恰恰在那里才谈得上是各党派的联邦，恰恰在那里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才同在一个组织里和睦相处。然而这样一个党当然是不能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它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这一点，它不希望这样做。

他悄悄地灌输这种思想，用这种思想来培植自己的青年派。这样一来需要拥有的就不是现在这种类型的坚如磐石的

党，而是工党类型的党。在这种党里各种思潮、派别、小集团可以自由角逐；在这种党里确实可以以包容各种思想、拼凑各种原则的思想家自诩；在这种党里可以把所有这些毫无原则的人——李可夫、托姆斯基——成功地纠集在一起，因为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里，在原则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里感到备受压抑。因此他们的学生从1924—1925年起就开始了为各种思潮和党派寻找施加影响的广泛自由的活动。他们考虑到，他们要团结谁，团结起来是为了什么，要走向哪里。很清楚，这就是导致放弃列宁的政党，放弃列宁主义，放弃布尔什维克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放弃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先决条件。（有人喊道：对。）根据的就是另一种形势，另一条道路；不过在当时他尚未下决心公开说出这一点。他对自己比较忠实的学生，如斯列普科夫、阿斯特罗夫、库兹明、蔡特林等人则谈得比较多。

因此，同志们，我们当然还算是幸运的，就在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施米特为代表的右倾分子已经试图公开地爬上舞台时，我们就已保持高度的警惕，为的是迅速转入反攻并粉碎他们的尝试。从组织上看，一切尝试都是为了使我们的党上当受骗，制服并摧毁我们的党，使党变成为另一个组织并转向另一条轨道。

我现在不谈什么是右倾。你们大家对这一点都十分清楚。你们知道，这是一条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反对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这是一条导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路线，这是一条为了富农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放弃社会主义立场的路线。（有人喊道：对。）是一条导致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和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这一点党已经作了充分的揭露。于是在

1930年，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发表了承认自己错误的有关声明。可是现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承认这些错误只不过是掩盖他们进一步的反党斗争。现在当然也可以试图推翻某些日期或地点：比如说，我走的不是斯帕斯门而是特罗伊茨基门，不是同科托夫一起去的；比如说，我不可能走斯帕斯门；比如说，我不是步行而是乘汽车去的，我不可能谈论政治，因为步行时是无法谈论政治的。

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毫无意义。对我们来说有的是另一层意义。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案件进行侦查，那么我们是会很好地去侦查的。维辛斯基同志会积极参加的，假如布哈林和李可夫努力争取这一点的话。现在的问题不是侦查。如何看待这样一些严重的事实：供词数量众多，数十份供词不仅有托洛茨基分子的（他们跟做过同样事情的右倾分子结成了联盟），而且还有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朋友们的，这些人公开说出了近几年来他们是跟李可夫、布哈林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干的。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呢？布哈林试图证明，凡是牵涉到他本人的事情都是不正确的，他不能承认这些事，因为他没有干过。

可是，当布哈林的这几十个最亲密的右倾同志自己招供说他们参加过恐怖活动时，布哈林就很难说对此该怎么办了。而如今，乌格拉诺夫管辖下的前哈莫夫尼基区委书记雅柯夫列夫详尽地供认，他是如何在斯大林格勒工厂搞破坏活动的。当他被调到车里雅宾斯克之后，他又在那里的建筑工地和生产部门搞破坏活动，往工人的用水中下毒并在工人中制造传染病。他们详细交待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通过第一次起诉把所有16名恐怖分子枪毙之后，发生在我们通过第二次起诉又

把与这个案件有直接关系的所有破坏分子也枪毙之后，对此该如何理解呢？他们不得不交待这些事是自己干的，而且他们确实既从事过恐怖活动，又搞过破坏活动，对此又该如何理解呢？布哈林说，他不知道这些事。可以理解为，他们想祈求宽恕自己的罪过，这些人想向党缴械投降，想帮助党，他们甚至还指出那些不完全确切，而且也不完全对的事情。不过，这是一些本人已经宣告投降的人。

此外，我还可向你们举出另外一些供词，比如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团中的库兹明的供词。就在这次2月21日的审讯中他还说过，他承认布哈林和他确实进行过这样的谈话：布哈林说他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党，并说他在莫斯科的那个时期曾多次会见过他那些最亲密的学生。库兹明还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斯列普科夫和其他一些人在他们的供词中所交代的内容；重复了阿斯特罗夫、蔡特林、扎伊采夫以及布哈林学派青年人中的其他人所完全确认的东西。不过，同时他又作了补充，他说：“我应当向你们作如下声明。我是你们的政敌，是你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现存制度的敌人。我认为，苏联是一座用来反对革命的全俄罗斯的集中营，也就是说，我赞成起义，反对苏维埃政权，我赞成推翻现存制度……”（有些人喊道：流氓，坏蛋！）他接着说：“我不会向你们放下武器，也不打算投降。”（有人喊道：这个人是谁？）这就是他最亲密的学生之一——库兹明。（有些人喊道：这个坏蛋！）他说：“我声明，我是共产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敌。”这就是布哈林集团中最亲密的人之一。（斯大林：是他培养的。）

这就是一个决不说他放下了武器的人。在4天前的侦讯

中他还说：“我是你们的敌人。我是不会放下武器的。”斯米尔加在自己的供词中也作了同样的声明：“我是你们的敌人，我是不会放下武器的。”（有人喊道：这个坏蛋。）布哈林是不是想给他们打气鼓劲呢？（有些人喊道：正是他们。）难道他不知道，所有的人供认的是同样的东西，不过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有些出入，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一些人想起的是一件事，另一些人想起的是另一件事，可是只要主要的东西大家说得都对的话，那么他们证实的就是同样的事情。（斯大林：所有这些都是供认时的不同说法。）对，是在供认所有其他事实时的不同说法，可是究竟在哪一次诉讼程序中所有的被告都供认得丝毫不差呢？这种情况永远不会有也不可能。不过我们现在说的不是诉讼程序，而是案件的法律方面。这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对所有这一切都加以否认，说我也不知道结果怎么会搞成这样，那么拉狄克也说过同样的话，他在最近一次讲话时声称：“在我还没有弄清楚我是最后一个人之前，在我还没有弄清楚有谁投降了之前，在我还没有查明谁投降了和谁没有投降之前，我是不会招供的。而只有在我得知我是最后一个人的时候，我才招认自己的罪行。”

这就是那个策略，就是那些不想放下武器，不想被揭发，不想掉脑袋的敌人所采取的那个策略，这些人不愿意招认说：“的确，我错了，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现在放下武器。”不，这些人要顽抗到底。这是一些可以用自己的策略专给库兹明打气的人。库兹明加入了他们的集团，他说：“我不会投降，我不会放下武器。我反对党，我反对你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波斯特舍夫：“我是你们的敌人。”）对，“我是你们的敌人”。他们的情绪正在帮助和支持这些人，

布哈林和李可夫正在以自己的言行推动这些人去继续斗争。（有些人喊道：对。）他们的算盘仅此而已。不过，同志们，应当说，不管他们怎样偷偷地绕来绕去，一些明显的犯罪行为和色彩强烈的东西总是会露出马脚来的。

我们不应当这么天真，以为布哈林这段时期以来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党言论。这是不确实的。不只是在他那里召开的各种小型会议上，不只是在这里或那里举行的种种会晤中，他到处都发表过反党言论。你们就拿他发表在1934年《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的那篇文章来说吧，这篇文章是在1934年5月12日发表的，遭到了斯捷茨基和梅赫利斯的反驳。他们说，对布哈林发表在1934年5月12日《消息报》上的题为《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的文章不能闭口不谈。大家都可能读过这篇文章，我不准备读这篇文章以及斯捷茨基和梅赫利斯的反驳意见，我要读的是另一个内容，即斯大林同志关于布哈林跟斯捷茨基之间发生的这场争论的意见。这些意见说的是什么呢？这些意见已经分发给政治局委员们，也发给了布哈林和斯捷茨基。

下面是斯大林同志当时就发表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的《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一文提出的4点意见。他在向这些政治局委员以及布哈林和斯捷茨基分发这个文件时说：“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在布哈林同志跟斯捷茨基同志之间的争论中，对的不是布哈林同志而是斯捷茨基同志。第一点，不能像布哈林那样，把工业化归结为建立一般的基金，因为这样做会抹杀重工业基金跟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基金之间的差别。重工业是指导和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在我们的政策中既不起指导作用，也不起改造作用。

整个问题的要害就在于这个差别。”（加马尔尼克：对，对。）

“第二点，不能作出哪怕是细微的暗示，说我国的重工业是通过多少吃掉或部分吃掉轻工业或农业的途径而发展起来的。不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诽谤，也是诋毁党的政策；诚然，这种细微的暗示，在布哈林同志的文章中无疑是存在的。”他可不能公开讲出来，于是他便在1934年决定作些暗示并推行自己的那一套东西。（波斯特舍夫：对，对。）我在这里不再宣读那些补充意见，而只提出斯大林同志的结论的最后部分。在引用这三点时，为了得出一个完整的印象，我最好还是全文宣读：“因此不能不指出，过去那些右倾分子有时企图把党的方针跟右倾分子的方针之间的区别归结为，党是正面进攻目标，而右倾分子则是通过迂回的痛苦较少的途径来达到同样的目标；并且还说，如果能给右倾分子提供机会的话，他们本来是可以较少的牺牲来达到目标的。无庸证明，带引号的这类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实际上，右倾分子不是走向同样的目标，而是走向阶级敌人所设置的圈套；因此，假如工人们听从右倾分子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落入圈套……（有些人喊道：对。）我认为，正是这种布哈林同志显然尚未脱离的反革命‘理论’的残余在他的《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一文中起了自己的作用。”（有些人喊道：对。）这就是斯大林同志就布哈林的文章向你们提出的第二点意见。

第三点意见：“不能像布哈林那样，把集体化政策归结为土地革命的概念。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这种‘做法’会抹杀集体化政策优于对农民实行的任何其他土地政策的主要之点。对我们党来说，整个问题的要害就在于这个区别，也就

是说，就在于布哈林同志抹杀的这一点。这当然不是字面上的争论，这是关于提法的鲜明性和确切性的问题。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强大有力，就是因为他们从不忽视对鲜明性和确切性的要求。”接下去是第四点意见：“不能说经典的和非经典的新经济政策。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使得问题复杂化并且会使人们迷惑不解。需要新的提法，是由于有这个必要，能澄清概念，有着明显的长处。如果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凭空臆造，那么这种提法就是有害的。布尔什维克不需要玩弄新提法的游戏。约·斯大林。”（有些人喊道：对。）

你们看到，1934年这场突然袭击，布哈林既不是在他自己学生中的小集团中，在李可夫的住宅里，也不是在讨论留京纲领草案的时候发动的，而是在他担任主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动的。这是一场百分之百地维护右倾分子观点的突然袭击，只不过是采取了隐蔽的、比较小心谨慎的形式罢了。谁也不会允许在我们党的任何一个机构里较为公开地维护右倾分子的观点。不过需要动员人，给人打气加油，把人拉回来同我们的党进行斗争，为此布哈林提供了材料。（波斯特舍夫：他可真清楚他的人是在寻找什么。）这样做是为了他的亲信，也是为了那些对党的政策不十分清楚的人。（斯大林：相互呼应。）这是对各种力量的动员，并且讲清楚：“要坚守住，我们是不会投降的，我们要用不同于以往的另一形式来继续坚持我们的观点，不过我们要进行斗争。”这就是布哈林所说的内容。他并没有放下自己的武器。

我们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在当时也还是宽容的。斯捷茨基关于这点写了两封信，梅赫利斯写了一封信，斯大林同志表达了党中央政治局的共同意见并就这件事发表了看法，仅此

而已。于是，整个事情就在中央委员会内部结束了，以后也没有再谈及这件事。关于这一切布哈林同志是知道的。当时我们不想彻底揭露他。如果把这件事公开发表在我们的报刊上，布哈林早在1934年夏季就无法再当《消息报》的主编了。我们党内对他的各种信任也就会荡然无存。

我们就拿对托洛茨基分子起诉前的最后一个时期来说吧。我们在8月份对托洛茨基分子——跟法西斯盖世太保以及诸如此类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恐怖分子进行声势浩大的政治起诉时，布哈林对这次起诉却只字未登，大家难道不感到奇怪吗？对像布哈林这样的著作家来说，这种情况难道不奇怪吗？大家要知道，尽管对托洛茨基分子已经作了揭露，布哈林却没有在任何地方刊登过针对他们的任何一个字。他是否作过一些尝试呢？作是作过的。布哈林怎么能什么不写就站住了脚呢？他发出过一篇短文，后来又发出过一篇，不过都是一些根本无法采用的东西，不可能予以发表，它们彻头彻尾都是谎言。一个经验丰富的著作家，他知道说什么，无疑，他要抄袭别人的话。须知就连皮达可夫也用了诸如“头号匪徒”等等这样一些哗众取宠的字眼。可是整个基本内容，即问题的实质却使得我们无法下决心刊登。

于是就这样过去了6个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1月、2月；7个月里布哈林没有发表过一行反对托洛茨基恐怖分子的文字，因为这个时期他实际上在政治上是支持他们的。（有些人喊道：对！）我将给你们读一封给伏罗希洛夫同志的信。你们大家都已收到这封信了。我将给你们读一下关于党及其领导人布哈林说了些什么。在诉讼程序结束之后，他给政治局委员、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伏罗希洛夫同志

写了一封信。信是1936年8月31日写的。“请你们老老实实地把问题摆出来，如果你们是真的相信的话，那么就应当立即将我逮捕并加以处决，因为这样的坏蛋是不能容忍的……（有些人喊道：这说得对。）如果你们不是真的打算这么干而仍旧让我自由，那么你们自己就是一些不配受到尊敬的胆小鬼。”（波斯特舍夫：瞧这个坏蛋！）

诉讼程序正在进行。所有这帮托洛茨基分子坏蛋都供认，说他们曾从事恐怖活动，说他们都干过这些事，在诉讼程序中他们都在揭露自己。他们都指控布哈林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我们——中央委员会——对工人阶级承担着政治责任。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先等一等，也许布哈林并不是百分之百都是错的，让我们把事情弄清楚再说。我们在《消息报》上保留了他的署名。为了维护和保住他，我们是承担着相当的道义上的责任的。而他却在这个时候说：或是你们不相信这些供词，也就是说你们认为这次起诉是一个骗局；或者你们是一些不配受到尊敬的胆小鬼。这是对我们想挽救他、无论如何也要想尽办法来维护他在工人以及全体劳动者心目中的地位的答复。这是对我们想拯救他的答复。为我们过分耐心而打我们骂我们吧，不过我们还是想把问题弄清楚。

早在上一次全会上我们就已经有了大量的供词，不过还是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了。我们决心要为一个迷途的人提供一条出路。即使他确有罪过，我们还是要给他时间，让他承认自己的错误，抛弃错误，悔过自新，同这一切一刀两断。为此我们曾探索过各种途径。可他说的是什么呢？你们以为，布哈林没有这封信的副本，他就不会在需要的时候利用这封信吗？（贝利亚：他已经利用过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是怎么

答复的?)伏罗希洛夫答复得相当好。我应当读一下伏罗希洛夫同志的答复：“致布哈林同志。9月3日。现将你的信奉还，你在信中竟敢对党的领导进行卑鄙的攻击。如果你想通过你的信来使我相信你是完全清白无辜的话，那么目前使我相信的只有一点——今后要同你保持更大的距离，且不论对你的案件侦查结果如何。要是你不以书面形式放弃你对党的领导所采用的那些卑鄙用语，那么我也将视你为一个坏蛋。”(有些人喊道：对！波斯特舍夫：简单而明了。)

伏罗希洛夫同志作了恰如其分的答复，而且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无疑都只能把这样的信称之为卑鄙下流，除此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说法。布哈林没有发表过一行字来反对托洛茨基恐怖分子，可是他却有一封反对中央的信；他在信中最粗野的话对我们破口大骂。布哈林是站在谁的一边呢？(有些人喊道：站在托洛茨基分子一边。)这就是一些明摆着的事实。不过，同志们，就算没有这一切，没有所有这些供词及其他材料，仅就绝食而言难道说还不够吗？(有些人喊道：对，对！)在中央全会召开之前，他写信说：我宣布完全绝食以示对诽谤者以及对由此而形成的气氛的抗议。仅仅这个事实就足够了，他自己后来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米高扬：对！)除此之外还能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不过因为他总是装腔作势，他只对政治局谈这件事。我们则应当向整个全会报告这件事，宣读这方面的材料，而他是只对政治局委员讲的。(波斯特舍夫：这么说来他是有保留的，这个坏蛋。)是有保留的。他知道，托姆斯基的计谋失败了，大家都懂得他自杀的含义，可是谁都不怜惜托姆斯基的

自杀。他看到这么做不起作用，那就只好换一种新花样吧。他是一个谦谦君子。看一看他是如何时不时地点头哈腰的，而当他忘记的时候，他就不点头哈腰了。当他忘记了的时候，他就不点头哈腰了，他的一切就都恢复正常了；而一旦他想起时，就又点头哈腰了。（**波斯特舍夫**：真是受罪。）“可以把信带到全会上去嘛。”你们看，他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原来说他不能来，后来又来了，一点也没有什么。他发表了讲话……（**有人喊道**：讲了两个小时。）来开会了，发表了讲话，并且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自我感觉还挺好的。（**波斯特舍夫**：他还把中央委员们称作是一群乌合之众。）

在宣布绝食之后过了两天，他就马上跳出来说：我已经饿了4天了。哪怕看一下自己的信也好。布哈林真是一个丑角演员。而且是小地方的小演员。他想感动谁呢？须知这不过是小演员的伎俩而已。这是一场绝食闹剧。难道说革命者们是这样绝食的吗？这就是反革命分子布哈林。（**斯大林**：统计过没有，他绝食了几天？）据说，他第一天饿了好长好长时间，第二天又饿了好长好长时间，就这样每天都饿好长好长时间。这就是布哈林的绝食闹剧。我们大家都吓得不成样子，处于绝望之中。绝食终于结束了。他没有挨饿，而只不过是在表演，他无疑是一个扮演可笑角色的小演员，可是具备演员的一切能耐。（**斯大林**：他为什么在夜里12点钟开始绝食呢？）我想是因为人们在夜间是不吃东西的，因为医学界不提倡这样做。

同志们，整个这次绝食是我们党内的一件滑稽可笑的事。大家以后会说：这就是我们党内发生过的布哈林绝食的可笑事件。这就是布哈林费劲攀登的那个角色。但是这可不是为

艺术而艺术，这都是为了跟我们党作斗争。（有些人喊道：对。）他把所有一切能动员的都动员起来了。就是那个库兹明在谈到布哈林时说道：“既是右倾分子又是左倾分子，一身两任。”库兹明说得对，他根据个人印象对布哈林了解得很透彻。这确实是这么一个人，他反对列宁，然而对马列茨基发表在百科词典上的那篇文章却只字未予反驳，那篇文章说布哈林是第一个阐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宁。在布哈林那里找不到任何一个词来揭穿这整个无原则的谎言，来揭露这种卑鄙无耻的行径。对这种无原则的小人要予以揭露，因为他从思想上来说就不是我们的人，他是怀有异己思想的人。

如果说他过去还能扮演角色，即扮演一个在进行思想斗争的人的角色，那么他并不是站在我们的立场观点上，他所进行的这场斗争是反对我们的立场观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反对我们大家、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因此他才以可怜的表演结束这场演出。布哈林就是这么一个人，这就是他遗留下来的东西。他如同一只小小的青蛙，把肚皮鼓得胀胀地宣称：他既是理论家，他又是领头人，他还是领袖呢，可到头来却是一个扮演滑稽角色的演员。假如这种人还能从泥潭里爬出来的话，那就请快爬出来吧，放下武器，放弃这场卑鄙无耻的反党斗争。你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掩盖住这场斗争的。而如今，当你在全党面前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假如你仍继续搞这种无聊的拖延，那么你将处于可笑的境地。

现在来谈谈李可夫。李可夫是个什么人，我们也非常清楚。在革命以前，我应当说——我先从个人回忆说起，我没有见到过他，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党务工作者；

此人变幻不定，一会儿支持列宁，一会儿又支持托洛茨基，是一个见缝就钻的人。（斯大林：在1910年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克鲁普斯卡娅应当知道这件事，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诺维也夫结成了联盟，伊里奇处于孤立的地位。伊里奇只好前往伦敦，去了英国博物馆。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应当知道这件事。后来季诺维也夫去了伊里奇那里并把他所控制的报纸归还给了伊里奇。）这是1910年的事，此后他在俄国。我在《真理报》工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李可夫曾在某地流放，他做过一些事情，我不记得他曾支持过我们。有一封署名为弗拉索夫（这是李可夫的笔名）的信曾刊登在孟什维克的报纸上，但是在《真理报》上没有登过李可夫的任何一封信，也没有登过他关于支持党的声明。

革命开始了，召开了党的四月代表会议。李可夫反对列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时，李可夫又反对十月革命。我们解散立宪会议，李可夫反对解散立宪会议。1920年跟托洛茨基的斗争处在新的阶段。李可夫不断地在衡量，谁是多数，谁是少数，最后才加入进去；当他看到托洛茨基失去多数时，他就抓住时机投票赞成列宁所赞成的人。在后来的整个时期即右倾时期，他充当领袖人物，作了相当充分的表演。接下去我们再拿后来的事情来说，他认了错，给他分配了新的工作。他在邮电人民委员部干了些什么呢？这是最乱的人民委员部之一。亚戈达说，那里的负责人和领导人都搞过破坏活动。我们会检查和弄清这件事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制造灾难，这就是李可夫在邮电人民委员部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工作进行得很好。他的工作做得糟透了。

这是谈的具体工作，我们再拿问题的政治方面来说吧。他也曾经说过，他提供的供词是各种各样的——这是他的手法，打乱了别人的意图。对于死人说什么都行——说他是敌人，是破坏分子，是领头人。这里还有什么良心和人格可言。（贝利亚：而他把活着的人称为疯子。）而他把活着的人，把自己最亲密的助手涅斯捷罗夫称为疯子，涅斯捷罗夫给他当了10年的首席秘书，而且此后也一直和他在一起，这个人曾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他在生病前后所供认的内容是一样的。对这一点还要证实一下。

而现在施米特也招供了，施米特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他本人了解他们所有的勾当。当他在莫斯科的时候以及后来一段时期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都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从政治上支持他们。施米特所讲的一切都是针对李可夫的。然而他不打算承认自己的罪过和自己的错误。他持何种态度呢？我不打算讲事情的细节，不过只举一个例子。李可夫不喜欢写文章，涅斯捷罗夫以及那个拉金为他写过几篇文章，他们现在都供认出关于李可夫活动的事实。而从另一方面讲他则了解得更多。就拿留京纲领这样一个重大事例来说吧。依我看，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例。（斯大林：这是所有托洛茨基分子的纲领。）对，这是所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也就是所有反革命分子的纲领。我将把这个纲领中最有代表性的几处地方念出来以证明斯大林同志刚才所说的话。现在我来援引所谓的留京纲领：“党内主要分水岭目前不是按‘拥护还是反对托洛茨基’……这条线来划分的……”（读。）

在纲领中联盟的中心思想百分之百地表达出来了：我们

同托洛茨基的分歧是次要的事情；布哈林原先的那些主张也是次要的事情；主要的是要进行反对斯大林，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些在留京纲领上签了名的先生，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托洛茨基分子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而这些人则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留京纲领是用以下几点建议来结束的，他们提出的第一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号召……斗争。”（读。）当然，这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而作的小小的保留，而主要的是：推翻以我们党为领导的工人阶级专政。方针就是如此：同托洛茨基的分歧是次要的事情；布哈林原先的那些主张不必再重复；主要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反对工人阶级专政和联共（布）党，主要之点就是用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就是贯穿整个这一纲领的关键之处。接下去当然照例是：“立即行动起来！是结束张皇失措和胆小怕事的状态的时候了……”（读。）

这就是你们看到的留京纲领。它谈的是什么呢？如果现在来听一下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讲话，又会得出什么结果呢？你们是否知道，布哈林曾证明说：“你们比较一下风格吧，这不是我的风格，就是说，这不是我写的。”结果却是相当令人尴尬的。我们就拿实际情况来说吧。6月初，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定于9月底召开中央全会的决定。是有过这样一个决定的。7月间，布哈林写了一份休假报告并于8月5日外出。留京纲领是在1932年6月写成的。在8月份之前，要议论和传阅和制定留京纲领，时间是相当充足的。不过发生了一件颇有意思的事，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就是李可夫的行为。今天在场的同志中大多数人也都参加了在1932年9月底至10月初

召开的中央全会，在那次会议上读了留京纲领，谈到了这件事。全会通过了中央的决定，谴责这一纲领并要求，凡是知道存在这个纲领的人，统统都要把他们揭发出来，开除出党并交付法庭。于是就发生了颇有意思的事，同志们会记起来，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李可夫曾发过言。（**有些人喊道：**是发过言。）他公开表过态——这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没有作速记记录，不过李可夫不可能在此否认，因为大多数同志都参加了那次全会，他说：“这是白卫分子的文件，只要我一知道有这样一个文件，那么我就会责无旁贷地枪毙发表这个文件的人。”（**埃赫：**他说过，他会亲自把这个人押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的。）

这就是10月初在我们眼前发生过的事，那么宣读留京纲领的博尔舍沃会议是在什么时候举行的呢？他说，确切日期我不记得了。让我们提出两种设想吧。假定说，李可夫是在博尔舍沃会议上先读过这个纲领，尔后才参加中央全会的。他在全会上发言说，他不知道这个纲领，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像出了一个新文件，要是他知道有谁参与了这件事的话，他就会亲自把这个人抓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去的。怎么会这样呢？把博尔舍沃会议说成是在那次中央全会之前举行的，这不大可信。那么这是在10月份以后举行的吗？这又不符合情况。假定说，这个文件对李可夫来说是新的，起码是在他作出要把当事人抓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去的承诺之后才有的。（**有人喊道：**他说过，会议是在夏天开的。）一个诚实的人怎么能是这样的呢？怎么能够相信这么一个人呢，他在1932年10月当着我们的面发表了讲话，而到了现在，1937年的2月，又在撒谎，当面撒谎（**喧闹声。**），好像他只会撒谎。

(埃赫：照俄国人的说法，这叫睁眼说瞎话。有人喊道：而且还掉眼泪呢。)两种情况下他都是个撒谎者，他已经不能自拔。

现在请想象一下布哈林的处境吧。布哈林在上一次全会上当着大家的面说过(速记记录中有)，他没有听说过留京纲领，也不知道留京纲领的内容，只是斯大林同志拿给他看过，告诉他这就是留京纲领，他说，我很快地浏览了一下。(有人喊道：他没有读。米高扬：他不想读。)不过布哈林这个人相当(有人喊道：滑头)……那就请你们大家来鉴定一下吧，他从前是个什么人，现在又是个什么人——这很难鉴定。10月5日全会结束，10月7日布哈林就给政治局寄来一封信并署上“致共产主义的敬礼！布哈林”。信是这样开头的：“致政治局。10月6日休假回来后，从李可夫的谈话中大体上获悉了中央委员会全会秘密会议的情况，鉴于此，我认为应当作如下声明：第一，我不能不对某些同志提出抗议，他们在发言中提到了我的名字，尽管这种做法给我蒙上的阴影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第二，不言而喻，我对反革命的文件以及全会上谈到的那个反革命组织的态度只能是一个(关于它们的存在我是在李可夫谈起秘密会议的情况时第一次知道的)，——我同样认为，对此类令人憎恨的反革命文件所采取的简单的不报告的做法，就算主观上是由于极端轻率而造成的，客观上也是反党的滔天罪行……”

你们看，他用一封简短的信函便与这件事脱离了干系。可是李可夫向他讲述过文件，他参加了全会，本人还发了言，布哈林对这个纲领知道得一清二楚；在此之后他不止一次地同李可夫会面——在1932年，1933年，他承认会过面。那么，当李可夫在博尔舍沃读过留京纲领之后，当他在中央全会上

听说了纲领……之后，他怎么还不知道这个纲领呢。可是布哈林在我们面前公开说：我没有读过，没有听说过。（布哈林：关于博尔舍沃没有人说过一个字。请你们追问好了，绝对没有的事。埃赫：故事倒很新鲜，可是难以令人置信。）就拿布哈林的话来说吧，他在信中竭力坚持，说他听到过一点什么。可是后来，他又企图把他知道这个文件的情况说成是这样：他仅仅是从斯大林手中看到那个材料后才知道这个文件的，后来又在中央委员会里让他看了一下。（米高扬：斯大林给了他这个纲领，而一个中央委员却不想读，难道这不奇怪吗。可见，他以前是知道的。一个中央委员怎么会不想读这个文件呢。有人喊道：是他本人审订的。）这里找不出几个人是愿意相信布哈林的。（笑声。）

再来谈李可夫吧。我不想再多谈布哈林，布哈林的问题多多少少是清楚的。李可夫呢，他的虚伪，谎言，欺骗全会的企图是十分清楚的，就连在最近这个具体的场合下也是如此。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布哈林在这个时候显得比较狡猾。1932年，尤其是1932年下半年，从一些派别企图崭露头角这一点来看，是最尖锐的半年。在这个时候，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正在谋求建立最牢固的联系，正在商定进行恐怖活动。这个时候在博尔舍沃托姆斯基家里正聚集着一伙人，他们正在讨论留京纲领。这个时候，8月或9月，斯列普科夫正在莫斯科召开青年派代表会议。布哈林虽然知道这些事情，知道这个文件，却在1932年6月外出远行，到帕米尔去了。所有这些事实就是如此。

行了，同志们，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人的政治面貌和政治

活动之后，对我们来说，情况就完全清楚了。这几年来，这些人不是设法靠拢党，而是在这段期间里先在表面上发表声明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布哈林：不对。）这是我们所能了解的最起码的东西。皮达可夫这个破坏分子曾对我们说：“不对”；拉狄克、利夫希茨、谢列布里亚科夫也说过：“不对”。他们都不承认，而我们就相信了他们。人们不相信这些人竟会走到这种犯罪的地步。即使到了今天，许多人还在给自己提出问题：不可能吧，难道说这些人会走到这种地步，他们可是我们党内的人，曾在我们党内担任过最重要的职务；他们熟悉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很好，他们落到这种地步是不可能的。

不过，同志们，我们知道，在这方面对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所持的看法也完全适用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有些人喊道：对。是的，是的。）他们也曾经是党的著名活动家，并且与列宁共事多年。当他们跟我们党在一起的时候，也确实深受劳动人民的尊敬。他们耍阴谋，施诡计，背离党，暗中袭击党和列宁；近几年来他们又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背后捅刀子。不过人们还是实在不能相信，事情竟会走得如此之远。

同志们，这就是说，我们正在进行一项非常重大的事业；就是说，我们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就是说，赞成共产主义还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问题，是我们时代最根本最尖锐的问题。（有些人喊道：对，对。）就是说，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这对劳动人民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诚然，为我们在我国取得的成就可以不胜惊讶，可以欣喜万分。但是，同志们，不论我们苏联取得的成就有多么伟大，不论我们近

期来在我们国内获得的成果多么丰硕，毕竟还是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还是有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或多或少是用自由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苏联的；他们是不希望走我们的道路的。

须知还有美国，那里目前还没有杰出的共产主义者；还有英国，还有法国，在这两个国家里新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了，不过那里还正在进行尖锐的斗争。依然没有一个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最终放弃了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在他们身上仍然充满着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暂时还依然故我，站在与我们不同的立场上。如果有些人从一次次动摇转而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转而建立自己的骨干队伍；如果他们对党的政策、对列宁主义的敌视态度由一些单独的行为转变为长期的斗争；那么这些人便是无可救药的。这些人是无可指望的。这些人不是同无产阶级在一起，而是同资产阶级在一起。他们会选择另一条道路。一些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虽说他们是相当杰出的工作者，读过马克思主义并且看到了我们拥有的全部成就，然而为什么他们不能走共产主义道路呢？（**斯大林**：他们还写过不少见闻录。）这些人确实是似乎能够颇为出色地从事这项事业的，可是他们终究没有脱离资产阶级，没有脱离资本主义。他们之所以没有断绝这种关系，是因为他们不信仰共产主义，是因为他们害怕无产阶级革命，是因为他们同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或者说同法西斯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这一点现在已十分清楚了。（**梅日劳克**：无疑是法西斯分子。**有人喊道**：对。）

不过，既然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不是所有的，而是许多的）现在对我们说：不错，我们搞过破坏活动，我们

从事过恐怖活动，我们曾经往工人用水中下毒，我们曾经在车间里用瓦斯毒害过工人。是有过这样一些事实。他们现在还在讲这些事情，就是说，这些人已经完全同工人阶级、同我们党、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断绝了关系。就是说，他们是另一个阵营的人。如果有人脱离这个阵营，有这个勇气，并想到他还能给工人做点什么的话，那么对此我们已经作了相当耐心的等待并采取过各种措施。不过既然你们已经开始了反党斗争并且走上了公开的反革命道路，那么我们对这样一些先生就只能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有些人喊道：对。鼓掌。）

有人提议宣布休会至晚上6点。（有些人喊道：对。）

原载《历史问题》1992年第8—9期

（邢艳琦 王问梅译）

2月25日晚间会议

莫洛托夫：现在由加里宁同志发言。

加里宁：同志们，关于李可夫、布哈林搞恐怖活动的问题已经说得面面俱到，非常透彻了，因此在我看来没有理由再来讨论那些分发给中央委员的材料了。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和莫洛托夫都已作过分析，认为再就这些材料进行评述，就是重复。因此，我仅就布哈林活动的两个具体事实谈一谈。首先，谈一谈他给中央的书面声明。当你阅读这份声明时，会发现里面含糊其词的地方比比皆是，证据材料纯系

伪造，不仅如此，他还常常要嘲讽别人，对每一件事他都有所保留：“我不想这么说，这件事本不该是这样，”但当时形成的气氛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使他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地。然而当你将声明通篇读完之后，它就会给你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这个人在向许许多多的个人和部门泼脏水，甚至把侦查工作本身、提供证据的人以及中央都涂抹得一团漆黑。

在这里，当人们打断布哈林的讲话，高声对他说道：你这是在玩弄律师的把戏时，布哈林说道：“怎么，不可以吗？我在这里的处境要求我为自己辩护。”我认为，大概冲他喊叫的同志们也会认为，当他们指责布哈林玩弄律师把戏时，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布哈林不该为自己辩护，问题并不在这儿，而是说布哈林在为自己辩护时所使用的是一个无论是非曲直也得为被辩护人开脱的律师所采用的手法，尽管他当事人的案子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有些人喊道：说得对。）这位律师施展种种手段，使出浑身解数，对他来说，不管被辩护人有罪还是无罪都必须证明他是清白的，所以律师就要想方设法来施加影响。这里，如果布哈林能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央采取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就好了，那样他或许会这样提出问题，这里包括两方面：一方是中央，另一方是布哈林。而事实上，说老实话，这里所有中央委员的发言都很激烈，而且找不出一个不用猛烈的言辞来抨击布哈林的人，难道说每一位中央委员都不想让布哈林从这桩案件中清清白白地解脱出来吗？（有人喊道：他怎么解脱得出来呢？波斯特舍夫：有点儿晚喽。）

我要说的还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全会之所以拖延了整整一个月不能结束，原因就在于此，大家原以为或许会有什么新情况。而对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您自

己也十分明白，在苏联每出现一个新的敌人就是一个负数。难道不该这样说么？所以人们的确都真诚地希望能少一些对他们的指控，但与这一愿望相反，指控简直就如同山崩一样扑过来。布哈林的策略——无论反映在他的声明中和讲话中，还是表现在他的行动中——就是一味地抱定与中央作对的路线——“一概否认”。他还以绝食的方式来求得他的这一路线的彻底实现。结果，绝食成了笑柄，我觉得这是咎由自取。但我们还是想真诚地审查一下。为什么我们如此审慎，要进行审查？为什么我们对您不信任？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多次被您愚弄，因而不想再被您愚弄了。（笑声。柯秀尔：我们当时也不想被愚弄。）你们读读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安德列耶夫同志宣读过的所有材料后就会明白，大家不知反复掂量过多少次：唉，可以解脱的，教育教育就算了，无论如何是可以教育好的。但结果却是白费力气。（柯秀尔：看来他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家伙。）

不错，看来他就是这么一个家伙。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不能再受愚弄了。正是这种不想再次受愚弄的愿望要求我们进行细致的审查。同志们，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终究是高于一切的。如果布哈林在这里，在最近的一次全会上能采取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那么在我看来，他自己的声明（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就应该循着这样的思路去写，他应该说：“同志们，我在这些或者那些方面犯有错误，”将事实逐一摆出。“这些情况我记不清了，那些东西属于胡说八道。帮帮我吧，帮帮我布哈林吧，请告诉我，我怎样才能爬出这个肮脏的泥潭。”对于一个有过变节叛党这一严重经历，又对党采取过重大敌对行动的共产党员来说，如果他还想与党一

道工作，这则是他唯一的一条出路。

现在还不是谈论我们要在思想上对我们的学生负责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他们组织了恐怖活动，他们在实践上领导了这一场斗争。因此，布哈林应该在自己的发言中集中抨击这一点。然而，我们并没有听到布哈林和李可夫这样去讲。布哈林玩弄的律师把戏就表现在这个地方。现在请诸位类推一下。如果布哈林在他的党内生活与个人生活处在最绝望的时刻向中央递交了这样的材料，说出这样的话，采取了类似绝食这样的政治行为，那么他在同自己学生的谈话中又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我们至少应该把他的一切策略伎俩都放大十倍。该不该如此呢？（柯秀尔：大致如此吧。）此后再说什么本人不知道学生们到哪儿去了，那就太可笑了。毫不足怪，政治规律就是如此，对学生们来说别无选择。如果大家把所有这一切事情拿来与布哈林最近的行为进行一番类比，并将他的这一行为与对学生们的态度相联系，自然不会有别的什么选择。（柯秀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李可夫说，所有拥护布哈林的人与党所展开的斗争，都不会是没有缘故的，无风不起浪嘛。这话说得对。也许那里的浪比风还要大。李可夫的发言从本质上讲是承认错误的。当然，对个别会面、个别交谈，可能会其说不一，可能会被推翻。但是，当我们对两次谈话进行评定时，哪次谈话在那一时刻发生过，我们就同哪次谈话进行类比。如果某次谈话是得到了证实的，比如与科托夫的谈话就属于这一类，而另一次谈话是未能得到证实的，如与乌格拉诺夫的谈话，其说法就该同与科托夫的那次谈话相一致。李可夫否认与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否认自己搞过恐怖活动。但在我看来，对此最

有说服力的反驳是别洛博罗多夫的供词，供词说别洛博罗多夫并非偶然与李可夫相遇。显然，偶然相遇的事是可能的，但问题在于给李可夫和别洛博罗多夫牵线搭桥的是巴胡托夫。请想一想，同志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进行这次会面，而且是约定的会面呢，为什么急于与别洛博罗多夫相见呢？

这次会面绝非一次偶然的相遇。是李可夫约定了这次会面，巴胡托夫——也是一位有名的右倾分子——参与安排了这次会面。于是，当我们得知以李可夫为代表的右倾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所说的那样，与托洛茨基总部的最高首领们有联系时，我们对这次会面就要另眼相看了。此外，托洛茨基分子不仅谈到这次会面，还谈到了从前谈到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别洛博罗多夫在这里的供词是真实的，他不能不讲实话，他没有必要作伪证。如果我们哪怕还有一点点政治头脑，那么单单是为了打招呼问候，为了无足轻重的会面，李可夫是怎么也不会想到要与别洛博罗多夫这个来自托洛茨基分子方面的（在审判前）最令人厌恶，最令人不能容忍的家伙进行这次会晤。李可夫与他见了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它一下子就说明了问题。它说明所有那些供认李可夫搞过恐怖活动的他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冤枉他。李可夫在这一问题上是无法逃脱的。他无处藏身。他逃脱不了干系。应当直截了当地发问，李可夫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想与别洛博罗多夫会面，出于什么样的用心他要与巴胡托夫商定这次会晤，又是为什么巴胡托夫和其他陪同李可夫的人员落在后面，让李可夫走在头里，使李可夫与别洛博罗多夫俩人面对面地单独交谈？

仅根据这两点事实——布哈林在全会上的所作所为和我前面引述的那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他们是有罪的（我所说

的有罪不是指像他自己所说的要在政治上对自己的学生负责，那不过是些老生常谈，尽人皆知的东西，人们都听腻烦了），而且他们的罪过就在于他们本身就是参与者。就我个人来说，是不愿意看到在党的队伍里出现这样的“参与者”的。这对党来说是一种耻辱。你们会理解这一点的。不过，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无法回避的。现在，在我面前，人们提出了如何处理的问题。我认为，事实本身已经向中央委员会指明了应该怎样去处理。（**施基里亚托夫**：究竟怎么处理？）没有旁的选择。（**施基里亚托夫**：这是避而不答。自己提出问题，却又不作回答。）没有必要回答。回答这个问题的应该是维辛斯基同志。

莫洛托夫：现在由卡冈诺维奇同志发言。

卡冈诺维奇^①：同志们，尽管党中央的上次全会已经开过近两个月了，但在本次全会上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是未能提出一星半点稍有份量的证据来为自己辩护。他们还是重复那些空口无凭的否认、言之无物的声明，说什么请相信我们，要么就是企图捕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偶尔出现的形式上的矛盾，以此来为自己辩护。既然你自认为是正确的，是无罪的，那就应当到全会上来，首先摆一摆在自己有生以来的整个斗争过程中表现突出的积极活动的事实，摆一摆自己坚持正确的和有原则的政治路线的事实。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他们没有这样做，却老是说：“我不是我，马也不是我的。”^②这并非偶然。

① 按未经校对过的速记记录稿发表。

② 这是俄罗斯的一句谚语，用来讥讽那些怕承担责任而矢口否认与某事有关系，或借故推托表示未参与某事的人。

之所以说并非偶然，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有的只是他们消极的活动事实，这些事实已完全被他们以往的每一个同谋的供词所证实。他们的这些同谋都无一例外地证实，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从1928年即右倾反对派形成之日起到1936年，实际上是一个非法新党即反革命党的领导核心。这个党与其他反革命组织结成同盟，它有自己的纲领，并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需要将其改头换面，使之适应要求。

在我看来，纲领问题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但是，在谈这个基本问题之前，也就是在谈他们如何在实践上为实现自己的这一纲领而斗争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来谈谈布哈林同志发表的两个声明，他把这两个声明作为为自己辩解的主要论据加以引证。这就是所谓的索柯里尼柯夫和库利科夫的两份供词中的矛盾问题。

布哈林同志说，索柯里尼柯夫在审讯中声称，右倾分子仅仅是保持接触，而在对质时他却又说，右倾分子后来加入了联盟，参加了联盟的总部。我询问过维辛斯基同志并看了审讯的速记记录。审讯的速记记录上写的是1932年。的确，在对质记录中有索柯里尼柯夫的声明，说在1932年曾试图建立联盟，让右倾分子加入到统一的总部中来。右倾分子当时只同意保持接触，拒绝加入到这个统一的总部中来。但到1935年时，他竟代表新的总部开始与托姆斯基进行谈判，而托姆斯基一开始说他本人不能给予答复，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代表李可夫和布哈林表示同意加入总部。这些在对质的记录中和笔录的索柯里尼柯夫的供词中都有记载。

在法庭上不需要就1935年的情况审问索柯里尼柯夫，因为索柯里尼柯夫根据托姆斯基的声明判定布哈林和李可夫参

加了，当时在法庭上的正好还有与布哈林有直接联系的皮达可夫和拉狄克。显然，维辛斯基同志已经就 1935 年的情况询问过拉狄克，但没有询问过索柯里尼柯夫。这样说来，你们看，没有丝毫矛盾嘛。索柯里尼柯夫在庭审前的审问记录中的供词与他在审问中的供词是一致的，与他在对质时的证词也是一致的。

再来谈谈库利科夫的矛盾。布哈林一口咬定，库利科夫在供词中说他企图对斯大林实行恐怖行为，而在对质时又说是对卡冈诺维奇搞恐怖行动。这个说法不准确。这有一份关于对质的材料。对质时库利科夫供认：“两天后我再次去找乌格拉诺夫……（读。）……在公园的旁边”。顺便说一句，这种在街上会面的习惯在关于布哈林同志的许多记录中是常常看得到的……（有些人喊道：说得对！）或者与阿斯特罗夫，或者与其他人。“我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讲述了自己的情况……（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声色俱厉地责备我拖延……责问我们有没有过硬的骨干。”后来，在对质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承认他确实询问过库利科夫关于骨干的问题……（读）“应该将他干掉”。“情况是这样吗？”他盯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问道。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对质时，如斯大林同志曾在这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对托洛茨基分子供词的反应通常是十分激烈的，动不动就斥骂他们。而在这里，面对着库利科夫直视着他的目光，他没有否认。布哈林没有否认，而是回答说：“我要把一切都说出来”。这难道不是刚好证实了库利科夫的供词吗？（有些人喊道：正是。）

我问过库利科夫，—— 1932 年你在我那儿还表示过忏悔，这么说你当时是在耍两面派啦？库利科夫回答说：“是的，

我要了两面派，而且甚至也对你耍了两面派”。伏罗希洛夫当时问他，你们为什么要谋害卡冈诺维奇？库利科夫答道：“与要谋害斯大林一样，是为了使领导层失去带头人。”还有什么呢？大家都看见了，无论记录中记载的，还是对质中供出的，证实的都是同一件事。在库利科夫的供词中根本找不出布哈林所说的矛盾，即库利科夫在记录中说他企图谋害斯大林而在对质时又说他仅是要谋害卡冈诺维奇。我可以再读几段供词，库利科夫在这里不止一次地证实他与布哈林交谈过。布哈林本人也打算承认自己同库利科夫作过几次交谈，承认自己做错了。他是这样讲的……（读。）……“我相信他刚才说的话。”（米高扬：这是布哈林说的？）是的，在对质后说的。“但是我坚决抗议”……（读。）

附带说一句，谈到“策划”及其他问题，我想提醒诸位，还是在就基洛夫同志被害一事举行第一次庭审时，加米涅夫就曾讲过同样的话。他确切的说法是这样的：“我与此案毫无牵连，既未参与策划，也未付诸行动”。而现在布哈林也是这样说：“我是无辜的，既未参与策划，也未付诸行动。”他还说：“我所能够做的只是试图说明怎么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库利科夫怎么会想出这种事情来。”

米高扬问：“你否认在亚历山德罗夫公园旁边的那次会面？”“对这件事我想这样来解释……（读。）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说，一方面当有人在这里质问布哈林：“对于1932年乌格拉诺夫集团表现出的一些过激情绪您是知晓的，对吗？”他的回答是：“是的，我晓得。但是我把这些过激情绪理解成了要开展某种运动。”“您有没有把这种过激情绪看作是要进行恐怖行动？”“没有，我没有把这看作是要搞恐怖

行动。”这就是说，他一方面声明，1932年他到乌格拉诺夫那里劝说不要采取过激行为时对过激行为的理解是开展一般运动；另一方面，当他来与库利科夫对质时，他却干脆说：“我所能做的只是试图说明”，并解释道，他们分道扬镳了，他并没有发过指示，而在乌格拉诺夫集团内部可能产生过搞恐怖行动的情绪。斯大林同志插话：“干得巧妙”。的确干得巧妙。他说，我们总部没有卷进去；而当他们落网时，他们会说，我们都没错，有错的是扳道工。然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的扳道工的问题，他们无论如何也是那些本来要采取行动的人。

伏罗希洛夫问道：“库利科夫为什么会产生你所承认的那种情绪呢？”布哈林避实就虚地回答道：“我说的绝对是实话，我的头脑里从来不曾产生过搞恐怖活动的念头。”难道这是对问题的严肃回答吗？“1932年我确实在乌格拉诺夫居住的那条胡同里见过库利科夫……他握住我的手……（读。）确有其事……我甚至还流了泪。”（有些人喊道：为什么流泪？）为什么事，无人知道，为什么流泪，无人知道。“我摊开双手说：有什么法子？他说，没有法子，必须采取行动。库利科夫就是这么对他讲的。我把他教训了一顿，问道，你们的靠得住的人都到哪儿去了。我们从没有使用过‘恐怖行动’一词。”（有些人喊道：而使用的是“杀掉”、“干掉”。）是的，是的。这就是我在教训人时讲过的靠得住的人的意思。也就是说，第一，他们1932年会过面，库利科夫要求采取行动，而他为此表示难过，流了泪。然后问靠得住的人都到哪儿去了。（洛佐夫斯基：流泪是因为没有靠得住的人。）问题不在这儿，洛佐夫斯基同志。犹杜什卡们常常也会流泪的。（有人喊道：这在

谢德林那里有很妙的描述。)不知道他为什么感到难过,他是否在为行动的结局感到难过,感到左右为难呢?是否在为库利科夫要求他采取行动,而他又难于作出决定而感到难过呢?因为这无论如何是很危险的。在一份记录上他承认,乌格拉诺夫集团内存在着更为极端的打算。他们分道扬镳了。库利科夫要求采取行动,他问道,你们的靠得住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布哈林:您搞混了。)他有意做扣儿搅混水,企图使我们搞不清。但在我们看来,事情很清楚,库利科夫要求采取行动,要求实行恐怖行动,而他是赞同的。

接着叶若夫向布哈林发问:“你认为1932年与库利科夫有可能谈过话……”(读。)布哈林回答说:“我当时还同党作过斗争呢。”我这是按照速记记录读的,此事发生在1932年。这就是说,他讲他1932年与党作过斗争。一方面这个人声明……(布哈林:您读的是一份未经订正的速记记录。在使用速记记录之前,应该先进行校对。)我们甚至可以凭着记忆就能复述出来,因为像这样的对质是不常见的。况且,我们去听这次对质并不是为了一睹您的尊容,而是为了得到证实。您不要以为政治局委员们除了去听对质就没有旁的事情可干了。他是这样说的:“我当时还同党作过斗争。”奥尔忠尼启则问他:“这件事发生在1932年。一些事情你还能清楚地记得”……(读。)布哈林马上支支吾吾起来……(引用记录。)显然,他是在向您施加压力,可您却还是对他表示了赞同。这就是库利科夫在对质时所供认的东西,以及我所作的简要引述。

同志们,你们由此可以看出,布哈林的声明、他找出的所谓矛盾破绽,在这儿就好像是孩子们用纸牌搭成的小房子

一样一碰就散架子了。他的声明没有什么内容。结果，布哈林没有在这里，在全会上回答与1932年谈话相关的实质性问题，没有在这里，在全会上清楚而有条理地谈一谈自己1932年对乌格拉诺夫都说了些什么，交谈的内容是什么，对库利科夫说了些什么，交谈的内容是什么，1932年你同党进行了什么样的斗争，——对所有这些极其重大的问题布哈林都避而不谈，没有回答任何问题。相反，他却企图抓住一种虚构的矛盾破绽，搬到这儿来当作为自己进行辩护的一条论据，奉为至宝。

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所有证词的。实际上，布哈林和李可夫在自己的报告和讲话里并没有就1932年、1933年和随后几年间他们有一种什么样的倾向、他们采取了什么样的路线作出实质性的回答。他们只字不提他们是如何看待党的政策、如何同那些对党的这一政策和实践持有异议的人进行辩论和斗争的。他们也只字不提那些企图从背后向党、向工人阶级捅刀子的乳臭未干的罪犯是如何在他们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从本质上说，关于这些问题，他们什么也没有交待。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只有一个，这就是恶意攻击所有证词。所有证词都被指责为不实之词。对阿斯特罗夫的供词、斯列普科夫和艾亨瓦尔德的供词、扎伊采夫、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等人的供词，也就是说，他所有学生和整个所谓莫斯科小组的供词，布哈林都给否定了。你们会发现，这些学生没有一个还留在党的队伍内。这也不是偶然的。（米高扬：好一个老师啊。）他就是这样一个老师。（有人喊道：有其主，必有其仆嘛。）

李可夫也否认了他的整个小组的供词。我还会专门谈到

李可夫小组的几名最重要的成员的，他们是斯米尔诺夫、埃斯蒙特、托尔马乔夫。李可夫否认涅斯捷罗夫的供词，称他是一个疯子；否认拉金的供词；否认阿尔乔缅科的供词，阿尔乔缅科曾是忠于他的。这一点我们都是知道的；他当然也否认施米特的供词。瞧，诸位也许会说，阿斯特罗夫、斯列普科夫以及其他青年派分子，尽管他们已不那么年轻……（有些人喊道：他们已是40岁的人啦。）就当他们是年轻人吧，我后面还要谈到这一点，可是他却否认施米特和乌格拉诺夫的供词……你们怎么样，想不想在全会上把施米特和乌格拉诺夫描绘成这样的一些大坏蛋？他们甚至在被捕后和招供时还连你们带自己一块儿诽谤了呢。他们是恶棍，用不着我们来为他们辩护。这是一些坏蛋、恶棍，是一些身在中央却与中央作对、身在党内却与党作对的家伙，但我们毕竟对他们了解，他们曾经是与你们十分接近的人。这些人都是些重要人物。施米特毕竟曾经作过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人民委员；你们的总部成员乌格拉诺夫毕竟曾是你们的顶梁柱；当你们开始组织右倾反对派时，你们曾指望莫斯科的组织跟着你们走。你们当然打错了算盘。（波斯特舍夫：说得对，说得对。就像季诺维也夫指望列宁格勒人那样。）跟你们走的只是一小撮脱离了党员群众的人，而你们却还曾对他们有所指望，可是现在他们粗暴无礼地否认了一切。

乍一看上去，这些都再简单不过了，人嘛，总是要为自己辩护的。布哈林和李可夫要我们给予他们以人道的理解，——请你们出于人道，体谅一下我们的处境吧，等等，等等。然而实际上，同志们，这是——我在这里正想谈一谈——这是敌人玩弄的一个新伎俩……（有些人喊道：说得对。）企图对

所有供词进行恶意攻击，企图恶意反驳几十个人的供词。然而无论在哪里，以什么样的方式对这些人进行审问，他们的供词都是相同的。当然，总的来讲，他们当中也可能会有个别模棱两可、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但在总部采取了搞恐怖行动的立场和 1932 年总部领导了留京纲领的起草工作等事情上，他们的基本倾向都是供认不讳。所有的人都供认，总部起初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签订了保持接触和互通情报的协议，后来，总部加入了联盟，总部教唆自己的人采取两面派手法，这是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供认不讳的。

应该说阿斯特罗夫给我们全体政治局委员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很有能力、非常理智的人，你怎么也不会像李可夫称涅斯捷罗夫那样，把他也说成是个疯子。这个人在我看来是诚实的，他发觉他们已经跌入万丈深渊，所以我们无论从供词中还是在对质时，都会感觉到他对布哈林的愤懑和怨恨。教育他们的是布哈林，将他们推入这深渊之中的也是布哈林，可是布哈林本人现在却在声嘶力竭地指责他们，说“你们这是一派胡言，是在给我栽赃”，责骂他们是诽谤他人的小人。然而不是别人，恰恰是阿斯特罗夫作证说，那还是在 1929 年，——你们读一读证词就会看到，那人就是眼前的这个布哈林。他是这样作证的，“1929 年春，斯列普科夫对我说，就在他对我讲此事的那天早上，布哈林去了他那里，接下去他又说道：你是了解布哈林的，他是一个有话就说，有什么新念头就会迫不及待地全盘托出的人。我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读。）现在我弄明白了，这种念头一直都在折磨着布哈林。”

这事发生在 1929 年，而在 1931 年和 1932 年，布哈林就

已经在直接地向阿斯特罗夫和其他人发号施令了。他说，应当干掉斯大林，应当杀死斯大林。（布哈林：纯粹是捏造，百分之百的诽谤。）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听你说过这种话了。（布哈林：而我还要反复说，还要说。）请吧，就当在全会说，也好让全会既听听您的，也听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应该对问题的实质进行分析。光是凭空反驳，您是无法使任何人感到信服的。应当以事实服人。我们就是在以事实来使人信服，而您却任何事实也拿不出来。（有人喊道：只有诽谤。）1930年，在波克罗夫—斯特列涅沃斯列普科夫的别墅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布哈林参加了那次会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他教自己的人如何运用两面派手法，并对前景作了说明。他说：“1930年春，第三次粮食征购运动将要进行，这对斯大林的党的领导来说将是一个最严峻的春天。”他说，到目前为止，农民的粮食已经被夺走，而现在这些农民正被组织到集体农庄中去。

看到了吧，这就是利用集体农庄问题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典型的社会革命党人提法。你们尽可以捶胸顿足地矢口否认说，你们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同社会革命党人订立同盟，但在意识形态上、在纲领上你们与他们是一丘之貉。“右倾组织的任务，是团结自己的骨干，为将要到来的那一时刻作好准备……（读。）他说，另外还要打入领导岗位，这样就容易搞到情报。”对你们来说，这就意味着当你们钻进中央委员会之后，搞情报就方便了。阿斯特罗夫说，这是为了搞情报容易些，而且继续奉行这种两面派策略的正是党内那些人，更何况布哈林和李可夫在中央委员会里还能够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怎么会得知党内生活的最新情况呢？你们，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却成

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情报员，成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情报员。（波斯特舍夫：成了叛徒。）阿斯特罗夫还供认，1932年在斯列普科夫被捕之后，他还曾与布哈林会过面。“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逮捕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了布哈林……（读。）我把这看作是执行组织总部的指令。”

这样一来，你们就会看到，1929年谈起指令，似乎还是遮遮掩掩的，而实际上已经是直截了当的了。到1931——32年间，无疑已经是直截了当地下达指令了。至于以后的供词，至于1933年的事情，至于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斯诺夫斯基等人，就无须多说了。他们拒不承认这些供词。但我们应该从政治上来看问题。如果从政治上看问题，那会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们在自己的右倾组织内部通过了采取恐怖行动的方针，搞暴动的方针，那么在实际中你们怎么会不去扩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增大自己的机会呢？你们怎么会不在实际中去与他们结为同盟呢？你们怎么能不与他们携手并肩地行进呢？这里的逻辑是完整的和无懈可击的。而供词也是有重要依据的。就以施米特的供词和对质来说吧，这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每个人都是很严肃的，所有的供词都是重要的。这不是一个偶然谈及某人的供词。党对任何一份供词都要进行分析，哪怕只有一份。然而，我们在这里所听取的是几十个人的供词，特别是听取了施米特的供词。

施米特供认，早在1930年就出现了恐怖主义情绪。证实这一说法的，不仅有涅斯捷罗夫，还有拉金、阿尔乔缅科——顺便说说，正是这个该死的阿尔乔缅科，还供出了她曾与另外一些人一起组织了对政府机构的监视活动。你们可曾知道，这可不是右倾分子随便说说，从阿尔乔缅科、涅斯捷罗夫、拉

金的供词来看，这可不是就恐怖话题随便说说。肯定不是的。这是有组织的活动。这不，施米特就在这儿，施米特、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的供词就在这儿，你们如何躲得过去？你们哪有藏身之处？这些供词你们怎么能回避得了，他们盯着李可夫说：是的，正是你向我们下达了这样的指令。你们总部，即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确定了恐怖活动的方针。因此，请大家想一想，李可夫在对质时怎么能不哑口无言呢？还是来读一读对质时的对话吧。他当时只提了一个问题：我参加过这次会议吗？施米特回答他说：是的，你参加过这次会议。另有一次，在施米特供认讨论留京纲领一事时，李可夫问道：“我参加过这次会议吗？”施米特答道：“是的，你参加过”。李可夫似乎还想狡赖，但当施米特开始陈述后，他一下子跳了起来说：“噢，我曾把这……”（斯大林：谁？）留京纲领叫作“梅德维捷夫纲领”。这也就是说，一方面李可夫提出了疑问，似乎他并没有参加过这次会议，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他讨论过这个纲领，他参加过这个纲领的讨论。

这些供词你们是回避不掉的。事情是你们干的，人是你们的人，你们栽培了他们，你们驯化了他们，你们教唆他们，你们在政治上怂恿他们，而现在你们却推说他们在说气话，想借此脱身。布哈林最忠实的亲信蔡特林在说气话。布哈林称涅斯捷罗夫是个疯子，对施米特则更不知该怎样定性才好。你们对所有供词都矢口否认。

顺便说一件事，提起这些生了气的人，我们便不能不讲到布哈林同志写给谢尔戈同志的便条。布哈林在这里面暴露出自己卑鄙无耻之尤的特点，他还利用谢尔戈的名声进行投机。当全党都在为谢尔戈而哭泣，当人们还在为谢尔戈举行

葬礼，当全体人民都在痛苦地为他举行哀悼的时候，布哈林却发现了一条利己的道路，他迫不及待地干起了卑鄙的内奸勾当。他利用了谢尔戈——我们一位故去同志的名字。此事绝非偶然，他是想以此来表明自己与谢尔戈关系密切。我们大家都知道，也可以从数十份速记记录中看到谢尔戈的极其尖锐的批驳。昨天，我刚刚读了其中的一份——埃斯蒙特和斯米尔诺夫案件的记录，从这份速记记录中可以看出，谢尔戈当时的发言是反对你们的。他当时说，埃斯蒙特和斯米尔诺夫案件是个非常严重、非常重要的案件——搞恐怖活动的案件。请不要忘记，我们决不会饶恕你们。而现在您却要利用谢尔戈的名字进行投机。您怎么不知道为自己的厚颜无耻而感到愧疚呢！他给谢尔戈同志的便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谢尔戈，请允许我溜掉几天”……（读。斯大林：此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应该是在1932年。便条上面没有署明日期。（有人喊道：比这还要晚点。）在1933年，1933年底。（布哈林：蔡特林是在1933年底被捕的。）这事发生在夏天。看到了吧，布哈林还在为蔡特林辩护。

蔡特林因为什么缘故生气呢？您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为蔡特林辩护的呀。（布哈林：蔡特林责怪我没有为他辩护。）您与蔡特林同住、同吃、同睡，他是您最忠实的朋友，对您绝对忠诚的人。是什么原因使蔡特林要生气呢？在此之后，蔡特林被释放了。也就是说，蔡特林能够估计到他之所以获得自由，是因为您为他说了情，帮了忙。那么，蔡特林有什么理由还要生您的气呢？您又为什么要声称他生气了呢，难道是为了诋毁他的供词吗？（布哈林：因为我这样才能向您证明此事如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明白。）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这里有一批被逮捕的科学院工作人员。顺便说一下，布哈林本可以在科学院工作中显示一下他真是一个在动员非党学者支持党的人。但他没有这样做。（布哈林：那巴甫洛夫呢？）巴甫洛夫？我们会弄清巴甫洛夫的事情的，现在先不说这个。是这样，在那里被逮捕的有一大批人，原来他们都是一些恶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分子，这伙人原本就是被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纠合在一起的。从他们的个人角度讲，他们非常同情布哈林，喜爱布哈林，千方百计地拥戴布哈林，不遗余力地吹捧他，同时还在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组织内效力卖命。当他们这伙人尚未被抓起来时，布哈林曾经千方百计地庇护他们。而当这个学派被粉碎之后，布哈林又将他们召集到研究所，即科学院内对他们进行教育。（斯大林：甚至连马列茨基也去了。）马列茨基只是一个副手。布哈林以合法的身份培植这第2个学派。布哈林为这个学派撑腰，参加这个学派的有：谢迪赫、科舍列夫、布瑟金、瓦西里耶夫、比比科夫、季尼扬斯基。

布哈林给科学院副院长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戈尔布诺夫院士寄过一封信。请允许我把这封信读一下。（有些人喊道：请吧。卡冈诺维奇读信。）诸位可以看到，对“胆小的”这一术语，他既从右的方面也从左的方面来使用。如果需要，将来可以从科学院请人来讲这里面的矛盾。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带有这种观点的先例：就是这个受布哈林庇护的布瑟金曾向许多同志散布说布哈林是个好人，是个杰出的同志，还是这个布瑟金又供认说布哈林曾同他进行过反苏的谈话，说布哈林知道他们有恐怖主义情绪。（布哈林：完全是无中生有。）卡列夫是一个陷得很深的托洛茨基分子。您也是知道的，当着

您的面，卡列夫曾供认说，你们曾经谈论过党的政策是错误的，把中央骂了一通，还处心极虑地破坏党的领导人的威信。当时您在哪儿？对于这些您从前学生的供词，您又作何解释呢？

这有一份曾在我们的编辑部工作过的卢克尼茨基院士的供词。（**布哈林**：在哪个编辑部？**米高扬**：您知道他在哪个编辑部。）他是在《消息报》编辑部。（**布哈林**：他从未在《消息报》做过事，他与我同在科学院干过。**有人喊道**：他本人知道自己在哪儿工作过，让他本人讲嘛。）卢克尼茨基供认：“1936年的2月或4月，在莫斯科布哈林的办公室里，即普希金广场的《消息报》编辑部里，我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布哈林在这次谈话中尖刻地批评了党的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同志。”（**布哈林**：天哪，我的天哪。他只是带来了他自己写的一本书，再就没说什么。**莫洛托夫**：您以后再来说这些吧。）这是一些与您的学派没有联系，完全来自另一方面的人，他们也都证实确有此事。您自己在对质时也承认您与索斯诺夫斯基谈过话，谈到了处境困难，您受到攻击，遭受迫害。（**布哈林**：我没有说过遭受“迫害”，而讲过受到攻击的话。）攻击也好，迫害也好，反正是一回事。从各方面来讲，与您过从甚密的人都证实说您同一些人抱怨过中央的政策，同另一些人谈起过并直接下达过搞恐怖活动的指令，而您现在却在这里企图把事实说成是大伙儿都对您进行诽谤。难道您想让我们相信您的鬼话？

同志们，我认为李可夫和布哈林在这里左一个声明，右一个讲话，死皮赖脸地为自己证明，说什么人们都是在诽谤他们，他们是清白的……（**施基里亚托夫**：他们才是集诽谤

之大成者。)这是在玩弄一种新的策略。不要忘了，皮达可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利夫希茨以及所有其他被我们审判的人，事实上都只是交待一些已经败露了的东西。(施基里亚托夫：是已经被揭露出来的东西。)被揭露出来的是已经无法再遮掩的东西，他们把大量的不可告人的东西带入了他们那醒醒的坟墓。(有些人喊道：说得对！的确如此！)这不是偶然的，现在，我们把他们都枪决了之后，才发现加米涅夫把自己搞间谍活动的秘密和他与某些大国进行谈判的秘密，以及他与间谍间的联系，都一同带到了坟墓里。季诺维也夫也是如此。皮达可夫把许多秘密和许多人的情况都带进了坟墓。利夫希茨是个恶棍，我还将专门就他的问题作个报告。他带走了大量还没有交待的交通部门的情况，因此，在我们把他们枪毙之后，交通战线又冒出了一些损毁和破坏活动。然而他们的策略就是这样，只交待那些已经被揭露出来的东西。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交待出来的这些东西没有挽救他们，也挽救不了他们。我们把他们都枪毙了。

现在布哈林和李可夫正在采用另一种策略，一种敌视的策略：即矢口否认一切，诋毁证词，而且，正当一位英国律师，一个自由派律师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证明根据这些证词完全可以构成有罪判决的时候；正当部分资产阶级报刊，尤其是法西斯分子想方设法要说明和证明这些证词都是暗中安排好的时候，布哈林却在这里声称：“他们用鼻子嗅出来这里指供的是我，他们对相关的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回答”。一大串哑迷，一大串的暗示和声明向我们表明，我们在这儿正在与诋毁证词的一伙人打交道，然而这些证词却是无法用事实加以推翻的，因为事实对他们是不利的。于是，他们便在这个问

题上转而祭起了敌对的策略。

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事实是：1930年一个组织，一个恐怖组织，即索尔莫沃的斯米尔诺夫的恐怖组织，乌格拉诺夫的组织被揭露了出来。他们从此事得到的第一个信号是：“放弃此事”。1932年又揭露出另外一些恐怖组织，两个恐怖组织——一个是斯列普科夫的组织，另一个是斯米尔诺夫和埃斯蒙特的组织。政治局对此问题作了讨论，这是有记录的，他们受到了警告。但这些警告并未能起到作用。埃斯蒙特—斯米尔诺夫恐怖组织是第一重要的恐怖组织。这个恐怖组织在亚速海—黑海边疆区有自己的重要小组，因此别洛博罗多夫现在供认说在他与李可夫会面时李可夫指定索契为实行谋杀的地点，这并不是偶然的。别洛博罗多夫的计划与埃斯蒙特、托尔马乔夫、斯米尔诺夫、米罗什尼钦科等人的计划是吻合的。米罗什尼钦科当时证实说，“我们的方针，我们的顿涅茨计划就是要搞暴动。但是，由于不知道事情能否成功，我们就将全部力量都集中在实行恐怖行动上面了”。

这就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无法使他们回心转意和洗手不干的事实。斯列普科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这是不是事实？这是事实。布哈林能推翻这个事实吗？他并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他只是说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不过至于他是否参加了会议，也许后面将会谈到。这是事实。在托姆斯基的别墅里召开过一次会议——不管是在喝得醉熏熏的情况下召开的，还是在没有喝醉的情况下召开的，总之是开过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留京纲领，这是李可夫在这儿承认的事实吧？无疑，这是事实。你们怎么能躲得掉这些事实呢？

我认为，核心问题是留京纲领，它能向我们提供理解右倾分子全部策略的关键，它能向我们提供理解统一联盟的关键。施米特供认，4月份开过一次会。他说，我们需要一个纲领。当时需要作出一个结论。参加这次四月会议的有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决定了要起草一个纲领，会上为起草纲领拟定了提纲和方针。8月份，在托姆斯基的别墅里搞了个聚会并就这个纲领进行了讨论。10月份党的中央全会讨论了留京纲领问题。可是李可夫无论是在中央全会上，还是在中央全会之后，无论是在对质中我们追问他时，还是在上次全会上，他一次也没有谈起过哪怕是读这份纲领时他也在场。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只是偶然地在对质过程中与施米特发生争吵时说出了这件事。

布哈林声称，只要能够根据文风等证明这份纲领是他写的，那事情也就算了结了。然而我们并不是孩子，同志们。我们认为，这个纲领在技术上究竟出自哪个人之手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我可以从其他方面，即与这一问题无关的方面举几十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道理，比如有时坐在那里执笔写作的是我们，而向我们口授的是斯大林同志。他虽然没有动手写，但他在指示我们该怎样写决议、报告书、各种各样的文件等。请原谅我举了这样的例子，作这种类比，但这也纯粹是进行形式上的类比。情况就是这样，问题在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对起草这个纲领发了指示，拟定了提纲。（布哈林：我没有拟定任何提纲。）而纲领的出笼则是后来的事情了，它出自留京、斯列普科夫或其他什么人，这无关紧要。问题的症结不在技术上，而在于本质。难道留京纲领与您1930年、1931年、1932年的立场有什么本质差别吗？它与您的立

场难道不一致吗？（布哈林：绝对不一致。）不，是一致的。

同志们，如果你们还没有忘记右倾分子自1928年以来所采取的立场，如果你们能仔细地读一读布哈林起草的这份右倾分子的纲领，你们就会确信留京纲领从总体上讲与右倾分子的立场是完全吻合的。回想一下所谓农业衰退的言论吧。回想一下所谓的农民动摇吧。回想一下自由贸易的口号吧。回想一下优先支持个体经营的口号吧。回想一下取消对富农的一切限制的口号吧。回想一下取消富农的个人所得税的口号吧。（波斯特舍夫：军事封建剥削。）回想一下关于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声明吧，如果把眼前的留京纲领拿来读一读，你们就会发现，它的渊源完全是那些论点。什么农业衰退，生产下降，他就是这样描绘的。这里面甚至还说对农民的掠夺，这倒比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的说法要温和多了。显然，他们是不想因引用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这句话而使布哈林露出马脚，所以才用了对农民的“掠夺”这样一个较温和的字眼。

要求优先支持个体经营，解散强制建立的集体农庄，这种话难道我们没有在你们的纲领中，你们三人的纲领中听到过？你们在那个纲领中都讲了些什么？你们当时扭扭捏捏地说：“我们并不反对集体农庄，但应该解散不必要的国营农场，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强制实行集体化或者至少要取消一切有可能导致强制集体化的措施。”你们想一想这一切，想一想你们关于取消对富农的非常措施的要求，而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要么我们战胜富农并为工人搞到粮食，要么让富农战胜我们。你们想把自己的纲领说成是偶然事件。留京纲领就是从你们所有的要求中概括出来的东西。当然，留京

纲领中也有新东西。那是你们从1932年的全部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东西。

你们，布哈林和李可夫，参与了同加米涅夫的几次谈判，你们与加米涅夫就结为联盟问题进行了谈判。稍后，于1932年，留京纲领便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必须联合一切力量，问题不在于托洛茨基与布哈林之间是否存在分歧，而在于要同斯大林进行斗争。现在请把你们散发的那份传单拿来读一读吧。你们现在读了它就会看到，你们在同加米涅夫谈判时对党的制度、党的状况、苏维埃国家的状况所作的评述都毫无遗漏地被留京纲领吸收了进去，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复述了一遍。在政治局讨论皮达可夫声明的会议上，不是你们说在我们的党内有监狱、有囚室吗？这难道不是写入留京纲领的那些字眼吗？

我再说一遍，如果布哈林不想避而不答的话，他是无法回避这一点的，即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以及口号的本质上和纲领的提纲上看，留京纲领都完全出于你们自1928年起所采取的立场，所不同的只是你们根据反党斗争不断加剧的需要，作了某些调整，使其更加充实而已。为什么你们对此缄默不语？你们以为我们是些孩子吗？我们在这里聚会，难道就是要讨论谁、在哪里、在哪一条街上、通过哪个门、乘坐的什么车、与谁会面吗？我们感兴趣的是政治。你们为什么不涉及这些实质性问题呢？那是因为你们无法否认这是你们的纲领，你们制定了这个纲领，你们组织了恐怖活动，你们与加米涅夫一起向季诺维也夫建议组成了那个自1928年到1936年始终存在的联盟，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法西斯式的联盟。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既然你们把党描绘成监狱、囚室，

既然你们把国家描绘成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那么由此就会得出任何相应的结论。

你们想把这个问题说成是由于天真而偶然地出现的一次失误，——“我的失误是偶然的，我与党一道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可是后来我却偶然地退却了。”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您在这里是跑不了的。这也不是偶然的。相反你与党一道同托洛茨基进行斗争的那两年倒更像是偶然的。如果撇开那两年不谈，我们就会看到您还剩下什么。您与党的斗争，既有关于民族政策问题的，也有关于工会问题的，既有关于国家问题的，也有关于失败主义问题的，既有关于党纲问题的，也有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的，然后跳过您与托洛茨基斗争的那几年，结果就是，您与托洛茨基斗争的那两年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波斯特舍夫**：况且他们还在为这个偶然事件而感到悔恨。）他们自然会感到悔恨。

他们同托洛茨基作了斗争，而且还是与党站在一起进行的，这件事是个偶然事件，也存在一些错误，提出了类似“发财吧”这样一些口号，中央对此进行过谴责，等等。他们那时摇摆过，但毕竟还是与党一起进行斗争的，在同托洛茨基分子斗争时他们与党走到了一起。但在此之后，他们又开始推行反列宁主义的政策，同我们党的列宁斯大林委员会又展开了斗争。（**有些人喊道**：说得对。）为了避免人家说我空口无凭，请允许我在这里引证几个事实。同志们，要知道我们最关心的是问题。有证词，而且除了证词外还有客观事实。要知道，布哈林不能总是认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应该懂得这是有客观标准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客观标准，这些客观事实。

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发表声明之后，承认自己的错误之后，他们又是如何为党而奋斗的呢？他们有什么样的行动，有哪些事实可以推翻证词呢？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这样的事实，但我们却有，我们有足以使我们证实所有证词都是真实可信的客观事实。下面我谈的就是这些事实。首先是有关组织方面的事实。1931年，我不再提1929年的事情了，他与加米涅夫进行了谈判。1931年——加米涅夫与李可夫进行了会谈：应当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讨论一下形势。关于这个问题李可夫对党一直守口如瓶，只是在过了6年之后才将这件事吐露出来，向我们吐出了骨头——瞧瞧，我是个坦率的人，我本可以不说的，但我说了。1932年，托姆斯基与季诺维也夫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极为热烈地会面。季诺维也夫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自己的办公室里主持了会谈，其中谈到国内形势严峻，需要好好议一议，等等。1932年，斯列普科夫分子召开了代表会议。

在结束这一话题之前，请允许我稍稍扯得远一点。布哈林在声明中说：“我没有参加过斯列普科夫分子的代表会议，但参加了讨论留京纲领的会议”。这是一种策略，我想用几件事实证实我的说法。1928年，当共产国际讨论他涉嫌的台尔曼事件时，他溜之乎也。布哈林没有参加。1930年，召开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对那次斗争进行总结时，布哈林没有参加。（**波斯特舍夫**：是的，是的。）您可能以为我们把您没有参加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事情早忘在脑后了；您是个头儿，您无疑是一个头儿，您怎么能够撇下托姆斯基，让他说几句玩笑话和俏皮话就敷衍了事？您怎么可以撇下李可夫，让他必要时甚至一声也不吭，而自己却急忙躲到克里木去呢？

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布哈林一直住在克里木。1932年，斯列普科夫分子召开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布哈林筹备的。（布哈林：您凭什么这么讲？）凭供词。但是布哈林没有亲自到会。布哈林这次没有参加会议难道是偶然的？您随便同什么人讲都行，但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些经验的，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现在您又该对扎伊采夫的失言吹毛求疵了。主要根据。扎伊采夫说：领导我们代表会议的是布哈林，但我记不得他是否出席了那次代表会议。再说留京纲领，中央全会讨论留京纲领。布哈林当时到哪里去了呢？布哈林没有参加会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波斯特舍夫：他爬山去了。）是的，是的。

1936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分子受到审判。作为中央政府机关报《消息报》的主编，他这时在哪儿呢？他离开了莫斯科来到帕米尔的某个地方，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是什么叶派的真主们把他召了去不成？无论怎样，总要离莫斯科更远一点，这样就无法将他召回来，即使有意召他回来，他也可以借口乘飞机，怕飞机失事，乘火车，怕火车颠覆，总是可以找到借口的。正如你们看到的，讨论留京纲领时，他不在场。他，真是可怜的人，从帕米尔回来后就不得不通过李可夫来了解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留京纲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写了报告。这就是策略，同志们。这是一种既胆怯又狡诈的策略。这是间谍采用的策略，这是一种目的在于不露痕迹的斗争策略。

1932年，在托姆斯基的别墅里举行了一次聚会，宣读了纲领。诸位来看一看，看看李可夫在这儿是怎样说的，他试图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幼稚无知的人。请看一看他是怎样描述

这次聚会的：在别墅里，我喝得醉熏熏的，我被叫到了另一间屋里。而在供词中他却说走了嘴，供认说他们读的就是这个纲领。而这次他却又说，他们对我讲要宣读一份工厂的材料。真会有相信这种鬼话的怪人。他们说，有人在工厂里拾到一份传单，要读一读。十分清楚，你们在托姆斯基别墅里宣读的就是这个纲领。全会是在10月份召开的，在托姆斯基别墅的聚会是在8月份。你们在中央全会召开之前就读过这个留京纲领，你们不仅读过，还对它进行了修改，作过指示。施米特在供词中就说过：“李可夫表示，要对太露骨的地方作修改，托姆斯基说，这可以放在以后再去润色，但是这个第二部分写得非常精彩，紧凑，有恐怖的味道。”他们需要这么一个能够将所有反党、反苏维埃国家的力量纠集起来的纲领。然而布哈林，这位主要首领之一，此时却不在场。他们说，就别让首领到场了，这个时候还是让他留在帕米尔吧，我们可以参加聚会，万一出现什么风吹草动，我们就把留京抛出去，反正他是不会出卖我们的。

1932年，埃斯蒙特、托尔马乔夫及其他人的案件。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与此案有直接关系。你们会发现，在留京和斯米尔诺夫案件之后，以及讨论留京纲领的时候，托姆斯基和布哈林都不在场。托姆斯基和施米特跑到纳尔奇克打猎去了，布哈林也不在。只剩下李可夫一个人——那就让李可夫来消灭痕迹，假装忿忿不平地说，这个纲领太不像话了，是个白卫军的纲领，就让他一个人来为我们所有的人撒谎吧。1932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两个托姆斯基家的常客常常与他会面。这一点从供词中看出来。

1934年，托姆斯基和季诺维也夫在托姆斯基的别墅中见

了面。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就走还是不走这个问题出了些主意。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上次的中央全会上作过发言，并将之说成是同一组织的两个领导人的主意。肯定就是这样。你们很容易就会想象出托姆斯基在别墅里同季诺维也夫都说了些什么。李可夫竟能把在托姆斯基别墅中的聚会说成是一种全无恶意的与世俗百姓一样的会面，但他甭想蒙谁。顺便说一点，他本人在讨论埃斯蒙特—斯米尔诺夫案件时还曾讽刺过别人呢，当那些人试图将自己的谈话说成是并无恶意的市井凡人的言语时，他还讥讽地对他们说：哦，可不是嘛，如果是两个党员在一起聚会，那可就不是为了家长里短而聊闲天了，而是要谈政治了。可是现在李可夫却对我们宣称，在那里所做的就是闲聊天。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季诺维也夫和托姆斯基当时就在那里，经他们策划，你们的实际策略在留京纲领的基础上变得更加明确了。

1935年，李可夫与托姆斯基仍保持联系，李可夫曾到过托姆斯基的公寓和别墅。1936年，托姆斯基与李可夫多次会面，托姆斯基向李可夫讲述了他曾被召到中央去的事情，情况是如此这般，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当然，他们商量了对策，这是无疑问的。这就叫作“忠于职守”吧！

他们工作得如何呢？托姆斯基在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工作得如何我们是清楚的，托姆斯基在国家图书杂志出版社联合公司工作得如何？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里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李可夫在邮电人民委员部工作得如何？人们已在这里就此作过报告，而且我们还将就此进行详细的分析；布哈林工作得如何呢？布哈林自己是如何表现的呢？（有人喊道：两面派。）布哈林除了这些行为以外，他还有一系列的讲话，

从他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开始，他在那里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弄出点什么名堂来。在那儿挑起过论战——这里我不想详谈这个问题——辩的是关于对改造的理解，他在谈到对我国经济的改造时，只字不提阶级、富农、政治，而仅仅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明改造——竟有这样的新技师、工程师，——他偏离政治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只从技术的角度谈问题，不想去涉及政治。

在第十七次全苏代表会议上他作了发言，他在我们的生活里找到的唯一一处不足是实验室的工作搞得很糟。你们还记得他发表的那个耍两面派的演讲吧，美中不足的只是实验室。而现在我们搞清楚了，早在1932年他就在与党作斗争了，他在关于农业中的刺激因素问题上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上我们懂得什么是刺激因素，你们的一切争论难道不都是围绕着什么是刺激因素而进行的吗？要么是资本主义的刺激因素，要么是社会主义的刺激因素。你们主张的是搞自由贸易和发展富农经济的可能性的刺激因素。这就是你们反对集体化、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出发点，你们主张的是自己的刺激因素。这就是他1931年到1932年在关于刺激因素这个小问题上所持的不同意见。而在全苏代表会议上，只要诸位看看他1932年的讲话，就会发现，他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也是耍了两面派手法的，他说：“我拥护党，我发现的唯一缺点就是实验室”。而与此同时，他却在自己策划恐怖活动的实验室里为实施谋杀党的领导人的恐怖行动而在给炸弹装药。（有些人喊道：说得对。）

最后，再来看看他的文章吧。莫洛托夫同志已经在这里引述过他的一篇文章，我所要说的是他发表于1935年11月

7日的一篇总结性文章——《革命的一年与我们的敌人》。这篇文章中存在着许多混乱和许多错误，而且他在论述中农问题时说，中农不再是摇摆不定的力量了。这话是在我们的集体农庄得到全面发展的时候讲的。他不去谈机器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中心，黑色冶金业自身就是一切。他不去讲重工业是我国经济的基础，却说什么我们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还有一篇论述选举的文章，我们曾在中央组织局对他的这篇文章作过相当精心的分析。他在文章中声称，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是集体化就要取得胜利或者说已经取得胜利的首次代表大会。而这正是我们在第六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得出的结论，当时我们的集体化就已经站稳了脚跟。他对我们国家的理解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混乱的。最后，以1935年11月7日的《消息报》为例。我已经说过，斯大林同志曾就这一天的报纸写过专门的批示，非常详尽地分析了报纸所载文章的缺点和大的错误。

我应该说，在这一天的报纸上发表了尼古拉·莫罗佐夫的一篇文章。从欢庆节日的角度讲，发表这样的文章真是驴唇不对马嘴，但现在看来，此文是另有所指。他在这篇题为《尼古拉·莫罗佐夫请教马克思》的文章中叙述说，马克思是赞成民意党人的活动的，其中包括恐怖主义活动。隔了两行，他又讲述了民意党人是如何准备1881年的恐怖行动的。为什么在11月7日的报纸上要登载尼古拉·莫罗佐夫的文章呢？他说，他是想用通俗的语言来介绍一下老民意党人。对不起，您错了，这是在向恐怖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发送信号。这不是偶然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漫画吧。请看，这是最耐人寻味的

东西了，老实说，我也只是今天才看明白了画中的意味，或许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吧。这里说的是布哈林的那篇题为《革命一年的几点总结与我们的敌人》的文章及这样一幅插图——不知道报界的人士如何来称呼它：伟大的佛来米派画家勃列伊克格伊姆^①的一幅未完成的巨大的巴比伦塔，互不理解和互相敌视的民族，鼓动人们搞无政府主义并煽动内部仇视的神秘的暴动信号。（有人喊道：这个坏蛋。）看到了吗？这就是革命一年的几点总结与我们的敌人。瞧，巴比伦塔画在这儿并配上了这样的说明。这说明的含义是什么难道还不明白吗？文章本身就完全是用从法西斯报纸上摘下来的东西拼凑而成的，只不过是作了某些修补而已。

总之，布哈林不知从何时起，成了偏爱援引法西斯报纸的人了。（斯大林：进行宣传。）他援引法西斯报纸，只是略作一点批驳。顺便说说，在莫洛托夫同志今天评述过的几篇文章中，布哈林试图阐述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审判案一事，但他在这些文章中所写的依旧是那些关于法西斯分子的废话，驴唇不对马嘴，我们没法将它们发表出来。（布哈林：是你们对我讲要发表关于纽伦堡代表大会的文章的。）研究所有一部著作——我不想将所有这些人都牵扯进去——，苏联科学院的《回忆列宁》这部厚厚的文集，是为纪念列宁逝世10周年而出版的文集。这部文集曾有一个前言。这篇前言后来没有发表，中央报刊部不准那篇前言发表，而是另写了一篇。然而，那篇前言正是由布哈林直接审订的。（布哈林：那不是我写的。）是谁写的，没能查清，但它是由布哈林直接审订的，

^① 原文如此。

他为这部文集而感到自豪，将之分送给我们每个人，好像在为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一样。

下面就是那个前言中的一段话：“在我们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时代即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神秘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列宁的学说……”对不起，能把我们的时代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时代即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神秘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吗？目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胜利的时代。难道可以把我们的时代说成资产阶级反动时代即法西斯主义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吗？在一部学术性著作中这么写，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是偶然的失言吗？拉狄克—布哈林的那个基本论点是不是又在这里被偷偷地塞了进来？拉狄克曾在受审时就此作过发挥，说什么法西斯主义正在取得胜利。（布哈林：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这又不是我写的。您这到底是怎么了？）您为此曾像为自己的全集一样感到骄傲。这无疑反映了布哈林和拉狄克一样，也把我们的时代理解为法西斯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其结论是，法西斯主义还占统治地位，法西斯主义还在进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是法西斯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因此应当对法西斯主义俯首贴耳，应当与它和解。（布哈林：天哪，您这是怎么回事呀！随您说吧！）不对，不该说“您这是怎么回事呀”，而应当找一找自己的思想根源，即使您想用空泛的总结来反驳也好。

同志们，我以为从1928年起，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就其整个思想和所有观点来看，滑到他们目前这步田地那是必然。事物的逻辑就是这样，历史事件的逻辑就是这样。如

果你执迷不悟，如果你试图动员力量，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力量跟着你跑呢？只能是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敌人的力量，恐怖主义的力量，而且你要为他们引路，不管你是否是这样打算的。（有人喊道：说得对。）布哈林的追随者库兹明曾对布哈林作过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评论，他在供词中声称：不错，他说，我是你们的敌人——莫洛托夫同志已经在这里引用过这句话。接着，库兹明谈到了布哈林，他说：“我对他有这样一个评语：确切地说，他自己都不知道，……（读。）……应该去夺权，还是应该去狩猎。”（笑声。）库兹明所作评论的原话就是这样。虽然库兹明是他的学生，但这话还是能够说明布哈林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夺权，还是应该去狩猎。然而，这个评语决不会减轻这个人所造成的危害。

他既左倾，又右倾。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左右倾联盟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他们站到了哪一边呢？要知道瑟尔佐夫曾经是布哈林的一说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女儿组织。布哈林既同情左倾分子，又同情右倾分子，所反对的只是党、只是中央、只是斯大林同志。还是看一看布哈林在一次对质中是怎么说的吧。斯大林同志问布哈林：“列宁在世时，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你是主张让局势更趋紧张呢，还是主张让局势更趋缓和？”布哈林回答道：我当时主张缓和。布哈林说，我认为遵循列宁的策略党就会毁灭，所以我当时表现得非常激烈。他当时的表现激烈到什么程度呢？你们都知道关于领导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要逮捕列宁的事吧。（布哈林：那还是从我这儿得知的呢。）这是各种文件不止一次地提及的一个事实。（布哈林：而您所说的恰恰相反。）好吧，就算是从您那儿得知的，知道你们企图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去逮捕列

宁并建立一个以皮达可夫为首的新政府。(布哈林：不对，不对。)这是您自己讲的。(有人喊道：是他自己这样发表的。)他发言的速记记录和他本人的笔记终归是可以援引的。我们知道布哈林当时进行了很激烈的斗争。

同时他还是个恬不知耻的人。是个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恬不知耻的人，而且他也真做了。1927年他曾亲自对我讲：——我已记不得是因为什么由头，当时我对他谈起了波格丹诺夫，我说列宁把波格丹诺夫调离了中央——“您知道吗，您这个人太天真了。波格丹诺夫是个非常能干、很有意思、颇有才干的人，但列宁不喜欢、不能容忍有才干的人，所以把他驱逐了出去。”布哈林可以否认有这回事，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这话是他讲的。我这里所讲的是他在对待列宁态度上恬不知耻的一个典型例子，而我们则是把列宁看得很神圣。布哈林还以同样恬不知耻的态度来对待中央委员会，对待斯大林同志，甚至唆使那些恶棍去反党，准备搞暴动，搞恐怖活动，反党。

不错，所有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不错，他们都不过是一些可悲的小走卒，他们投身于反革命的营垒，指挥反革命分子。好在党取得了胜利，好在党有这样的领导，好在他们在我们的面前扮演了背叛者的角色——一切都还不错。然而作为胜利者的我们，施舍宽容的时间太久了。(有人喊道：说得对，说得对!)不能总是这样。不错，可以，也需要宽容，何况这样做与其说是宽容，毋宁说是一种政治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说，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无论是对待李可夫、布哈林，还是对待其他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多次讲，我们都是一道工作过的人，甚至斯大林同志还经常对我

们说，我们太热衷于追查问题了，应当试一试让这些人留在党内。

今天，在1936年，我们公布了这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卑鄙齷齪的勾当。1936年以前，我们没有想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竟能堕落到如此地步，尽管我们将他们屡次开除出党，也未曾想到皮达可夫、利夫希茨和其他人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想象不出他们究竟会堕落到何等地步，然而在1936年，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了这一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从今天起这种宽容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将这些人从我们的党内清除出去，应当对这些人继续进行侦查，因为，即使在他们的背后没有什么势力，他们自己也会成为敌人的，我们应当清除他们，以便消除这些人对我们的危害。（掌声。）

原载《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

（刘淑春译）

关于所谓的“克—罗”案件

(迫害苏联知识分子的一段历史)

关于苏维埃时期我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问题正在引起史学家和政论家的广泛关注。

自从1992年初开始扩大档案材料的使用范围后，一些原属于国家机密的案件诉讼过程和细节才得以曝光。

战后时期排斥异己、把党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绝对化的作法是从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著名决议开始的。档案材料证明，这个文件以及后来关于影片《伟大生活》第二集和改进话剧院剧目的措施等决议都是1946年8月9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预先决定的。这是斯大林统治最后15年中唯一的一次由他直接主持的中央组织局会议，因此，这些决议^①的基本观点都是由领袖定的。

1946年发表的这些决议的影响及社会政治意义在历史科学和政论作品中得到广泛的阐述。尽管这些文件在社会上也有反响，但却没有使国内党组织的实际工作出现预期的转变，也没有对党员思想产生影响。中央的决议触动的只是为数不多的搞创作和搞文艺的知识分子。党的宣传工作的重点是批判安·阿赫马托娃和米·左琴科、同“没有思想性的、在思想上有害的作品”作斗争，而对当时《星》杂志上开始出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五分册，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9—200页。

现的一些“培养决非苏联人所应有的、崇拜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精神的作品”^①的批判却不多。但是，正是决议的这个观点在“冷战”不断升级和苏联政治领导日益脱离世界发展进程、同反希特勒同盟国断绝联系的情况下成为斯大林领导集团特别关注的目标。

从1946年底起，掀起了一场“树立苏联爱国主义精神”、反对西方“腐朽”影响、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者进行“再教育”的大规模运动。根据斯大林的旨意，这次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和领导者还是安·亚·日丹诺夫。在他的领导及直接参与下，1947年3月通过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各部和中央主管部门中的荣誉法庭》^②的决定，1947年6月开展了哲学批判，批判格·费·亚历山德罗夫《西欧哲学史》一书^③，通过了关于国家机密的新法令^④，完成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的准备工作。在反对奴颜婢膝、崇洋媚外的幌子下，利用对他们二人的指控，向国内所有党组织、整个国家机构系统，向党员和公民的意识中灌输苏维埃国家独立于世界发展轨道之外、“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进步中起领导作用的思想。

H. Г. 克柳耶娃(1898—1971)和Г. Н. 罗斯金(1892—1964)教授案件是苏联科学史上的重要一页，它记录了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联共(布)中央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五分册，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0页。

② 参见本刊第3辑第58—61页。

③ 参见B. Я. 叶萨科夫《关于1947年哲学辩论的历史》——《哲学问题》杂志1993年第2期第83—106页。

④ 参见1947年6月10日《真理报》。

授案件的非公开信》(见文件 1) 从组织形式上规定了意识形态专制的确立过程。党的机构炮制这封信并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加以贯彻执行，其目的就是动员国内所有党组织、整个国家行政机构、苏联军队和青年组织等对学者们的工作和知识分子的活动进行严格的监督。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才有可能开展同世界主义的斗争、进行“科学辩论”、玩弄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抛弃合理的国际合作、加剧“冷战”状态。建立“荣誉法庭”的结果是所有不同意见受到压制，各科研学派受到监督。

第一批被送上“荣誉法庭”的人的命运是悲惨的。虽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没有被逮捕，但“不可信赖的公民”的帽子多年来妨碍了他们在癌症的生物治疗领域的科研活动。受这一案件牵连，瓦·瓦·帕林(1903—1971)被迫害。但斯大林死后，他马上得到大赦，接着又被平反。后来，他创建了医学生物研究所，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是宇宙生物学奠基人之一。

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微生物学家克柳耶娃和莫斯科大学教授、细胞学和组织学教研室主任罗斯金多年从事肿瘤最新生物疗法的研究。到 1946 年，他们在制药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虽然这种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已经具有抗癌效能。制剂的作用原理本身就是一项发现。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在科学界广为传播并引起极大兴趣。书稿准备出版。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在癌症生物治疗方面的工作被认为是苏联科学取得的重大成就。

为了在国外宣传我国的科学成就，当时曾讨论把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书稿拿到美国同时出版的问题，这是符合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的协作精神的，在国际科学合作实践中也屡见不鲜。但是，由于国内对所有工作都有严格规定，而且政治领导者对开展反知识分子运动的初期成果不满意，所以苏美两国学者间科学合作的事实和美国人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著作的关注就被蒙上了一层意想不到的明显的政治色彩。

通过研究与所谓的“克—罗”案件有关的一些事态的发展变化，可以更好地了解极权制国家的党的决策机制。联共（布）中央机构炮制这个“案件”，其实质就是利用它来影响社会意识、控制社会舆论。

众所周知，在战后国家遭受巨大损失的条件下，科学研究工作困难很多。科研工作的成就与其说取决于对科学的实际贡献，不如说取决于国家的支持，这是科研工作经费的唯一来源。所以，苏联学者经常同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层打交道是很自然的。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于1945年12月在《论癌症及其治疗》的简介中总结了癌症治疗的现代方法、自己的工作进展、下一步研究工作中的组织和物质方面的困难。按照一个亲密朋友、老党员的建议，克柳耶娃在写这份简介材料的同时还写了一封致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米高扬的信，希望他的过问“使问题立刻得到应有的解决”。但是，正如她后来所说的，“由于不好意思打扰”，这封信并没有发出去。

1946年3月，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在苏联医学科学院全体会议上作报告，宣布发现了专门治疗恶性肿瘤细胞的物质。中

央报刊发表了这条消息^①。第二天，即1946年3月15日，原下诺夫哥罗德卫生局局长B. H. 维克托罗夫给自己的老熟人安·亚·日丹诺夫寄去一封信，请这位联共（布）中央书记找机会召见这几位学者并“给予苏联科学界大力支持”。随信还附上给米高扬的信和那本简介材料。日丹诺夫没有接见这几位学者，但是1946年4月3日他把维克托罗夫、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材料提交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处理。中央书记处决定委托苏联卫生部部长Г. А. 米捷列夫研究这些材料，“切实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并将结果报告中央”。记录摘要上最初只标明这个决定给米捷列夫一个人，但是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名字——波斯克列贝舍夫^②。这个问题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

卫生部长对中央的决定迅速作出反应。1946年4月22日他以“绝密”的形式通知联共（布）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为保证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制剂研制工作，组建了流行病学和微生物学研究中心专业实验室，现已开始运行”，建议苏联医学科学院成立癌症生物治疗问题理论研究部，向苏联部长会议申请进口一些必需的实验仪器。

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已经采取了使学者们能正常工作的措施——确定科研人员的名额，拨出实验室用房。但正如1946年11月15日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给日丹诺夫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得到的房子不能作为试验用动物的饲养处和我们的病人的住院处；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仍然缺少最必需的试验仪器和试剂。我们是在科研经费极其短缺的可怜条件

^① 参见1946年3月14日《消息报》。

^② A. H. 波斯克列贝舍夫是斯大林的秘书。

下进行工作的”。

在上面提到的 1945 年 12 月的那本简介材料中，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恳请国家领导人注意报刊上关于美国建立一个大型癌病研究所的报道。该研究所在组建中享受原子能研究工作的一些待遇。美国国家癌病研究所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打算把在攻克肿瘤病的斗争中最有前途的学派动员起来。他们对苏联学者的工作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1946 年 6 月 20 日美国驻苏大使斯密特访问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进行抗癌疫苗试验的苏联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学研究所。此次访问是严格按照当时同外国人交往的规定进行组织的。经过苏联卫生部部长 Г. А. 米捷列夫批准，并征得苏联外交部（Г. Н. 扎鲁宾和副部长索·阿·洛佐夫斯基）的同意。

一个半月以后，美国大使同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会谈的情况引起了政治领导人的关注。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局副局长 А. И. 安德列耶夫在 1946 年 8 月 3 日给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帕托利切夫和波波夫的专函中强调，美国大使同这几位学者的会晤是经过协调的，并指出，谈话是在所长办公室进行的，在场的有弗·德·季马科夫教授和红十字会的代表，斯密特没有去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试验室，但“无论斯密特还是他的翻译，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发现及他们的工作都非常熟悉。从所提问题、内行而确切地使用专业性很强的术语等情况可以看出，斯密特十分了解这项发现的过程及其意义”。最后的结论是，“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格尔佐夫同志认为，斯密特同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谈话的安排是正常的”。

美国大使建议在抗癌疫苗研制方面进行切实可行的合作：“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美国和苏联学者应在抗癌斗争中携起手来”。他还建议，让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构思，由美国人提供仪器。另外，还保证用飞机把必需的美国器械运来。

在战后恢复时期，上述建议是很有吸引力的。1946年7月6日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被召到苏联卫生部并得到正式通知，决定向美国学者公开研究方法的实质，采纳美国大使关于合作的建议，同意接受美国人提供的试验仪器。

紧接着，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组织美国学者梅特和累斯利参观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试验室。此外，美国国家癌病研究所不止一次地向他们提出合作的建议，并表示准备把该所科研人员派到莫斯科来。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对此没有答复。

上面提到的安德列耶夫《关于美国驻苏大使斯密特访问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学研究所的情况》的专函送给日丹诺夫时，正值日丹诺夫积极参与制定新的意识形态方针，其中就有同向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的行为作斗争的方针。这位思想家不同意中央干部管理局和国家安全部关于美国大使同这几位学者的会晤的安排是正常的这一结论。他在这个专函上给贝利亚的一位最亲密的老战友、当时任苏联外交部代理副部长的B. Г. 德康诺佐夫批示道：“请阅材料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不应该让斯密特去研究所。8月7日日丹诺夫”。这位中央书记不是征求意见，实际上是预先确定了答案。这个批示为炮制“克—罗”案件开了头，这是学者们当时所料不到的，他们还在努力进行抗癌制剂的研究工作。

给日丹诺夫的复信是由苏联外交部负责人Г. Н. 扎鲁宾

和 C. K. 察拉普金起草的。他们避而不谈美国大使访问得到批准这一问题，却写道：“最近一段时间，常有一些外国代表，主要是美国人和英国人，直接同一些苏联学者及科研所和图书馆等进行接触。外交部都是事后才得知这些事的。”为了反映“定货人”的愿望，他们建议：“（1）毫无疑问，应该拒绝斯密特的建议……”（2）同时，鉴于“美国人的一再要求”，委托卫生部长米捷列夫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不许把任何有关该制剂的情报泄露出去”。

同时，外交部工作人员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大使访问克柳耶娃试验室在时间上同收到美国人请我们“派 8—10 名外科医师赴美参加会议的邀请相吻合，另外，我们还向美国人提出给我们 4 名癌病专家单独发签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斯密特同克柳耶娃教授的会晤未必妥当”。

但是，对双方互利的学术交流并没有引起政治领导人的兴趣，德康诺佐夫同意上述建议并于 8 月 12 日提交日丹诺夫批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日子里，日丹诺夫正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忙于起草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再后来，日丹诺夫开始向列宁格勒作家们的脑子里“反复灌输”决议的思想。8 月 31 日日丹诺夫才审阅了外交部的建议，他把这些材料转给德康诺佐夫并批示道：“我认为你们的建议是正确的，应该报告莫洛托夫同志。”给莫洛托夫的短函也委托扎鲁宾和察拉普金起草。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是同苏联医生访美，并且首先是同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学术秘书帕林的出访联系在一起。他的出访是经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同意的，而且是根据苏联

部长会议关于继续进行医学科学信息交流的决议^①而成行的。这次访问再一次反映出同美国医学家进行科研合作的巨大潜力。帕林在访问中接受了一些新的科研书籍、新的试验制剂、化学制品、仪器、医疗器械及其他材料。按照互惠条件，必须给美国机构提供类似的材料。帕林当时掌握有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提供的抗癌疫苗以及Л. А. 季利贝尔发现的钴华样品^②。

文件中对帕林得到上述制剂的事实有各种说法。让我们来看看1947年1月28日克柳耶娃同日丹诺夫谈话中的一种说法。这次会谈的记录中记着，克柳耶娃说：“帕林去美国之前得到卫生部的通知，决定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发现解秘，所以到美国他可以谈这项发现，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书稿也给了他。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提醒帕林，书中删去了工艺过程部分，这一部分以后单独给他。连制剂样品都交给他了。同时，部里还说，莫洛托夫查问过这本书和制剂样品。”

日丹诺夫同志指出，莫洛托夫本人对这件事很关心，但根本没让把这些东西送给美国人。

——在卫生部有人对我们说，这些是送给美国人的。”

“克—罗”案件起因的国际因素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虽然后来在审判中实际上把国际因素排除掉了。

1946年秋，联合国大会专门讨论了国际合作方面的问题。1946年10月29日莫洛托夫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苏联与国际合作》的发言。讲话中有一节谈到原子弹，这个问题离开学者的参加就无从谈起。莫洛托夫说：“即使在原子领域，

① 参见《科学与生活》杂志1988年第1期第108页。

② 同上。

无论哪个国家都不能指望垄断。科学及科学的体现者——学者是不能被禁锢在箱子里的。现在是抛弃这个幻想的时候了。”^①

苏维埃国家看来最有影响的一位领导人如此明确地发表了对科学的国际性和各国学者科研合作的必要性的意见，这不能不引起外国研究人员和外交人员的注意。

1946年11月初，莫洛托夫不是以对新发现感兴趣的个人的身分，而是作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的首脑向苏联卫生部查问，能否把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发现的资料送给美国人。卫生部决定直接请示斯大林。在日丹诺夫个人全宗文件中保存着苏联卫生部1946年11月14日发来的“绝密”密码电报文本：

“致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查问可否把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癌症的生物治疗》一书手稿以及克柳耶娃—罗斯金抗癌制剂送给美国人。这本书我们正在印刷并将公开发行。现正在美国的帕林院士说，派到美国去的一批肿瘤医生从美国医生和癌病机构得到很多他们需要的信息。我们的专家学者认为可以送给美国人作进一步的试验研究。卫生部支持这个意见。

请指示。

苏联卫生部副部长

库兹涅佐夫”

一个月后，日丹诺夫在给另一位中央书记阿·亚·库兹

^① 维·米·莫洛托夫《外交政策问题。讲话和声明。1945年4月—1948年6月》，1948年莫斯科版第262页。

涅佐夫的便条中对扣押卫生部密码电报的原因竟作出如下解释：“现送去米捷列夫的副手库兹涅佐夫给斯大林同志的电报草稿，因为要成立克柳耶娃—罗斯金制剂问题委员会而把电报草稿压在我们这儿了。所有文件帕夫连科^①都交给了波斯克列贝舍夫。或许，送给你的这封电报草稿也需这样办。敬礼！日丹诺夫。12月21日。”

由于组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会、由中央机构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试验室情况进行总结、卫生部长米捷列夫因未执行中央书记处关于帮助学者的决定而受到批评等原因，苏联卫生部对莫洛托夫的查问没有给予答复。1946年11月26日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书稿以及他们研制的制剂还是送给了美国人。在拼凑“克—罗”案件材料的过程中，这次未经“最高领导批准”的馈赠被定性为犯罪行为。1947年2月帕林回国不久即被逮捕。

围绕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工作出现了很矛盾的局面。一方面，研究抗癌制剂的工作日益受到重视。苏联部长会议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试验室通过专门决议，座落在第一梅先大街的试验楼正在突击建设（贝利亚的机构主管这项工程），试验室增加了研究人员（也是在贝利亚的机构的监督下完成的）。另一方面，联共（布）中央内部负责进行全面监督的思想家则认为，利用这件事可以组织对一些教授——苏联知识分子的分子的代表进行公开指责，因为他们得到党和政府各方面的支持，但却忘记了对他们研究成果的绝对支配权利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只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即使现在，这些学者

^① A. C. 帕夫连科——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局副局长。

关心资产阶级西方世界对他们的承认也被看作是不体面的事。日丹诺夫和伏罗希洛夫同这些学者和苏联卫生部领导的谈话记录证明，他们领导了这场运动，就其实质来看，他们是在搞以诋毁学者为目的的侦查。比如，日丹诺夫在同克柳耶娃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时曾不止一次地重提美国大使斯密特访问她的试验室这件事，并且是在克柳耶娃承认可以把她同斯密特的谈话看作是斯密特试图进行的策反活动之后才结束谈话的。党中央还邀请医学界代表进行咨询。

1947年2月克里姆林宫召开了由日丹诺夫主持、斯大林参加的专门会议。Я. Л. 拉波波尔特教授根据罗斯金的叙述所写的回忆^①提供了一些关于讨论过程的情况。目前我们无法用文件来证实他的说法的准确性。但是我们同意这种推测，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表示出对帕林的不信任。

“克—罗”案件的全部政治因素只有当中央政治局文件、斯大林个人档案和总统档案馆其他文件开放后才能真相大白。但是目前根据已开放的文件资料也可以弄清很多问题。在日丹诺夫的一个记事本上记录着最高权力集团讨论“克—罗”案件的各种情况和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这些记录有助于研究1947年春季事态发展的脉络。请看日丹诺夫的一些亲笔记录：

“应当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有所区别。罗斯金说，可以考虑用6—8个月，而克柳耶娃却否定了。从其他城市——基辅、列宁格勒、从罗斯金的研究所吸收一些人来，吸收他们的实验员。

^① 参见《科学与生活》杂志1988年第1期第103—104页。

组织法庭。

对帕林火力要猛些……

要记住，凡是用人民资金获得的东西应返还给人民。

应建立荣誉法庭。

5 月份在 8—10 个部组建荣誉法庭。

要认真地筹备。

卫生部。案件的准备工作。部长上法庭。材料。法庭审判——作出决议，进行调查。传唤证人。召开法庭会议，关于组织听众……

(1) 不是百分之百的

不完全符合要求的

学生

(2) 从彼得大帝时起德国人、法国人
农民比克柳耶娃有更多的尊严和勇气。

个人尊严不够。

不了解俄罗斯的作用。

痛斥美国 and 英国被夸大的声誉……

可以给 10 天时间调查……

应该广泛刊登调查结果，不仅使各级官员了解，也要让群众知道……

医学科学院应服从人民委员部的领导……

不是人民委员部指导他们，而是他们同帕林一起在指导
人民委员部

帕林去美国的情况……

这件事应该起诉

驳回帕林的证据……

看一看起诉书……

起草一封中央委员会关于出国访问的信……

发给各共和国，以便组织监视……

信中这样写：奸细……

给各州委、各部长、各部党组织发一封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非公开信……

发言。不要成为统计员……

把荣誉法庭的事委托给苏斯洛夫去办……

关于对克—罗实验室采取有关措施”。

我们看到，这位主要思想家在这些学者身上花费了不少精力，针对他们的“案件”制定了不少计划。

通过斯大林授意制定的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关于苏联各部和中央主管部门中的荣誉法庭》的联合决定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向知识分子进攻的重要阶段。决定中要求：“卫生部、商业部和财政部在两周内率先成立荣誉法庭”，荣誉法庭的任务是进一步“用苏维埃爱国主义和忠诚于苏维埃国家利益的精神教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便同有损于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荣誉和尊严的不良行为作斗争”。荣誉法庭负责“审查苏联各部和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者、业务人员和科学工作者的反爱国主义、危害国家、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如果这些行为不在刑事处罚之列的话）”^①。1947年共组建了82个荣誉法庭^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讨论中央非公开信之后建立的。

日丹诺夫还受命起草了给各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各

^① 参看本刊第5辑第58—9页。

^② 同上。

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关于对来访的外国人加强监视的一封信。信的初稿他不满意，于是他重新起草这个文件（除第三段）。联共（布）中央提醒大家注意，“最近一个时期，外国情报机构，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竭力扩大自己在苏联的活动。他们不仅搞间谍活动，而且收集各种材料，组织对苏联的诽谤和反苏宣传。为此，外国情报机构首先利用驻苏的外交人员、外国记者以及各种科学和文化代表团的合法条件”。党组织必须做到，（1）“对来访的外国人不能毫不关心、不予重视，也不能卑躬屈膝”；（2）“严守国家机密”，特别是在地方上；（3）“通过有关组织对去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市的外国人进行监视，以便了解他们的一举一动，防止他们同易泄密的人和不保守国家机密的人接触、同对外国人和其他不受我们欢迎的分子卑躬屈膝的人接触”。规定书记收到这个指示后要报告并“亲自检查措施的执行情况”。我们不知道通过和发出这封信的准确日期，但是毫无疑问，它是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应该把1947年5月7日看作是“克一罗”案件准备阶段的结束。这一天日丹诺夫搞出了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进行指控的书面材料。他在这一天给斯大林写道：

“现将我起草的卫生部党组织给斯米尔诺夫部长的关于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送交荣誉法庭的呼呼书草案呈送给您。”

斯大林的领导班子认为，自己有权不征求党组织对所讨论问题的意见而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他们。日丹诺夫起草的草案就成了中央非公开信的附件。

可以认为，日丹诺夫起草的苏联卫生部党组织给卫生部

长叶·伊·斯米尔诺夫的信（见文件2），就是亚·亚·法捷耶夫于1947年5月13日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作家时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宣读的那份文件。康·米·西蒙诺夫在《我这代人的见证》回忆录中谈了这次会见的情况^①。西蒙诺夫所描述的斯大林在会见中关于必须为树立苏维埃爱国主义、同知识分子在目前条件下对外国文化的不正确的崇拜态度作长期斗争的讲话是同日丹诺夫记录本中摘录的话完全吻合的。

在筹备1947年6月5—7日“荣誉法庭”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审判过程中，日丹诺夫给法庭庭长A. H. 沙巴诺夫写了一份个人声明，表示不同意罗斯金和克柳耶娃在荣誉法庭预审中的供词。他事先向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马林科夫和沃兹涅先斯基介绍了自己的声明。

日丹诺夫还参与了公诉人发言的定稿工作。著名心脏外科专家彼·安·库普利亚诺夫被推举为公诉人，取代年事已高、性情倔强的尼·亚·谢马什科。但是发言稿不是他写的。公诉人的发言稿是由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局长格·费·亚历山德罗夫院士（此人的《西欧哲学史》一书在随即开展的哲学问题讨论中受到批判，此时似乎是让他先给自己造点好名声）、苏联卫生部新部长叶·伊·斯米尔诺夫和苏联总检察长K. П. 戈尔舍宁起草的（见文件4）。让党政高级干部的代表参与公诉人发言稿的起草工作显然表明，“荣誉法庭”的被告没有任何权利，对任何诽谤和恶意中伤也没有申辩权。

正当向国内党组织广泛通报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并将荣誉法庭对他们的审判树为“样板”的问题提上日程时，日

^① 参见康·米·西蒙诺夫《我这代人的见证》，199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版第86—102页。

丹诺夫起草了《联共（布）中央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件的非公开信》（见文件1）。

非公开信及其有关文件系第一次发表。

历史学博士

B. D. 叶兹科夫

生物学副博士

E. C. 列维娜^①

文件 1

联共（布）中央非公开信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加盟共和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党的边疆区委委员、州委委员、
市委委员和区委委员、苏联各部部长、中央主管
部门负责人和领导人、苏联各部及中央主管部门
党组织书记、各军区和集团军司令

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件

最近一个时期，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揭露出一些事实，证明在苏联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对外国的东西和资产阶级西方现代反动文化卑躬屈膝、有损于我国人民形象的行为。其中最典型的是联共（布）中央揭露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反爱国主义和有损国家的不法行为的案件。今年6月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判。

^① A. B. 叶西娜也参加了文件发表前的整理工作。

鉴于这一事件的重大政治意义，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各级党组织及各部部长和各部党组织送发这封信，阐明案件的真相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和教训。

联共（布）中央把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的全部材料发给你们，这些材料包括：部党组织给卫生部部长的呼吁书，荣誉法庭第一次会议速记记录，公诉人在法庭上的发言和荣誉法庭的判决。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在原卫生部部长米捷列夫的纵容下，在美国间谍——原苏联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的积极帮助下，把苏联科学的重要成果——抗癌制剂送给了美国人。他们是苏联的不可信赖的公民，为了追求在国外的声誉和廉价的知名度，经不住美国情报人员的利诱，把属于苏联国家和人民的科学发现送给美国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无视国家和人民的迫切利益，忘记了自己对关心和重视他们工作的祖国的义务，使苏联科学丧失了在这项发现中的优先权（优势），给苏联的国家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失。

从这些材料中你们可以看出，为了取悦于外国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用尽了各种办法。在案件的审理中，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表现得不真诚、不体面，极力掩盖事实，公然说谎，迷惑法庭。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们试图以人道的、“纯洁的”动机来解释自己的肮脏行为。有部里 1000 多名工作人员参加的法庭审判向广大的社会舆论界揭露了这些人：他们道德政治水准低下，行为动机无聊而又卑鄙，连苏联公民起码的荣誉和义务感都没有。

联共（布）中央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件大概不是唯一的偶然事件，它说明我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领

域的某些阶层在道德政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这些事实应该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早在去年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以及关于话剧院剧目的两个著名决议中，联共（布）中央就要求要特别重视我国某些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的危害性。但是，在联共（布）中央发出这些严肃警告之后，崇洋媚外现象还在蔓延，甚至涉及到像克柳耶娃这样一些应该把自己获得的知识、工作条件、社会地位归功于苏维埃国家的学者。这更加说明，如果不根除崇洋媚外这种危险的不良社会现象，它就会腐蚀我国知识分子中那些不坚定分子。

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何在？为什么我们苏维埃社会中会有人不顾民族尊严、丧失自尊心，对外国资本家最卑微的出卖灵魂的走卒卑躬屈膝呢？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人民从外国资本的经济和精神奴役下解放出来。苏维埃政权使我国第一次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先进的集体化农业，实现了经济独立。我国人民完成了文化革命，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国家，打碎了资产阶级西方国家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桎梏。苏联成了世界文明和进步的堡垒。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社会主义体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苏联发挥世界历史作用的情况下，怎么还会有卑躬屈膝和不相信自己人民力量的可耻现象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会有崇洋媚外的情绪呢？

这种反爱国主义的情绪和行为的根源在于，我国某些知识分子仍然是万恶的沙皇俄国的残余的俘虏。沙皇俄国统治阶级依靠外国，长期以来将俄国置于落后和被支配的状态，因此，他们给知识分子灌输的是我国人民落后的思想并使知识

分子相信俄国人永远是西欧“老师”的“学生”。同时对居住在沙皇俄国的其他民族也采取这种态度，无视他们的科学和文化，沙皇俄国统治阶级脱离人民，与人民格格不入，不相信俄国人民的创造力，认为俄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落后状况。从18世纪起外国人纷纷拥进俄国，他们把自己看作是高贵种族和高级文化的代表。所以，18—19世纪俄国贵族阶层陆续失去自己的民族特征和传统，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语言，盲目地摹仿法国的一切。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后来，俄国贵族对法国习俗和法国文化推崇的现象又被俄国统治阶级对德国人卑躬屈膝的态度所取代。

俄国科学始终因崇洋媚外现象而受到损失。由于不相信俄国科学的实力，所以俄国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得不到重视，致使俄国科学家的重大发现纷纷转给外国人或被外国人剽窃。罗蒙诺索夫在化学领域的伟大发现被说成是拉瓦锡的，伟大的俄国科学家波波夫发明的无线电通讯被意大利的马可尼剽窃，俄国科学家亚布洛奇科夫发明的电灯也被外国人据为己有，等等。

所有这些都对外国资本家有利，他们轻而易举地就把我国人民的财富用来为他们的自私的目的和利益服务。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在俄国支持和培植俄国人民文化上和精神上的低劣思想。俄国的科学和文化同沙皇俄国其他民族的科学和文化一样，始终是在同使它丧失独立性、遭到西欧文化轻视的种种尝试进行无情斗争中发展和锻炼起来的。

卑躬屈节的第二个根源是周围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知识分子最不坚定阶层的影响。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不惜代价要在苏联内部建立情报和反苏宣传据点。外国情报人员为了在我国内部建立一些施加影响的阵地所作的努力是众

所周知的。他们知道，我国工人、农民和士兵能够坚定地捍卫苏维埃国家的利益，绝不会干出有损于我国荣誉和尊严的事情，于是他们便积极寻找不坚定和易攻破的环节，并且在沾染了卑躬屈膝和丧失自信等病症的我国某些知识分子中找到了突破口。因此十分清楚，帝国主义走狗试图千方百计地支持和助长某些人意识中极其有害的资本主义残余，以便削弱苏维埃国家，在思想政治方面瓦解最不坚定的苏联公民。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清楚地表明，正是那些沾染了对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的奴才思想的人容易成为外国情报人员的猎物。

我们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应该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1. 由于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节的现象已造成一定影响，党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用苏联爱国主义和忠于苏维埃国家利益的精神教育苏联知识分子，培养他们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性格，使他们能够抵制外国情报人员的任何狡诈的手段，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不惜任何代价捍卫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和荣誉。各级党组织应该孜孜不倦地向我国人民宣讲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他说，即使是“最次的苏联公民，只要他摆脱了资本的桎梏，也比任何一个套着资本主义桎梏的外国高官高出一头”。

2. 经验证明，荣誉法庭在培养苏联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发挥出很大作用。由于法庭在审判过程中把对一些人的具体行为的调查同政治教育工作结合起来，由于荣誉法庭具有广泛的公开性，从而使诉讼程序产生巨大的道德威力，使荣誉法庭成为我们政治教育工作的强大杠杆，这是一般抽象的政治宣传运动所无法比拟的。这说明，荣誉法庭是教育我国知识

分子的一种新型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形式，必须加以鼓励和发展。

3.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还表明，在我们国家机构一些工作人员中，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放松警惕、宽容和不负责任的现象。面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包围，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不像是国家政治工作者而像是一些无原则的、不问政治的、失去布尔什维克本色的、甘愿上钩的人，听了几句奉承和好听的话就为外国情报人员提供一切服务。如果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重视我们，我们就应该首先尊重自己。任务在于要使我们的人民学会保持苏联人应有的尊严。

4.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还暴露出各部党的政治工作薄弱。这个工作不是经常地开展，往往只是在纪念日和运动时才搞一搞，而且与各部最重要的现实事件相脱节，没有把真正用布尔什维克精神教育部里工作人员作为中心工作。各部党组织的工作应最坚决地克服这一严重缺点。

中央委员会建议党的州委委员、边疆区委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市委委员和区委委员认真阅读这封信及所附材料，还要在苏联各部、中央主管部门、高等院校、科学院和科研所党组织中进行宣传和讨论。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1947年7月16日

（待续）

原载《半人半马》杂志1994年第2期

（孙凌齐译 李永全校）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总部”案件

编者按：本文根据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关于所谓“莫斯科总部”案件的报告编辑而成，文中记述了关于“莫斯科总部”案件的基本情况，并附有季诺维也夫在他受审时所作的一份长篇声明。

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遭暗杀。由对这一案件的调查引发出所谓的“列宁格勒总部”案件及与该案件有直接牵连的“莫斯科总部”案件。

因为“莫斯科总部”案件，共有19人在1934年12月被捕，并于1935年1月16日被判处5—10年监禁。

格·叶·季诺维也夫，1883年生，1901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16日被捕，被捕前为《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会成员；

列·波·加米涅夫，1883年生，1901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16日被捕，被捕前任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

阿·莫·格尔季克，1879年生，1902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8日被捕，被捕前为科技联合出版社社长助理；

亚·谢·库克林，1876年生，1903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14日被捕，被捕前已退休：

波·瑙·萨霍夫,1900年生,1919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25日被捕,被捕前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市任北方边疆区检察长;

格·叶·叶夫多基莫夫,1884年生,1903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8日被捕,被捕前任苏联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乳制品工业总局局长;

伊·彼·巴卡耶夫,1887年生,1906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9日被捕,被捕前任动力网总局局长;

雅·瓦·沙罗夫,1884年生,1904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14日被捕,被捕前任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针织工业局局长;

伊·斯·戈尔舍宁,1894年生,1919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12日被捕,被捕前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计划处处长;

尼·阿·察里科夫,1903年生,1921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12日被捕,被捕前任列宁格勒州齐赫文斯基铝业公司第一工段长;

格·费·费多罗夫,1891年生,1907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9日被捕,被捕前任全苏制图托拉斯经理;

谢·米·盖森,1898年生,1916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9日被捕,被捕前在斯摩棱斯克市为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驻西部地区特派员;

伊·伊·塔拉索夫,1902年生,1919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18日被捕,被捕前为莫斯科政法学院四年级学生;

列·雅·法伊维洛维奇,1900年生,1918年加入联共

(布)，1934年12月12日被捕，被捕前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棉花总管理局副局长；

亚·弗·格尔茨贝格，1892年生，1916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12日被捕，被捕前任苏联“技术出口”联合公司总裁；

阿·伊·阿尼舍夫，1899年生，1919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22日被捕，被捕前为全苏农业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研究员；

阿·维·佩里莫夫，1897年生，1915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9日被捕，被捕前为苏联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驻奥尔忠尼启则市负责玻璃包装器厂开工的特派员；

波·利·布拉沃，1900年生，1919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13日被捕，被捕前为苏联人民委员会采购委员会杂志责任编辑；

亚·法·巴什基罗夫，1903年生，1920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14日被捕，被捕前任列宁格勒市“红霞”工厂助理车间主任。

这些人被认定犯有以下罪行：作为过去积极参加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人，虽然声明与反对派观点决裂，但却没有放下武器，而是搞起反苏的地下活动，妄图取代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现任领导。此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格尔季克、库克林、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沙罗夫、戈尔舍宁、费多罗夫还被宣布为“莫斯科总部”的领导者，该总部被认为与无疑策划和组织了暗杀基洛夫活动的“列宁格勒总部”有牵连。

现已查明，所谓“莫斯科总部”案件纯属内务人民委员

部机构的捏造，对本案被告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逮捕并起诉他们的目的是利用暗杀基洛夫事件毁坏他们的政治名誉，继而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指控这些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并组织暗杀基洛夫的根据是，暗杀基洛夫的凶手 Л. В. 尼古拉耶夫以前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但是没有任何档案或其他材料能够证明这一点。尼古拉耶夫属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说法是由斯大林提出来的。叶若夫在联共（布）中央 1937 年二、三月全会上致闭幕词时谈道：“我现在还记得，斯大林同志把我和科萨列夫叫去说：‘要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中间寻找凶手’”。此外，布哈林于 1937 年 1 月 13 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驻地同拉狄克当面对质时（当时斯大林在场）说：在基洛夫被暗杀后的第二天，斯大林召见了他和列·扎·梅赫利斯并向他们宣布，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斯大林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同时还进一步证实说，这次谈话是在他从列宁格勒回来后进行的，他去列宁格勒是为了领导调查基洛夫被暗杀事件委员会的工作。但是没有任何客观依据可以证明尼古拉耶夫属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所以斯大林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然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苏联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苏联检察院要案侦查员 Л. Р. 舍宁、苏联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却根据这一说法进行案件的调查，蓄意歪曲事实真相，把从事反苏活动的罪名强加于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因此，从 1934 年 12 月 8 日起开始逮捕本案被告，1934 年 12 月 16 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被逮捕。

季诺维也夫在他的住处被搜查时当场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现在(12月16日晚7点半),莫尔恰诺夫带着几个肃反工作人员闯入我的住宅进行搜查。

斯大林同志,我对您说实话:奉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从库斯塔奈回来后,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写的每一行字,所产生的每一个想法,都没有必要向党、向中央委员会、向您个人隐瞒。我一心只想着如何博得中央委员会和您的信任,争取您为我安排工作。

除了一些陈旧的档案之外(都是30多年积累下来的,包括从事反对派活动时期积累下来的),我这里什么也没有,也不可能。

我绝对、绝对没有什么对不起党、对不起中央委员会、对不起您个人的地方。我以被布尔什维克视为神圣的一切向您发誓,我以列宁的名义向您发誓。

我想象不出我有可疑的地方。我恳求您相信我的肺腑之言。我的心灵深处在颤抖。”

1935年1月,在结束了对“列宁格勒总部”案件(被告为尼古拉耶夫等人)的诉讼后决定对“莫斯科总部”案件提起公诉。为提起公诉提供可能的是所谓巴卡耶夫认罪的供词。

1935年1月参与本案调查的Д. М. 德米特里耶夫从巴卡耶夫那里获得一份详细的“供词”。供词称,前“季诺维也夫分子”在搞反苏活动,他们有反革命的组织,有领导总部等等。然而,这些供词没有提供“季诺维也夫分子”从事反苏活动的任何具体事实,因此关于存在反革命组织和领导总部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

对本案进行的调查很不客观,极其片面,带有倾向性并

脱离案情的实际，法制在这里遭到最粗暴的践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为了获得对侦查机关有用的和必需的供词向被告进行恫吓并滥用党的名义。用这种手段得到的假供词又被用来胁迫其他被告承认并不存在的罪行。通常被告所提供的所谓进行犯罪活动的供词被随便地、笼统地记录下来，没有具体的事实和案情材料，不标出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1935年1月10日在对加米涅夫进行审问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要他承认存在地下反革命组织，并肯定地说季诺维也夫已经承认了。然而季诺维也夫当时并没有提供这样的供词。

巴卡耶夫所作的存在“莫斯科总部”的所谓供词也被用来当作向其他被捕者施加压力的工具。1935年1月9日巴卡耶夫和叶夫多基莫夫进行对质的记录就证实了这一点。在对质记录中，向被审问的人提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事先准备好的，那上面用打字机打印着：

问巴卡耶夫：您承认不承认您和叶夫多基莫夫以前都是莫斯科组织莫斯科反革命总部的成员？

问叶夫多基莫夫：您认为巴卡耶夫的这个供词属实吗？

问巴卡耶夫：您知道反革命组织莫斯科总部的成员是谁吗？

问叶夫多基莫夫：您认为巴卡耶夫供认的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莫斯科总部的成员名单属实吗？

问巴卡耶夫：请您列出您所知道的季诺维也夫组织在莫斯科的人员名单？

问叶夫多基莫夫：您认为巴卡耶夫的供词属实吗？

其余的所有问题都同样采取这样的形式。对问题的回答是笔录的。巴卡耶夫的供词由侦讯人员预先拟好，叶夫多基莫夫只需简单地承认即可。其他被指控者对质时的问讯记录也是如此。

起诉书认定的“总部”成员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库克林，沙罗夫，格尔季克，戈尔舍宁和费多罗夫。

现有文件表明，本案被告中的布拉沃、佩里莫夫、塔拉索夫和法伊维洛维奇从未提供过任何关于存在领导“总部”的供词，而其他被指控者就这个问题所提供的供词非常不具体且自相矛盾。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直到预审结束也未承认存在反革命组织的“总部”。

季诺维也夫在一次次审问中肯定地说，党的十五大以后，反对派总部已经解散，组织也不存在了，过去的反对派成员只是互相见见面，聊聊天，表达一下对自己现状的不满，过去的反对派领袖还希望重返党的领导岗位。只是在侦查刚一结束后才以不合法的方式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得到一份《向侦查机关所作的声明》（本文后附有该声明的全文）。但是该声明自相矛盾，而且从本案已查明的情况看，不能将它视为季诺维也夫的认罪声明。

加米涅夫在审问中也肯定地说，从1928年起他未参加过前反对派的任何聚会，从1932年11月起甚至同前反对派断绝了来往，他只同季诺维也夫保持着私人交往，因为他们住在同一幢别墅内。只是在党的十五大以后他曾一度指望在中央出现分歧的情况下重返党的领导岗位，但从1930年起他打

消了这一念头。他在1935年1月10日的审问中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成型的组织总部。我认识许多人，这些人互相见见面，交换一些对当前政治问题的意见。他们过去都是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组织的成员。他们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库克林和沙罗夫。”

对“您是否承认曾经存在过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反革命组织，特别是它的莫斯科总部？”这样一个挑拨性的问题，加米涅夫回答道：“我不能承认这一点。我个人十分清楚，任何组织的存在都是直接有害于党的，它只会妨碍我重返我所向往的党内工作岗位。”

我个人当时赞成停止同党的斗争。”

在提起公诉后加米涅夫递交了一份声明，声明指出：“把我划归旨在消灭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组织之列与侦查工作的整个性质不符，与向我提出的问题和在侦查过程中对我的指控不符。我一定要竭尽全力、毅然决然地同这种严重违背事实、与侦讯时向我出示的材料大相径庭的说法进行斗争。”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加米涅夫断然否认他自1928年恢复党籍以后参加过有组织的反党活动，但是在侦查结束后，即1935年1月14日，却以不合法的方式从他那里得到了季诺维也夫集团的领导总部直至1932年（包括1932年）仍在从事活动的供词。加米涅夫对这一活动作了如下说明：“我认为，所有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成员在这一时期的任务就是向上面提到的总部提供他们凭自己的职位或同反党小集团中的党员和非党员碰头时获得的情况和感想。所有的讨论都是以反党为主题的，也就是说，其出发点是用这些情况来说明党的领导日益削弱或陷入困境，说明党面临着重重困难，等等。

但是季诺维也夫集团已经不可能采取某种积极的活动了。”即使这些供词也不能证明所谓“莫斯科总部”的存在，不能证明被告人从事了反苏活动。

所有调查表明，侦查机关并未得到任何确凿的证明这个所谓“莫斯科总部”犯有准备暗杀基洛夫的罪行或确定他们知道这一企图的证据。但参加本案侦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和苏联检察院人员不惜捏造事实，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结果。现存于苏共中央档案馆内的起诉书的两稿可以说明这一点。起诉书的初稿所标明的日期是1935年1月13日。它根据侦讯所查明的材料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承认自己有罪；库克林和格尔季克否认自己参加了“莫斯科总部”；佩里莫夫和盖森只承认自己同其他被告人有来往。

显然，组织所谓“莫斯科总部”案件诉讼的人不会满意这样的预审结果。因此，1934年1月14日在已经结束侦查并把被告交付法庭之后，又非法提审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库克林、格尔季克、佩里莫夫等人。季诺维也夫的《向侦查机关所作的声明》就是这次获得的。

在1935年1月15日法庭审判时，起诉书所标明的日期仍是1935年1月13日，但它与初稿相比有变化，其中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自己有罪；库克林和格尔季克肯定自己参加了“莫斯科总部”；佩里莫夫和盖森承认参加了“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即使这与他们的供词不一致。

1935年1月16日，即开庭的第二天，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库克林、格尔季克、盖森和佩里莫夫等人宣读了经过修改的起诉书。同一天起诉书公布。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修改起诉书从时间上讲不早于

1935年1月14日，也就是说当时起诉书已经被法庭批准并转给了被告。修改起诉书的是斯大林秘书处的工作人员K. P. 赫尔岑贝格和A. H. 波斯克列贝舍夫，这一点通过鉴定笔迹和波斯克列贝舍夫60年代初所作的解释得到证实。

苏联检察长伊·阿·阿库洛夫以及维辛斯基和舍宁是先签署了经过修改的起诉书，然后才给它填上日期的，他们的这种做法严重地践踏了法律，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捏造了事实。

1935年1月15日法庭开庭审判了本案被告。1月18日根据斯大林本人起草的提纲而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名义发出了关于基洛夫被暗杀事件的非公开信。信中指出，暗杀基洛夫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受“季诺维也夫莫斯科总部”领导的“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总部”干的。“莫斯科总部”确切知道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意图并进一步煽动了这一意图。

斯大林在非公开信中还得出结论说，季诺维也夫派别集团是最阴险的、最卑鄙的……伪装了的白卫组织形式。斯大林断言“季诺维也夫分子”选择两面派手法和欺骗手段处理自己同党的关系，他号召要像对待白卫分子那样对待他们，逮捕他们，孤立他们。他指示，必须保持警惕性，注意以前的各类反对派集团的活动。

由此可见，斯大林提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暗杀了基洛夫的说法，是为了镇压前反对派，首先是镇压“季诺维也夫分子。”

苏联最高法院在审查了所谓“莫斯科总部”案件的全部案情后，取消了对本案被告的判决，案件由于缺乏犯罪事实而终结。

附录：

季诺维也夫向侦查机关所作的声明

阿格拉诺夫同志向我指出，迄今为止我所作的供词给侦查人员留下的印象是没有真心彻底悔过，没有把所有情况讲出来。

侦查的时间已经剩下不多。我所作的对质当然对我也起了作用。我应该、绝对应该对侦查人员坦白一切。

的确，我在以前的供词中为自己的辩护多于对自己罪行的彻底交代。有许多事情我确实忘记了，但我不想再去彻底加以考虑，更不用说向侦查人员彻底交代了。

可是我想彻底缴械。

可是我意识到我对党犯下的大罪，我心中充满真心悔过的想法。但是我的脑子缺乏彻底考虑这一切的精力和“体力”。

一开始我觉得，对基洛夫同志的谋杀以及将我同这一事件牵连在一起简直像崩落的岩石碎片一样莫名其妙地意外埋葬了我。我逐渐才明白了事件的真相。

个别的细节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实质是，在十五大以后我们作为一个集团，严格地说作为一个处于地下的集团依然存在，并认为1925—1927年纲领的最重要部分是“正确的”，党迟早会承认我们这个“功劳”的。

既想留在党内，又要保留这样的想法，我们不得不欺骗党，实际上就是要耍两面派手腕。

“两面派”是一个很伤人很难听的说法。我从未想过要加

以“承认”。

但这又是一个确切的说法。它不留情面地、但却准确地揭去了假象的伪装，“有啥说啥”。

其余的一切都由此而来。

十五大以来事态的发展对我们（尤其是对我）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以及后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头几年的成绩，经济的增长，社会主义文化的提高，苏联世界影响的扩大，党的壮大，集体化的成果，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不能不使我们对我们的1925—1927年纲领的信心发生动摇。

但是“令人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在其他方面是“对的”（比如，近来在共产国际工作路线问题上），党内制度“非常可怕”等等。“令人聊以自慰”的还有，从1928年以来许多事是“按我们的纲领”办的，但付出了“一大笔的学费”等等。

因此，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同志抱有敌意。

我们并不是完全看不到党的领导人正在做伟大的事业。但是总是能找到一点“理由”来得出敌视党的总路线、敌视党的领导人、敌视斯大林同志的结论的。

我本人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我这样说当然不是为自己“辩护”或“推托责任”，而是因为：（1）应该有什么说什么；（2）我的这个特点对整个集团的命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当我毫不动摇地帮助党把已作出的决定贯彻到群众中去的时候，我对党不是一无用处的。列宁去世后，我本应该亲自在这非常复杂的局势下（有一次是在列宁在世时，即1917年10月）作出至关重要的决定，但我上述的性格特征（动摇

不定，优柔寡断）不止一次起了非常坏的作用。

我在十五大以后，特别是在十六大以后多次对自己说，好了，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在各方面都是对的，这已经得到证明，应该完全彻底地承认这一切结论。但是，当事态又一次发生转折时，当出现新的困难时，我又开始动摇起来了。最鲜明的例子是1932年，关于那一年的事件我在供词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我再一次成为反党情绪的喉舌。我主观上当然并不想对党和工人阶级造成危害。但实际上我在这些年中成了想阻止社会主义的那些势力的喉舌。

我在十七大上的发言是出自真心的，我认为我只是在表达方式上“迎合了”多数人，实际上我还是三心二意。

在前“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核心中有的人个性比我坚强。但是糟就糟在我们没有真正服从党，没有彻底同党融为一体，没有像全党和全国那样对斯大林同志满怀感激之情，我们还在朝后看，过着特殊的“憋气的生活”，因此我们的这一处境决定了我们政治上的两面性，导致了耍两面派手腕。

我们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要是党（我们指的是斯大林）吸收我们参加“实实在在的”工作，那么大概一切就会缓和，我们会帮助修正“错误”，改善体制等等，一切就会好起来，我们会摆脱同党的疏远。

党感到我们心怀叵测，当然就不可能让敌视和半敌视党的路线及党的领导的人恢复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多少重大的影响。

回顾过去，应该说党实际上对我们是非常爱护的。但是党当然不可能真正信任我们。

我们继续保持着自己特殊的心理，我们活动的“规律”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恼羞成怒的”、“比谁都看得清楚、却无法给别人指点道路”的人组成的“封闭的小圈子”的发展“规律”。

同时个人交往也越来越局限于和我一起调出列宁格勒的前列宁格勒工作人员的小圈子。

我在接受侦查时肯定说，从1929年起，在莫斯科没有我们前“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总部。我自己经常想，这算什么“总部”，这无非是季诺维也夫加上加米涅夫加上叶夫多基莫夫，再加上两三个人，而且他们几乎互相不见面，也不再从事任何有步骤的反党派别活动。

但是，实际上这就是总部。

那些不能或不想真正溶合在党里的前“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残余骨干（首先是“列宁格勒残余分子”）就是这样看这几个人的。

其他所有的大小反党集团也是这样看这几个人的。我们当中的某些人（首先是加米涅夫和我）过去政治声望很高。1932年，当所有的反党集团开始“复活”的时候，这部分人马上谈起了“列宁派政治局”（既列宁领导下的有我、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参加的政治局）。这些组织还大度地“同意”这个政治局里还应该有所大林同志。

所有的反党分子再次推举出我们的“候选人”。留京的反革命富农纲领斥骂了我和加米涅夫，把希望寄托在新人身上，寄托在自己的“实践家”身上，但最终同样还是没有撤销这几位“候选人”。

我的那些近几年来住在莫斯科的志同道合者从来都是赞

成党的总路线的，他们的公开言论都符合党的精神，可是“在自己人中间”还在说令人不能容忍的话，虽然说的不全是老调子（生活否定了1925—1927年纲领的许多“基本原则”），但还是对党的路线和领导抱有敌意。

他们耍的两面派手腕给那些把这个集团看作“权威”的人树立了榜样。

这个前“季诺维也夫分子”总部的成员碰头越来越少了，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碰头变得越来越漫无目的了。

在1933—1934年间，在我这里和加米涅夫那里几乎没有过这种碰头。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各种场合见见面（一部分是因为有些亲戚关系）。我尽力设法像过去那样去了解一切，如通过马札尔^①了解共产国际的事务（我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工作期间还通过正式渠道了解到许多事情），经济事务部分地通过戈尔舍宁来了解。

现在同加米涅夫经常谈论的是另外一些话题，谈普希金，谈文艺批评等等，并痛心地补充说：“这是我们远离政治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也互相报告“新闻”，传言，碰头的情况，交换政治看法和观感，总之都带有两面性：说许多事情干得“很棒”，很好，而许多事情干坏了，不对头，付了“学费”，等等。

对待党的领导人的态度同样也要两面派，也就是就一个党员来说实际上是持敌对的态度。

同时我们还幻想能“吸收”我们参加工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只能把我们作为一个个“单干户”吸收进来。

^① 路易·马札尔（1891—1937）——匈牙利革命运动活动家。从1928年起在共产国际机构中工作。

当然，假使问题仅限于两三个朋友之间谈谈话，假使这一切发生在真空中，假使境外的资产阶级仇恨的浪潮没有向我们涌来，假使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没有背着我们组织起来，那么这不过是两个人或几人的两面性（或两面派行为）。

但实际上，在我们实际的现实处境中，这就是对党犯了罪，这就是欺骗了党。

不管我们想不想这样做，事实上我们仍然是反对党和反对党过去和现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的总部之一。

侦查人员要求我直截了当地坦白：在莫斯科有没有前“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总部。我的回答应该是这样的：是的，是有过的，虽然还没有很成型，在近几年中也少有积极的行动，没有明确的纲领，但是是有的。这个总部在实际上当然起了反党即反革命的作用。

起初总部的成员有：我、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库克林、沙罗夫、费多罗夫，一段时间里还有扎鲁茨基^①、哈里东诺夫^②。后来在1932年总部的组成不太确定，大体上不包括后两个人。

关于莫斯科这一前“季诺维也夫分子”总部集团在不同年代存在的方式、定型的程度问题，这个集团的每个人、特别是我的个人心理、个人感受及动摇起的作用不那么重要。

侦查人员提出的问题是：有还是没有？

① П. А. 扎鲁茨基（1887—1937）——1907年入党。1917年为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为候补中央委员。1923—1928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西北局书记，列宁格勒省委书记。

② М. М. 哈里东诺夫（1887—1938）——1905年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彼尔姆省委书记，俄共（布）乌拉尔局书记，萨拉托夫省委书记。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作过。

只好回答说：有。

我再来谈谈列宁格勒的问题。

阿格拉诺夫同志向我指出，审问中当我谈到这一点时，我特别畏首畏尾，这使侦查人员特别不信任我。

是的，说得对。我过去和现在在这个问题上特别畏首畏尾，但我只请求你们理解其中的原因和表现在哪里。问题不在于我反正逃不了的惩罚的轻重，问题在于别的方面。

的确，我很害怕，面对历史我感到害怕，害怕落到杀害基洛夫的坏蛋和法西斯分子一伙的下场，落到煽动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袖搞恐怖活动的人的下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第一次审讯时起就火冒三丈，怎么能把我混同于杀害基洛夫的坏蛋呢。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

当我从对“列宁格勒总部”的起诉书（报纸上公布的）中得知一切事实后，我不得不承认对前“列宁格勒反对派”和我个人对所犯罪行（指我在以前供词中所说的罪行）负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

但这只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

坦率地说，昨天叶夫多基莫夫和我就这个问题对质时所说的一切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最能使我彻底加以思考。

近年来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组织怎么能在我对它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存在呢？

然而事实是，在我被捕和在拘留所受审前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我现在对您说的都是真话，我不知道，而且我以为它在近几年中并不存在。逃避责任对我来说为时已晚，毫无

意义，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假如我现在对您说，我知道在1933—1934年间在列宁格勒存在一个前“季诺维也夫分子”的组织，那么我说的就不是真话。

当我在1932年夏同B. 列文^①谈话时从来没涉及过什么组织、特别是列宁格勒组织的话题。但是当然我知道我对他（对列文）来说很有威信，我的反党想法会坚定他的反党想法。

我不能不知道，列文生活在列宁格勒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知道，列文在1926—1928年间起的是列宁格勒前“季诺维也夫分子”反党势力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的作用。我本应该明白，他大概也有朋友，他对他们来说也有威信，他大概把从我这儿听到的一些东西告诉了他们中的人。

从实质上说，这就意味着在1932年反党情绪在列宁格勒复活。这跟前“季诺维也夫分子”反党组织在列宁格勒的复活之间的差别当然没有多大。

当然，我在1932年夏“只”谈到思想分歧，当然，我还谈到我们不想进行组织斗争（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斗争没有指望）、我们将“只”等待时机等等的话。但是侦查人员说得对，这实际上就是在鼓励建立组织联系。

1933年我从流放地（我在那里感受很多，竭力克服我以前的反党情绪）回来后，我又抱着不能容忍的轻率的态度，没有向党揭发干反党勾当的人和事。

那时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公开作一系列表态，不是讲外交辞令，而是真正揭露我们以前的反党路线并真心拥护党

^① B. C. 列文（1897—1934）——1917年入党，1922—1926年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1924—1925年任彼得格勒区委委员，列宁格勒省委委员。后来从事经济工作。

和党的领导人；二是向党交代一切以前的反党联系，说出所有的具体的人名和细节。第一点我能办到。第二点我办不到。这就是我的主要的不幸和主要的罪过。

我现在回忆起我那时的心理，我觉得我带有某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情绪，我几乎使自己精神上也完全垮了；而我现在说的话和写的东西都是为了使别人不再怀疑过去的一切都已结束，我完全彻底地服从了党；加米涅夫也这样做，这就意味着所有听命于我们的人的一切也都将结束。当时，我和加米涅夫不止一次地谈过，看来现在要留在党内、告别背叛和疏远阶段是最后一个机会，至少我们现在要做得这样：比如说，一年后有人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问起我们的情况和表现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将说，我们说不出他们有任何坏的表现。

首先对我（和加米涅夫）的这种情绪表示不满的竟是叶夫多基莫夫。我清楚地记得，我从库斯塔奈回来后，就这个题目同他谈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我看到他的眼中流露的疑问：你这样做是当真吗？

我确实没有从组织上尝试恢复从前的一切。我“只是”逐渐又开始收集一切“新闻”。后来“只是”又开始对这个叶夫多基莫夫谈对党的领导人的许多作为的否定性评价。后来我和加米涅夫又开始详细交换听到的一切消息，并作出相应的评论。

我确实一点不知道关于1933—1934年列宁格勒的情况，除了一些偶然听来的片言只语。但是，我当然本该记得列宁格勒留下了一些人，他们跟我们走，没有放弃反党立场，大概还常常碰头，他们最后听到的关于我的消息是1932年的情

绪。

在这些年中，即在 1933—1934 年我想得最少的是以前的“失去领袖的人”（青年）。我和他们没有私下的联系。但是我知道并且不可能不知道，除他们之外在列宁格勒还有一些过去和我们交往过、至今还抱着反党情绪的人，他们大概也常常碰头。

我确实没有听说过他们在 1933—1934 年间来过莫斯科，也没有听说过有人为了从事反党活动在这些年去过列宁格勒。

当叶夫多基莫夫对我说他到过列宁格勒（我忘了是在 1933 年还是 1934 年）时，他根本没有说过他和列文或其他什么人见过面，他只是告诉我他在斯莫尔尼宫见了谁，官方的领导人和他谈了什么，已故的基洛夫问他：“你认为可以相信季诺维也夫吗？”如此等等。

但是我再说一遍，只要我愿意多少认真地想一想过去的话，我就不会不明白，在列宁格勒还有一定数量的有反党情绪的前“季诺维也夫分子”。

要结束这种状况，只有把所有那些和我有过交往、有反党情绪的人都向党交代出来。

在这一点上我的党性和责任心不够。我们（我和加米涅夫）当时很高兴，因为没有直接要求（即党和国家政权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指望这一切“不管怎么样”会自行“消失”。

列宁格勒确实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完全不同的一些事。我从谋杀基洛夫一案的起诉书中得知，正是在 1933—1934 年这些人的活动特别积极。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

因此，我确实不知道近几年中在列宁格勒存在过前“季诺维也夫分子”的组织。但是我知道并且也不能不知道在列宁格勒还有抱反党情绪的前“季诺维也夫分子”，他们大概还经常见面。

我知道，但我没有说。我知道，但我向党隐瞒了。

客观上这比我对关于几年来的组织情况一无所知具有的意义还要大。我本该向侦查人员承认，问题的关键在于后一点。

1933—1934年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的，即今天我讲话或写文章或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承认党的总路线和党的领导，而明天我却在悄悄地说我实际上反对所有这一切。

但是对过去几年的欺骗和两面派手段形成了这样的看法：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无奈，实际上他们大概想的是另一回事。

然而前“季诺维也夫分子”逐渐听到一些意见、看法和说法，他们从中断定他们确实心怀叵测。

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我真心悔过，发自内心地悔过。如果我因被指控参与针对党的领袖的恐怖活动、参与下流的法西斯暗杀（如暗杀基洛夫）而结束我的余生，这是很可悲的。但是我当然是从未想过干任何类似的事情的。

我愿意做一切事情，一切的一切，愿意帮助侦查人员揭开我和我以前的志同道合者以及我在反党（实际上是反革命）斗争中接触过的人所进行的反党斗争的全部真相。

我会讲出我记得的和我能想起的所有以前参加反党斗争的人的名字。我将尽力而为，我知道这是我的义务。

当然，我对待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同志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特别的、至为重要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用老生常谈来应付是不识时务的。

的确，那些在 1925—1927 年可能被认为是“政治斗争中个人的缺点”的东西通过后来事态的发展和 1935 年出现的情况变成了大量的诽谤。

当我和其他一些自认为“难以取代的”人成了反无产阶级倾向的喉舌甚至比这更坏的东西的时候，那些我们曾十分轻视的较为年轻的政治局委员（相对比较年轻，实际上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党资格最老的工作人员）完成了最为伟大的历史任务。这是事实。

而关于斯大林，我不必再说什么了。

把许多针对他的诬蔑不实之词、许多恶劣的声明和评述都归咎于我个人是没有道理的。这些东西或者是根本不存在，或者是“集体创造”的结晶。但是只要有过这回事就足够了，完全足够了。

现在我能够说的只有一点。假如我能向全体人民悔过，这将使我感到很大的宽慰。我要说，对于你们我是又一个例子，说明连那些伟大的人物、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也不得不迎着种种诽谤和侮辱前进，即使这些诽谤和侮辱来自一小撮丧心病狂的人，他们还是有本事给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在前进的路上设置不少障碍的。

我不想在这里说一些可能会被认为是阿谀奉承的话。任何人都不需要这样做，斯大林本人尤其如此。如果我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和听到他这位列宁的真正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继续领导苏联前进、领导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话，那么我热烈地祝愿他在这条道路上得到幸福，取得成功。

请允许我个人再说说我自己：尽管我近几年遇到了这样一些事，但在我自觉的一生中，直到最后一息我都将全身心地忠于世界无产阶级。

请其他人吸取我的沉痛教训吧，让他们认识到偏离党的道路将意味着什么，将走向何方。

假如我将再一次有机会工作的话，那么我将贡献出我的一切来赎取我的大罪。

格·季诺维也夫

1935年1月13日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7期

（高晓惠编译 何宏江校）

托洛茨基笔下的斯大林

约瑟夫·斯大林

——评 传 习 作

列·托洛茨基

1913年在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维也纳，我在斯柯别列夫的住宅里喝茶。斯柯别列夫是巴库富翁磨坊主的儿子，当时他在上大学，是我政治上的追随者；几年后他成了我的对手，当上了临时政府的部长。我们喝着芳香四溢的俄国茶，当然是在议论如何推翻沙皇制度。没有听见敲门声，但是房门忽然敞开，走进一个陌生人，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面孔黑里泛青，脸上的麻点很显眼。来人手中端着一个空茶杯。他显然没有料到会遇见我，他的目光中没有一点友好的表示。陌生人嘟哝了一声，也可以认为他是在打招呼，他走到茶炊跟前，不声不响地给自己倒上一杯茶，又不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我莫名其妙地看了斯柯别列夫一眼。

“这是我的高加索同乡朱加施维里；他刚刚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看来已经在其中起作用了。”

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模糊却非同一般。也许是后来发生的事件加深了对这初次见面的印象？否则我干脆就会把他给忘了。他突如其来的出现和消失，目光里流露出的先入为主的

敌意，含糊不清地打招呼，尤其他那难以名状的郁郁寡欢的神情，实在令人不安……几个月后我在布尔什维克的杂志上读到一篇论民族问题的文章，署名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约·斯大林。这篇文章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它尽管总的看来平淡无奇，却出人意料地不时闪烁出独特的思想和尖锐的提法。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才了解到，这篇文章是列宁授意写的，门徒的手稿经过了大师的润色。我没有把这篇文章的作者同那位在维也纳很不礼貌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的神秘的格鲁吉亚人联系起来，然而正是他4年之后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中领导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

1917年5月5日我从加拿大集中营来到革命的彼得格勒。各个革命党派的领导人当时都云集首都。我立即同我早在侨居国外时就认识的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会面，又认识了后来担任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的年轻的斯维尔德洛夫。我没有见到斯大林。没有人提起过他。那些日子的全部生活就是开会，但斯大林从未在群众大会上讲过话。在列宁领导的《真理报》上出现了斯大林的署名文章。我只随便浏览了一遍，没有查问文章的作者是何许人，显然我心里认为这是在任何编辑部里都能读到的一篇平淡的但却是有用的文章。

我无疑在党的会议上见到过他，但不曾把他和第二排、第三排的其他布尔什维克区分开。他极少发言，总是呆在不显眼的地方。7月到10月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隐藏在芬兰。我和斯维尔德洛夫并肩战斗，当研究重大政治问题时，他总是说：“必须写信给伊里奇”，而有了实际任务时，他有时表示：“必须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其他布尔什维克上层人物提起斯大林的名字时总强调他是一位必须予以重视的严肃的革命者，而不是一位领袖。

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次会议在斯莫尔尼宫列宁的办公室里举行，办公室里用未油漆的木板把电话间和打字间隔开。我和斯大林先来到办公室。从木板那边传来了德宾科浑厚的男低音；他正在同芬兰通电话，谈的话很有些柔情绵绵的味道。这位 29 岁的黑胡子水兵是个快活而自信的大个子，前不久与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关系密切起来。柯伦泰这个女人贵族出身，掌握 6 种外语，快要 46 岁了。党内有些人无疑把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尽管以前我不曾同斯大林交谈过个人问题，但他突然随随便便地走到我跟前，朝着木隔板耸动了一下肩膀，笑嘻嘻地说：

“他这是和柯伦泰，和柯伦泰在……”

我觉得他的姿态和讪笑，特别是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很不合适而且太庸俗了。我不记得我是干脆移开目光，一声不吭，还是毫无表情地说：

“这是他们的事。”

但斯大林立即感到碰了壁。他的脸色马上一变，黄眼珠里又迸发出我在维也纳时发现的那种敌意的火花。从那时起他再也不想同我交谈什么私事了。

当斯大林当上政府成员时，不仅人民群众，甚至连党内许多人都根本不知道他。他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司令部成员，因此他拥有一小部分权力。斯大林甚至在他那个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里也没有威信并且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都居于少数地位。当时还不可能发号施令，而斯大林又没有说服年轻的对手的本事。当他失去耐心时就干脆从会场上溜走。斯

大林的一名工作人员和吹捧者，部务委员会委员佩斯特科夫斯基对他那位人民委员的举动作了极为出色的描绘。斯大林说：“我出去一趟”，便从会议室溜走了，躲到斯莫尔尼宫的，后来是克里姆林宫的最隐秘的角落里去了。“几乎根本无法找到他。起初我们总是等他，后来大家就散会了。”

耐心的佩斯特科夫斯基通常一个人留下来。常常有人从列宁的办公室来电话找斯大林。

“我回答说，斯大林不见了，”佩斯特科夫斯基讲述说。但是列宁要求立即找到他。

“任务可不容易完成。我沿着斯莫尔尼宫和克里姆林宫无尽头的走廊转悠。常常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他。有几次是在水兵沃龙佐夫的住处找到他的，斯大林躺在厨房里的沙发上在吸烟斗……”

这一真实写照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揭开斯大林性格之谜的钥匙。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是他与生俱来的极端的权欲和智力潜能不足之间的矛盾。他躺在厨房里的沙发上吸烟斗，无疑是在琢磨反对派造成多么大的危害，争论多么令人受不了，要是能永远结束这一切该有多么好，等等。他当时未必指望他能达到这一目的。

* * *

约瑟夫或索索是鞋匠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家的第四个孩子，1879年12月21日生于梯弗利斯省的小城哥里。因此今年底当今俄国的这位独裁者该满60岁了。母亲生第四个孩子时才20岁，她在较富裕的邻居们的家中干活：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烤制面包。父亲是个严厉而肆无忌惮的人，菲薄的收入大部分用来买酒喝了。约瑟夫的小学同学谈到过，维

萨里昂对他的妻子和儿子态度粗暴，经常毒打他们。

“他驱走了索索心中对上帝和人们的爱，也种下了对父亲的厌恶。”

格鲁吉亚妇女在家庭中的奴隶般的地位给约瑟夫打上了终身的烙印。他后来承认了要求保证妇女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纲领。但在处理个人关系时他始终不愧是他父亲的儿子，把妇女看作下等人，只能承担一些必要而有限的职能。

父亲想把儿子培养成鞋匠。母亲的虚荣心较重，梦想自己的索索能谋得神父的职位，正像希特勒的母亲期望看到她那个阿道夫能当上牧师一样。约瑟夫 11 岁进宗教小学。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俄语，对他来说俄语始终是他学生时代在棍棒下学会的异族语言。大多数学生都是神父、官吏、格鲁吉亚小贵族的子弟。在这些边远地区的贵族中，鞋匠的儿子感到自己地位卑微。他很早学会了咬紧牙关，把仇恨深深地埋在心中。

这位未来的神父还在学校念书时期就同宗教一刀两断了。

他曾对一个同学这样说：“你知道，我们受骗了，上帝并不存在。”

革命前俄国的少男少女们小小年纪，有的甚至在童年时期就同宗教断绝了关系，这是一种明显的社会情绪。而“我们受骗了”这个说法却带有未来那个斯大林的个人印记。但是这位年轻的无神论者从宗教小学升入了梯弗利斯的宗教学校。在这里他度过了难熬的 5 个年头。从内部制度来看，宗教学校介于修道院和监狱之间。吃不饱就拼命作祈祷以求得到补偿。教育主要是实行惩罚。然而许多学生因此学会了表

面装得虔诚，免得值班僧侣发现他们的造反思想。梯弗利斯宗教学校培养出不少高加索革命者。如果说索索在这样的氛围中加入未来的密谋团体，那也并不希奇。他早年的政治思想带有鲜明的民族浪漫主义色彩。索索给自己取了个秘密工作的化名柯巴，用的是格鲁吉亚爱国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与他接近的同志们直到最近几年都这么称呼他；而现在这些同志几乎都被处决了。

年轻的朱加施维里在宗教学校比在宗教小学里更感到穷困之苦。

“他没有钱，”一个学生这样讲述说，“而我们大家却收到父母寄来的包裹和零花钱。”

因此约瑟夫更急切地向往未来。他要让他们瞧瞧！在那些年同学们就发现约瑟夫只喜欢挑别人的缺陷，不相信存在无私的动机。他善于利用他人的短处并且让自己的对手们自相残杀。谁想反对他或者哪怕是想向他解释他不明白的事，谁就会招来“不共戴天之仇”。柯巴喜欢指挥别人。

现在他开始读俄国经典作家、达尔文、马克思的著作了。约瑟夫失去对神学的兴趣后就开始沿着阶梯向下滑，终于不得不在1899年7月结业之前离开宗教学校。他在宗教学校一共呆了9年，离开学校时已是20岁的小伙子了，也就是从高加索标准看是个成年人了。他认为自己是个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母亲希望看见索索穿着东正教神父的法衣的美梦已成为泡影。

柯巴用格鲁吉亚文和蹩脚的俄文写文章，在地下印刷所干活，在工人小组中讲解剩余价值的奥秘，参加党的各地方委员会的活动。他的革命道路记载着他的如下经历：从高加

索一座座城市秘密地转来转去，多次被监禁，被流放，多次逃跑，又一次短暂的秘密工作，又一次被捕。警察局在报告中说他“……被宗教学校开除，无身份证，无固定职业，无住处。”

他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说他神情阴郁，长满胡须，不修边幅。

他解释说：“他的生活费使他不能穿得好，但是他没有保持衣着整洁的要求，这也是真的。”

柯巴的遭遇是沙皇时代外省的普通革命者的典型遭遇。然而他和他工作中的同志明显不同的一点是：在他所经历的各个阶段都有着关于他搞阴谋、违犯纪律、独断专行、诬陷同志甚至向警察局密告自己的对手等的传闻。这些事中许多无疑是捕风捉影。但是对其他任何革命者可没有人传过这类事！

1903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后，小心谨慎、行动迟缓的柯巴在一旁观望了一年半，但他最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然而他将长时期不为人知。本世纪初曾在高加索起过巨大革命作用的杰出工程师克拉辛（后来他是苏维埃国家的杰出外交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许多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姓名，但根本不提斯大林。在国外存在着列宁领导的革命中心。所有优秀的年轻革命家都与这个中心有联系，到过国外，同列宁有过书信往来。在这些书信中没有一次提到过柯巴这个名字。他感到自己是外省人，事业进展很慢，步履沉重，对周围的人很忌妒。

1905年的革命没有看重斯大林，同他擦肩而过。这一年他是在梯弗利斯度过的，那里是孟什维克的一统天下。10月

17日那天当沙皇颁布了立宪宣言时，有人看见柯巴爬在灯柱上比划着手势。那天大家都爬上灯柱。但柯巴不是演说家，在群众面前不知所措。他只有呆在秘密住宅里才有信心。

由于反动势力猖獗，群众运动一落千丈，恐怖活动就一度抬头。当时传奇式抢劫和血腥仇杀的传统在高加索还有活力，因此恐怖主义的斗争能物色到勇敢的执行者。暗杀省长、警察、叛徒；手握炸弹和手枪为革命抢劫公款。柯巴的名字同这方面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但迄今为止查无实据。政敌们显然夸大了斯大林这方面的活动。有人传说，他为了抢劫公款亲自在梯弗利斯广场上从屋顶上扔下第一枚炸弹。然而梯弗利斯袭击行动的直接参加者在回忆录中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斯大林的名字。他自己关于这一点也只字未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与恐怖活动毫不相干。他是在幕后活动；决定人选，以党的委员会的名义加以批准，而自己及时地置身一旁。这样做更符合他的性格。

柯巴在反动年代证实了自己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1912年才从外省的活动转入全国范围的活动。不错，党代表会议不同意柯巴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是列宁终于说服了中央委员会增补柯巴。从这时起这位高加索人取了个由钢这个词构成的俄罗斯化名——斯大林^①。在那个时期这样做与其说表明了一个人的特征，还不如说是表明了一个派别的特征。早在1903年未来的布尔什维克被称为“强硬派”，而孟什维克被称为“温和派”。孟什维克的首领普列汉诺夫曾讥讽地称布尔什维克是“强硬派”。列宁把这个称号看成是一种赞扬。当时有

① 俄语中 Сталин (斯大林) 这个姓是由 сталь (钢) 这个词构成的。

一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取了个化名叫加米涅夫^①，与朱加施维里取名为斯大林的原因相同。然而区别在于加米涅夫的性格中没有一点坚硬如石的东西，而斯大林的硬邦邦的化名对他的性格更合适得多。

1913年3月斯大林在彼得堡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极圈外的一个小村庄库列伊卡。1917年3月君主制度被推翻后他才返回。斯大林在这4年中自由自在，却没有写过一行字，难怪后来也就没有东西可发表。而那正是世界大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严重危机的年代。斯维尔德洛夫曾同斯大林在一个房间住过一段时间，他在给姐妹的信中写道：

“我们两个人，格鲁吉亚人朱加施维里同我在一起……小伙子不错，但在日常生活中很自私。”

从库列伊卡转移到其他地方的还有其他流放者。斯大林暴躁，虚荣心强，对别人总怀有敌意，大家都感到与他很难相处。

一位流放者后来回忆说：“斯大林孤僻，他打猎、钓鱼，几乎完全独来独往。”

斯大林打猎从不带猎枪，因为他宁愿安放捕兽夹子。当1916年开始征召壮年兵时，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流放地应召服役，但因左手僵直未被编入部队。

斯大林在监狱和流放地总共呆了8年，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竟未能在这段时间掌握一门外语。在巴库监狱里他确实有过学习德语的尝试，但终因学成无望而中途放弃，改学世界语并以世界语最有前途来自慰。在知识方面，特别是在语言

^① 俄语中 Камень (加米涅夫) 这个姓是由 камень (石头) 这个词构成的。

学方面，头脑不太灵活的斯大林总是寻求阻力最少的路线。1917年2月底（旧历）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回到彼得格勒。上一年的12月他满37岁。

* * *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认为一批年轻同志，其中包括现在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是过激的左倾分子，把他们排除在党内的领导核心之外，并采取了支持临时政府的方针。但是3个星期后列宁从国外回来了，排斥了斯大林，给党提出了夺取政权的方针。在革命时期的几个月里很难看到斯大林的活动。更有名望更有才华的人占据了前台而处处使他相形失色。他既无理论想象力，又无洞察历史的远见和预见形势的天赋。在复杂的环境中他宁可默默地等待时机。新思想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官僚机构，而这一官僚机构这时尚未得到斯大林的充分信任。

革命有自己的规律和节奏，不由分说就排除了小心谨慎、优柔寡断的斯大林。1905年的情况如此。1917年又重蹈覆辙。后来德国革命、中国革命、西班牙革命都是如此，每一次新的革命都使他惊慌失措，使他对靠机关指挥不了的革命群众暗中不满。

一些肤浅的心理学家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举止稳重的、从某一点来看是完美的纯朴的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主要的一个矛盾是：虚荣心与其才智潜能不相称。列宁的特点在于他的精神力量是和谐一致的：理论思想、实际洞察力、意志力、毅力——所有这一切在他身上结合成一个积极的整体。他能在顷刻之间不费力地把自己精神的各个方面调动起来。斯大林的意志力看来不比列宁的意志力差。但

是如果把列宁的智力算作1，那么斯大林的智力大概只相当于10—20%。而斯大林本人的智力中比例又不一样：实际洞察力和心计特别发达，但概括力和创造性想象力差。推动他这个革命者的主要动力从来就是对这个世界上的强人的仇恨，而不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而这种同情心却使列宁这个人的形象显得高尚而可亲。其实列宁也会仇恨。

斯大林感到比起其他任何时期来十月革命时期他向上爬的努力更是一再受挫。总有一人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中纠正他的错误，使他相形失色，退居一旁。他的虚荣心像长在身体上的脓包叫他坐立不安，使他对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杰出人物无端猜疑，心存忌妒，因此他们的关系逐渐恶化。他在政治局中几乎总是沉默寡言，神色阴郁。只有在粗野的、果敢的、互相不抱成见的人群中他才变得温和而合群一些。在监狱中他同刑事犯比同政治犯处得好。

粗暴是斯大林固有的特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把这一特性变成了自觉的手段。头脑简单的人往往以为粗暴是一种真诚的表现。“这个人不好猜，他心里想的全部抖搂出来了。”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效果。同时，一旦涉及斯大林本人，他总是极为感情用事，心眼很小，非常任性。只要他感到自己受排挤，就转过身子，坐在角落里，猛抽烟斗，阴沉沉地一言不发，琢磨着如何进行报复。

斯大林在斗争中从不反驳批评，而是马上把批评的矛头转向对方，而且批评得最粗暴，毫不留情。罪名越大越好。一位批评家说，斯大林的政策违背了人民的利益。斯大林回答说：我的敌人是法西斯的雇佣间谍。人们大吃一惊，但不会认为这是弥天大谎。心理学教科书可以大胆地把莫斯科审判

案所使用的这种手段称作“斯大林反应”记载下来。

革命的头几年克里姆林宫内生活非常简朴。1919年我偶然了解到人民委员会的合作社出售高加索酒，于是我建议把酒拿走，因为当时禁止买卖酒精饮料。

“如果前线听说克里姆林宫有人喝酒，那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对列宁说。

说话时斯大林也在场。

他生气地说：“我们高加索人没有酒喝怎么行？”

“瞧，格鲁吉亚人决不能没有酒喝！”列宁开玩笑似地接着说。

我不战而降。

克里姆林宫像整个莫斯科一样住房不够，因此争夺住房的大战不断。斯大林想把自己的过于嘈杂的住所换成一处较安静的住所。肃反委员会的代表别连基建议他搬进克里姆林宫的正房。我的妻子有9年主管博物馆和历史文物，她不同意这样做，因为博物馆应保护克里姆林宫。列宁写了一封长信开导她，信中说可以把宫内一些房间里较贵重的家具搬走并采取一些保护房屋的特别措施；斯大林需要一处能安心睡觉的住所；他现在的住房应该让年轻同志住，年轻人即使在炮声轰鸣时也能睡着等等。但是博物馆的女保管员不同意这些理由。列宁指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委员会认定宫殿不适合用作住所。结果是好说话的谢列布里亚柯夫把自己的住所让给了斯大林，但17年后斯大林枪决了他。

我从未去过斯大林的住所。但法国作家昂利·巴比塞在去世前不久写了两本传记，即耶稣·基督传和约瑟夫·斯大林传，他详细地描述了克里姆林宫的一幢小楼房，独裁者简

朴的住所就在二层楼上。斯大林的逃到国外的原秘书巴扎诺夫对巴比塞的话作了补充。住所的门口一直站着—个哨兵。在小小的前厅里挂着主人的军大衣和军帽。三间屋子和厨房里的家具都很简单。他同第一个妻子生的长子雅沙很长一段时间都睡在饭厅里晚上当床用的沙发上……但雅沙当上工程师后，离开父亲家已经有几年了。

从前早餐和午餐都由人民委员会食堂送来；但最近几年因为怕有人放毒就开始在住所里做饭。如果主人的情绪不佳（这是常事），饭桌上大家就都不说话。

巴扎诺夫说：“他在家里面然是个暴君。整天价摆着架子不说—句话，不回答妻子和儿子的问题。”

早餐后—家之主坐到靠窗的沙发上吸烟斗。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电话铃声不断。

“柯巴，莫洛托夫叫你，”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说。

“告诉他，我在睡觉。”斯大林当着秘书的面这样回答说，无非是为了表示他对莫洛托夫的蔑视。

从国内战争起斯大林为了显示自己同军队的关系，总是穿—身军装：高筒靴、军上衣和咔叽裤。“从未见过他穿别的衣服，只有夏天才穿—件白麻布衣。”

这里讲到前厅、军大衣和皮靴，我们可以承认巴比塞的见证是权威性的。

克里姆林宫里晚间汽车吵得让人不能入睡。最后作出决定：晚上 11 时后汽车只能停在拱门附近，因为从这里起就是住宅楼了；再往前走大家就得步行。但是不知谁的汽车继续违反规定。我夜里 3 点钟被吵醒（这不是第—次）后就站在窗前等到那辆车开回来时叫住司机：

“难道你不知道作过决定吗？”

“知道，托洛茨基同志。”司机回答说，“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快到拱门时斯大林同志吩咐我继续往前开！”

除了克里姆林宫里的住所，斯大林在哥尔克还有一所别墅，列宁曾在这所别墅里住过，后来斯大林把列宁的遗孀从那儿赶走了。别墅的一幢房子里设有电影银幕。另一幢房子里摆了一台用来满足主人的音乐需求的贵重乐器——自动钢琴。另外一架自动钢琴摆在他的克里姆林宫住所里。看来他的生活不能长期没有艺术。他休息时就玩八音盒，欣赏《阿伊达》^①的乐曲。他在音乐上就像在政治上一样，宁愿要一个听话的机关。在那个时期苏联作曲家把玩两架自动钢琴的独裁者的每个指示都当成法令。

1903年斯大林24岁，与一个文化不高的格鲁吉亚姑娘结婚。据他童年时代的伙伴回忆，这次婚姻是幸福的，因为妻子“接受过女人必须侍候丈夫的神圣传统的熏陶”。当丈夫参加秘密集会时，这位少妇总是在虔诚的祈祷中度过漫漫长夜。柯巴对妻子的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容忍，是因为他并不需要妻子成为能同意他的观点的挚友。年轻的妻子于1907年死于肺病或者肺炎，按东正教仪式为她举行了葬礼。她留下的男孩10岁前一直在梯弗利斯由亲戚监护，后来送到克里姆林宫。我们经常看见他和我家的儿子们呆在一起。他愿意呆在我们的住所里，不愿跟父亲在一起。我在自己的文件中发现了妻子的下面的记录：

“雅沙这个男孩大约12岁，一张娇嫩黝黑的小脸，一对

①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创作的歌剧（1870年）。

闪着金光讨人喜欢的黑眼睛，纤细的身材小巧玲珑，人们说他活像得肺病死去的母亲。他的言谈举止非常温和。雅沙曾对他的好朋友谢廖沙说，他的父亲看见他吸烟就对他严厉处罚，狠狠地揍他。‘但是无论他怎么揍，烟我照常吸。’谢廖沙还告诉我说：‘你可知道，雅沙昨天晚上—夜和哨兵一起呆在走廊上，因为他身上有烟味，斯大林把他赶出了住所。’”

有一回我看见雅沙在男孩子的房间里，手里拿着一支烟。他不自在地笑了。

“吸吧，吸吧！”我安慰他说。

“我爸爸是疯子，”他说得很肯定，“自己吸烟，却不让我吸。”

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布哈林看来是在1924年告诉我的另一件事，当时他同斯大林的关系很密切，对我也非常友好。

“我刚从柯巴那儿回来，”他对我说，“你可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他把一岁的儿子从小床上抱起来，吸足了一大口烟就往孩子的脸上喷……”

“你胡诌些什么呀！”我打断了他的话。

“上帝保佑，我说的是真话！上帝保佑，确实如此，”布哈林带着他独有的天真神情急忙反驳说，‘婴儿呛得咳嗽，就大哭起来，但柯巴却哈哈大笑说：‘不要紧，身体会长得更结实……’”布哈林模仿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口音说话。

“这可真野蛮？！”

“你不了解柯巴，他这个人不寻常……”

看来性格温和的布哈林对斯大林的粗野倒有些好感。不能不承认，这个父亲确实“不寻常”，他用烟味来“锻炼”小儿子，对大儿子却相反，不许他吸烟，并且采用的是鞋匠维

萨里昂当年用来对付他的那套教育手段……埃米尔·路德维希担心在克里姆林宫里遇见一位傲慢的独裁者，但据他本人所述，实际上他却遇见了一个他乐意“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他管教”的人。这说得是否太急了？尊敬的作家最好别这么干……

斯大林第二次结婚，娶了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她的父亲是俄国工人，母亲是格鲁吉亚人。娜捷施达生于1902年，革命后在列宁的秘书处工作，国内战争时期在斯大林所在的察里津前线工作。当时她才17岁，而斯大林40岁。她是个非常可爱而谦逊的姑娘。她进工业学院学习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当斯大林领头开始对我迫害时，阿利卢耶娃见到我的妻子后表现得倍加关心。可见她感到自己与被迫害者更亲近。1932年11月9日阿利卢耶娃突然身亡。当时她年仅30岁。苏联报纸对她突然身亡的原因保持沉默。在莫斯科人们私下传说她是开枪自杀的，对她的死因传说不一。一次在伏罗希洛夫家中的晚会上，所有的大人物都在场，她勇敢地批评了造成农村饥荒的农民政策。斯大林用俄语中最脏的话大声骂她。克里姆林宫的女仆发现阿利卢耶娃在回自己的住所时非常激动。不一会儿从她的房间里传出了枪声。斯大林收到许多慰唁，后来又恢复了正常生活。

很受欢迎的俄国作家阿菲诺格诺夫1931年写了个剧本，其中谈到，如果对100个公民进行调查，那么其中80个都有恐惧感。在血腥的大清洗年代其余20%中的大部分人也有同感。促使斯大林本人奉行这样的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他对自己造成的恐惧现在感到恐惧了。斯大林本人不是胆小鬼，但他的政策却反映了特权暴发户阶层对自己的未来的恐惧感。斯

大林从来不相信群众，他现在害怕他们。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这是官僚们惧怕战争必然导致的后果。这个联盟是可以预测到的，外交家们只需适时地换上一副眼镜就可以办到。本文作者也预测到这一联盟必然出现。但是外交家先生们也像普通人一样总认为**近乎情理**的预测比**准确的**预测强。其实在我们这个疯狂时代**准确的**预测多半不近乎情理。只有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同法国、英国、甚至同美国结盟才会对苏联有利。然而克里姆林宫最希望避免战争。斯大林知道，假如苏联同民主国家结盟，那他将会赢得战争的胜利，但在取得胜利的同时无疑会削弱或者抛弃寡头政治。克里姆林宫的任务不在于找到获取胜利的同盟者，而在于避免战争。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同柏林和东京友好。这就是斯大林从纳粹得势以来所坚持的出发点。

不能不看到，斯大林喜欢的不是张伯伦，而是希特勒。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看到元首不仅具有他具有的一切，而且还具有他欠缺的一切。希特勒好坏是一位发动大运动的首创者。他的思想无论多么可鄙，却团结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一个以世界前所未见的力量武装了自己的领袖的党就是这样发展壮大的。今天希特勒集首创精神、背信弃义和癫痫病于一身，一心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和面貌来改造我们的星球。

斯大林这个人物和他的生活道路却不是这样的。不是斯大林创造了机关，而是机关创造了斯大林。然而机关像自动钢琴一样是死的机器，不能进行创造。官僚制度贯串了庸庸碌碌的习性。斯大林是官僚制度最突出的庸庸碌碌的典型。他之所以力量强大，是因为他比别人更顽强、更坚决，更无情地表达了统治阶层的自我保护的本能。然而他的弱点也正是

在这里。他没有远见。从历史角度来看他鼠目寸光。他是杰出的策略家，但不是战略家。在1905年和1917年进行的上一次战争中他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斯大林对自己的庸碌无能心里一直是明白的。因此他才要求别人对他阿谀奉承。因此他才忌妒希特勒，暗自崇拜希特勒。

据苏联在欧洲的间谍活动的原领导人克里维茨基说，希特勒1934年6月对他的党的清洗给斯大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才是领袖，”莫斯科的这位不慌不忙的独裁者对自己这样说。从那时起他显然在模仿希特勒。苏联的血腥大清洗、“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闹剧以及现在对波兰的入侵——这就是那个蓄着查里·卓别林式的胡子的德国天才给斯大林的教诲。

克里姆林宫的辩护士们，有时也包括它的敌人们试图把斯大林—希特勒联盟与1918年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相提并论。这种相提并论简直是一种嘲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是在全人类的面前公开进行的。当时苏维埃国家连一个有战斗力的营也没有。德国进攻俄国，侵占了苏俄的不少地区和军用储备。莫斯科政府除了签订和约就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尽管我们自己公开称这一和约是手无寸铁的革命对强大的掠夺者的**投降**。因此这里根本谈不上是我们对霍亨索伦的什么援助。至于现在的条约，那是在有几百万苏军的情况下签订的；这个条约的直接任务是减少希特勒摧毁波兰的困难；最后，红军在“解放”800万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名义下进行的武装干涉导致2300万波兰人受奴役。这种比拟揭示的不是相似，而是直接的对立。

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侵占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来首先使居民由于令人痛恨的与希特勒的联盟产生的爱国心得到满足。但斯大林一如既往，入侵波兰也有自己个人的动机，即复仇的动机。1920年未来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率红军攻打华沙。未来的元帅叶戈罗夫攻打伦贝格。与叶戈罗夫一道出征的是斯大林。后来当获悉图哈切夫斯基在维斯瓦河有遭到回击的危险时，莫斯科司令部命令叶戈罗夫从伦贝格方向折回卢布林去支援图哈切夫斯基。但斯大林担心图哈切夫斯基夺取华沙后再从他的手中“抢走”伦贝格。叶戈罗夫凭借斯大林的威望没有执行大本营的命令。4天以后，即当图哈切夫斯基完全陷入绝境时，叶戈罗夫的队伍才转向卢布林。但为时已晚，灾难无法收拾了。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都清楚图哈切夫斯基惨遭溃败的罪魁祸首是斯大林。今天入侵波兰和夺取伦贝格是斯大林对1920年遭到惨败的报复。

然而战略家希特勒显然比策略家斯大林强。希特勒通过波兰战役把斯大林捆在自己的战车上，使他失去机动的自由；使他威信扫地，并且顺手打击了共产国际。谁都不会说希特勒变成了共产党人。大家都说斯大林变成了法西斯的代理人。然而斯大林即使用建立丢脸的叛卖性的联盟为代价也换不到主要的东西——和平。无论中立的规则多么严格，但是没有哪一个文明国家能摆脱世界气旋的影响。而苏联最不走运。在每一个阶段希特勒都将向莫斯科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今天他把“大乌克兰”交给莫斯科的朋友暂时代管。明天他又将提出谁来当这个乌克兰的主人的议题。斯大林也好，希特勒也好，都撕毁了许多条约。他们之间的条约能维持许久吗？当各国人民中了毒气在抽搐时，联盟义务的神圣性显然是微不

足道的偏见。“自寻生路”这句话将成为各国政府、各个民族和各个阶级的口号。莫斯科和寡头政治倒可以不经令其心惊胆战的战争。然而斯大林的堕落却拯救不了像十足的梦游症患者一样冲进深渊的希特勒。

希特勒即使有斯大林帮忙也不可能达到改造我们星球的目的。我们的星球将由其他人来改造。

1939年9月22日于考约阿康

克里姆林宫的超级博贾^①

列·托洛茨基

致《生活》杂志编辑

尊敬的阁下：

您读了我为贵刊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后说我是斯大林的“宿敌”。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政治上我和斯大林早就属于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两个营垒。然而某些人总是说我“仇恨”斯大林并且武断地认为，凡是我所写的涉及莫斯科那个独裁者和苏联的一切都贯串了这种感情。我侨居国外近10年中克里姆林宫的笔杆子们一贯认为没有必要对我所写的有关苏联的文章作认真的答复，并且为了方便起见一味推说是因为我“仇恨”斯大林。已故的弗洛伊德对于这种廉价的心理分析是

① 切萨雷·博贾（约1475—1507）——罗马涅（意大利）的统治者（1499年起）。

严厉的。仇恨毕竟是一种个人关系的形式。而且促使我和斯大林决裂的是那些早已把个人恩怨付之一炬、化为灰烬的火辣辣的事件。仇恨包含着忌妒的成分。而我认为，也感到对斯大林的少见的吹捧是最彻底的堕落。斯大林是我的敌人。然而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我的敌人。现在我对斯大林就像对希特勒、佛朗哥或天皇那样都没有太多“仇恨”了。我为了更好地同他们作斗争，首先要努力去理解他们。

在重大历史问题上个人恩怨总是微不足道、令人鄙弃的感情。这种恩怨不仅使人变得渺小，而且使人丧失理智。而鉴于苏联国内和世界舞台上最近的事态，甚至许多敌人都确信我并非眼力不济，因为准确的恰恰是我的那些曾被认为是最不近乎情理的预测。

为了提出忠告，这几句开场白尤为需要，因为这一回我将要谈的是一个特别尖锐的题目。在第一篇文章中我试图根据我对斯大林的近距离观察和对他的生平的详细研究给他一个总的评述。我不否认，最后得出的形象是阴暗的，甚至是可怕的。但是面对这几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清洗”，闻所未闻的指控，莫须有的审判，对老一辈革命家、军队指挥员、苏联的老外交官、优秀专家等的消灭，以及最近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的手腕……面对这些震惊人类的事，又有谁能拿出另一个更富有人性的形象来呢？在这第二篇文章中我想谈谈一个外省的革命者变成一个大国的独裁者的经历中的某些非同寻常的事实。这篇文章中的观点以及我在文章中提出的怀疑不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因为这些想法我以前就有过，而我一再排除这些念头，以为这些都是由于我过分猜疑而产生的。然

而莫斯科审判暴露了克里姆林宫的这位独裁者在背地里搞骇人听闻的阴谋、栽赃陷害、弄虚作假、毒死和暗杀政敌，从而也揭开了过去的年代令人心惊胆战的真相。我开始更固执地一再问自己：斯大林在列宁生病期间真正起的作用是什么？这位学生未曾采取过加速导师死亡的措施吗？我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提出这种怀疑多么荒唐。但如果这样的怀疑是根据情况，根据事实，特别是根据斯大林的性格得出的，那又该如何呢？1921年列宁忧心忡忡地提出警告说：“这位厨师只烧辣菜。”

其实岂止是辣菜，而且是下了毒的菜，说下了毒并非指这个词的转义，而是指这个词的本义。两年前我第一次把当年（1923—1924年）只有7—8个人知道的一些事写成材料，当然只能说写了一部分。这些人中活着的现在除了我只剩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如果说莫洛托夫属于知情人（对此我没有把握），那他们俩都不可能把我打算第一次在本文中谈的事告诉别人。我还得补充一点，我提到的每一件事实、引用和摘录的每一段文字，要么有苏联官方出版物作为依据，要么有我收藏的文件作为依据。关于莫斯科审判我已经向约翰·杜威博士的委员会作了书面的和口头的说明，并且我所提供的数百个文件没有一件有人提出异议。

列宁与斯大林 最后的斗争与决裂

在近几年创作的数量繁多的（我们暂且不提质量）肖像集中列宁和斯大林总是形影不离。他们并肩坐着，交谈着，亲

热地相互注视着。这一画面之所以没完没了地在绘画、雕塑中以及银幕上一再出现，无非是基于一种愿望，即要人们忘却一个事实：列宁晚年一直同斯大林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且这场斗争以他们之间的彻底决裂而告终。列宁在斗争中始终没有夹杂一点个人恩怨。他无疑对斯大林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特点评价很高，如性格坚定，作风顽强，斗争无情，手腕高明，因为这些都是斗争因而也是党的司令部所必需的品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越来越多地利用了他的职位为他提供的那些可能性来网罗忠于他个人的人，报复对手。

斯大林 1919 年领导检查人民委员部后逐渐把这个机构也变成了他拉帮结派搞阴谋的工具。他把党的总书记处变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荣华富贵的源泉。他的任何行动都有着私心杂念。列宁逐渐作出了如下结论：斯大林的某些性格特点加上他掌握的机关，已成为对党的直接威胁。因此列宁才决定把斯大林调离机关，只让他担任一般的中央委员。列宁当时的信件现在在苏联是最绝密的文件。然而其中有不少由我收藏，其中的一部分我已经公开发表了。

1921 年底列宁的健康急剧恶化。第二年 5 月他第一次中风。在两个月中他既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和写字。从 7 月开始他又慢慢康复，10 月他从乡下回到克里姆林宫并重新工作。他确实为官僚主义、专横行径和阴谋活动在党和国家机关中的滋长所震惊。12 月他对斯大林在民族政策方面，特别是在不愿承认总书记权威的格鲁吉亚的问题上采取的压制作法开了火。列宁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意见并草拟了给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列宁的秘书们根据他本人的说法把这一行动称之为“投向斯大林的一枚炸

弹”。1月23日他提出了关于建立旨在限制官僚权力的工人监察委员会的计划，着实让总书记吓了一跳。

3月2日列宁写道：“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①等等。

领导检察院的是斯大林，因此他很清楚这样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12月中旬（1922年）列宁的健康再度恶化。他不得不放弃参加各种会议而只通过写便条和打电话来同中央委员会联系。斯大林立即试图利用这一时机，向列宁隐瞒党的书记处所掌握的情况。封锁消息的措施是针对与列宁最接近的人们的。克鲁普斯卡娅尽了一切努力，不让病人受到来自书记处的恶意打击。但列宁善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恢复事情的全貌。

“不要使他激动不安！”医生们这样叮嘱说。

说来容易，做起来却不容易。列宁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与外部世界隔绝，焦急和气愤使他非常痛苦。造成不安的主要根源是斯大林。医生们对列宁的健康情况的看法越不好，总书记的行动就越大胆。那些天斯大林总是阴沉着脸，紧紧地咬着烟斗，一双发黄的眼睛很吓人；他不回答任何问题，只是不停地骂人。事关他的命运。他决心不顾一切。他终于与列宁彻底决裂了。

对斯大林颇有好感的原苏联外交家德米特列夫斯基像总书记身边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叙述了这一戏剧性的情节。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1页。

“克鲁普斯卡娅没完没了的纠缠早已使斯大林厌烦透了，当她又一次打电话到村里问斯大林一些情况时，斯大林……用最下流的话把她痛骂了一顿。克鲁普斯卡娅立即哭着跑去向列宁告状。列宁的神经早已被阴谋活动搞得极度紧张，这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克鲁普斯卡娅急忙把列宁的信寄给了斯大林……克鲁普斯卡娅兴高采烈地对加米涅夫说：‘你是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如果他不认为有必要在政治上打垮斯大林，那他是永远不会同斯大林断绝个人关系的。’”

克鲁普斯卡娅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一点也不“兴高采烈”；正相反，这个极其真诚而文雅的女人被发生的事情吓坏了，心情很坏。说他向列宁告斯大林的状不是事实，正相反，她尽可能地起着缓冲器的作用。但是对列宁一再提出的问题她也只向他转达书记处告诉她的内容（斯大林把最要紧的事隐瞒了）。

那封提到断绝关系的信，确切地说那是一张几行字的便条，是3月5日向受到信任的女速记员口授的，这封信冷淡地宣布同斯大林断绝“一切个人和同志关系”。这张便条是列宁身后留下的最后一个文献，同时也是列宁同斯大林之间关系的最后总结。就在那天晚上列宁又一次失语。

事隔一年，当列宁陵墓已经竣工时，正如德米特列夫斯基的叙述相当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公开要克鲁普斯卡娅承担断绝关系的责任。斯大林指控克鲁普斯卡娅对他搞“阴谋”。经常执行斯大林的模棱两可的命令的小有名气的雅罗斯拉夫斯基，1928年7月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

“他们发展到胆敢向病中的列宁告状，说斯大林欺负了他们。可耻啊！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把个人关系同政治搅在一

起……”

“他们”，这是指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得罪了斯大林，使她遭到了疯狂的报复。而克鲁普斯卡娅本人向我讲了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对斯大林极不信任的事：

“沃洛嘉说：‘他（克鲁普斯卡娅没有说出名字，而是用头朝斯大林的住所那边点了一下）没有起码的诚实，最普通的人的诚实……’”

所谓列宁“遗嘱”，即列宁关于党的领导组织的最后意见，是他第二次发病期间，即1922年12月25日和1923年1月4日分两次写成的。

遗嘱中说：“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①

10天后列宁感到这个克制的提法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一句话：

“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一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②

列宁努力使自己在评价斯大林时尽量不说伤人的话。但仍然提出要把斯大林从唯一能为他提供权力的职位上调开。

在此前的几个月中发生了那些事件之后，这个遗嘱并不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但他仍然把这个遗嘱看作是对他的残酷打击。当他第一次读了克鲁普斯卡娅请他转交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信时，他用肮脏下流的但是却反映他当时对“导师”的真实感情的语言大骂列宁，当时在场的有他的秘书，现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② 同上，第340页。

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梅赫利斯，还有现在已从舞台上消失的著名苏联活动家瑟尔佐夫。斯大林的另一位前秘书巴扎诺夫描述了加米涅夫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宣读遗嘱时的情形：

“所有到会的人都感到十分难堪。坐在主席台的台阶上的斯大林感到自己渺小而可怜。我仔细地观察他；尽管他能够自制并且表面显得镇定，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关系到他的命运的问题……”

在这次难忘的会议上拉狄克坐在我的旁边，他俯身对我说：“现在他们不敢攻击你了。”

他指的是这封信的两处，一处说托洛茨基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①，另一处是要求把斯大林调开，因为他粗暴，不够谦恭和爱滥用权力^②。我回答拉狄克说：“正相反，现在他们要干到底了，并且要尽快地干。”

确实如此，遗嘱不但没有实现列宁关于停止内部斗争的要求，而正相反，急剧加速了这一斗争。斯大林再也不怀疑，列宁恢复工作就意味着“总书记”政治上的毁灭。相反，只有列宁死去才能为斯大林扫清道路。

“老头子很痛苦”

在列宁第二次病倒后，大概是1923年2月在一次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本文作者）的会议上，斯大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② 同上，第340页。

林在秘书退席后通报说伊里奇突然把斯大林叫到身边要求给他拿毒药。他又不能说话了，对自己的病已感到绝望，预料又快要再次中风，不相信医生的话，很容易就抓住了他们说法的矛盾；他的思维完全清楚，痛苦异常。格季耶是我们共同的医生，又是我家的朋友，因此我能通过他天天了解列宁的病情发展。

“费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难道就完了吗？”我和妻子不止一次地问他。

“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重新站起来的，因为他的体质很强。”

“但他的智力呢？”

“基本上没有变化，有可能，不是每一个音调都会像原来那样准确，但巨人终归是巨人。”

我们继续抱着希望。所以一听说表现出生存本能的列宁要服毒，不免感到突然。那他的内心该有多么痛苦啊！

我记得，我当时感到斯大林的面色很不正常，很难捉摸，与当时的情景不相称。他转达的是一个悲剧性的请求。他的脸却一直似笑非笑，活像戴了一副面具。过去也常见他的面部表情和他的言语不一致。但这一回却令人无法忍受。尤其可怕的是，斯大林对列宁的请求根本不表态，好像在等别人说话；他是否是想捉住别人反应的细微差别，而自己又不受其束缚呢？还是他自己有着不可告人的想法？……我望着坐在我面前的两个人，一个是真心爱着列宁的加米涅夫，他一言不发，面色苍白；一个是在任何紧要关头都表现得惊慌失措的季诺维也夫。他们是否在开会前就知道了列宁的请求？或者斯大林对自己三人联盟的成员也搞了突然袭击？

“不用说，根本不可能执行这个请求。”我大喝一声，“格季耶没有失去希望。列宁会康复的。”

“我把这些话都对他说过的。”斯大林不无懊恼地说，“他把手一挥，老头子很痛苦。他说想要点毒药放在身边……如果确信自己的病已无法治愈，就服毒。”

“反正不行。”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好像这次季诺维也夫也支持我，“他会因一时冲动而走出无法挽回的一步。”

“老头子很痛苦。”斯大林又重复了一遍，还像方才一样不表示意见，目光毫无表情地看着我们。看来他说话时脑子里有许多想法，但他想的同说的完全不一致。后来发生的事件当然可能影响我记清细节，但我总的来说是习惯于相信我的记忆力的。而这个情节本身是一件永生难忘的事。况且我在回家后详细地告诉了妻子。每当我回想起这个场面时，我不能不一再对自己说：斯大林的行径、他的整个形象都难以捉摸，令人生畏。这个人要干什么？为什么他不从自己的面具上抹去这个奸笑……当时没有进行表决，也不是正式会议，但我们散会后都作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那就是毒药绝对不能给。

这里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列宁在这一时期对斯大林的怀疑很大，那他怎么会对斯大林提出这样的请求呢？（乍乍看起来，是要对他本人有高度的信任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的）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在向斯大林提出请求的前几天，列宁对遗嘱作了无情的补充。又过了几天，在他向斯大林提出请求之后就同他断绝了一切关系。斯大林本人也不能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列宁恰恰向他提出了请求？谜底很简单：列宁认为斯大林是唯一能执行这一悲剧性请求的人或者执行

这一请求对他有好处的人。病人准确的嗅觉猜出克里姆林宫内外正在发生什么事，猜出斯大林对他抱有什么样的真实感情。列宁甚至不必动脑子去逐个地想那些与他最亲近的同志，就能断定：除了斯大林，没有人能为他提供这样的“服务”。可能他想顺便考验一下斯大林，这位烧辣菜的能手究竟如何迅速地利用已经出现的机会呢？在那些日子里列宁不仅考虑死的问题，而且还考虑党的命运。列宁的革命神经无疑是最后才向死神屈服的一根神经。然而现在我却向自己提出另一个、走得更远的问题：列宁果真向斯大林提出过要毒药的请求吗？斯大林是否为了将来能开脱自己而臆造了这一套说法呢？他根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去核实，因为我们三个人当中谁也不会去问病中的列宁，他是否真的向斯大林要过毒药。

毒药实验室

柯巴早在青年时期便暗地里煽动牢房中的个别性情暴躁的高加索囚犯去整他自己的对手，毒打他们，有一次甚至酿出了人命。他的技艺日进。独揽大权的党机关和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关为他提供了连他的先辈如切萨雷·博贾之流做梦也未曾想过的机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查员进行惨无人道的审讯的办公室与斯大林的办公室有送话器相联。嘴里叼着烟斗的、隐身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贪婪地听着他预先安排好的谈话，满意地搓着手，哑然失笑。在有名的莫斯科审判前10多年，一个夏天的傍晚他站在别墅的凉台上举着一瓶酒对他当时的盟友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说了心里话，他认为生活中最大的享受就是敏锐地发现敌人，精心作好一切准备，毫

不留情地予以报复，然后去睡觉。现在他正在向整个一代布尔什维克报复！这里也不必再提莫斯科栽赃诬陷的审判了。这在当时已经得到了权威性的全面评价¹。但是要了解斯大林的真面目和列宁病中以及去世前后斯大林的行为方式，那就必须对1938年3月炮制的最后一个大审判案的某些情节作一番说明。

坐在被告席上的亨利希·亚戈达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了16年，起初担任副手，后来任局长，一直与“总书记”有密切联系，是“总书记”同反对派作斗争时最信任的心腹。那一套承认莫须有的罪名的做法，如果不是他发明的，那也是他亲手贯彻的。1933年斯大林授予亚戈达列宁勋章、1935年天才的图哈切夫斯基被授予红军元帅称号后刚过两天，亚戈达被晋升为国防总政委，即政治警察元帅。亚戈达代表的是臭名远扬的、不齿于人类的小人。老革命家都愤怒地面面相觑。甚至驯服的政治局中也有人试图反抗。但令人感到有某种神秘的东西永远把斯大林和亚戈达联系在一起。然而神秘的联系却被神秘地切断了。斯大林在大“清洗”时期决定顺便把知道内情太多的同伙干掉。1937年4月亚戈达被捕。斯大林这样做，像往常一样，得到了某些额外收获：亚戈达由于得到了宽大处理的许诺而在法庭上对一切罪行都承担了个人责任，而人们本来怀疑这些罪行都是斯大林犯下的。许诺当然没有兑现，亚戈达被处决了，这是为了更有力地证明斯大林在道德和权利问题上决不调和。

1 见约翰·杜威博：《委员会出版的“列夫·托洛茨基审判案”，1937年；《没有罪》，1938年，哈伯兄弟出版社。

然而法庭审判却暴露了使人深受教育的一些情况。根据亚戈达的秘书和代理人布拉诺夫（这个布拉诺夫于1929年把我和我的妻子从中亚送到土耳其）的供词，亚戈达有一个专门存放毒药的柜子，如果有需要他就从柜子里取出贵重的小药瓶，交给他的代理人并作相应的指示。顺便说一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原是药剂师，对毒药尤其感兴趣。他手下有几个毒物专家，他为这些专家造了一个专门实验室，而对这个实验室的拨款是不受限制，也不受监督的。不言而喻，根本不能设想亚戈达建立这么一个机构是用来满足他自己的个人需要的。这一回他也是在履行官方职能。他像尼禄^①宫中的老太婆洛库斯塔一样是个放毒犯，一个作出反应的工具。他只不过在技术方面远远超过了能干尽坏事的前辈！

与亚戈达并排坐在被告席上的是4个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他们被指控杀害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两个苏联部长。

“我承认自己犯了罪”一度曾担任过我的医生的德高望重的列文招认，“我采取了完全不对症的治疗方法……”从而“……我导致马克西姆·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早逝”。

在进行审判的那些日子里谎言满天飞，我感到那些所谓毒死年迈多病的作家的指控纯属无中生有。后来我了解到的情况和我对许多情况所作的较认真的分析都使我改变了这种评价。在审判过程中并非一切都纯属谎言。有被毒害者就有放毒者。不是所有的放毒者都坐到了被告席上。他们的头子在用电话指挥审判。

马克西姆·高尔基既不是密谋家，也不是政治家。他是

^① 尼禄（37—48）——罗马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皇帝。

一位富于同情心的老人，是蒙冤受屈者的保护人，是好动感情的抗议者。从十月革命之初起他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饥荒肆虐，不满和镇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表示抗议的有大官，甚至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也不例外。在这样的气氛中高尔基是一大危险。他与欧州的作家们有通信往来，国外人士访问他，蒙冤受屈者向他诉苦，他也制造了社会舆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强迫他保持沉默。而要逮捕他，驱逐他（更不要说枪杀他），那是更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亚戈达之手用“不流血”的办法赶紧除掉病中的高尔基，必定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想到的唯一出路。斯大林的脑袋瓜就是这么长的，这类决定像条件反射一样在他头脑中出现。

亚戈达接到命令后便去找“自己的”医生。他不担任何风险。据列文说，拒不执行无异于“我们的毁灭，也就是我和我全家人的毁灭”。“逃不出亚戈达之手，亚戈达决不手软，他一定会把你从地底下拖出来。”

然而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的那些有权威的、德高望重的医生不向政府的成员们，也就是向他们很熟悉的病员报告呢？仅列文医生一个人的病员名单上就有24个高级官员，直到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委员！原因是，列文与克里姆林宫内和周围的人一样都很清楚，亚戈达是谁的代理人。列文听从亚戈达，因为要反抗斯大林他可是无能为力的。

关于高尔基有不满情绪，想逃往国外，关于斯大林拒绝发给他出国护照一事，在莫斯科人们都知道，议论纷纷。作家死后人们立即开始怀疑，是斯大林给大自然的破坏力帮了一把忙。审判亚戈达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排除人们对斯大林的

怀疑。因此亚戈达、医生们以及其他被告才会反复说高尔基是“斯大林的亲密朋友”、“得到信任的人”、斯大林主义者”，他完全拥护“领袖”的政策，对领袖的作用“热烈赞扬”。假如这些话哪怕有一半是真的，亚戈达就根本不敢去毒死高尔基，更不敢把这样的计划托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因为只要这位医生给斯大林去一个电话就会要了亚戈达的命。

我们从一次审判中了解到一个“细节”。审判多得很，“细节”更是不计其数。它们都被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斯大林的印记。这就是他干的主要工作。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详细地筹划，用何种手段能使不合他心意的人声名狼藉，令他们诬告最亲密的人，可耻地出卖自己的人格。谁要是不顾一切地反抗，那等待他的将是一个小小的药瓶，因为亚戈达虽然消失了，但他的柜子还在。

列宁的去世和葬礼

斯大林在 1938 年的法庭审判中似乎还指控布哈林 1918 年曾参与策划谋杀列宁。幼稚而热心的布哈林敬仰列宁，像孩子对母亲一样热爱列宁，即使在论战中顶撞过他，那也是跪着顶撞的。按列宁的说法布哈林是块软蜡，他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名利的图谋。如果当年有谁向我们预言，说布哈林有朝一日将被指控策划谋杀列宁，那我们当中的任何人（第一个就是列宁）一定会建议把这位预言家送进疯人院。斯大林干吗非得提出这一极其荒谬的指控呢？了解斯大林的人就会有把握地说，这是为了回答布哈林曾经不慎说出的对斯大林本人的怀疑。莫斯科审判的所有指控都是照这种样子提出

来的。斯大林栽赃陷害的主要内容不完全是单纯的臆造，而是来自实际，大部分是来自各种案件或者是烧辣菜能手本人的意图。高尔基之死突出地暴露了“斯大林反应”带有防御进攻性，而这种性质的反应通过列宁之死则更充分地显示了出来。在前一件事上以亚戈达的性命为代价，在后一件事上则轮到了布哈林。

我对事态是这么设想的。列宁要毒药（如果他要过的话）是在1923年2月底。3月初他又一次瘫痪了。这一时期作出的诊断是谨慎而不乐观的。斯大林感到信心十足，因此他无所顾忌地行事，好像列宁已经死了。然而病人却使他大失所望。列宁的强健体魄加上坚强的意志终于占了上风。冬天前列宁开始慢慢康复，行动自如多了，经常听别人为他朗读并且自己看书；开始恢复言语功能。医生的诊断结果越来越令人放心。当然，列宁即使康复，也不可能阻挡官僚反动势力取代革命。1926年克鲁普斯卡娅说得很有道理：

“沃洛嘉假如还活着，那此时此刻他就会呆在牢房里。”

但在斯大林看来问题不在于发展的总进程如何，而在于他本人的命运如何；要么他现在，就是今天能一跃而成为机关的，因而也是党和国家的主宰；要么终生沦为三流角色。斯大林要权力，无论如何要得到全部权力。他已经牢牢地抓住了权力。目的已经接近了，但是来自列宁方面的危险更接近。正是在这个时刻斯大林不得不为自己下定决心，必须抓紧时间采取行动。到处都有完全和他命运与共的同伙。亚戈达便是召之即来的药剂师。斯大林是否已把毒药交给了列宁并暗示说医生不再指望他能痊愈，或者是否已采取了更直接的措施，这些情况我都不得而知。然而我坚信，当斯大林的命运

已是千钧一发，当结局完全取决于他的手稍一动弹时，那他是不会消极坐等的。

1924年1月的下半月我去高加索的苏呼米，试图治愈困扰我的无名感染，直到现在医生也没有查清楚此种感染的性质。我是在路途中获悉列宁去世的。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我之所以丢了权，是因为我没有出席列宁的葬礼。对这一解释未必能信以为真。但是我未出席追悼会这一事实本身使我的许多朋友感到很难受。我当时年仅18岁的大儿子的来信流露出—个少年的失落感：无论如何应该回来！不管心情多么沉重和悲痛，这也是当时我自己的打算。我和妻子是在梯弗利斯车站收到关于列宁去世的密码电报的。我立即用密码给克里姆林宫发去了直达电报：

“我认为必须回莫斯科。何时举行葬礼？”

约一小时后收到了莫斯科的回电：

“葬礼在星期六举行，您来不及赶到。政治局认为，鉴于您的健康状况，您必须去苏呼姆。

斯大林”

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而要求推迟葬礼。当我盖着被子躺在苏呼米疗养院的凉台上时才了解到葬礼已改在星期天举行。起初确定举行葬礼的日期，后来又改期了，其间的情况错综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斯大林耍手腕，不仅骗了我，看来还骗了他的三人联盟的其他成员。斯大林与一味从鼓动效果来看待一切问题的季诺维也夫不一样，他在耍冒险的手腕时有更实际的考虑。他可能担心我会把列宁的死与去年有关毒药的那次谈话联系起来，并且我一定会向医生提出是否是中毒的问题；我一定会要求进行专门分析。因此从

哪方面来看把我留在远处都要更安全一些，这样就可以对遗体作防腐处理，把内脏火化掉，再也无法作任何技术鉴定。

当我向莫斯科的医生们询问出乎他们所料的死的直接原因时，他们令人费解地把手一摊。不言而喻，解剖尸体是按照一切必要的规定进行的，因为这是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最关心的问题！然而医生们没有去寻找毒药，即便是洞察力较强的人认为有可能是自杀时也没有这样做。他们大概也没有提出别的什么疑问。至少他们不可能有过细地弄清问题的动机。他们懂得政治高于医学的道理。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寄给在苏呼姆的我；我没有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来打扰她。两年后，即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断绝关系后我才同他们恢复了个人关系。他们显然回避关于列宁去世的情况的话题，回答得很简短，眼睛望着别处。他们是否了解到什么事或者仅仅是有所怀疑呢？他们至少在此前的3年中与斯大林过从甚密并且不会不担心他们也会涉嫌。列宁之死的经过疑云重重。大家都回避这个话题，好像害怕注意到自己的不安心情。只有外向的、爱说话的布哈林有时私下作一些出乎意料的古怪的暗示。

“噢，你们不了解柯巴。”他心惊胆战地微笑着说，“柯巴什么都干得出来。”

斯大林在列宁灵柩前照本宣读了对导师表忠心的誓词，这个誓词的风格与他在梯弗利斯宗教学校学过的布道术的风格如出一辙。当时这个誓词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现在它却收录在每一本教科书里，成了西奈戒条。

* * *

自从莫斯科举行了审判和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最近的事态

后，人们不止一次地提起了尼禄和切萨雷·博贾的名字。我想，如果召唤这些历史亡灵，那也该说是超级尼禄和超级博贾，他们那个时代所犯的罪行与当代功勋相比简直就不值一提，显得太幼稚了。然而通过单纯的人物类比倒可以揭示出更深刻的历史内涵。衰落的罗马帝国的习俗是在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从多神教到基督教的转变时期形成的。文艺复兴时代标志着从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从天主教到新教和自由主义的转变时期。在这两种情况下旧道德消亡在前，新道德形成在后。

现在我们重新又生活在两种制度的转变时期，即通常伴随着道德危机的社会大危机的时期。旧的已彻底衰落，新的刚刚开始建立。当一幢房子的屋顶已坍塌，门窗的铰链已折断时，生活在这样的房子里是不便而困难的。此时此刻穿堂风席卷我们的星球。道德的传统原则越来越难以为继并且不仅是来自斯大林方面的……然而历史地作出解释并非宣告无罪。尼禄同样是自己时代的产物。但在他死后他的塑像被砸烂，他的名字到处都被人刮去。历史的报复比最强大的“总书记”的报复更可怕。我想，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1939年10月13日

于考约阿康

原载《对斯大林崇拜的思考》一书

（黄有自译）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 (1949年1月)

编者按：俄罗斯《近代与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4—5期发表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的6封往来电报及苏联政府的声明。俄罗斯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院士在为发表这些材料所写的前言中指出，在中国的一些文章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即苏联领导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对中共采取了冷淡和怀疑态度，而苏联政府于1949年1月就南京国民政府敦请美、英、法、苏四国调停以实现与中共和谈的建议所发表的声明，往往被用来作为上述说法的证据。美国的一些书籍还传说苏联曾劝告中共领导人“在打到长江后即停止进攻，并同国民党达成协议，甚至也可以同意分而治之”，以避免美国的干涉。齐赫文斯基认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公布的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这几封往来电报说明上述说法缺乏根据。

现将该杂志公布的斯大林与毛泽东的6封往来电报和苏联政府的声明全文译载如下，以供参考。

1

斯大林致毛泽东的电报

(1949年1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来照，建议由苏联政府来充当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调停人。类似的建议也同时发给了美、英、法三国政府。南京政府尚未得到上述三国政府的答复。苏联政府也还未予答复。整个来看，南京政府的建议是在美国人的授意之下搞出来的。该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

我们准备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希望了解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希望另一方——中国共产党也能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之举，希望能就苏联充当调停人一事征得另一方的同意。我们准备依此复照，你们是否同意此议，请告。如不同意，请秘示更为妥贴的答复。

我们还考虑到，倘若他们去征询你们的意见，你们似应大致作如下答复：

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和平，首先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所以应当由南京政府来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

不能容许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强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强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的战争的。我们认为你们的答复大体上应该如此。

如你们有不同意见，请将你们的意见告知我们。

至于说到您的莫斯科之行，十分抱歉，我们以为，鉴于上述情况，您还得将您启程的日期再推迟一些时日，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力量。这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苏联当然都是不利的。

早复为盼。

菲利波夫^①

2

斯大林致毛泽东前电的续电

(1949年1月11日)

如前电所述，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十分明显，国民党不会在没有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国民党也不愿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此，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

^① 斯大林出于保密的考虑，在这里使用了菲利波夫这个化名。

提出的条件举行谈判。其结局是，中共是赞成和谈的，因而不能指责它欲将内战继续下去。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就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将必胜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早复为盼。^①

菲利波夫

3

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

(1949年1月13日)

菲利波夫同志：

1月10日电收悉。

一、我们认为，对南京政府建议由苏联出面调停以结束中国内战的照会，苏联政府似应作如下答复：

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那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认为不能接受为中国内战双方进行调停的工作。

二、我们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特别是美国，尽管对参与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工作极感兴趣，从而达到使国民党政权保存下来之目的，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国政

^① 斯大林在电报中还向毛泽东全文通报了南京政府关于调停问题的照会，该照会由南京政府外交部递交并注有如下附言：“南京政府认为该建议不宜公布”。

府，已经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信誉扫地，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亡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强是否还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从而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看来都成为问题了。

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在给南京政府的复照中采取您 1 月 10 日来电中所陈述的立场，那么美国、英国和法国势必会认为它们也应当参与调停，国民党也就会找到诬蔑我们为好战分子的口实。

而对国民党深感不满，殷切地希望人民解放军尽快取得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感到失望。

因此，苏联如果从国际关系的整体利益考虑，在复照中能够采取我们提出的立场，则我们殷切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您若能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支援。

三、关于是否可以允许南京政府人员，包括战争罪犯在内，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还需斟酌一番。目前，我们倾向于采取这样的立场：为使中国人民能够尽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

战争是由南京政府挑起的，它犯下了滔天罪行，全国人民已不再信任它。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和实现和平，南京政府应该将政权交给人民。它没有任何理由存在下去。

我们认为，如果现在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进行和平谈判，并且以这些人的名义与我们一道组成联合政府，那么这刚好符合美国政府的心意。

而这样做却对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造成很大的混乱，也会使我们现在所坚持的完全正义的立场遭到严重损害。

自1947年7月以来，我们已慎重地并长时期地注意到谈判的欺骗性，只要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失败，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就必然要求进行谈判，我们还注意到这种骗局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何种程度的影响。

令我们深感忧虑的是：这种骗局将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影响，将使我们被迫再一次作出政治上的迂回，也就是说不能不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我们暂缓建立联合政府。这样做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要使美国人和国民党分子打出他们的所有王牌，而我们则是在最后时刻打出自己的王牌。

不久前，我们公布了战争罪犯名单，共计43人，是以非正式形式（权威人士声明）公布的。人民解放军尚未发出缉拿这些战犯的逮捕令。

1月1日，蒋介石提出了和平建议。对此我们同样还是以非正式的形式（记者评论）作了回答。

总之，我们已为转折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看一看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对国民党的和谈骗局作何反应。

而现在我们认为完全有理由不接受国民党的和谈骗局，因为现在，由于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所以，今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当可渡过长江，进攻南京。

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次采用政治上迂回的办法了。在目前的局势下再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只会是弊多利少。

四、感谢您就如此重大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若您不同意我的上述意见，或您对之有何修改意见，请告知。

毛泽东

1949年1月12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的电报

(1949年1月14日)

致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南京和谈建议的长电收悉。

一、倘若南京政府根本没有提出和平建议，再倘若美国搞的这套和谈花招根本都不存在，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显然，这套花招是不符合我们意愿的，因为它可能会给我们共同的事业造成麻烦。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花招出现了，它的存在是个事实，对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而必须予以重视。

二、毫无疑问，南京方面和美国人的和平建议，是一种欺骗政策。这是因为，首先，南京方面事实上并不想同共产党言和，与共产党言和就意味着国民党要放弃它的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而放弃这一基本政策，就会导致国民党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死亡以及国民党军队的彻底崩溃。其次，他们懂得，共产党不会与国民党言和，因为共产党也不会放弃它的消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

那么，南京方面的企图究竟是什么呢？他们的企图不是与共产党实现和解，而是与共产党休战，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利用休战作为喘息之机，整顿国民党军队，加强长江南岸的防卫，从美国调运武器装备，积蓄力量，然后再撕毁停战协议，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并将破坏和谈的罪名转嫁到共产党的头上。他们的企图最起码是要阻挠共产党将国民

党军队彻底击垮。

这就是南京方面和美国人目前所推行的欺骗政策的核
心。

三、如何来对付南京方面与美国人的这一花招呢？答案
有两个。第一个答案是，公开地、毫不掩饰地拒绝南京方面
的和平建议，这就等于宣布一定要将国内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第一，你们往牌桌上甩
出了自己那张重要王牌，而把和平的旗帜这一如此重要的武
器拱手让给了国民党。第二，这意味着你们在帮你们国内外的
敌人的忙，让他们诬蔑共产党是继续打内战的好战分子；而
赞扬国民党是和平的卫士。第三，这意味着你们为美国提供
了可乘之机，使其得以在欧美公众中大造舆论，鼓吹不可与
共产党讲和平，因为它不愿意要和平，唯一能够在中国实现
和平的办法是由列强组织武装干涉，就像 1918 年到 1921 年
的 4 年间曾在俄国进行的那种武装干涉。

我们认为，当你同诚实的人打交道时，公开的、毫不掩
饰的回答当然可取，然而当你不得不同南京方面那些政治骗
子打交道时，公开的、毫不掩饰的回答就可能是危险的。

然而还有另一种答案。这便是 1. 表示愿意在中国实现和
平；2. 双方应在没有外国调停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
为中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外国调停人；3. 谈判应当在
共产党与作为一个党的国民党之间进行，而不是与挑起内战
并因此而失去民心的南京政府进行谈判；4. 一旦双方就和平
与中国的领导权问题达成协议，军事行动就当立即停止。

国民党是否会接受这些条件呢？我们认为不会。不过，如
果国民党不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人民就会明白，继续打内战

的罪人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这样，和平的旗帜就落在了共产党手里。这一局面目前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厌恶内战的人，他们愿意支持那些主张建立和平的人。

但假定，——我们认为这种假定是根本不可能的——国民党接受了这些条件，共产党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呢？

第一，应当不停顿地采取军事行动，建立中央联合政府机构，并将五分之三的（政治）协商会议议席、三分之二的政府部长职位留给共产党，而将余下的议员席位和部长职位分配给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

第二，应当把总理、总司令，并尽可能地把总统的职位都留给共产党。

第三，应当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这样建立起来的联合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而其他任何妄想篡夺中国政府地位的政府都是欺世盗名的叛乱集团，应予取缔。

最后，应当通过联合政府不但向你们的军队，也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命令，要求军队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并保证立即停止对那些已宣誓效忠的军队采取军事行动，而对拒不宣誓的军队继续实施军事行动。

国民党方面未必愿意接受这些措施，但是只要他们不接受，事情就会于他们更为不利，因为那样他们将会被彻底孤立，而这些措施也将在没有国民党人的情况下执行。

四、以上便是我们对事情的理解及给你们的建议。或许我们在前电中没能把我们的建议完完全全地表述清楚。

请你们把我们的建议仅仅看作是建议，而不是要求你们必须做这做那，你们可以接受这些建议，也可以不接受。你们尽管相信，拒绝这些建议是不会影响我们之间关系的，我

们仍将一如既往地做你们的朋友。

五、至于说我们对南京方面调停建议的答复，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意愿来起草。

六、我们依然坚持认为，您最好暂缓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如您愿意，我们可马上派一位政治局负责成员到你们那里去，在哈尔滨或其他什么地方就你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谈。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4日

5

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

(1949年1月14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一、您1月11日续电收悉，我感到十分欣慰。就基本方针而言，即阻止与国民党的广泛谈判和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与您是完全一致的。

今天，我们公布了我们同意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蒋介石1月1日在其和谈建议中提出的五项反动条件提出来的。

几天以前美国人已经试探过我们的反应，想了解我们是否愿意在没有43个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可见，仅这一项条件，即在没有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已不足以戳穿国民党和平谈判的阴谋。

二、……^①

三、在国民党发表和谈建议之后，国统区出现了极大的混乱，为数众多的居民向国民党要和平，谴责国民党提出的和谈条件太苛刻。

国民党的宣传机关匆忙出来解释国民党为什么必须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和为什么必须掌握军队。我们认为，国民党内部的这种混乱局面还将进一步扩大。

毛泽东

1949年1月14日

6

斯大林致毛泽东的电报

(1949年1月15日)

致毛泽东同志

我们刚刚收悉您后一份内容不长的电报。由此电可以看出，我们在南京方面的和谈建议一事上观点已达成一致，中国共产党已开始进行“和谈”运动。也就是说，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5日

^① 这一条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电台与莫斯科继续联络的方法，故在这里略去。

附录：

苏联政府关于复南京政府备忘录（照会）的公告

（载于 1949 年 1 月 18 日《消息报》）

中国外交部 1 月 8 日向苏联驻华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内容是中国政府邀请苏联政府担当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举行和平谈判的调停人。苏联大使被告知，中国政府还向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提出了同样的请求。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安·亚·维辛斯基同志于 1 月 17 日会见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先生，并向他转交了苏联政府的复函。苏联政府在复函中指出，为始终不渝地遵守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苏联政府认为担当上述备忘录中所要求的调停工作是不合适的。

苏联政府在复函中还指出：使中国作为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恢复统一，那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这种统一只能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首先是双方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直接谈判来取得。

原载《近代与现代史》杂志 1994 年第 4—5 期

（刘淑春译）

同毛泽东同志谈话笔记

——摘自尤金日记

(1956年3月31日)

今天我拜会了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关于苏联向（1）51个企业和3个军工科研所的建设，（2）乌鲁木齐至中苏边境段铁路的建设提供援助）。毛泽东请我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转达他的深深的谢意。

我接着说，我返回北京后本想立即拜会他（毛泽东），并谈一下苏共20大的工作，特别是赫鲁晓夫同志在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毛泽东回答说，他由于生病不得不推迟了同我的会见。毛泽东说，中共出席20大的代表团成员给他谈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并带回了一份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现在这个报告已经译成中文，他已经看过。

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指出，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虽然基本正确，但他在个别时期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斯大林在1926年的几次讲话中夸大了国民党的革命能力，把国民党当作中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斯大林在1926年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向国民党看齐，把国民党当作中国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斯大林说，应当依靠国民党，追随国民党，也就是他直接谈到了中国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问题。这是一个束缚了中国共产党在动员群众、争取群众方面的独

立工作的大错误。

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成为共产国际事实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下达了大量的不正确的指示。出现这些错误的、不正确的指示的原因是斯大林听不进中共中央的意见。当时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经常会见斯大林，他片面地向斯大林报告中共的情况。斯大林看来也认为只有王明才是中共中央意见的唯一表达者。

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和李立三试图掌握中共的整个领导。他们把批评他们的错误的共产党员都说成是机会主义者。毛泽东说，他们把我叫作右倾机会主义者和狭隘经验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举了以下一个例子来说明共产国际如何错误地对待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以中共三中全会在讨论李立三的盲动主义错误时对这些错误的批评不彻底为借口，为了纠正中共三中全会的错误，过了3—4个月派了两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米夫和王明来中国^①，他们的任务是召开中共四中全会。而在米夫和王明的压力下作出的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实际上比李立三路线更“左”。决议说应该进攻大城市，夺取大城市，而不要进行争夺农村地区的斗争。例如，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犯了一个大偏差，以致在被国民党包围的中国苏区里甚至取缔了小商业资产阶级，停止了一切国内贸易。由于执行了这样的政策，1929年达30万战士之多的中国红军，到1934—1935

^① 王明1929年到中国，米夫1930年11月到中国。

帕·亚·米夫(米·亚·福尔图斯)(1901—1937)——1927—193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局书记处领导人(奥·威·库西宁)的第一副手，1937年被非法镇压。死后平反。

年只剩下 2.5 万人，而中国苏区的面积减少了 99%。中国共产党在城市里的组织被国民党所摧毁，而共产党员的数量从 30 万人减少到 2.6 万人。苏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完全隔绝，没有任何商品，连盐也没有。这一切引起了苏区居民的严重不满。

执行王明“左”倾政策的结果是，基本上只有华北（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保留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略大一点地区，因为王明的权力还没有涉足这些地区。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实际上力图使八路军和新四军脱离中共中央的领导。

王明及其追随者把国民党看作吸收了一切优秀传统、能战胜日本的“年轻力量”^①。他们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反对加强中共的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反对将各阶层居民团结在中共政策的周围。王明分子力图用自己的六条纲领（其作者是王明）来取代中共的真正革命的十大纲领，而王明的纲领实质上是投降主义纲领。王明在执行这一政策时打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招牌，以主要权威自居。

王明分子利用他们在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占多数这一点，给军队和地方下达错误指示。毛泽东说，例如，有一次，我们大吃一惊地发现，连挂在延安房子墙上的中共标语根据王明的命令都被换成了“同国民党结成牢固的联盟”等这样的标语。

由于进行了严肃的思想斗争，做了巨大的解释工作，在

① 原文如此。

中共七大之后，特别是最近4年中，大多数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的共产党员都承认了自己的过失。王明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也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在此后又回到了原来的立场上。毛泽东说，王明以前的活动都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毛泽东在评价共产国际的整个活动时指出，共产国际在列宁在世时在团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建立和加强各国共产党、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起了杰出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活动的这一时期很短。后来季诺维也夫^①、布哈林^②、皮亚特尼茨基^③之类的“活动家”进入共产国际。他们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对王明的信任超过了对中共中央的信任。在共产国际后期，特别是在季米特洛夫^④主持工作时期，有了某些进展，因为季米特洛夫依靠我们，相信中共中央而不相信王明。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也犯了不少错误，如解散波兰共产党等。毛泽东说，因此共产国际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最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也最大。而且遗憾的是，共产国际正是在这一时期

① 格·叶·季诺维也夫(拉多梅斯尔斯基)(1883—1936)——1919—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② 尼·伊·布哈林(1888—1938)——1919—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季诺维也夫被解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后领导共产国际的工作。

③ 约·阿·皮亚特尼茨基(塔尔希斯)(1882—1938)——1921年起在共产国际中工作，1923年起担任书记，1928年起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④ 格·米·季米特洛夫(1882—1949)——从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从193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1936—1943年在共产国际中分管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处理东方问题最多。毛泽东指出，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当时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除了有其他原因外，也是由于共产国际错误行动带来的结果。毛泽东指出，因此，坦率地说，对于共产国际的解散我们是满意的。

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后来对中国局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的估计也是不正确的。他对国民党力量的信任仍然超过了对共产党力量的信任。1945年他坚持要求同蒋介石分子媾和，要求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要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尤其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一份不知为什么是以“俄共（布）”的名义发出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发的）秘密电报，电报里坚持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①。中共中央当时反对毛泽东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会进行挑衅。毛泽东说，但是我不得不去了重庆，因为这是斯大林坚决要求的。1947年当反对蒋介石分子的武装斗争正如火如荼，我军节节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坚持要求同蒋介石签订和约^②，因为他对中国革命的力量有怀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之后，斯大林仍然不信任我们。也许斯大林的猜疑和不信任是由于南斯拉夫事件引起的。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何况当时纷纷传说中国共产党将走南斯拉夫的道路，而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我对毛泽东说，我们党内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绪和议论。

毛泽东接着说，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右翼社会党人接过“关于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说法大肆渲染。毛泽东指出，当时斯大林看来不相信我们，而资产阶级和工党人

① 关于斯大林1945年对中国的立场的这一电报和其他文件没有发表。

② 证实这一说法的文件没有发表。

士幻想“中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只有蒋介石一个人“捍卫了”毛泽东，大肆叫嚷说资本主义列强决不能相信毛泽东，“他决不会离开自己走的道路”等等。蒋介石的这种行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太了解我们了，他不止一次地同我们发生冲突、打过仗。

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对中共的不信任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也有所表现。我们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①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

毛泽东说，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边界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②。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后来就有了同柯瓦廖夫^③和费德林^④的不愉快的谈话，他们建议我去苏

① 指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条约。

② 阿·伊·米高扬(1895—1978)——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贸部长。

③ Н. В. 柯瓦廖夫(1901—1993)——1948—1949年任援华专家组组长，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的代表。

④ 尼·特·费德林(生于1912年)——1938—1968年从事外交工作，著名的东方学家。

联全国游览。我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回答说，我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毛泽东接着说，过了一段时间，给了我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答记者问^①的草稿。这个文件说，莫斯科正在进行签订中苏条约的谈判。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毛泽东说，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他们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开始了谈判，马林科夫^②、莫洛托夫^③、米高扬、布尔加宁^④、卡冈诺维奇^⑤、贝利亚^⑥参加了谈判。谈判期间，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试图由苏联单独占有中长路。但是后来决定共同使用中长路，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苏联提供旅顺的海军基地，在中国建立4个合营公司。毛泽东说，根据斯大林的倡议，东北和新疆实际上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这些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其他外国的代表，包括在这些地区定居的捷克人、波兰人、英国人都必须从这些地区迁走。斯大林唯一不提的是朝鲜人，因为朝鲜人在东北有150万人之多。毛泽东说，对于斯大林的这一类要求我们很不理解，这一切都给资产阶级报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们以口实。毛泽东接着说，实际上在谈判过程中环绕这个条约进行了真正的讨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答塔斯社记者问，载于1950年1月2日《真理报》。

② 格·马·马林科夫（1902—1988）——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③ 维·米·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1890—1986）——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④ 尼·亚·布尔加宁（1895—1975）——当时任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

⑤ 拉·莫·卡冈诺维奇（1893—1990）——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⑥ 拉·帕·贝利亚（1899—1953）——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价还价。这样提问题不漂亮，但突出地表明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猜疑和不信任。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高兴地指出，中长路和旅顺已归还中国，合营公司已停办^①。毛泽东在这部分谈话中强调指出，赫鲁晓夫没有参加这些谈判，布尔加宁参加得也很少。

斯大林对中共的不信任还表现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包括著名的柯瓦廖夫关于中共领导人中存在反苏情绪的文件^②。斯大林把这个文件交给中共中央，他看来想强调指出他的不信任和猜疑。

毛泽东说，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越来越感到对我们的不信任，因此请求向中国派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苏共中央的代表，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中国理论家的著作，同时看一看毛泽东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的中文版未经作者审阅，而苏联同志又不顾作者的意愿坚持要求出版这些著作。

毛泽东提醒我说，在我（尤金）来华后，他特地坚决要我去全国走一走。我就此告诉毛泽东在我归国后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在场的还有几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当时问我，中国的领导同志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在听到我的肯定答复后说：“这很好！可以放心了。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自己成长起来了。”

毛泽东指出，这样提出问题本身也表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

① 指根据1950年3月27日两国政府协议建立的4个合营股份公司。根据1954年10月12日协议，苏联在其中的股份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② 指И. В. 柯瓦廖夫1949年底向斯大林呈交的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把这份报告给了他。

看来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共的一个重要情况是您（尤金）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毛泽东说，因此，如果从历史上来看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斯大林对它的态度，那么可以看出，犯的错误多么严重，尤其是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这些错误蔓延很广。1945年后，在同蒋介石斗争时期，由于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而对中国革命的力量估计不足，斯大林试图使双方和解，限制革命事态的发展。甚至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还继续不信任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说，尽管如此，我们坚持了革命立场，要是我们动摇了，犹豫了，那大概早就完蛋了。

然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作用作了总的评价。他指出，斯大林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优秀的正直的革命家。但是他在很长一段时期的大量工作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大错误，其中主要的错误赫鲁晓夫的报告已经一一指出。毛泽东说，这些主要错误可以归纳为7条：

(1) 非法镇压；

(2) 战争时期的错误，主要是战争初期而不是战争后期的错误；

(3) 严重损害工农联盟的错误。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在莫斯科与朱德同志谈话时谈到了这一类错误，尤其是谈到了错误的农民政策；

(4) 与非法迁徙一些民族有关的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毛泽东说，但是整个来说民族政策是正确的；

(5) 拒绝集体领导原则，骄傲自满，受到阿谀奉承之徒的包围；

(6) 独断专行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7) 对外政策上的严重错误（南斯拉夫等等）。

毛泽东接着强调了以下的想法：从整体来说，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从2亿人口发展为9亿人口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但是在胜利前进的过程中，一些国家、一些党犯了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他说，类似的或其他的错误今后还会犯。我指出，像斯大林犯的那样的错误最好还是不要再犯。对此毛泽东回答说，看来将来还会发生这样和那样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出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完全可以解释，因为众所周知，社会是通过矛盾的斗争，新和旧的斗争，新生事物和垂死事物的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说，我们的意识中旧的残余太多。我们的意识落后于不断发展的物质世界，落后于生活。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这些国家有许多东西来自资本主义旧社会。例如，对被告的体罚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新问题。早在1930年红军中审问时就盛行打人的做法。毛泽东说，我当时亲眼见到殴打被告。当时就作出了相应的决议，禁止体罚。但是在延安又违反了 this 决议。当然我们竭力不允许非法处决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进一步同这一丑恶现象作斗争。毛泽东接着说，十分明显，被告在遭到殴打后自然会开始作假供，而审问者对此信以为真。资产阶级旧世界留给我们的这种残余及其他残余还将长期留存在人们的意识中。讲排场，摆阔气，节庆大操大办——这也都是资产者心理的残余，因为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客观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习惯和心理。毛泽东说，这些和其他的情况的存在为各国共产党内产生这样和那样的错误创造了条件。

我指出，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迹近奉为神明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他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积累起来的。加上他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大家都知道，人是会犯错误的。毛泽东谈到，他在看列宁的手稿时确信，连列宁也删改他的著作中的某些字句。毛泽东在结束他对斯大林的评论时再一次强调指出，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

总的说来，他强调指出，代表大会的材料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大会之后形成的气氛也将有助于我们更自由地说出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苏共提出所有这一切问题很好。毛泽东表示，在这件事上我们很难表现出主动精神。

毛泽东声称，他预计今后在米高扬同志来华时以及在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志方便时还将继续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接着离开这个话题，兴致勃勃地稍许涉及某些哲学问题（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等等）。他特别强调指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任何矛盾、没有思想斗争、没有任何残余的社会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毛泽东说，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好人和坏人。他接着说，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还有死背教条和公式化的毛病。尤其是中国的报刊还不符合对它提出的要求。在报刊的版面上没有不同意见的斗争，没有重大的理论论战。毛泽东由于时间不够表示愿意再一次会见我，专门谈谈哲学问题。

我在谈话结束时问毛泽东，他是否读过《真理报》谈个

人崇拜危害的编辑部文章^①，3月30日《人民日报》已经刊载了这篇评论的译文。他回答说，他还没有来得及读完这篇文章，但别人告诉他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正准备由《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谈这个问题的社论^②，这个星期这篇社论就将见报。他开玩笑说，从3月16日起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大谈特谈这个问题，只有中国还没有说话。

我接着简单地告诉毛泽东，16个著名的苏联学者已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在苏联专家俱乐部开幕的讨论20大的理论讨论会已开始工作，会上苏联和中国学者将分别作报告。

毛泽东对这些消息十分感兴趣。

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毛泽东情绪很好，常常开玩笑。

参加谈话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和苏联驻华使馆参赞 T. Ф. 斯克沃尔佐夫。

苏联驻华大使 帕·尤金

原载《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

(梁元和译)

① 指《为什么个人崇拜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一文，载于1956年3月28日《真理报》。

② 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载于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